

孫中山先生傳

于右任敬題



孫中山先生傳

高良佐著

近芬書屋印行

第一卷 少年時代

—— 紀元前四十年（一八七二）至紀元前廿二年（一八九〇年）——

第二卷 革命停頓時代

—— 紀元前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年）至紀元四十年（一九〇二年）——

第三卷 革命猛進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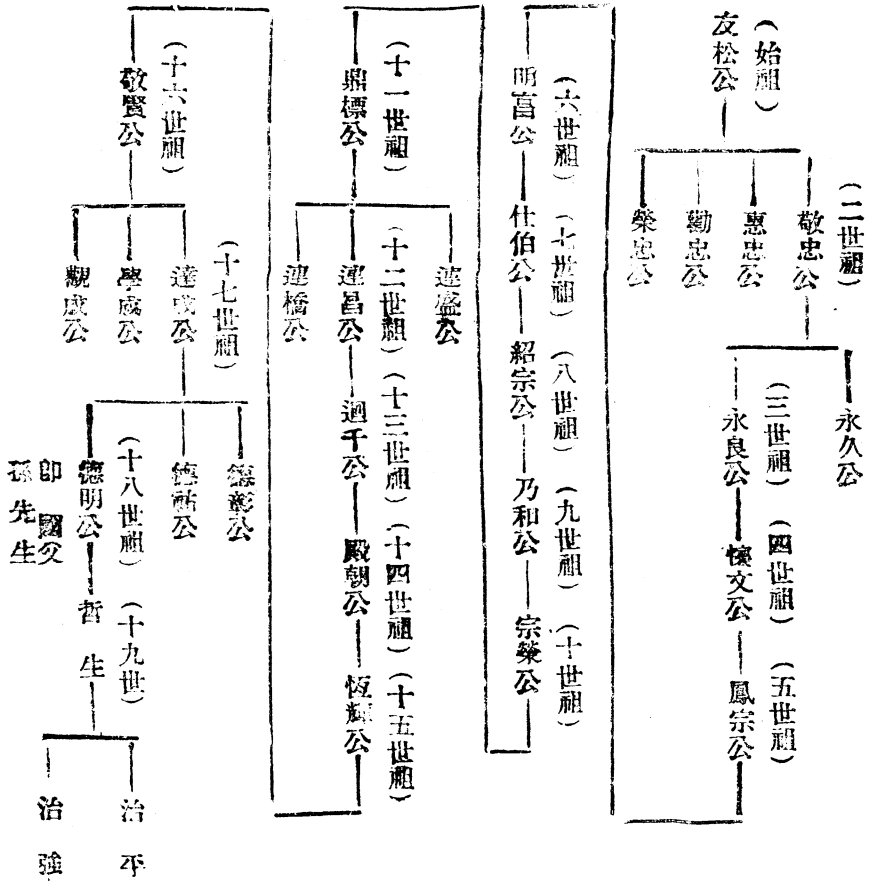
—— 紀元前九年（一九〇三年）至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



## 總理遺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  
四十年其目的在求  
中國之自由平等積  
四十年之經驗深知  
欲達到此目的必須  
喚起民眾及聯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之  
民族共同奮鬥  
現在革命尚未成功  
凡我同志務須依照  
余所著建國方略建  
國大綱三民主義及  
第一次全國代表大  
會宣言繼續努力以  
求貫徹最近主張開  
國民會議及廢除不  
平等條約尤須於最  
短期間內其實現是  
所至囑

# 世系表



# 黃季陸序

二十年來，我時常不能忘懷一件極重大的事情——寫一部比較有系統的中山先生的傳記。這是我決心編纂的，雖然始終沒有完成的素願。

傳記本來是不易執筆的，除了要充分了解傳主的生平，他的思想和他的事業，以及許多有關他人格上、精神上的發揚以外，還要能夠澈底明白傳主所居的時代與環境的特徵，而把一些影響於他和他所給予的影響，極整的整個的提示出來。傳主如果只是任某一方面有所成就的人，那邊容易，若被傳的主人乃是一位不世之聖，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建樹，牽涉的範圍既寬，包羅的內容的更廣，資料浩繁，頭緒紛雜，要能處理得恰如其當，那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中山先生是一個時代的偉人，世界的聖傑，可以說，他乃是現代史的創造者。他的一生，雖只短短的六十年，而其影響所及，在時間與空間上都有極大的深度。因而要給他寫一個比較合於理想的傳記，就須涉及極多的方面，幾乎等於是整理一部綜合性的現代史。這該艱鉅的工作，本非一時可就，或許還不是一人所能的。

這件適有重大意義的工作，使我不能忘懷；為其艱鉅的緣故，又使我不敢草率，而且無法輕易執筆。

十三年的春天，我剛從美國回來，在廣州見着中山先生，便打算替他做一部傳記。那時和先生見面的機會較多，先生又很樂於和青年同志接近，我便開始蒐集傳記的材料，並希望由先生的口中，得着許多珍貴的逸史。先生告誡我過不少的軼事，都是未曾刊布過的材料，有些看來，雖似無關重要的瑣事，然而却是以表現一個偉大人物的特徵來。所以我不敢有所遺漏，事無巨細，完全將它筆記下來，以備參考。這些材料，經過若干次的流離奔走，一直帶至我身旁，不敢讓它稍受損失。二十七年入川時，交通不便，只得暫時寄存在柳州為關文懿。去年湘桂戰起，柳州淪陷，這些珍貴的筆記，難免於浩劫，每次想起，往往使我心痛。

先生的詩常接觸之中，我開始驚異着。先生的修養，遠非世人所及。先輩人格上、思想上的修養，固屬偉大，其學術上的修養，尤非世人可及；即是章辭令來說，其優美的程度也是並世無偶的。先生說話，無論演講和對談，都是親切、誠懇之至，且能雅俗共賞，有時，也頗富於幽默感。記得先生曾經告訴我一個幼年的故事，事蹟平常，他却說得非常有趣。

先生的哥哥德彰先生，是檀香山的首富大王，家裏自然有很多的馬匹；但這些馬多是用來馱物的，並不慣於被騎。先生小時會去過檀香看他的哥哥，有一天，見着馬快索着馬來，他便天真的爬上無鞍的馬背上去。這馬無是不慣被騎，立刻就受驚而亂跳起來。先生這時自然是非常危險，却又無法下來，便只有用力將馬抱住，口裏不斷的「一、二、三、四……」的數着，用機械的動作來緩和緊張的場面。先生說：「當我數到七八下的時候，我便不知道了！」我聽了這話，莫名其妙，爲甚麼數到七八下就會不知道了呢？他說：「當我能夠知道事的時候，我已經躺在醫院的床上了。」原來先生不久即在馬背上被拋下地，跌昏了，失去知覺，一直到醫院裏施診後才醒轉過來。這個故事本來是極其平常的。可是因爲先生善於辭令的緣故，却把它說得娓娓動聽。至於他正學術方面的修養，真可說是學究天人，無書不讀，大家却不十分明白。有一個故事，就可以充分證明先生的好學用功。

我從美洲回國的時候，在紐約買了兩本最新出版的書，一本是 Reger and Mc. hain 合著的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s of government 一本是 Roger and Whiting 著的 New Constitution of Europe 在廿幾天的旅途中，無事時，便略略翻覽了一下。到廣州見着先生，他問我說：「你新從美國回來，他們最近新出版有甚麼好的書嗎？」我當時便將這兩本書說了出來，並說乃是最新最好的出版物。他說：「這書裏面講的甚麼呢？」我以爲這樣近才出版的書，先生當然沒有不到，便把書內的要旨，大概的說了一番。先生聽過之後，卻從書架上拿出一本書來問我說：「你所說的，是否就是這本書呢？」我接過來一看，真是我所說的那本書。在書裏面，先生已用紅藍鉛筆加注了許多的記號，可見他不只有了這樣極新的書籍，而且已是精讀透了。

自述傳者來，先生的確是無微不至，而且讀無不精了。他在學術上的修養如此，其它各方面的修養，也不如此。一個偉大人物的成就，自有他的獨到之處，而我們所應效法的，也即在此。

忽忽二十年來，我這一素願還未達到，時常引爲生平的一大憾事。而同時環顧國內，也始終沒有一本系統的黃炎培產生，尤更覺非常焦慮而難過。最近高良佐同志撰成本書，不獨我個人爲之興奮，想來大家也會引爲欣感的。

高良佐同志研究黨史有年，對於先生的生平尤其留心；若干年來，便在苦心孤詣的搜集材料，從事整理，因爲他不願意過於草率的緣故，直到今天才將全稿完成。我早已很明白而且很欽佩他的忠忱與毅力，更早早希望他能及時完稿，尤盼其能早日問世。當他以原稿見示時，我心中真有無窮的滿足，同時也不禁引起了無限的感歎！原稿我會匆匆一讀，便決心設法使能出版。以高同志的修養來說，寫一部好的傳記是毫無問題的，不過先生的傳記太難着手了，其間自然難免也還有些不能十分刷到的地方。在這裏，我不願多說，讓讀者去細細體味。但我可以說，這本書的內容，大體上是毫無問題的，而且還有它的精到之處，不致辜負讀者們期切的舉意。同時，我們今天能夠讀到這樣一本有系統的中山先生傳記，無論如何，也是值得特別滿意的一！

黃炎培序於國立四川大學，三十四年四月十五日。



孫中山先生遺囑

四

## 自序

寫作傳記，是一個最艱鉅的工作。中外各處傳記作品的數量，並不算小，但當得起所謂不朽之工作者，能有幾部？這是因為傳記本身格調的關係，限制了許多寫作者的能力發展，劉知幾說：「史才須有三長：才也，學也，識也。」而寫作傳記，不僅具備這三個條件，還須要處處受到傳記主人翁的束縛。章學誠對傳記寫作，比較說得具體，他說：「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之中，有一定焉。」這所謂無定中之一定，就是受傳記主人翁束縛的意思。四五年前，吳爾芙夫人在她傳記的藝術一文中，也說：「藝術家，不論是詩人，戲劇家，小說家，繪畫家，雕刻家，都有其創造的自由；他不受什麼束縛，也沒有什麼束縛——除了他自己給自己的束縛。傳記家不然；他沒有這自由，他有無數層束縛，他的情感，想像，思想，只能在這無數層的束縛之中活動。傳記寫作的不容易成功，這恐怕是主要原因之一。傳記家史屈萊基也有寫一部完美的傳記，與遇一個完美的生命同樣難得的感慨。」

國父孫中山先生不但是中華民國的開創者，革命的導師，並且在近代世界史上是一位劃時代的偉大人物。他一生事蹟，包括革命運動的經歷，革命思想的開展和同時代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思潮等的變動，波瀾起伏，事態萬殊。是一個最好的傳記材料，但也是一部最難寫的傳記。我服膺國父主義廿餘年，竊不自揆，打算寫這一部傳記，動議很久了。當國父逝世後一年——民國十五年春天，由同學鍾孟雄君的引導，到寶山楊行去訪謁居覺生先生，因雨未留，在覺生先生的藏書樓中，看到許多革命事蹟的照片和書報，窮一夜之力，盡量翻閱，不覺引起了蒐集國父傳記資料的興趣。十七年來廣州，先師鄧翼如先生手訂孫中山先生傳目錄大綱，令我着手編寫，但當時材料十分缺乏，祇寫了十分之一，又因他事所阻，從此擱置，原稿也即廢棄。十八年在上海，勸鄧翼如先生編印建國通志，以發揚革命精神為建國主要任務之一，因此竭力蒐集材料。翼如先生以

所藏各種珍貴史料，都給我利用，按期發表。同時又常到徐家匯天主堂圖書館，瀏覽各種已經絕版的革命書報，對於傳記的寫作，因此更感興趣，但始終不敢動手。十九年春天，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成立，我就參加工作，從此更加深了我對於革命史料研究的興趣；同時也感到寫作 國父傳記的種種困難。因為我那時勸助編輯 國父年譜，及補編 國父全書，對於材料的蒐集，雖然比較便利，但愈蒐求而愈感材料利用的不夠，劉知幾說得好：「學者欲博聞強事，多識其物。若不窺別錄，不討異書，專治周禮之章句，直守避閭之紀傳，亦何所能自致於此乎？」我們寫 國父傳記，就不能專有於局部的材料，必須廣及同時代其他有關材料，才能獲得一個完整的概念。但是材料蒐集得多了，還須加以審慎的去取，嚴密的鑒別，即所謂「學者博聞，貴在擇之而已。」因此我從二十一年起，曾經費了相當長的時間，從事史料的考訂工作。寫過許多有關革命史中重要事實的考訂文章，在逢國月刊上發表，如 國父先世世系，與中會創立地點和時間問題等，都曾加以討論，我最初的計劃，是想對於每個革命史中的重要問題和史實，加以澈底瞭解，然後才可以用融會貫通的方法，寫成一部比較生動的紀傳。但深感自己學力才識不夠，因此雖然抱了這種熱情，始終不敢下手。直到二十四年，才開始試寫每當一章寫成以後，自己看看，終不滿意，雖是不斷地往下寫去，卻從不經意示人。二十五年，曾以已記之稿，請示翼如先生，不幸是年先生在歐陽園，原稿曾留置在他的書房內，未加手定，從此失掉了一位指正先賢進，我也興味索然，不想繼續寫下去了。

抗戰以後，我把這部稿子，在雜亂生活中，帶到後方，但為恐敵機炸毀，常常保藏在鄉間，同時工作環境的變遷，更無法繼續寫作。許多師友每以此督責，使我感到萬分惶悚。尤以吾師黃季陸先生之督責最嚴，到最後又得黃大白、繆振鵬兩兄之助力，才陸續成付印。這一本幾經醞釀，曠時甚久的稿子，現在雖然才能問世，我的反因此惴惴不安。因為 國父的偉大事蹟，在我這平庸的筆底下，祇是一堆沒有消化，沒有結構的材料而已。

這部傳記的體例，在此不能不作簡單的說明：當我動筆時，首先抱定了實錄直書的態度，因此有許多在草

命運中誤事敗事的黨人，並不掩飾；當時很努力而現在錢衝的人，還是根據事實，加以記載。歷次革命運動，此舉彼中，都有脈絡可尋，因此特別注重整體性連續性的描寫，而尤於國父策動領導的關係、處處關照，以明主旨。我並不忽略國父生活動能及實際行動的描寫，我更企圖在這實際行動背後所隱藏的革命動力，加以透視。爲要了解國父思想的演進，人格的成長，內心的變化，常常不惜篇幅來引用多國父自己的話，更用各種其他事實加以旁證，有時，意增感述，恍惚身臨其境，我會流過熱淚，也會歡欣而笑。有時，我也曾以旁觀者的態度，來觀察衡量當時事實的經過。雖然爲了材料的缺乏，和自己能力的限制，不能暢所欲言，但我却企圖使這部傳記，能夠成爲國父生活之體系化。全書因寫作時環境一再變動的關係，許多引用的材料，大都未加標註；現在大部份的材料，且多散逸，更難查明記註，這是很大的缺憾。但全書所記一事一言，都有根據的。現在據記境所及，曾經參考的重要材料，尚可舉出的：關於國父遠祖遷徙的地點，和家世的源流，我過去雖會做過許多考據的工作，但現在完全接受羅香林先生的意見。國父故鄉的一切情形，我在中央黨史會時，曾請鍾公任先生加以實地調查，而王玉斧先生的再度調查，更給我不少材料。現在玉斧先生已歸道山，就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紀念。關於國父在檀香山的求學情形，大體是根據美人利斯特力區 H. E. Rosarich 的孫逸仙傳，因爲他曾在檀島教書，關於意奧蘭尼學校的情形，再沒有比他更詳盡的記載了。倫敦蒙難的事實，一方面根據國父原著的英文本，對現行的譯本，有相當校正；一方面又根據羅志希先生的考訂及其所附偵探社的報告原文。與中會方面的事實，主要的參考材料是陳少白先生的與中會革命史要，少白先生此書，作於民國十八年他南下參加國父奉安的時候，當時孫應翼如先生的邀請，替我們建國月刊社同人講述的。至於美人林白克先生的孫逸仙傳，英人康德梁先生的孫逸仙與新中國，及日人宮崎的三十三年落花夢，孫逸仙傳，四野橘次郎的中國革命史等，都是重要參攷材料。民國二十年平岡小太郎也曾從青島寄來一篇回憶，我請程萬里先生加以選譯，現在程先生也已作故，不勝人琴之痛。與中會及同盟會時代關於南洋及美洲華僑參加革命的許多寶貴材料，應該感謝的一位是張永福先生，他給了我一本南洋與創立民國，一位傅壽林先生，承借印刷

精美而價值甚高，以作參考。同時又替建國月刊寫了許多文章，都是不可多得的資料。黃警頑先生的南洋華僑革命史蹟，也是一本好書。而胡展堂先生十九年在新亞細亞學會演講南洋與中國革命的時候，更對我有很多的啓發。在此時代的革命書報，如民報、復報等，都曾加以瀏覽，先烈的著作，如宋漁父的我之歷史，陳天華的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等，都是最好的直接史料。

辛亥革命及民國以後的參考材料，最重要的是居覺生的辛亥劄記，查光佛先生的武漢國秋，蔣介石先生的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張氏權先生的孫大元帥回粵記等。毛思誠先生手編的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一書，關於革命創導者與承續者的各種重要關係，對本書最多參考。而翼如先生給我的啓示和鼓勵最大；他給我的參考材料也最多，中華革命黨時代的史實，和護法經過等，都是他的材料。本書未能得其實審訂，是一件最大的憾事。其他黨前先進，如吳稚暉先生，于右任先生，戴季陶先生，居覺生先生，孫哲生先生等的講演論文，凡有關述述國父及革命史實的，都曾一一參考。至鄒海濱先生和馮自由先生等的著作，也都是本書最主要的參考材料。其他直接間接參考的資料爲數太多，不能細舉。

此外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便是國父自己的著述。關於這一點，我們應該感謝季陸先生最近的努力，他編印的總理全集，在數量上超過展堂先生所編的幾乎一倍，是很夠我們參考的。我對於國父遺著的蒐集，也曾費過相當的時間，給我寫這本傳記，以不少便利，這是應該聲明的。文前簡單年表，是依據各種年譜及本書記載，加以編寫，可供參攷。

國父逝世以來，各家所撰傳記，已經很多了，我這一本，僅是許多種中的一種，而已並且是一本最沒有遺熟的作品。劉知幾所謂「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其始末圓備，夫豈無咎？」應該等待高明的史才，來完成這一個任務。這本書，雖然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但遺漏舛誤的地方，一定很多，尙祈本黨先進，海內鴻儒，不吝指正，實爲厚幸。

高良堂三十四年三月十二日誌於重慶



第十章 因革命而學醫……………三五

第十一章 兩廣幼派的分歧……………四〇

第二卷 革命發軔時代……………四四——一三三

第十二章 最早的政治見解……………四四

第十三章 創立興中會……………五〇

第十四章 第一次廣州起義……………五六

第十五章 亡命……………六六

第十六章 倫敦宣傳艱難……………七一

第十七章 完成三民主義……………八一

第十八章 日本志士的活動……………八八

第十九章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對立……………九四

第二十章 援粵非律各獨立與革命形勢之關係……………九八

第二十一章 聯合與鴻章運動的失敗……………一〇二

第二十二章 惠州起義……………一〇八

第二十三章 惠州失敗後的革命大勢……………一一三

第三卷 革命進退時代……………一二〇——一三七

第二十四章 被委山的論戰……………一二〇

第二十五章 重慶談判……………一二七

第二十六章	在歐洲的活動	一三五
第二十七章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一四二
第二十八章	革命的宣傳與南洋黨務的開拓	一四七
第二十九章	接關武官的活動與南洋黨務的擴展	一五二
第三十章	革命方略	一五八
第三十一章	民報週年紀念與萍瀏起義	一六三
第三十二章	日本放逐東南方革命的新潮	一七三
第三十三章	防城起義與汕尾運械	一八三
第三十四章	鎮南關起義	一九二
第三十五章	被迫離安南後的革命運動	一九九
第三十六章	革命重心的新加坡	二〇一
第三十七章	內 闕	二〇二
第三十八章	革命運動的復興	二〇〇
第三十九章	庇能會議	二二六
第四十章	三月二十九日	二三三
		二三八



# 年表

- 一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公歷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是年公歷十一月十二日（即陰歷十月初六日），先生誕生於廣東香山縣翠亨村。
- 二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五年，公歷一八六七年，（清同治六年，丁卯）。
- 三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公歷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戊辰）。
- 四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三年，公歷一八七九年，（清同治八年，己巳）。
- 五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二年，公歷一八七〇年，（清同治九年，庚午）。
- 六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一年，公歷一八七一年，（清同治十年，辛未）。
- 七歲 民國紀元前四十年，公歷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入翠亨村私塾讀書，聞鄉人談洪楊故事，潛抱革命大志，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命。
- 八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九年，公歷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 九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公歷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 十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七年，公歷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乙亥）。轉入馮氏宗祠私塾肄業。
- 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六年，公歷一八七六年，（清光緒二年，丙子）。
- 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五年，公歷一八七七年，（清光緒三年，丁丑）。仍在村塾讀書，畢經業。
- 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公歷一八七八年，（清光緒四年，戊寅）。

先生能得是假香山，初見歲舟之奇，滄海之闊，遂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理。

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公歷一八七五年，（清光緒五年，己卯）。

入塾入學，解之意與西學無涉。

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二年，公歷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甲申）。

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一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七年，辛巳）。

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三十年，公歷一八八二年，（清光緒八年，壬午）。

畢業於尊真塾，旋升入粵人設立之國朝學校肄業，為全島最高學府。

十八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九年，公歷一八八三年，（清光緒九年，癸未）。

自設香山返里。

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公歷一八八四年，（清光緒十年，甲申）。

二十歲 因與塾有定宿恨，為鄉人所不容，乃返香港，入拔萃書院，旋又轉入真家書院。

二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七年，公歷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

在拔萃書院，與塾無涉，其歸國，當中國經見之學。是年中始和約告成，劃安南島嶼，先生乃決意飄洋過海，創立洋學。

二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六年，公歷一八八六年，（清光緒十二年，丙戌）。

先生與法法法法，與塾無可入之資，而生活上又極獨立自營，因入廣州之博濟醫學校肄業，於同學

中誠實為其真誠所感，亦一合其意，遂引渡為密遊，交為甚密，後廣州惠州潮德，深資其益，而先生

與塾無涉，計自此始。

二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五年，公歷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丁亥）。

先生再博濟一年，其志漸趨進，乃院附設之醫學校，功課較優，且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乃轉學該校

二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四年，公歷一八八八年，（清光緒十四年，戊子）。

二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三年，公歷一八八九年，（清光緒十五年，己丑）。

適家公逝世。

二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二年，公歷一八九〇年，（清光緒十六年，庚寅）。

二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公歷一八九一年，（清光緒十七年，辛卯）。

二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二十年，公歷一八九二年，（清光緒十八年，壬辰）。

先生以全段第一名畢業於雅麗氏學校。在校五年，每於課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與陳少白、尤少鈔、湯鴻階五人，往返長密研考熱革命，港澳間親友呼爲「四大寇」。異業後，懸壺於澳門，聲名鶴起，然爲葡屬所忌，乃遷至廣州。

二十八歲 民國紀元前十九年，公歷一八九三年，（清光緒十九年，癸巳）。

時粵中西醫極夥，而先生獨以西醫名，尤精解剖術，故就診者戶無爲穿，營業甚盛，常與鄧士良、陸皓東、程玉光等數人，聚談革命。

二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十八年，公歷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

當時廣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窺長江之形勢。至天津時，以李鴻章號爲識時務之大員，因作長函道之。不測，乃回上海。時中法戰爭正劇，先生以爲時機可乘，乃遊計檳榔，以反清復漢事誦諸其日親友，創立革命會。然當時華僑風氣尙未開，應者寥寥。是年冬，返香港，徵聯合各地同志，襲取廣東以爲根據地。聞初在文咸官領碼頭、謝誠泰藥行等處，乃與商組織大計，揭發其陰謀，於是兩派合辦。

三十歲 民國紀元前十七年 公歷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

擴大的與中會成立於香港，乃商議襲取廣州計劃，陸皓東提議用青天白日旗，亦於是時決定。創設農學會於廣州，爲革命機關。定九月九日（公歷十月二十六日）（重陽發難，乃以運械不慎，爲海關搜獲，事機乃洩，陸皓東等殉焉。此爲中國有史以來國民革命第一次之流血，亦爲先生第一次之失敗也。事敗後，先生由間道脫險至香港，隨與鄧士良、陳少白同渡日本，招集同志，成立與中會分會。尋命士良歸國，收拾餘衆，待機而動，少白留日，考察東邦國情，而已則斷髮改裝，遠遊美洲，同華僑籌餉款，爲捲土重來之計。

三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十六年，公歷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先生抵檀島後，復集同志以推廣與中會，並募款爲第二次發動。但當時窮賤，應者寥寥，進行遲滯。因念美洲多華僑，應與聯絡，遂決計赴美。濱行，偶於市郊遇康德黎，握手甚歡，先生告以將赴美歐，康亦以卽赴英倫告。四月，先生離檀赴美，自三藩市，橫過大陸，至紐約。所過皆有洪門會，惟考其實際，僅爲工商等聯絡感情，絕無政治意味。先生既至，乃解說反清復明宗旨，並勸其聯絡內地會友，共策革命進行。當時領悟者，每處不過十數人，或僅數人耳。先生以美無可活動，乃決赴美。時清廷已下令通緝先生，故由美洲甫抵倫敦，卽被清廷駐英公使龔照璣誘捕。幸得康德黎竭力營救，始能脫險。

三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十五年，公歷一八九七年，（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

先生仍居倫敦，出入圖書館中，日夜不息。以考察歐洲政治風俗之心，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爲革命建設之標的。是年秋，重回日本，從事實際運動，以其地與中國相近，消息易通，便於籌劃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頗歡迎先生。而日本志士先後助先生者有山田兄弟，宮崎兄弟及菊池萱野等，大半在此時期締交。

三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十四年，公歷一八九八年，（清光緒二十四年，戊戌）。

先生在日本。八月，清廷政變禍作，康有爲、梁啓超逃命日本。日人宮崎平山等以先生與康梁俱志在救國，欲居間調停，使兩派聯合，乃有爲儼以帝師孤臣自擬，堅不納，後且創保皇會與革命黨對抗焉。

三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十三年，公歷一八九九年，（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先生仍在日本，努力革命運動。是年七月，日政府取消治外法權，先生乃憤橫濱山下區一百二十一號爲機關，與清領署爲隣，公然向其敵人挑戰。時康梁之保皇黨已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爲尤甚。先生以大無畏之精神，作不間斷之努力。知欲喚起國民，必須創立宣傳機關，乃命陳少白回香港，籌辦中國日報。復命史堅如深入長江，聯絡會黨，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同志，於是乃有長江會黨及兩廣福建會黨併合於興中會之事。

三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十二年，公歷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

先生仍居日本，力助菲律賓獨立未成。五月，近畿義和團起，時局騷動。粵督李鴻章納港督卜氏之言，擬令黨人倡廣東獨立，既囑劉學詢函請先生，旋派艦駐港待之。先生至港，即依同志決議，派宮崎爲代表，乘船赴粵晤學詢，知李尚無決心，先生以事已無望，乃憤於籌餉軍事。以惠州黨難全權，授鄭士良，命其回惠州，組織響應。己則以水警監視，不獲登陸，偕宮崎返日，尋復轉上海赴台灣。士良在惠州苦城數月，彈藥告竭，事復不濟，是爲先生第二次之失敗。廣州史堅如謀炸粵督，毀撫署被執，亦遇害，英年殉國，先生倍痛惜之！是年梁啟超抵檀，賴先生先爲介紹於檀島同志，自是保皇黨遂獲密跡檀島。且設保皇報於餘

三十六歲 民國紀元前十一年，公歷一九〇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

惠州失敗後，先生由台灣至橫濱。益從事籌款及宣傳，以圖再舉。時距義和團肇發，聯軍攻陷北京年先矣。清廷方降鉅款，與八國媾和，海內外志士，憤激竄敗，知不足與圖存，遂多被傾心革命。即向日警視。生者，至是亦亦同情，而日本留學界思想言論，尤爲中於革命問題，時梁啟超亦在日本，與先生同爲失敗之人，朝夕過從；而持議終不相合，梁改清議報爲新民叢報，鼓吹君主立憲，反對民主革命。

三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十年，公歷一九〇二年，（清光緒廿八年，壬寅）。

安南總督賴美，屢託日京法公使，約先生往晤。至是以河內開博覽會，遂行。抵安南，賴美已離任回國。其秘書長哈德安，招待甚殷。在河內結識華僑多人，而安南興中會以立，厥後欽廉河口諸役，深得其力。

三十八歲 民國紀元前九年，公歷一九〇三年，（清光緒廿九年，癸卯）。

河內博覽會告終，先生乃再作環球漫遊，取道日本而赴歐美，秋間抵日。時上海發生蘇報案。先是章炳麟、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言論激烈，嘗直斥清帝之名，呼爲小醜。鄒容著革命軍一書，排滿最烈。清吏乃控諸租界當局，封閉蘇報，章、鄒被捕，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爲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後清廷雖勝訟，而章、鄒僅囚禁二年而已。

三十九歲 民國紀元前八年，公歷一九〇四年，（清光緒三十年，甲辰）。

先生抵檀後，以保皇黨之勢力方張，排斥革命，異常激烈，乃改組黨報，並親撰論文，向保皇黨大張撻責，聲勢爲之大振。又鑒於前次游美之失敗，知非列籍洪門，不能得其助力，乃毅然加入致公堂。尋由檀赴美，保皇黨運動關吏，禁先生於木屋，不使登岸。經教友及致公堂同志奔走，始得保出。及登岸，大受洪門歡迎，與前次迥異矣。先生以旅美致公堂會員踴衆，而主張分歧，團體渙散，乃提議舉辦總註冊，手訂致公堂憲章，與黃三德出遊各埠，鼓吹革命。在紐約時，撰告歐美人書，題爲中國問題之眞解決，甚得美人之贊同。

四十歲 民國紀元前七年，公歷一九〇五年，（清光緒卅一年，乙巳）。

是年春，先生由美赴歐，是時留歐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先生乃揭鑿生平所憤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乃由德返英，轉道法國，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在巴黎時，謁前安南總督賴美，因以獲交於法京政黨各要人，與商協助中國革命事，甚爲得手。尋取道南洋，重回日本，開第四會於東京，加盟者數百人，除甘肅無留日學生外，十七省人皆與焉。中國革命同盟會，遂正式成立。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誓詞，頒布會章，發表革命方略，選舉孫先生爲總理，而空前之革命黨報——民報，亦於是時創刊焉。是年冬，赴西貢。

四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六年，公歷一九〇六年，（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

先生由南洋過香港，將往日本，法屬武官布加卑謁先生於舟次，並於天津法軍參謀部派武官七人，歸先生調遣。先生命廖仲凱、黎仲實、胡毅生等，偕法武官赴天津、兩廣、川滇、南京、武漢等處，設立機關，或從事調查，而南京、武漢之新軍，皆大歡迎。十月，同盟會員劉道一等，自動起事於萍鄉，醴陵，與清兵二十餘戰，相持匝月，卒以衆寡不敵，復失，劉道一等被害。

四十二歲 民國紀元前五年，公歷一九〇七年，（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

正月，日政府徇清公使楊樞之請，令先生出境；先生乃偕胡漢民等赴安南，設機關於河內，籌劃進行，旋命許雪秋、余既成等，發動潮州黃岡之師，不得利，此爲先生第三次之失敗，繼又命鄧子瑜發難於惠州，亦不利；此爲先生第四次之失敗也。無何，欽廉兩府有抗捐之舉發生，命黃克強、胡毅生二人暗結清軍郭入漳、趙伯先、以爲內應，會東京本部黨首忽起風潮，購械運輸之計割破壞，郭、趙又失約，全軍遂敗，過十萬大山，此爲先生第五次之失敗也。旋又親率黃克強、胡漢民襲攻鎮南關，扼據三砲台，與清兵龍濟光、陸榮廷等數千人之衆相抗，後以軍火不繼，乃退入安南，此爲先生第六次之失敗也。清廷與法政府交涉，令先生出境，遂往星洲。

四十三歲 民國紀元前四年，公歷一九〇八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

先生在新加坡成立南洋支部，自兼部長。令黃克強再入欽廉，率同志二百餘人，大小數十戰，前後四十餘日，所向無前，清兵聞而生畏，克強之威名大著，後以彈藥接絕退出，此爲先生第七次之失敗也。又命黃明堂聯絡清兵爲內應，率同志百餘人襲河口，然以孤立無援，清兵四集，卒以不守，此爲先生第八次之失敗也。

四十四歲 民國紀元前三年，公歷一九〇九年，（清宣統元年，己酉）。

先生以連遭失敗，安南、日本、香港等地，皆不能自由居處，因往美洲籌募用款，將國內一切計劃，委之黃克強、胡漢民二人。

四十五歲 民國紀元前二年，公歷一九一〇年，（清宣統二年，庚戌）。

先生從美東行，時黃克強、胡漢民發動廣州新軍舉義，事敗，倪映典死之，此爲先生第九次之失敗。

先生聞收耗後，兼程東返，過日本、潛行登陸，隨爲警察探悉，遂避往新加坡，約譚伯先、黃克強、胡漢民等往晤，以商捲土重來之計。時新敗之餘，精銳已喪，衆皆相視無言，先生歸勉再四，並招集當地華僑會議，以集資金，一夕之間，得八千有奇。各同志分頭勸募，數日之內，達五六萬元，先生又親赴南洋英荷各屬島，所至輒受其政府之驅逐，遂再赴美洲，向華僑竭力募捐，於是乃有幸亥廣州之役。

四十七歲 民國紀元前一年，公歷一九一一年（清宣統三年，辛亥）。

先生在美籌款，進行甚利。黃克強、趙伯先等遂藉極籌劃廣州舉義，三月二十九日，克強率衆發難，慶戰不克，殉難者七十餘人。是役也，集各省革命之精英，與清廷爲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死事之烈，已震動全球，國內革命之勢，實以之造成矣。此先生第十次之失敗也。廣州革命雖不成，然黨人曾不因此少懈，至八月十九日（公歷十月十日）復又舉義於武漢，而先生廿餘年所企圖之種族革命，竟得以實現。先生在美聞耗，遂決意致力外交，以絕清廷之援力。首至英國，停止清廷向四國銀行之借款二萬萬元，復請制止日本援助清廷，與取消放逐令，以便回國，皆得英政府許可，乃由法東歸。十七省代表選舉先生爲臨時大總統。

四十七歲 中華民國元年，公歷一九一二年。

一月一日，先生在南京宣誓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文告，採用陽曆，改元爲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退位，而先生顛覆清廷之志，於是乎實現。翌日，提出辭職書於參議院。四月一日，頒解職令，繼之請爲袁世凱。在任三閱月中，促達南北統一，頒佈臨時約法，樹民國之規模，立法治之基礎。先生之辭職，雖曰攝廢袁氏，促進統一，而革命方略之不行，實爲其主要原因。自是周游各省，宣傳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並從事實業教育，旋任全國鐵路督辦。

四十八歲 民國二年，公歷一九一三年。

先生欲實現其鐵路政策，乃東渡日本，視察其工商情況及鐵路現狀，並聯絡其學界名士，實業鉅子，以爲



總行之助，尋即回滬。時袁世凱野心日熾，雖爲民國總統，而實醉心帝制，日務裁削革命勢力，廣植其心腹爪牙。三月，遣人暗殺宋教仁於上海，於是舉國譁然。先生致書袁氏，數其罪狀，命李烈鈞回江西，佔領湖口，宣佈獨立，舉兵討袁，寧、湘、皖、閩、粵等省繼之，即所謂二次革命也。袁竭力壓迫，各省獨立先後取消。先生至是不能安居國內，乃重赴日本。

四十九歲 民國三年，公歷一九一四年。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氏即解散國民黨，國會遂不足法定人數，陷於消滅狀態。隨又郊天祀孔，議及罷黜。先生以袁氏反形已具，帝制自爲之心，雖然如見，乃在東京集合同志，組織中華革命黨，重立誓約，增訂新章。任命各省中華革命軍司令，命鄧鏗舉兵於廣東，范鴻仙、夏之麒舉義於江浙，均不克，范竟死焉。然各地同志此仆彼繼，再接再厲，討袁之成功，實基於此。

五十歲 民國四年，公歷一九一五年。

先生以袁氏帝制運動，日見辭明，乃命居正赴山東，陳其美赴上海，朱執信赴廣東，于右任赴陝西，運動總兵，並發布宣言，聲討袁氏，遂有陳其美上海肇和兵艦戰役，以武器不支而退，此反對帝制之第一聲也。十二月十三日，袁氏稱帝，並改明年爲海憲元年，先生艱難締造之共和，從茲中斷。時前雲南都督蔡鍔得報在粵，陰謀反對，陽表贊同。旋設計脫身回滇，說將軍唐繼堯以反對帝制，唐同意，遂通電各省，宣佈獨立。

五十一歲 民國五年，公歷一九一六年。

滇省舉義，各省響應，袁氏迫於情勢，取消帝制。先生於五月初由日回滬，即發表宣言，主張繼續維持共和。及袁破，復重申前旨，並電令各省同盟停止軍事行動，維持地方秩序，政法問題，靜候高黎商決。時黎元洪復法繼任總統，拘先生之主張及軍務院之要求，恢復民元約法，召集國會，組織正式內閣，懲辦帝制罪魁，於粵南方撤消軍務院，各省亦取消獨立。八月間，黎電先生北上，共謀國是；先生以黎爲帝孽包圍，不意，惟勉其速解糾紛，及請釋放政治犯而已。

五十二歲 民國六年，公歷一九一七年。

先生仍在滬，完成民權初步。黎氏繼任後，與內閣總理段祺瑞積不相能；對德宣戰問題之起也，祺瑞又恐不能得志於國會，陰召各省督軍之附己者入京，以威脅之。何無祺瑞免職，嗾使督軍圍叛，倪嗣冲宣布獨立，各省響應。時海軍總長程璧光不直其所爲，因率海軍抵滬，備國家之緩急，並向先生表示服從。及張勳入京復辟，國會解散之變繼作，黎氏被迫退位，先生命各省革命軍人出師討賊，東南各省，相繼並起。祺瑞亦著盪馬廠，收復北京，迎副總統馮國璋入京，代理大總統職，已則復任內閣總理。先生發電祺瑞，以擁護約法，誅劬叛逆爲言，卒不之省，遂于七月二十二日與程璧光及國會議員赴粵，宣言護法。國會議員開非常會議，議決組織軍政府，舉先生爲大元帥，九月十日，先生宣誓就職；通電否認段政府，下令各路進攻。

五十三歲 民國七年，公歷一九一八年。

先生以護法號令西南，諸將雖不敢顯持異議，而首鼠兩端，不受約束者，比比皆是，尤以陸榮廷、莫榮新二人爲甚，驕悍萬狀，遇事掣肘。先生以大局爲重，屢優容之。莫更無忌憚，竟擅捕殺軍政府衛隊，先生乃於一月三日，命同安、豫章二艦，砲擊軍署，以示懲戒。莫知理屈，且恐滇、粵軍，起而躡其後，遂終不敢還聲，且前請罪，先生宥之。時一部份國會議員，倡議改組軍政府。莫榮新復遣人暗殺海軍總長程璧光於海珠對岸，先生憤議員之被紿，桂系之兇橫，乃於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職。七月，改組之軍政府成立，先生以彼雖號爲軍政府，無異附枝機關，乃於二十一日離粵赴滬，雖被舉爲總裁，未嘗發表意見也。

五十四歲 民國八年，公歷一九一九年。

先生仍在滬，時南北進行和議，爭持數月，迄無結果。先生以雙方各挾私圖，拂逆民意，乃於八月七日正式向軍政府辭總裁職，命朱執信、廖仲愷、胡漢民等，創辦建設雜誌，努力建設之宣傳。是年，著孫文學說，創行易知難之學說，並完成實業計劃。十月十日，改組中華革命黨爲中國國民黨。

五十五歲 民國九年，公歷一九二〇年。

先生仍在滬。是時桂系把持之軍政府，內部發生衝突，各總裁已多宣告脫離。五月，在粵國會議局開會，譚延闓、唐紹儀等以遞補之，先生與唐紹儀、唐紹儀等通電反對，申言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廣州軍政府無效。八月，粵桂戰起，陳炯明奉先生命，率師回粵，莫榮新狼狽出走，岑春煊等亦於十月二十日，宣言解除職務，相率離粵。先生以莫等智窮勢絀，投降北方，因借伍廷芳、唐紹儀及國會議員返粵，重開政務會議。

五十六歲 民國十年，公歷一九二一年。

一月六日，先生集唐紹儀、伍廷芳等發表宣言，希望南北繼續和平統一之議。四月七日，國會非常會議，議決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先生為大總統。五月五日就職，發表對國內外宣言，以地方自治，和平統一，開放門戶，發展實業，昭告中外。北方政府以合法政府在粵誕生，大起恐慌，嗾使陳榮廷、陳炯明兵擾粵，先生以寇氣甚熾，命陳炯明、李烈鈞等，分三路進攻桂林，七月十五日桂林悉平。先生仍親率大軍北伐，駐節桂林，組織大本營。惟陳炯明已陰蓄叛志，不肯接濟餉械，雖疊電趣促，置若罔聞。

五十七歲 民國十一年，公歷一九二二年。

先生以陳炯明把持後方，不與接濟，乃改道北伐，移大本營於韶關，復率師還粵，命陳炯明與直軍勾結日亟，即以省長各職，旋命辦理兩廣軍務。五月六日，誓師韶關，軍行順利，直抵贛州，陳炯明與直軍勾結日亟，即以所部葉舉等，還集廣州，謀應北方之約。先生因返省坐鎮。六月十六日，陳炯明與直軍勾結日亟，即以先生冒險出行，登永豐艦，親率海軍戡亂，以待北伐軍之還師靖難。既而各軍敗退無至，不得已，於八月十三日抵滬，發表宣言，布告粵變顛末，表示統一意見。十月，北伐軍許崇智克復福州，先生任爲直路討賊軍總司令，以規復廣東。

五十八歲 民國十二年，公歷一九二三年。

自陳炯明叛據廣州，倒行逆施，人民不堪其苦，函請先生剷除之者，已非一日。先生乃令閩軍許崇智等部進剿潮、汕，其他滇、桂、粵各軍，亦奮勇進發。一月，肇慶、三水、河口，相繼克復，譚啟秀、魏邦平

等，在廣州響應。陳炯明遂逃走東江，二月，各軍將領，共迎先生返粵，復任大元帥職。無何，沈鴻英引北軍犯廣州，先生率各軍討平之。時東江陳炯明殘部，猶未肅清，北伐之舉，卒被牽制不克進展，先生仍命漢、桂軍進攻惠州。命譚延闓率師伐湘，不克而還。

五十九歲 民國十三年，公歷一九二四年。

一月二十日召集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通過黨綱章程，並發表宣言。四月十二日，發布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命蔣中正任青埔創立軍官學校；於軍事外，灌注三民主義，加以政治訓練，以養成真正革命之黨軍，迄後軍專之成功，基於此焉。時曹錕僞竊，先生曾首先聲討。八月，奉軍入關，亦討伊恆超，蔣江繼之。先生至是遂決定北伐，出發韶關，命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職權，任譚延闓爲北伐軍總司令。無何，浙江敗挫，直奉戰起，而馮玉祥、吳景翼等忽班師回京，顧壽曹、吳、馮、胡等與段祺瑞張作霖電請先生北上，解決時局，先生爲謀中國統一與建設，遂允其請；由廣州出發赴滬，發表宣言，主張開國民會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抵滬後，繞道日本而至天津。沿途勞頓，已感不適。及見段政府答覆使團，有外崇國信之語，知北上目的，終不能達，太息久之，而風疾復發矣。然仍力疾入京。

六十歲 民國十四年，公歷一九二五年。

先生抵京後，病日加劇。段政府對先生主張之國民會議，迄無進行誠意，且復召焦善後會議，先生乃決黨員不加入其會議，而於國民會議，及裁兵統一辦法，仍日夜籌籌，病益以劇，百藥罔效，遂於三月十二日逝世。初遺囑二通，一致同志，於民國前途再三致意；一關於處置亂產事。先生畢生盡瘁國事，所積僅衣服、書籍、居室而已。

# 第一章 革命的聖地

大約在民國紀元前四十年的光景，廣東香山縣一個山明水秀的小小村莊，是那樣的靜寂和清幽，百餘家坐西向東的村舍，前面和右邊是葱鬱的樹木，左邊的高峯叫做翠頭尖，後面隱約可見的一抹橫嶺，就是五桂山的崗巒，右邊一帶樹木之下還有一條清流，清流之外又是幾個青山，青山之外便是渺茫的九洲洋西岸了。這樣有山有水的地方，真是像一幅絕妙的圖畫。這裏住的都是質樸的農民、漁民，和幾個從外國經商回來的僑民。

這時候，雖是距離歷史上有名的太平天國的覆亡，還是很近，政治的震動和社會的騷亂，還是在繼續發展中，但是在南安儉樸的人們，依然度着他們平靜的生活，沒有覺醒着新時代的到臨。

農村裏的居民，向來是在勞動中去消磨他們的時間。有時候，我們看見他們很愉快的閒談着古往今來的事情，才知道這是他們工作停歇的當兒，也就是他們享樂的時候。這是某一天的傍晚，田野裏的事情，已經完畢，蒼靄的暮色漸漸的籠罩着全村，村裏的人們，照舊大家聚會有閑談起來。有一個額上滿堆着白髮的老頭兒，正正他們前面找出勁的像演說家一樣的滔滔地說着，坐在旁邊的人，也很聚精會神地去聽他的言詞，因為他們都想從這個老頭兒身上去找一點關於太平天國的故事，做他們的消遣。他是這個村莊裏男女老幼都認識的太平天國的老兵，同時也成了全村最歡迎的活話匣子了。

這老頭兒的話完了，大家也就漸漸的散去，但這時候，有一個小孩子，站立着不動，兩隻神采奕奕的黑眼睛，對着這老頭兒發出奇異的注視，老頭兒也很奇怪的看他，並且很懇切的說：

「孩子！你是很好的，你將來一定能擔當這個大任！」

「我不能問你你所說的大任，如何要我擔當，又怎樣擔當到我的肩上來？」

「你可知道中國現在的操權者，還是滿洲人麼？」

『知道的，是滿洲人。』

『你不是漢人麼？』

『當然是漢人。』

『我們都是漢人，怎麼還要當滿人的奴隸呢？』

『我也覺得這是一個疑問，只是沒有人替我解說，所以我不明白，為什麼甘心受滿人統治？』

『滿人用種種壓迫而禁錮的手段，置漢人於萬劫不復之地，便是不甘心也只有隱忍啊！』

『難道就沒有人起來反抗麼？』

『只看誰做洪秀全第二。』老頭兒很感慨的說。孩子聽了，不覺鼓舞奮發的說：

『這樣我一定擔當這個大任，我做一個洪秀全第二。』

老頭兒愉快的聽了這孩子的回答，他慢慢的走回去了。

這孩子約模有六十歲的樣子，穿着很整潔的衣服，有很端莊的舉止，要是我們從他的外表看來，會當他是十歲以上的大孩子呢；他就是未來的偉大革命領袖，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

孫先生的家族，住到這所愛的村莊裏，只有四代的光景，在這時期以前，他的祖代，因為受了戰爭的紛亂，生活的壓迫，不斷地遷徙。他們從遠代的友松公在廣東紫金忠壩公館背村立下了家庭的基礎，才開始做了廣東人。孫先生在少年時代，曾經在火奴魯魯住過相當時期，因此很多人對他的籍貫不甚清楚，他有一次曾說林百克 (H. J. Lagergren) 說：『我和我的幾代祖，的確是在翠亨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祇有數。』我們的宗廟，卻在東江的一個龍公村 (Long Kong) 裏。『這龍公村三字，到最近經過了多方面的考證，才知道就是紫金縣忠壩的公館村（見羅香林著 國父家世源流考）。』

到了明末清初，粵東義士舉起了反清復明的火炬，抵抗清兵入粵，忠壩為琴江都小盆地，東西南三面，羣山環抱，成為天然屏障，易守難攻，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在這裏由於鍾丁先的領導曾經展開了劇烈的鬥爭。

戰，不少的漢人在清兵淫威之下，遭受殺戮的慘禍，剩下來的人，祇有流離失所。孫家的人，也有不少參加過一次的血戰。事變過後，他們就從紫金遷到增城，那就是十二世祖連昌公，這些孫氏向廣東中部遷徙的開始。

在這時紛亂的局面，還是不斷地發展着；滿清政府雖乘明室內亂而奪取了統治權，四方志士，依然到處發動義師，抵抗到底。如鄭成功張煌言等的據廈門、金門，會師金陵，前仆後繼，壯烈奮鬥，最爲滿清政府所頭痛。他們到了最後無辦法，還是退保孤懸海外的台灣，作爲復興的根據地。滿清政府爲要根除這民族鬥爭的大患，就對台灣採取嚴密封鎖的辦法，下令遷移沿海邊界，爲堅壁清野之計，企圖困滅成功，於是閩粵江浙等省瀕海居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廩舍盡燬，膏沃廢棄，造成了空前慘劇。但滿清政府對這種殘酷的政策，並沒有阻過了鄭氏的獨立，反使戶口虛耗，物力減損，使東南各省的經政，蒙受嚴重的影響。因此過了不久，那些比較有肝膽的疆吏，不忍坐視，先後奏請復界，移民開墾，於是廣東北部農民與昔年抗清義民的退散者，都漸漸地向瀕海一帶去移殖。連昌公也在這時，又從增城遷到中山（舊稱香山）縣涌口門村，度着他們的劫後生涯。這是大約在清初康熙中葉的時候。一直到 孫先生第十四世祖殿執公，才又從涌口門村遷到這小小的村莊來住。我們不要忘了這個將永傳不朽的聖地的名稱，它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叫做翠亨村。無疑的，它和孔子的曲阜，耶穌的那路撒冷，同樣的受到後世的追慕和尊敬。

中山縣是在廣東灣的粵江口，前面臨江，在出口處有一個淺澳島，形成了一個灣勢，叫做金星港。地居廣州香港澳門三商埠之間。這翠亨村距離縣城大約有五十多里，從翠亨村到澳門約有七十四里的路程；到廣州省城則有一百三十多里的路程，香港便在它的東面，遙遙相對。這金星港口，因爲有淺澳島做着屏障，是一個避風的良港，那時滿清政府不准外國船隨意停泊，特指定金星港爲外國輪船停泊之所，所以那時香山縣幾成爲中國和西洋交通的樞紐，從歷史上的地勢來看；古代東西交通的孔道，向來是一面有北方陸路，由小亞細亞，經帕米爾高原，下搭木里河，從新疆甘肅等地而到中國；一面有南方海路，由波斯灣，阿拉伯海，經印度洋，從廣東以入中國。自宋朝時代起，南方的海路，幾乎代替了北方的陸路，一八五一年阿拉伯入梭里曼(Soliman)

著作的旅行記中，就說當時中國最大的大口岸是叫（Khaofan），經過許多歷史家的考證，我們知道就是現在的廣州。這個歷史上負有交通中外責任的地方，因為時會之所轉移，潮流之所激盪，自然會誕生出一個偉大的人物，來做新時代的開創者。

在孫先生誕生的前後，世界強盛的國家，正在向海外尋求殖民地的時候，那時北美合衆國脫離英國而獨立，才有九十年，它們也就跟着先進的帝國主義國家開始從事殖民地的開拓。最巧的，一八四八年他們忽然在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發見了大量的金礦。因之尤其激發了他們的殖民熱，大批的移民自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移住。同時他們又把一八七七年科克（California Coast）發見的夏威夷（Hawaii），和日本競爭移殖其國民，但是發掘大量的金礦和開發殖民地，必須要有大批的工人，因為美國的人口中心地，離開這些新產金區域和殖民地這樣遠，他們找不到工價低廉的工人，那時歐洲航行大西洋的路程很慢，不足以供給這個需要，於是他們不得不轉向中國來募集了。他們宣佈道：『中國人願意來，無論要多少工錢都可以的』。因此許多中國人從上海或香港渡海到加利福尼亞和夏威夷，有的被人拐帶到別條路去的。但是到了這些地方，這般華工都得了很大的工錢，已出當初的意料之外，於是他們都滿意了。

海浪激起了白沫的花，這樣長期的招呼着他們到冒險的黃金和新財源的地方去，翠亨村的農民，就有不少的飄流到海外去，也有已經賺了很多錢回來當富家翁了。孫先生也自己說過：『鄉之人，多遊覽於四方，迨西之後，頗多富饒』（見上李鴻章書）。他在幼年時代，也早就有出洋的企慕，但他僅僅是一種好奇心的表現，嗣後來却因為有了這個吸收新空氣的機會，確立了神偉大的革命志願的基礎。

廣東，在地理上，是有這樣的重要地位，再加上孫中山先生的偉大功業，它更在歷史上將有同樣的不朽價值。但在另一方面，它給予孫先生有不少的便利，因為它是濱海的大省，他們的居民，有活潑聰慧的天性，冒險勇敢的精神，使孫先生有一種強毅的意志和敏銳的體魄。這種特長，在他一生革命事業的推進中，都能表現了構成偉大領袖的條件。廣東的天氣，是有益於體格發展的，尤其是翠亨村的位置雖是近於熱帶，但也有



一個更入補足生氣的冬天，並且或者也可以看見一些細微的霜雪，因此它兼備着溫帶和熱帶的優點，孫先生便在這起越的氣候，強健體魄的農村生活中，長成了一種刻苦奮鬥，獨立不移的精神和體力。他們有不少的同學到海外去冒險工作和經商的，尤其是僑居美洲的最多。他們愛種族愛國家，更有團結互助的精神，所以廣東人的足跡，幾乎踏遍了全球，而他們的團體都是非常發達。孫先生在長期奮鬥中，在海外的僑民，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會替他盡過力的。再從孫先生的家世和故鄉的歷史來說，孫家的遠祖，曾經參加反清復明的民族運動，並且在滿清政府的壓迫之下，受盡屠毒流離的痛苦，因此民族的意識和反清的思想，在孫家歷代相傳下來的子孫腦海中，都留存了很深刻的印象。孫先生的嫡姊姊西姑太太，曾經告訴人家說，她家的先人，在清代從來沒有人去應舉當官，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孫家從增城遷到中山，又在中山的涌口再遷到翠亨，住在這些地帶的農民，和孫家同樣的曾經參加抗清義師而退散的，或從沿海各地復界還鄉的子遺，他們的民族思想，也挾與俱來，鑄錯而居，各懷身世，影響所及，就和西南沿海各地反清復明的天地會（又稱三合會或洪門會），發生了共鳴的作用，而中山縣瀕海曾被避界的鄉村和島嶼，更演為天地會在廣東的樞紐。據同治香山縣志記載，道光時代三合會再起的首領，就是和翠亨村毗鄰的石門甘秀。這是初期的中國民族運動的祕索組織，對於以後孫先生的革命運動，也有很大的關係。

在時間的進展上，已經安排了到另一階段的新局面，真像嘉萊爾（TH. Carlyle）所說，一堆乾燥死寂的燃料，等待着「上天」放下來的火焰把牠燃燒起來（Hero's niche worship）。在民國開國前四十六年，這靜寂的翠亨村，誕生了中山先生，舊時代開始沒落下來，他就是一種火鏟，衝破了黑暗，到光明之路。新時代的世界史上，孫先生是永遠佔着極重要的地位，誕生孫先生的廣東，也永遠被人家所紀念。

## 第二章 孫先生的家庭

孫先生是國曆於中華民國紀元前四十六年，清同治五年丙寅，即西歷一八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上午四點鐘，即夏曆十月初六日寅時，名文，字德明，又字逸仙，外人以孫逸仙（Sun Yat-sen）稱先生。先生初生時，因為父母特別鍾愛的原因，曾娶取翠亨村北帝廟神像的名字，名孫先生為象，字日新，又為帝象，這是希望神明保佑，遂其成長的意思，也是一種風俗的表現。「中山」二字是先生三十二歲亡命日本時，為避人耳目所取的別號，但後來就成為舉世共知的大名了。此外，先生為便利奔走革命，也有好幾次隱姓埋名，我們打算暫在後面再提，這裏不必細說了。

孫先生的父親達瑞芬，名觀林，號道川，他是殷朝公的第四世孫，是一個最和平忠厚、公正廉明的農民，為人很慈祥和藹，在鄉里中深受鄉人敬愛的一位老人家。他和孫先生的祖父敬賢具有同樣的性格，善能排解糾紛。現在翠亨村中的長老們能清晰的記憶，他們說，那裏的住戶都是在很早以前由四方遷來的，常常為了源流不同而引起爭執，達瑞芬和敬賢公，總是出來公平調息，決不偏袒任何一方。因此他為鄉中各派所愛戴。他在早年時候，曾經到澳門去做裁縫工，有時也充當鞋匠，每月工資四元，一年能積四十六元錢。當時澳門在葡萄牙人經營之下，他們利用了窮的中國人的勞力，富的中國人的資本，建築了這個樂園。有種種彩色的建築物，深綠色的海水就使做了邊緣，點綴得五光十色，富麗異常。那裏有雜耍的妓院，醉人的酒館，賭場煙館，滿佈着街道，絃管笙歌，通宵達旦。多少年輕的中國人，一到這繁華靡麗的地方來，都沉緬在酒色煙賭之中而墮落了。但這個將來要做一個全時代改造家的父親的少年，他始終認澳門是一個可怕的羅網，他厭恨這淫靡腐敗的環境，本着他純粹的自信心，他毅然離開這些繁華的娛樂場所，回去享受那卑陋勞苦而澹泊的鄉村

生活。

達成公回到故鄉以後，仍舊從事農田的操作。有時也替人家縫紉，來補助農耕的不足，雖是僅有二三畝的田園，但種菜養豬是儘夠的。他常說：『無家不成家，要造成一個家，是離不了養家的』，總之，他是極滿足他的農村生活的。過着幾年，他和楊太夫人結婚，便是孫先生的母親。她是生長在離翠亨村不遠的隔田鄉，楊勝輝公的大兒，是一位富紳而富淑的夫人，她下顏稍尖，眉清目秀，雖到老年時代，還是很健康的。她小達成公十五歲，這時才有十八歲，達成公已經有三十三歲了。他們結婚了九年，才生下了孫先生的大哥德彰公，名眉，字壽屏，接連着又生長女金星，次子德祐，名典，次女妙而，差不多中間都隔了三年才生。金屏和德祐，都是幼年夭亡。當孫先生誕生的時候，距離妙西姑太太也有三年，那時正當達成公五十四歲，楊太夫人三十九歲。孫先生的祖母袁太夫人也在，大約是七十四歲。

楊太夫人持家教子，是達成公的賢內助，她對孫先生有投養，影響甚大。妙西姑太太的回憶，孫先生生幼年時，最歡喜和人打架，他看見其他小孩子給人家欺凌，就大抱不平，奮勇攻打，到衆寡不敵時，也不退却。因此常常扯破其他孩子的衣服，楊太夫人一面嚴責孫先生，一面就替他們補好衣服。孫先生自小就反對賭博，有一次，許多小孩子在祠堂裏大車賭博，其中有一個年已十七歲的大孩子楊帝卓，正在那裏呼盧喝雉，孫先生去拉他的辮子，勸他不要賭，楊帝卓認爲拉辮子是要敗賭運的，很不滿意，後來果然大敗，就捉住了孫先生，把他的頭向牆上猛撞，撞得孫先生劇痛氣絕，不省人事，經許多人勸止，並塗以藥粉，才蘇醒過來。楊太夫人知道了這件事，親自來帶着孫先生回家。在平時，孫先生和人家孩子無理毆打，必定喚回去鞭責一番，這一次因爲他在楊帝卓，沒有責罰孫先生。

達成公有兩個弟弟，一名學成公，曾經在上海做工，在孫先生出世前的二年，就在本鄉死去了。一名觀公，是翠亨村裏到加利福尼亞探金區去最先一批人中間的一個，但當孫先生出世後一年，他死在異國的曠野，他到他們家裏，使他們情緒上受了極度的刺激。達成公便開始負起他們兩個已死兄弟所遺下來的孀婦的

生活。孫先生在幼年時代，就和祖母、父親、母親、哥哥、姊姊以及兩個可憐的叔母同居，他們是充滿着歡和愉快的家庭，於兄弟姊妹之間，盡盡友于之義。但是因為他兩個叔叔冒險的失敗，他們都一致主張以後不准他們的小孩子再到洋人危險的地方去；他的老叔母常常流着淚，像說故事一樣的說起洋人可怕的事情，她說離翠亨村不遠的海口，那些外國船隻在那兒實在不妥當，因為常有可怕的事情，在他們船上發現出來。這些外國人所穿的衣服，很是奇怪。最異樣的便是他們頭上都沒有髮辮，有幾個竟一絲髮辮也沒有，但是有很多像火一般紅的鬚鬚。她聽人說，那些外國人是用鋒利的刀子來吃東西的，她並且說，她曾經親眼看見有煙從他們常用的槍裏出來。因此她見了那些洋人，心裏實在害怕，她主張善良的孩子，應當遠遠的離開他們，因為那些洋人十分暴躁，是不好惹的。她永遠紀念着她那冒險而死的丈夫，因此總是愛護年幼的，孫先生不要和洋人接近，孫先生的父母，自然也同情她們的主張，但他們夢想不到，這一個年幼的小孩子，終究在外國找到一種覺悟，使中國脫離數千年的專制政體。他那時實在並不因兩個叔叔冒險的失敗，而壓抑了企慕出洋的心理，他覺得將來一定到洋人危險的地方去，勇敢地去做成成功的冒險，並且無論如何，總要想出一個法子來，使得全家的人贊許他的冒險。

一直到他的大哥德彰公到距離加利福尼亞一半路程的夏威夷的火奴魯魯（Honolulu），他才預伏了到外國去的機會。這次奴魯魯因為出產檀香油最多，後來海峽就改稱為檀香山島（Sandwich Island）那時他只有六歲，眼望着他哥哥的遠行，竊有許多說不出的羨慕和幻想。德彰公這時幾年紀，才十八歲，他有着壯健的體格，聰慧的頭腦；但是自小不肯念書，一天到晚，總是在外面嬉笑頑皮，所以父親是很討厭他的。那一年，他那在火奴魯魯經營的長舅，剛剛有事回國，遠成公因為家裏很窮，兒子又不長進，就氣呼呼的請他的母舅帶他到外國去。遠成公的意見差不多是不要再看見他的兒子了。所以德彰公的出洋，原不是出於父親的本意，不過借這個機會來懲罰他的過失。但是後來的事情竟出乎他老人家的意料之外，年幼的孫先生到底憑藉了他的在外的哥哥的力量，造成了他偉大的事業。

孫先生家裏的房子，原來只有幾間很狹窄的小屋，前面有廣大的曠場，蒼蘆的大榕樹，和幾棵蒼鬱絕橫的古樹，做了他們前面的屏障。曾經見過孫先生父親的老輩說：遠處公在沒有事情的時候，常常在這大榕樹下石凳上坐著。手拿旱煙袋，儘吸。他的臉龐長長地，兩頰高高，雙眼睜人有神。他的鬚眉很長，而且是很白。穿的是粗布衣裳，有時是登木屐，他總是有事在心似的沉思，有時愛講故事給他們聽。他是終老在這狹陋的破屋裏。直到孫先生二十七歲做了醫生，才把賺來的錢，改造了現在的房子。七間軒敞的洋樓，圍着短小的磚牆，大榕樹便依然保存在圍牆之內。他是一座向面的房子，在全村一律向東的屋子中，是最顯著而易於認識的。

他們的祖墓，便在翠亨村前面長沙埔的黃草崗，零落殘破的寔夢中，就是孫先生高祖嚴親公和曾祖恆輝公的長眠地。墳是向東的，而對着汪洋萬頃的大海，平靜的波浪，明麗如鏡，海鷗逐着波浪覓食，白鷺拳立在沙灘上，我們站在那邊，正是像走進了一幅美麗的圖畫，他們村裏人，常常唱着這樣的一首山歌：（見王玉斧著 總理故鄉調查記）

土名黃草崗，大海作明堂。

鯨魚遊北海，旗鼓鎮南方。

金星寨水口，燕石王中央。

談人葬得奇，黃金大斗量。

歌中的幾字應作誤，就是其說島，戲諧古，就是古鶴島，金星和燕石，都是嶼中小嶼的名稱。他們這裏有這宏麗的偉大堡壘，將那裏的遺蹟來生出一個震天撼地的偉大來。不，這正是人傑地靈吧！然而孫先生的故居和孫先生先代的墓地，都讓我們這念頭留戀的。

孫先生的祖母，在孫先生四歲的時候就死去了，年壽七十有八。那時年幼的孫先生突然失去了一個慈祥的祖母，就從他的天性上流露了無限的哀痛，在出殯的那天，母親欲抱著他去送，他不肯，想拿靈柩來背著

他，他也不要，他竟用他小小的兩只腳，跟着大家很悲痛的走送；他這種孝親的至性，便激動了個全家人的注意。達成公也是很小心孝敬他的母親，很忠貞懇摯對着他的朋友。家雖不豐，他却一面恭敬承歡，一面曾經奉養過一個朋友，有十八年的長時期，他從沒有愾色和怨言，這種一個備具着優美德性的家庭，對於孫先生的身心和品性，會永遠留着極深切的影响，這是無疑的。

### 第三章 在村塾中

幼年的孫先生，有七年的時期，在早開的鄉村學校中受教育。那學校不是現存的新式學校，它是相沿千餘年來的一個分班式，沒有提課標準的計劃。孫先生走進了這個村塾的時候，才有七歲，在翠亨村裏的小孩子，他是算受教育最早的一個了。廣東人平時都戴裹頭本屨，但孫先生每天到村塾去上學時，總是穿了一雙靛藍的布鞋，這和鄉間農民才去，這是一終身難得的轉點。孫先生家裏的人，天才亮大家就起身，到田裏去工作，這為鄉村中很普通的生活，孫先生每天到村塾，是很早的，回家晚，有時也到田野裏做點工作。他幼時雖是讀書，但是很安樂，也常常得空看奇書異談。他也很愛玩樂，終身過着清苦的鄉村生活，只要便衣衣的，他就不愛穿了。他何等天生親熱他去極，個革命領袖，受革命在野中種種困難；他並不喜歡做那大政治家會的工具，去造成那項革命流血慘劇，但責任命令督促他，終於不能不回復他那羸弱的鄉村生活。

那時候在地方，雖是沒有什麼能夠揚揚氣的事情，但是孫先生的母親是很賢慧的，父親是很正直的。孫先生曾經告訴人家說：『我的母親很慈愛的，我的父親是很好的；家庭中雖是守舊一些，但是古樸可風，另有一種美德存在着；這種美德，是適合於人生道德的。我因為要博得他們的重視，所以一心上進。我的母親和這美德，使我深信，和全村人的敬禮，使我自己得以身心愉快。』確然的，孫先生的優美的德性，

大半是對之於他的健全的家庭。孫先生的母親，雖也免不了中國古代遺傳的迷信，但是他的有力的心靈，雖然能夠感導孫先生，養成他領袖的天才，引伸他的同情心，到中國的全民衆，先天下之憂，後天下之樂。我們在這裏可以說：世界上決沒有比真瓊更大的宗教，也沒有比賢母更大的感導力。

村塾中，對於年幼的孩子照例的要教他們高聲朗誦三字經，這就和現在的小學教科書是一樣的算作學童的課本，但那時是用機械式的方法強迫他們背誦記憶。孫先生過了一個月以後，他幼稚的頭腦，已覺悟到這種教授的不合理，於是大胆的起來向教師反對道：

『我一點不懂，儘是這樣唱有什麼意思，我唸它做什麼？』

教師驚駭的站起，拿了一根夏楚，在手中掂量，但不一回他的手放下來了，因為他正在思索，文是全塾中最、於背誦的，打他似乎不熱使人心服；而且文的父親，是村中的長者，恐怕也不便如別人一樣對待他。於是教師揮動他的夏楚，可怕的道：

『什麼！你反發逆調嗎？』

『不是，我並不反對經訓，但是我一些不懂書中的意義，為什麼要天天這樣無意識地唸呢？』孫先生的激楚的回答。

『這就是大不敬，就是反對先聖先王之教，』教師可怕的說。

『但是我到學塾裏來，是要先生教我的，而我竟不明白我所讀的。』孫先生仍然抗命回答，教師不勝震

駭。

那時孫先生比別的孩子更有進步，所以他已有幾句先聖賢賢學問的心理，因又說道：『可否請先生明白告訴我，使我知道書中讀的是什麼？』

教師的心軟下來了，他以為這是例外的事情。但是年幼的孫先生又對他解說：『世界上無論什麼事情，都有理由的，為什麼這種文字沒有意義呢？』教師沒有話答覆了。孫先生這種反動，竟使他深入經書的意義

中間，造成了他將來的大學問家的基礎。然而，他的幼年時代，到底是太孤立無援了，鄙陋的翠亨村，一切的一切，都像在黑夜中，沒有一件事物，可以做他將來的指導，教師指示古人的教訓，像昏暗的星光一樣使價格外黑暗了。他只有仗着他個人天才的感悟，從幾味陳腐的環境中，像黯淡的山光，清幽的月色，散漫的雲宅，高低而穹廡，這裏邊衝出一線光明來，恐怕在這種黑暗的境地中，只有他一個人能自信，所以後來才憑着他個人的天才，把這一線光明，發揚光大起來。這風景秀麗的翠亨村，在那時是永遠的遮蔽在黑暗而厚霧之下，再沒有第二個人有勇氣衝出來；年幼的孫先生，是這樣的孤立無助。

大約過了三年，孫先生來到另一村塾去唸書，那裏的教師是一位是何鐵士先生，一位是何鐵士先生，他們當然要比那一位教師高明些。這村塾是在翠亨村西面的西氏宗祠裏，附近的風景，是常常變化的。孫先生在那村塾裏用心的讀書，進步得很快。那他在紀元前十七年（乙未）廣州第一次革命的風潮中，也和孫先生同在一起讀書，他小孫先生三歲，這時候是八歲，但他是孫先生幼年時僅有的同志了。

年幼的孩子，是都歡喜玩的，但舊式的村塾，沒有星期，假期也極少，所以孫先生幼年要做他煩雜的功課，很少時間費在遊戲上面。他祇有常常盼望節期，唯一的新年長假期，他便有機會和家裏的人或其他孩子在一塊兒玩。他所最希望的玩具，是要得到一隻鸚鵡或羽毛美麗的鳥，但是，他小小的腦海裏，只有欣賞鳥的悅耳之鳴，和讚美鳥的飛去自由，他不歡喜把鳥囚拘捕囚犯般捉住，祇在徑尺的籠中，而剝奪了鳥的自由。所以他一面儘量希望有一只鳥，一面終究沒有向人要求過。這種新奇的遊戲，倒很像和孫先生同時代的西方革命家蘇俄的列甯（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小孫先生四歲）差不多。據列甯家中的一位女僑瑪利亞說：列甯在幼小時，極喜歡玩小鳥，他在節假的時候，常要求他的父親和母親買小鳥給他，他拿到手之後，不要多少時間，就把小鳥放出籠子，他就在這當中取樂。這種解放的思想，正和孫先生愛好鳥的自由一樣，大概這是表現他們革命抱負的一個特徵吧。我們不能因為這是幼年遊戲而忽視它。孫先生對於各種遊戲像放風箏、吹毽子、跳田雞、翬棒、劈甘蔗等等，都是很歡喜的。翬棒是把一棒打出另一棒，一個孩子使用衣襟來接，尚能接



得住，便詢他去打，末了量那二人打出的長度，做勝敗的決斷。劈甘蔗是先把甘蔗扶着豎立地上，手一鬆，乘他沒有着地之前用方猛力的劈去，劈得甘蔗最大的，便算勝利。孫先生在各種遊戲中，常常做了孩子們的領袖，有時着了魔，幾乎廢寢忘食，但是他們的塾師，常常教訓他說，勤有功，嬉無益，他是不主張學童們活潑的遊戲的。

孫先生也很喜歡游泳和騎馬的，距離孫宅不遠的地方，我們看見綠葉茂密的兩岸，清澈晶瑩的水流，他曾經在這裏很愉快的游泳，妙面姑太太至今還是稱贊。孫先生少年時期的善於泅水，她說：孫先生像一隻入水的青蛙，翠亭村中的任何孩子，都比不上他。真的，他是一個多麼活潑而精強的孩子？騎馬的機會是比較少些，因為依照那時，孫先生的家境，買一匹馬是辦不到的，孫先生祇是看見人家騎着馬在堤面前走過，表示非常羨慕。偶然從朋友方面借來騎一下，但當孫先生初次試騎的時候，就能穩貼自如，縱橫馳騁，氣概威武，神色怡然，儼然是一位少年將軍了。

他在許多學童中，是最有思想而英敏的一個，經過幾年書本的誦讀，他的智慧顯然的進展了。因為常常聽到年長的說書或是表示極長的時間，是用以稱頌皇帝的，他有些奇怪這樣的稱頌，就要求他母親解釋，他問很：『萬歲是怎樣長久？』

『這是極長的時間，沒有一個人知道的。』母親的回答。

『誰沒有人知道怎樣的長久，那稱頌皇帝為萬歲，不是一句騙人的話麼？』孫先生從幼小的腦海裏，道鋒利的刺破了這問題，便這樣回答他母親的話。

還有一次他問母親道：

『青天是什麼東西做成的？』

『這是很一隻覆了轉來的飯碗。』母親這樣答覆。

『但是正碗的上面還有別的東西覆着嗎？』他再進一步的問他的母親，他母親不能回答了。

他又問：

「人死了以後怎樣？」他母親聽了黯然說：

「死了種種事情都完結了！文！」

「但是我死之後，不要我的生命就此完結。」孫先生十分肯定的說。慈祥的母親很奇怪他的兒子的答覆

她撫摩着他的頭，很愉快的說：

「你讀書很長進了，文呀！」

亞里斯多德說過：「哲學起於懷疑」，大思想家的幼年，都是經過一個對於宇宙和人生的懷疑時期。笛卡爾先懷疑一切，才建立他的哲學系統。希臘的比羅（Pytho）和法國的巴斯噶（Pascal）都是徹底的懷疑主義者。朱子幼時，嘗問他的老師說：「天外爲何物？」老師瞭然不能回答。從前印度有人問他的父親：「人生在地上，她在什麼東西上？」父親說：「她在鳥籠上。」又問：「鳥籠在什麼東西上？」父親便不能回答了。這種懷疑外圍的精神，是大思想家的基本精神。幼年的孫先生在靈敏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和其他大思想家一樣地進入「懷疑時期」，於是正開始探索如霍（C. H. Hooper）所說：「人類傳說中所遺留下來的諸問題，任何時代的男女，都會加以詢問」的問題。

## 第四章 翠亨村裏的風波

孫先生在香港中政讀千餘年來的經傳，也覺得自在，但年紀漸漸長大起來，智識也跟着增加了，他很想讀書本以外去找一些新思想，尤其是關於政治的問題，以滿足他的智識的飢渴。但當時在滿清專制之下，人民和政府關係，只身每年繳納租稅，此外，人民便絲毫沒有參加政治的機會，翠亨村的人，只有看見滿清兵士的威嚇善良的老百姓，他們永遠不知道政治是怎樣一回事？因此孫先生除了讀書以外便無從知道政治的機會。他

看見他的父親，處理家事，并非有條，所以他以鐵腕的天才，自信這一個大家庭，只要各人互尊各人的權利，接受家長治家的規矩，便可以各人的自治，維持家庭的治安。如果在這樣許多家庭之上，有了一個政府，也只要各家庭各守各的權利，也就能夠治理得并非有條。這是他幼年時認識政治問題最早粗淺的鑄型，他並能把這學說中懂得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浮影，所以從治家體悟到治國的道理，是那樣的簡單而平易。但只有這些，已經可以知道他是怎樣一個富於政治天才。他那時沒有一個人能到教他懂得政治的，雖有人能講及平天治國的故事，也是張谷糊的。所以在他長大後從家庭裏所學得清政治兩相比較，便完全他的獨立思想。

一直到翠芳村上落盜劫案發生，才做了他現實的教訓。

那天，孫先生在正村裏讀書，忽然外面起了極大的喊殺聲，伴着攻牆的碎石聲，震動全屋。直到時候了才發動一個由美國回來的信商，大家才驚醒。廣東的大盜，是比那惡匪更惡，那匪們能破門而入，則則來，也知道這村上落盜的惡，所以這村上落盜，水泥的牆壁，鋼鐵的大門，以為萬有不能破，而且打不進，可以高枕無憂了。但是這班水盜，這一日忽然來到，卻不容易的破。他們用了極粗的磚木，把繩子繫在一座三脚架子上面，十幾個彪形大漢，將垂下的粗木的一端，向那高大門的牆壁上，一槌不放鬆地猛撞，一陣陣的聲浪，震動着耳鼓。那倚窗的笨拙思想，倒底被水盜這極兇猛的方法所打破，堅固的牆壁隨着粗木的猛撞一塊塊粉碎下來，他們踏着煙垣瓦，蜂擁而進，將他辛苦掙來的錢財，完全劫去下。

水盜用粗木猛擊的巨聲，把翠芳村的人都陷入了恐怖之類，震恐的母親們亂嚷亂叫着他們的孩子，連聲呼救，村裏裏的教師和學生也都四散了。但是年幼的孫先生勇敢的不自所動，一步步往前走，毫不遲疑地到水盜搶劫的地方去，他的臉上，沒有一點驚慌之色，他站着，不怕水盜的兇猛，不怕紛飛的木片，也不怕被拋的碎石。前後牆垣倒了，水盜擁擠了他的身旁，得到裏面去搶劫，他們歡呼着出來。他一幕幕看着，幼小的腦中，激起了不平的波浪，他覺得這種橫暴的行爲，決不是合於正理的。他目送水盜長而去，臉上起了那裏不屑的神氣。

過了一回，這僑商哭喪着臉，亂髮蓬鬆的奔出來，大喊着：

「我完結了！我在外國所積聚的，都被萬惡的水盜搶去了！如果我不回來，那外國有法律保護我，就不會遭這樣大劫！咳，我悔恨不及了！」

幼小的孫先生聽了這僑商的呼喊，很奇怪地暗想：「外國有法律，難道中國就沒有法律麼？這僑商冒了生命的危險得到金錢，帶回中國，爲什麼得不到法律的保護？」

村裏的人們對於這樣的悲劇，一向認作和不能避免的禍害像蝗虫水旱一樣，除了主張把錢收繳起來，免得強盜覬覦以外，再沒有比這更積極的議論。悲劇過去了，把惶恐的人心鎮定了，就像夏天的陣頭雨，雲散雨歇以後，會無絲毫影響遺留。但這年小胆大的孫先生，從這破損的屋子回到村塾時，心裏浮起了一種嚴重的感覺，他反覆的暗想着：「外國有法律，難道我們中國就沒有法律麼？」

這一幕悲劇發生了不久，第二次的貨物教課又來了；這便是官吏壓迫富人的一回事，使孫先生更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

這一情是發生於一家兄弟三人的花園裏，他們三弟兄在翠亨村裏是受到全體村人的尊敬的。他們幼年很窮，後來到加利利尼亞去做；許多年採金的工人，就典積聚了很多錢，回到翠亨村來，便是富翁了。他們三人很友愛。待人也很忠厚和藹。他們成了全村的模範人物，許多家長教導他們的子弟要效法他們。孫先生在村塾教學校。常常到他們花園去玩，那裏有燦爛的花木，悅耳的鳥鳴，很能引起孫先生的興趣。達成公和他們三兄弟是很親密的，所以孫先生對於這三兄弟也很尊敬，他常常留連在這花園裏。

有一天，孫先生正在園裏玩耍的時候，忽然來了數十名滿清的兵士，還有許多衙役，與佩刀的軍官，將這住宅和花園，包圍起來，把他們兄弟三人一齊拘住，上了手鐐腳鍊，像押着就宰的豬一般，解去受訊。孫先生看了，從正義發出的不平的憤怒，是一種本能的衝動，他說：「他們三兄弟是受着全村人尊敬的，他們都是好人，他們不會犯什麼罪的；就是犯了罪，也不該用這樣酷虐的手段！」義憤填塞了胸臆，他竟戴着勇氣，

「無罪權，向一個軍官責問：

「這三個人爲了什麼罪名，要將他們一起刑具來押了去？」

軍官沒有回覆他的話，跟他來的如狼似虎的兵士，却么喝起來：「誰家的小孩子，滾開些！」

三兄弟被押了去，幾個軍官竟留在那裏，佔據了他們的財產和家宅。後來聽說三兄弟中的一個，竟在廣州被斬決了；還有兩個，也呻吟憔悴於獄中。這些軍官對於三兄弟這樣的暴行，目的是在掠奪他們的財產，就不信把他們誣害了！翠亨村的人，沒有一個不是憤恨這些貪官污吏的毒狠，却沒有一個敢說出口。孫先生不平的心，從沒有平靜過，他有一個不能答覆他自己的疑問，便去問達成公：

「爲什麼官員就有這種無上的權力，能夠拘人殺人，奪人財物，而不顧誣陷善良？」達成公只有嘆息着，搖搖頭，也不能答覆。

他目視了這兩幕大悲劇，幼稚的腦海裏，常常盤旋了有什麼似的，他想解決自己的疑問，但沒有一個適當的答覆，他所受的教育，是不能使他了解一切的，全村的人，只有消極的憤恨官吏的殘暴，和水盜的不能防止，這些都是毫無疑義的，是永遠不能指示了他一條正當的路，他是煩悶極了！這煩悶，直待到他智識所能了解時，便成了他革命的種子。

達成公是一個善良而守本分的農民，他雖是負擔了很多不應繳納的賦稅。但始終抱着納稅等於防範海盜以求安全的見解，每年按期繳納。可是他們這些納稅的地田，早在好幾代以前賣給他人了，因爲當時的官廳去轉讓受到苛索，便繼續負擔了付稅的責任。但時代的變遷很快，人事也不固了，這些地田已經又變換了很多主人，他們再不能去追求真正的地主們的賦稅，這樣達成公是負了一個重大負擔，這困苦的情形，是像被惡毒牽累一樣，全家人的心裏，都覺得非常憂慮，除了納賄權稅的胥吏以外，沒有別的方法。比較永久補救的辦法，就是到官廳去換新契，那便要費一筆極大的款項，是他們家庭經濟狀況所不能辦的。孫先生從達成公憂愁的面容上，知道他有這樣一件心事，屢次自己想道：「爲什麼那些官吏對於人民地契的轉移，要這樣勒索重費

，而教人家做這種白契的權宜方法，使已經失了田地的人，還要負了很重的納稅責任？這樣不公平的法律，爲什麼竟能容許它存在？」他想有一個徹底補救的辦法，他向達成公很懇切的問着。

「沒有的，文！沒有補救的方法，因爲這是皇帝的規例！」

「皇帝麼！他的權力是怎樣的大？他爲什麼容許這殘暴的強盜，酷虐的官吏，和不公平的法律呢？」孫先生這樣反覆的在心中默想，但沒有說出來。他驀然記起了，他知道中國的皇帝是滿洲人，他想這一切問題，也許就是因爲不是中國人自己操權，所以容留了這樣許多罪惡，他似乎找到了一個滿意的答案。他安慰了年高勞苦的父母以後，面上現出了愉快的笑容。

滿清政府是腐敗的政府，是應該要反抗推翻的；孫先生經過了這許多深刻的教訓以後，是堅決的認定了，但是把他推倒之後，有什麼可以替代他呢？因爲他完全不知道開明的國家是怎麼樣的，他從來沒有同外國人接談，也不知道外國的事情。他承認改造的進行，必須要尋求較現在更好的方法，才能使人民滿意。他從他叔母所述的洋人事情和他哥哥在海外的生活，他便憧憬着外國的一切美妙景象，他到外國的意念，這時候更堅決而迫切了。也像飢渴者的需要飲食一樣，很迫切的需要新生命的獲得，做他改造的準備。

## 第五章 海外的哥哥

現在我們應該說到海外的孫先生的哥哥德彰公了。這位德彰公自那一年到檀香山島以後，到現在已經有整整過七個年頭了，在這長時間中，他竟已有出乎達成公意料之外顯著的發展了，那時候，從檀香山到翠亨村的郵路還沒有通。德彰公去後快到一年了，才從一個同國的華僑帶了信回來。他們從這消息中，知道他很平安的到了檀香山，並且很是得意。這便達成公感到分外的愉快，因爲他兩個已死的弟弟，都成了飄流海外的慘敗者，現在竟能看見他兒子的成功，這是神明的獸福罷。年幼的孫先生知道哥哥的平安，使他對於出洋的企

慕尤其迫切，他相信他的志願一定可以無阻礙的成功。

那時檀香山還是一個半開墾的荒島，人口稀少，棄地很多。美國政府爲要積極經營太平洋起見，他和當地政府商定，大規模的獎勵墾荒，准許隨便什麼人都可以自領田。所以德彰公到了這個地方，也在翠亨村所學得的耕田工夫，却都很有用處了。他起先是替人家耕田，過了幾年，就自己合了幾個夥計，到茂宜島（Maui Island）的特勒鎮（Keala），向當地政府領了些田畝來耕種，這茂宜島是夏威夷羣島中五大島之一。德彰公在那裏耕種，同時又創辦了許多畜牧事業，他一切的事業，都很順利。他爲人輕財仗義，遇事剛斷，同島的人多服從他，因此竟有人替他起綽號，叫做「茂宜島王」（King of Maui）這樣辛苦經營的結果，他已經很有積蓄了，於是就到珍珠港（Pearl Harbor）去。這珍珠港是和西面的關島及菲列濱羣島相聯絡的，現在已成爲美國在太平洋中的海軍重要根據地。德彰公在那邊，把海濱浪花所不到的地方，都把它開墾，他用了兩只手，一天一天的去耕種那廣蕪叢生的濕地，使它可以用生產百倍的米穀，以輔助農業上之需要。他這種堅毅忍耐的精神，獲得了同伴的感動和當地土人的尊敬。後來夏威夷的政府，就請他招募別的中國人去繼續工作，他們顯出巨大的僱金，以鼓勵中國人前往，因此德彰公準備着回到故鄉來了。

時間過得很快，隔了幾年頭，孫家所渴望歸來的孫大哥真的歸來了。他們出洋共有三人，只有這位德彰公一人歸來，全家的人不用說都高興得不得了，就是那兩位可憐的叔母也只有暗暗的悲悼他們不幸的丈夫，承認他是從奇異的地方得了勝利回來的。

德彰公出去的時候，是一個窮苦的農家子，現在却滿載而歸，不但富於金錢，並且富於西方辦事的經驗。他把在夏威夷島上的見聞告訴了大家，他說那邊有黃金似的沙灘，靛青色的海水，澎湃的大浪，晶瑩玉潔的泉水，高聳在溫暖海水中的紫山，遮護着那些物產豐富土地肥沃的山谷。香的花，叫的鳥，隨處可以見到。山谷中滿佈了棕樹、香橡樹、波蘿蜜種種樹林。果園和葡萄園是毗連相繼的。這確是一個世外的樂園啊！他又把他在真珠港附近開墾濕地和其他事業的成績報告他們，他說從事這種工作的，將來必定富裕，他竭力鼓吹他的村

人壽那邊去。他這樣很快而有無限希望的報告，引起了最大感奮的，便是他的幼小的弟弟——孫先生了。

德彰公這一次回來的任務，第一是奉了達成公的命令，和譚夫人結婚；這是他老人家最重視的一件事，因為他相信要立業，必須成家，所以在德彰公回家不久後，就替他把這位譚夫人迎娶過來了。第二任務，便是受了夏威夷政府的託付，招募大批的華工回去。因此他就在翠亨村附近，設立了一個移民事務所，一時應募而來的很多，他就把他們都留在那裏。不久，他所招募的人和合股購置的航海大船，居然達到了目的，他就準備要回到檀香山去經營他的事業了。

孫先生知道大哥快要走了，他認定這達到出洋目的的好機會，就懇求他的父母准許他跟大哥一塊兒去，但不幸焉，他所預想的無阻礙的成功，竟遭了意外的打斷，他父親很嚴厲的嚴斥他的要求，做說：「出洋是危險的，不可當着玩的，從前你兩個叔父，不是都不能夠往還麼？況且你還是小孩子，更不應該離開父母的翠亨村。」

達成公的意思，以為有一個兒子去冒險，已經夠了，年幼的孫先生當然不用去離鄉背井；但他沒有看出他幼子的廣大懷抱，他是以深愛的心理來阻止了——孫先生的要求。

這是多麼失算啊！德彰公一切屏擋就緒以後，他又到風波浪濤的去了。孫先生為要順從他父母的意志，他依然留在這毫無異味的翠亨村中，過他鄉村的生活。但機會是由人去找尋的，一個機會過去了；還可以再找一個，孫先生這樣的躊躇安撫着自己，他相信他出洋的志願不會變成一個幻夢的；這確是一個曠世而來的奇蹟的見解。

## 第六章 太平洋上的所見

孫先生奇異的時代終於到臨了。在德彰公去後的一年，他所招募的第二批移民又要出發了，他們僱定的「



隻二千噸的輪船格蘭諾去號，已在澳門停泊準備啓行。在這急迫的時候，是孫先生能否出洋的一個重要關頭。這倒像有神的啓示一樣，在這時候，孫先生的母親楊太夫人，忽然想起了她的大兒子在海外的一切，在她慈愛的懷念中，她決定要到橫香山去看一看她大兒子的一番盛況，才能安慰了她老人的心。孫先生抓到了這個絕好的機會，於是很有理由的要求他母親帶他同去，遂成公是沒有話可以阻止了，這久抱宏願的孫先生，因此開始離開了故鄉，走出了國門，而遠涉重洋了。

這是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公曆一八七八年）的事情，是正當孫先生十三歲的時候，他從水道到澳門；這是他父親早年旅居的地方，他見到繁華的景象，深伏的氣氛，雖然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但他從天才的感悟，和親切的潤養，他便和他父親一樣地喜愛這一切的一切，他竟不願上岸去觀望，就逕自走上了格蘭諾去輪船。

這是他第一回的離家；在這汪洋萬頃的大海上，尤其是見所未見；浩蕩的滄海，蔚藍的天空，海水與天空相連，茫茫地一望無邊。輪船從棧橋開行，掀起了白浪的浪花，那浪花衝到船上所發出的回聲，像巨獸的雄吼，和青海風聲中不斷地傳送，濤偉大的景象，更擴展了他的胸襟，他對於未來的懸望，像這輪船鼓着輪子一樣的不斷地前進。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所說，一個人從小在黝暗遼遠的地方長大成人，忽然一天給人家帶到了高空中去望日出。他對於這新奇！他的感覺像嬰孩般自由，無牽。他的智慧卻像成人般的成熟，孫先生就有這樣的情形。他在那航行生活中，那船上精巧的機械和奇異的汽鐘，自然引起了他的注視和探索的興趣；但使他感觸最深的，便是船上的鐵梁；這是橫貫着船的兩邊，使船更加堅固的。在他看起來，這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他想這麼重的一個梁，要多少八纜可以把牠裝配好？他又想到發明鐵梁的天才，和應用機械的方法，都表現了外國人的聰明，他立刻覺得中國像一隻停擺的鐘，應當急待修理，而使這隻鐘為適時的走動。他雖還沒有看到我們本國長城的偉大，古代工程的奇偉，所以驚異着這幾個鐵梁，但是他幼年的腦海裏，已經深深地覺到中國文化的停滯狀態；正需要新的推助的機構，因此那船上幾個平常的鐵梁，也不能避掉他的注意，他的感覺是怎樣的銳敏啊！

但是第二個奇異的印象，又觸動了他的感覺了，這就是海葬水手的一回事情。這一天有一個船上的水手，忽然病死了；在他的屍體剛冷的時候，他們已經把他縫在一隻很粗的帆布袋裏，放在甲板上，再把鐵塞在裏頭，以增加牠的力量，又把一面顏色鮮明的旗包着這布袋。喪鐘響了，船主從一本聖經中讀了幾句，悻然一聲，水花四散，這水手的遺體已到海中去了。

他那時因為不知道船主所誦讀的是聖經，又因為不能說英語，不知道這是一種英國的風俗。他看見他們對於死者這樣的殘忍，心裏很覺得反對。這船主有什麼權力可以把屍體拋入大海中呢？他這樣的在暗想。依照他的禮教觀念看起來，這樣的對於死者輕忽，是有損神明的，是野蠻的舉儀。他開始發現外國人和中國人有不同的道德觀念，而外國人是這樣的殘忍而野蠻，他覺得他將要到一个與中國宗教不同的地方去了，在滿懷的希望中，不免有些惘然了。

船上滿載了中國僑民，但是在他們的中間，找不着一個親密的朋友，他只有和慈愛的母親講話。可是嚴重的教訓壓在他的心頭，他老是不斷的獨自思索着。他從奇巧的機械的應用上，讚歎外國人的好處，但以傳統的道德觀念來判斷，他又反對外國人的殘忍野蠻，這樣矛盾複雜的思緒，充滿了他的幼小的腦海裏，他那時不想有一個具體的解答，他想在未來的實際事物的研究中，必定能夠發現一個真理的。在這二十餘天的航海行程中，他除了陪着母親瀏覽着海洋的風景，或者在甲板上玩耍以外，他大部份的思想，就浸潤在這極重大的問題中了。

太平洋上的大小島嶼，正像星羅棋佈，一個個都好似在歡迎着輪船的開來，從船上遠望，都可以隱隱地見到眼簾。帝國主義的列強，爲要拓展他們的勢力，正在這許多島嶼上演出演好着的把戲；火藥的氣味，已經飄蕩在海水的波浪中。但一個個剛從村塾中走出來的少年，他沒有地理的智識，不瞭解世界的形勢，他的注意力所及的，只在他所處的輪船上，這是因為他的年齡和智識所限，誰都能料想的，然而他這一次出洋，是他一生歷史轉變的起點，是無可疑義的。據愛德華(Lyford P. Edwards)說游歷是增加革命運動發展的一種因素，他說

：「紐約人到過德國的威斯巴頓(Wisbaden)以後，就要批評本地的薩刺拓加的瀑泉(Saratoga Springs)。德國人見過紐約城的夜景，對於柏林夜間的幽暗，便表示不滿。美國的國會議員，在英國下議院詰問時間(Question Hour)旁聽以後，便開始對其本國政府在憲法上行政部與立法部的分離，表示懷疑。英國人在美國的平等社會中經歷了以後，必定失掉他的幾分對上議院的尊敬。因為一個社會的制度，在遠處看，或在另一民族當中看，總有些不同的。」(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Chap. II)這是很對的，一個人走出了自己的國門，回顧本國的情形，總是有很多感觸的，況且那時滿清政府的一切設施，在孫先生早有不滿意的感覺，所以一到外洋以後，當然增加他革命的決心，豈止是一些輕微的批評概念。此後孫先生在太平洋往來的次數，不知有多少，簡直是從游歷而變為飄泊(Tramps)，他自己說過：「約計每二年繞地球一週，到武昌起義以前，大概繞過了地球六七遍。」但是他偉大的抱負，就在這生涯中展開。中外歷史上因游歷而影響他的事業和思想傳播的例子很多，就以近代論，法國哲學家福祿特耳(Voltaire)的游歷，在法國革命前政治思想的發展，是有顯著的影響。盧梭的懺悔錄(Confessions)是在英國著作的。俄國人在一九一七年前一世紀，革命黨領袖，也都是足跡遍全球。列寧當未執政前幾月還僑寓在瑞士；同時托洛斯基的通訊處，是美國的布隆克斯(Bronx)。五十年前，巴枯雷和克魯泡特金的游蹤，也踏遍了全歐。就拿馬克思來說吧，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生活，就完全消耗在亡命裏面，時而甲國，時而乙國。所以偉大人物的造成，決不是偶然的，但他們好像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從極曲折的生活中磨練出來，尤其是像流蕩的游歷生活，對他們都是很有益的。因此，孫先生這一次出國，在他生活史上是最重要的一頁。他此後每一次走過太平洋，遙望着黯澹衰落的祖國，和虎視鷹瞵的列強，我們相信，一定有每一次不同的感覺，他偉大的抱負，革命的志願，也許在這太平洋上幾次往還中更堅決而確定起來的，但這一個初次見面的印象，當然永留在他的腦海裏，這是他偉大生活筆的紀念！

輪船直向南方開行，很迅速的前進，孫先生偉大的經歷，也開始猛勇的進展。他到達檀香山的時間，大

約是在紀元前三十四年五月，正在廣東初夏的季節，但那邊已在酷熱盛暑之中了。

## 第七章 在檀島的生活

楊夫人在檀島住了不多時候，就回祖國去了，孫先生因此跟着德彰公開始過僑居的生活。他在島上遊覽了幾處風景，都覺得出乎他意料以外的奇異，豐富的物產，和平的秩序，街道的整潔清潔，人民的安適愉快，在鄙陋的翠亨村裏，都不能夢見到的。他在這漸漸安靜的環境裏，有很難說的感覺，觸動了他幼年的心靈。因為這是他的天賦的一部份，他只覺得要從實際的觀察中去追求真理，所以他自己並不覺得有什麼野心。林白克(Paul Imbarco)說得好：「爲什麼大家都公認孫先生爲領袖呢？那詢奇民治主義的中國人，或者將說，因爲他的人格，他的主義。但還是說因爲孫先生的意志，不是爲的自己個人，求得一確切一點。」(See Paul Imbarco and His Chinese Revolution)這是千真萬確的，孫先生在檀香山的生活，祇是靜默的觀察，但他自己並不覺得是一個銳敏的觀察家，並且還不明瞭自己的前程遠大。他既沒有憎惡，也沒有怨恨。他的心裏對於種種的勢力，無論是善的惡的，都是開放着儘量的接受。這是他從早熟的幼年時代而入於少年時代的象徵，但他只是安靜的，他到處靜默的觀察，便發生了改造中國的宏願，終究因他所處的環境發展了種種的熱情。所以他不是是一個野心家，但是他這種救國救民族的志願，潛伏在他的意識之內，有一種壓力似的在逼迫着他不斷地努力，不斷地前進，他是一個不爲自己只是爲國爲大英雄啊！

德彰公對於這一位將在未來領導中國革命的幼弟，始終是盡了愛護的責任。但是他正忙於經營他的事業，沒有機會來親自教導。在最早的時期內，他就把孫先生送到阿胡島(Oahu)去，在他所開設的一所商店裏去習業。孫先生很刻苦的學習了幾個月，就精通了記賬的方法和算盤的應用，商店中的一切，他都知道了。德彰公很驚奇他的聰明，他才知道這種生活，不能發展他幼弟的天才，他就決定要孫先生去受以基爾做基礎

的教育，因為在夏威夷英語是最重要的。

那時在檀香山各校中，容許少數中國學生進校的，只有英國監理會牧師韋利斯（Wills）主辦的意奧蘭屈學校（Iolani School），這是一隻純粹的教會學校，創辦於一八六二年十月，一八七三年遷到白脫斯街（Bata Street），由夏威夷王卡麥哈麥第五（King Kamehameha V）改換現在的名稱。孫先生在紀元前三十二年（一八七九年）的暑假以後，進了這學校。他是五個中國學生中的一個，是寄宿在校裏的；這是從前公同意思，因為他相信住在學校裏面，對於求學是最方便的。

在這學校裏，教授孫先生基本英語的教師名叫蘇羅門米海拉（Solomon Meheula）：全校的教師都是英國人，祇有他是夏威夷人。他是一個有名的著作家，對於英語的教授也很有名的，韋利斯也常常幫他教孫先生的英語。

這是孫先生從事實的觀察轉變到思想影響的時期了，他很努力於他的學業，民主主義的思潮，開始潛現在他的心頭。但這是很特別的，他在美國的教育之下，却感受英國的精神。在學校中，周圍的環境，都表現着很強烈的英國色彩，所受的功課，只有英國史，而沒有美國史，一切課本，都用英語，就是算學罷，也不講元角，分，而講鎊，先令，辨士。在高級的英語中，還夾雜了很少的拉丁文。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十足的表現英國的色彩。孫先生因為是一個寄宿生，很少和校外的人接觸，尤其是美國人。那時夏威夷是一個君主政體的國家，就是孫先生的一個夏威夷教師，也是一個君權下的國民，他當然也希望他的學生當他一樣的去尊敬他的王國。在這樣的環境中，竟能產生偉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家，這不是一個詭語麼？所以韋利斯於紀元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年）在他的教區雜誌（Diocese Magazine）也這樣很驚奇的說：

「在可能的回憶中，密象在學校的時候，沒有什麼顯著的特徵，足以指示着他的未來的生涯。他是無異於一個沒有繪畫圖樣的國畫的習識，而從事於推倒威嚴的權力的工作。誰能料到，他這樣愛好民主政治而希望在中國帝國之內發生革命，造成像夏威夷共和國的機型一樣，是意奧蘭屈尼學校中教出來的人；而這些

却正在朝向未來的路上走。」（見孫逸仙，中國的解放者 Henry Bond Ratarih Sun Yet Sen Lrnator of China）

他這個話，大概是聽到了 孫先生在倫敦蒙難以後說的。其實 孫先生的變成一個民主主義革命家，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因為 孫先生始終是在靜默中觀察，他看到夏威夷國王的專制，同時也看到一部分夏威夷人民的反對君主專制和美國的宣傳民主主義，他於是從正反兩事實中探索一個真理。這樣深沉的態度，和蘊藏着熱烈的企圖，而不暴露於外表，誰能瞭解他心坎的最深處呢？總之，孫先生不是一個暴燥浮躁的人，他是很有靜面和氣的，這是在少年時的學校生活中已經表現了。

孫先生在以後回憶中，對於這個時期的印像，也不十分清楚了。民國元年在廣東嶺南學堂演講時，曾經這樣說過：「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見其教法之善，遠勝吾鄉；故每課暇，輒與同國同學諸人，相談衷曲，而改良劇，拯救同羣之類，於是乎生。當時所懷，必使我國人人皆免苦難，皆享福樂而後快。」這雖是幾句簡單的演講，但我們可以知道，在意奧蘭尼學校的時代，對 孫先生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

夏威夷王國到底在紀元前十九年（一八九三年）廢去王政而成立共和國。但韋利斯還是一本初衷，口誅筆伐，反對這種革命的行動，死力的擁護利路克拉尼 (Laiukalani) 的權力，而排斥和美國合併。他和 孫先生思想的距離是這樣的遠；但不管這些反面的和正面的事實，當 孫先生在夏威夷求學的時代，是正當夏威夷在變遷的時代，這是確實的，因此 孫先生在這時代，却瞭解了自由平等鬥爭的意義。他常常聽到美國人勸告夏威夷政府，要有公平的司法制度，要教工人利用物質來發展工業，他就很深刻的印在心上，暗暗地和中國比較。他那時不是祇是看到民主主義而沒有看到民族主義，這是很難推想的，但在後來他主張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並行，也許就因為夏威夷祇得了民治的虛名而被併於美國的一段歷史的緣故吧！總之，孫先生在夏威夷時，對於民主主義的認識，是很有影響的，無論在那一方面。

談到 孫先生在學校的功課，對於英語的學習是最努力了，因此進步得非常迅速，這也許是和環境有關

，因為全校的夏威夷小孩子，除了用英語以外，不許用土語。紀元前三十年（一八八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曼尼爾尼學校考試完畢的一天，孫先生得了英文文法的第二名獎賞，發給獎賞的是卡拉哥王（King Kaka-ka-ka 馮皇后 Queen Emma）和麗麗阿卡蘭尼公主（Princess Iliuolani），這是很榮譽的，一個三年前對於英語完全不懂的學生，竟獲得了這樣的成功。■

不久，孫先生就離開這學校，轉入美國人設立的阿胡學校（Oahu College），它是全島的最高學府，孫先生想在這學校畢業後，就可到美國去進大學了。但那時孫先生已變成一個基督教的信仰者；德彭公是篤守中國舊道的，他深怕他的幼弟在海外住久了。沾染洋氣，是有背他父親的教訓的，因此，他對於孫先生的信仰耶教，很不以為然，結果，他以大哥的權力，命令孫先生回國了。

## 第八章 從檀島回來以後

孫先生在檀島前後住了六年，他現在又回祖國來了。但這一次從海外回來重游澳門，他的感想比出國前更深刻而有意義了。他從夏威夷坐輪船直抵香港以後，就改乘了一只小輪船回向翠亨村。這輪船離開了香港口岸，必須經過一個小島上的釐捐局，於是苛稅煩擾的印象，便最先留在他的腦海裏，做了他回國後的第一個見面禮。在船還沒有到達這地方以前，船主已本其經驗，勸告全體的乘客說：『你們對釐捐局的人員要忍耐些，不要觸怒了他們。』果然，乘客們都接受了這個勸告，在釐捐局人員來檢查的時候，他們都忍耐着任檢查員翻箱倒篋，並且也有把禮物獻給他們的，孫先生也跟着他們一樣的忍耐。但孫先生的箱子鎖好，第二批的檢查員又來了，孫先生說：

『我已經檢查過了，爲什麼又要檢查呢？』  
「上次是收本地的海關稅，我們才是收釐捐的。」檢查員不耐煩的說。

孫先生聽了這句話，沒有回答，只得再把行李打開，他們騷擾了一番而去。他以為沒有事了，但過了一回兒，第三批的檢查員又到甲板上來了。對着孫先生厲聲說道：

「打開來！」

「我已經過兩次檢查了。」

「他們不過是收本地的海關稅和釐捐罷了，我們是查禁私運鴉片，保護百姓的官員。」

於是他們把孫先生的行李又輕輕地翻一下，他們才大踏步的去了。孫先生以為經過三次的檢查，當然可以過去了，可是第四批的檢查員竟又來了，這是一個軍官帶了兵士上來檢查的，別的乘客都忍氣吞聲的服從，孫先生却覺得忍無可忍了，他憤然的向他們抗議說：

「我們已受過三次檢查，怎麼還要我們受第四次的麻煩？」

「我們是查禁私運軍火的，不要遲疑，快把行李打開來！」軍官很兇惡的回答。

孫先生不理會他的話，決心反抗他們第四次檢查，軍官恐嚇他，要他服從，但孫先生始終是拒絕，許多乘客都勸他再忍耐一回，他仍舊不肯。

船主的顧慮，不幸成爲事實了。因爲軍官受了孫先生的抗命，覺得大難臨頭了，於是命令他的部下，把這隻船扣留起來，不准開行。以洩他的私忿。經過船主幾次哀求，又納了些賄賂，作爲罰款，才得放行，但是已耽擱了一天的路程了；全體乘客，都憤恨軍官的苛虐，一時怨聲盈耳，孫先生趁着這機會，就把他威嚇所及，向乘客們盡量宣傳中國政治有改革的必要，竟獲得了一部分人的興味和同情，這是他第一次公開宣傳他的主張。

久別的故鄉，依然無恙，孫先生已經安然回來了，他們全家的人具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樂，然而孫先生在海外飽受了新的教育，他看見故鄉的人依然任保守和愚昧中度日，和他幼時所見的一些沒有變動，他悵悵地失望了。他偶從馮氏宗祠前走過，那些小學生正在把三字經一句一句的高聲朗誦，他恍惚地走進了兒時的夢境。



，心頭黯然，有些不堪回首了。

他很熱心的想把故鄉改造，他不斷的向全村的人宣傳滿清政治的腐敗，尤其是毒最攻擊官吏的貪污和苛虐，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他那時已經知道運用宣傳的方法，曾經向賣水果的小販，給他同治或咸豐的制錢，他不愛，因為他祇認識康熙和乾隆幾個漢字，因此祇要康熙的制錢。孫先生就把這些制錢的背面，拿來問他認識不認識？他搖搖頭說：「不認識。」孫先生於是把握了這個機會，向他解釋道：「這就是康熙和乾隆的滿洲文，滿洲人奪了我們的江山，做了皇帝，他們不是我們中國人呀！」那人便恍然大悟，孫先生接着就宣傳民族思想，凡是聽到他的滔滔雄辯，沒有不感動的。有時也和鄉人們講地圓之理，灌輸他們新的智識，他那時已經做了一位有力的宣傳家了。

他在全村公共事業上，因為年齡的關係，沒有發言的力量，但他也會盡心竭力的做了許多規劃，如關於教育，防盜、街燈、溝道、防疫等等，都本着他在檀島所見的，貢獻到本鄉來。然而村中父老們，都以為他是被外國所誘惑而背叛祖國聖訓的狂徒，他們一致的議論他，指摘他。孫先生真是像陷入重圍中的一支孤軍，他開始向落伍的故鄉苦鬥了。

在這時候，他幼年的唯一同志陸皓東，也從上海回來了，這才成了他有力的同伴。皓東八年前在滬民宗祠的村塾中，讀了不多時候，就跟着他父親到上海去，現在他父親死了，才從上海扶柩回來。他也是主張革命的，常常帶了許多村中的小孩子，演說太平天國的革命史，和華盛頓拿破崙的故事。現在他們別後重聚，志同道合，自然格外的親熱和愉快，他們於是大規模的向村中宣傳了。

這大概是翠亨村北帝廟裏北帝的生日罷，翠亨村全村以及附近的男女老幼，都紛紛的到這神像前，焚香禮拜，真是盛極一時，孫先生爲要破除迷信起見，他就約了皓東也到那邊去。他站在北帝神像前面，向頂禮膜拜的人演說：

「你們多麼癡迷？向這泥塑木彫的偶像求幸福，他有怎樣的神力，能夠把幸福給你們，它是一個無知無識

的木偶，我們明知他是木偶，而拿神一樣的虔敬他，這不是迷信麼？迷信就是代表人們的愚昧，是我們要求進步的一個障礙。我們希望真正的幸福，必須要把這些神像毀掉；同樣的，我們還要毀掉那高坐在北京城裏的滿清皇帝，因為他是知有識的會把毒害給我們的偶像。」

那些頂禮焚香的人，聽了這少年這樣的話，大家都驚奇的當他是一個瘋人，許許多多驚奇的情怒的目光都集中到他和薛東的身上。孫先生不慌不忙的笑說：

「你們還相信它能保佑你們麼？它要是遇到有人搗毀，試問它有怎樣的方法來抵禦呢？它不是祇有自身喪失了保祐的力量，而歸於毀滅麼？這樣一個無知無識的木偶，還值得我們人的禮拜麼？現在我們就在大眾前面，把它毀掉，看它有沒有抵抗能力？」

他說着就和薛東一齊走上北帝像的神座，動手把它搗毀。焚香的人都慌懼起來了，他們以為這樣的毀壞神明，將有大禍降臨他們身上，於是都逃出了北帝廟。

這是翠亨村上空前的大風潮，他們散到外面去一致的詛咒孫先生中了洋教的毒，老成的人主張把這孩子要受公眾的懲誡，於是大隊的人都擁擠到孫先生的家裏，要達成公把孫先生交出來。這年老的父親，爲了兒子闖禍，當然也很傷心，但爲面子起見，還是要維護他的短處，他向大眾這樣的說：

「這事應當鄭重些，神像如果真的被我的兒子搗壞了，當然由我負責修復；如果沒有損壞神像，是不應該責罰他的。」

後來村人就引導達達公去調查，北帝像的面部，確已毀壞了，達達公要平村中父老的氣，立即把它修復。他也是向來主張敬禮神聖的，對於他兒子的蔑視，覺得再不能寬宥了，因此他很憤怒。孫先生這種行爲，慈祥的母親，雖然也覺得蔑視是不對的，但她在告誡中還有憐惜的意味。孫先生爲求避免他父母的受累起見，他就悄然離家了。

孫先生從檀香山回來，一直到他離開翠亨村，祇有幾個月的光景，他現在又要走到異鄉去了。什麼地方是

他的去路呢？他走出了他的家門這樣的想，大體是不要他在太平洋中的島上，故鄉是不能再留戀了，種種事實的逼迫，他知道中國的革命工作，再不能延遲了，他須要進一步的準備他的學問和知識，他於是決心到香港去，再求高深的學問。

## 第九章 立志革命之始

這一次 孫先生從翠亨村被迫出走，是他一生轉機的關頭。自尊是少年人的天性，因此他所受的種種刺戟，就是造成他奮鬥的第一步。

他到了香港，就進拔粹書院(Dickson Home)肄業，同時又認識了幾個香港有名的基督教宣教師，一是區鳳舞，他曾在德國柏林大學担任漢文教授，長於文學，孫先生就拜他為老師，發奮學習國文。其次是美國宣教師喜嘉理博士，他來華多年，足跡走遍了廣東各縣，對於孫先生特別器重。據說孫先生和基督教正式發生關係，就在這時候，施受洗禮者就是這位喜牧師。

香港是中國民族恥辱的標誌，孫先生在這裏看見盎魯魯撒克遜民族的飛揚跋扈，富麗的洋房，建築在山上，有嚴密的市政組織，有經過訓練的巡警維持着治安。從山巔可以俯瞰他故鄉裏的河流，它像是一只踮踮在中國大門外的猛虎，他開始覺得要改造中國，不但要排除滿清的勢力，並且要把香港以及其他的中國領土內，所有外國人的勢力一律排除，才能造成獨立自由的民族。

但是香港給他也有不少便利，因為這裏是滿清政府勢力所不能到達的地方，他可以在英國法律之下自由自在。這裏是國際交通的重要商埠，海面上航行的輪船，帶了全世界各國的國旗和消息，使他更能擴展了他的知識範圍。巨大而莊嚴的英國軍艦，停泊在海中，很靜寂的似乎在聽候英帝國政府的命令而動作。他觀察了周圍的環境，他就不禁驚異蓋爾島國的英格蘭，竟然造成了這樣的偉績，於是他更深深地感到改造中國不僅是要

撞倒滿清政府，並且還須培養偉大的民族力量，用民族的力量來造成一個新的中國。

在拔粹書院不過幾個月，他又轉入皇家書院（Queen's College）他依然很努力於他的學業，這學校的教師，都是英國的上流人物，他們英語的發音很準確，因此孫先生的英語，更得長足進展。這時候孫先生十九歲了，達成公自他離家後，雖是爲了他斃壞神像，不免有些氣憤，但是骨肉的情誼，沒有絲毫動搖，並叫孫先生已經到結婚年齡了，因此，就招他回來。紀元前二十八年（一八八四年）四月十三日，孫先生就在故鄉的家裏和盧夫人結婚了。盧夫人名慕貞，是香山縣整鄉盧耀顯先生的女兒，是一位很賢淑的夫人，她在思想上，雖比較孫先生保守些，但是她在以後孫先生革命的時期內對於孫先生的專業，也有很多幫助的。

不久，德彭公突然來信要孫先生到檀香山去。原來德彭公爲防止孫先生沾染外國習氣而要他回國，但他在故鄉又鬧出蔑神的亂子，他爲要挫折孫先生的銳氣以鼓勵他前進的精神，他把從前分給孫先生的財產，已經轉讓給他人了，現在必須要孫先生親自回去執行。孫先生接到這消息，毫不疑遲的就到檀香山。德彭公不見了他的，小別年餘的兄弟，在愉悅的情緒中流露了憂鬱的態度。當他們互道別後的經過以後，德彭公開始深責孫先生污蔑北帝神像的事情，因爲在也看來，這是累及父母的悖逆行爲，敬祖和敬神，是同樣的重要，在人生的大事上。最後他說：

「到外國來和外國人共同工作，是好的，得到他們的尊敬也是好的。但倘使我們失去了中國遺傳的寶貴，我們不遵守祖宗的遺訓，在外國所得的財產有什麼樂趣呢？」

孫先生很瞭解他大哥的意思，他毫無怨言，絕對服從德彭公對他財產的處置。德彭公在這事辦理完畢後，就要孫先生到他曾經習業的阿胡島店中去，他想借這個機會來磨勵孫先生的志節。孫先生在手足友愛的情誼之下，對於大哥的命令，是絕對服從的。可是人情太可怕了，孫先生在重返阿胡島店中的幾個月內，夥伴們似乎都已窺破了他兄弟間的祕密，他們以爲孫先生是見逐於家庭的，他們對他盡量的譏笑，盡量的輕侮

他們對於孫先生欺侮的方法，據孫先生的二姊西姑太太說：他們把店中一切洒掃的苦役，大家都暗中相約不做，讓孫先生一個人去幹。甚至上毛房，一張草紙，也要孫先生遞給他們，這真是極得裏偷罷了。這抱負遠大的少年在他重遊的舊地內，受盡了人們這樣的奚落，這是何等可恨的舉情呢？然而他在波折重重的生命的歷程中，看來這是很平常的，他以為不能因為這樣瑣屑的波折羈留了他的前程，他不想和他們計較，但怎麼辦呢？他只有決心不告訴他的大哥而離去夏威夷了。

但是，孫先生現在是喪失財產的人了，他連路費都沒有，他到什麼地方去呢？他祇是爲了自己的前途，只有決心不顧一切而走了。那時他的姊丈楊子輝，就是二姊西姑太太的丈夫，也在檀島，孫先生就向他表示離去該島的原因，他說：

「我不堪他們這般無知卑賤的苛待，但我却不願因此區區小故，驚動我的哥哥。我去了，你是要好好幫助我哥哥的；我的哥哥，不就是你的哥哥麼？」

他姊丈說了許多話去阻止他，但是無效，他終於悄悄地走了。當孫先生孑然一身的從阿胡島跑到檀香山大埠的時候，很巧的遇見了一位他在阿胡學校中的美國教師佛蘭耶文，這位教師，向來是很器重孫先生的，他就請孫先生到他家裏去坐一下，他很懇摯的詢問孫先生此後的行蹤，孫先生就告訴他要回中國去，但路費沒有。佛蘭耶文就很慷慨的拿出了許多錢，請孫先生自己取，孫先生很感激他，但只拿三百圓美金。他辭出了他教師的家，便計劃到美國去然後回家。他就寫信給德彰公告訴他的行蹤。德彰公知道孫先生走了，立刻從真珠港到大埠來看他，要他回去再住一下，孫先生不肯，說船債已經定了，不能退回的。德彰公有些悔意了，他說：

「那我沒有錢給你，怎樣辦呢？」

「我不要你的錢！」孫先生立刻這樣的答覆他哥哥，他就坐上了輪船到美國去。在美國漫遊了各大都市以後，就到日本，又從日本到上海、南京，然後回到家裏見他的父母。他把身上僅有的剩下來的美國一枚，就

舉獻給他慈愛的老母，做他這次漫遊的紀念品；這是他一種孝思的表現，但也是很有風趣的一回事。

孫先生經過了許多波折，他已有更廣博的智識，闊大的胸襟，但現在又回到故鄉來了，他憑什麼才能抒展他的抱負呢？他只有無聊的在蔽塞的翠亨村裏，重溫兒時的舊夢。世界正在跟着時代不斷地轉變前進，但中國還停滯在中古的狀態。孫先生經過這一次漫遊，他更瞭解西方近代的文明。現在伏處在這蔽塞的故鄉，不免有些煩悶了，在無可如何中，忽然想起了中國古代的文化，便悠然地追慕我們祖先黃金時代的燦爛光輝，他相信我們自有傳家的寶貝，我們要改造國家，還須要恢復我們固有的優美文化，才嚮吸收西方的新的智識。因此他在鄉居生活中，就埋首鑽研中國的經史，這是最有意義的一件事，一個飽受了西方教育的少年，重返了他祖國文化的研究。所以這時期內，在孫先生未來的思想上，是有很大影響的。雖是孫先生自己追憶起來，說這是浪費的年頭，實際上，是絲毫沒有浪費的。

這是在歷史上永遠刻着的一個時期，孫先生具體的決志革命的時期到了。正當紀元前二十七年（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的時候，孫先生在故鄉很關心戰事的消息。這戰事的起因，是爲了法國人想奪我粵屬安南，在這戰事中，滿清政府的弱點開始暴露，驕慣的廷臣，始終是和戰不定；當法國海軍艦隊長孤拔（Courbet）率艦到福州企圖在福建擾亂時，滿清的官吏，還沒有知道他的陰謀，很熱烈的歡迎他，但結果這強悍的孤拔，却乘清廷不備，砲攻馬尾，擊沉了南洋艦隊，焚燬了船政局及福州馬尾各廠臺。到這緊迫的時候，清廷才吞吞吐吐的向法國宣戰，但是法國的海軍，已經開進黃海，佔領旅順、威海衛等地了。在安南方面，劉永福、蘇元春等却正在奮力抗戰，已經克復了諒山；漢督岑毓英同時與大英法軍於臨洮，聲勢很壯。法國政府受了這樣的敗挫，因此發生了政潮，如果乘勝進逼，中國不是一定戰敗的。但是滿清政府突然在這時候和法國言和，派李鴻章在天津簽訂和約，竟把安南許給法國做保護國，前線殺敵的將士，還在奮勇的前進，他們却不曉得他們所爭的國土，早已被滿清政府獻給敵人，這不但足可恥的，却表現政府的愚昧。孫先生知道和約簽訂了，他鬱心已極，他痛恨滿清政府到了極點。

這是最明顯而具體的事實，給他一個很強烈的刺激，他從這時期起，歸納了過去許多複雜的思潮，激起了更顯著的意識，在他的腦海裏，開始永遠的活躍着下面幾個字：

「革命！」

「排滿！」

自 孫先生從翠亨村蕩神出走到現在，是他少年時代在思想上行動上最複雜的時代，但是終於由時勢的造，他開始發現了他真正的出路了。他從少年的煩悶時代，突進了積極的革命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他的革命的意識愈見明顯而堅確。所以 孫先生自己也承認：「予自乙酉（紀元前二十七年公歷一八八五年）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這是在歷史上永遠不能磨滅的一個重要時期。

## 第十章 因革命而學醫

革命，不但是 孫先生個人思想上，事業上的出路，也是整個中國民族的出路，偉大的 孫先生，開始踏看革命的大道而前進了。但是革命不是空洞的口號，應當從什麼地方着手呢？他經過詳密的考慮，決定要有一種可以憑藉的職業，以為藏身的地步。他曾經想學一個軍人，但是滿清政府下的陸軍學校，是不許漢人進去的；福州的海軍學校，也剛在中法戰事中被法國人毀壞了。又想做一個律師，但那時還沒有法律學校，最後他就決定學醫學，因為醫生與社會接觸的機會最多，可以在醫生的名義之下秘密的進行他的計劃，也可以憑藉醫道以終身從事於革命的事業。

這是 孫先生少年抱負實現的開始，他在檀香山時候，曾經和一位華僑杜南山討論過關於良相與良醫的問題。杜南山是廣東順德人，和 孫先生友誼很厚。有一天 孫先生看見南山的書架上，放着翻譯的醫書，很是奇怪，因此問南山道：「譯這種書有何用處？」南山道：「從前范文正公曾經說過：『不為良相，當為良醫。』

「我讀這種醫書，就是這個意思。」孫先生聽了，起初也很佩服，後來却對南山道：「以前你說范文正公的話，我以為不十分妥當。因為凡是讀書的人，不是馬上可以從政的，從政的人，也不是馬上可以當權的。倘使殫心竭力以求作相，等到不成功再去做醫生，不但良醫不容易做，就是努力去做，恐怕也太晚了。據我看起來，應該一方面努力政治，一方面努力醫術，這樣定了目的，向前進行，才可以有一方面的成功。」南山聽了非常敬佩。現在孫先生果然依照當年的遠大見解，應用到實際事實上了。

孫先生的計劃決定了，他就離開翠亨村，直到廣州。由喜嘉理牧師的提議和介紹，進了博濟醫院附設的醫學校。這學校是由院長克爾博士（Dr. John Kerr）主持的，他是一位很有名的外科醫生。孫先生對於醫學，也特別注意外科，因為這比較有興趣的一門科學，因此他在克爾博士教導之下，很用心的學習；讀書是孫先生一生最大的嗜好，他對於這新奇的科學，尤其是要格外細心的研究了。

博濟醫院是英美傳道會設立的，創立於一八三五年，當時遠東各國還沒有西醫西藥，這醫院可說是開風氣之先。一八五五年，克爾繼任院長時才附設了這個醫校，一八七九年又兼收女生。當孫先生肄業時，這學堂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當時學費非常低廉，每年僅納二十元。孫先生寄寓在醫院內哥利支堂十號宿舍，就是現在的四十八號病房。

在這學校裏，同學並不很多，但孫先生却發現了一個同志，就是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在廣州起義的鄧士良，他是廣東客家人，生長在歸善縣淡水墟。在學校的名字，叫做鄧安，號弼臣。廣東的客家人，大都是三合會會員，士良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為人豪俠尚義，孫先生一見了就很賞識，於是漸漸地和他接近，他也很敬佩孫先生，他們友誼一天天地深起來，於是在密談中，孫先生向他說出了也要革命的心事，士良聽了，就非常悅服。孫先生的意見。他們興奮極了，就滔滔的議論起來：

「你是一個純粹的書生，要革命必須靠武力，還須要共同起事的人，這些必須要顧及的。」士良說。

「但是我所想像的革命，是不像古代英雄的鬧起草莽，第一必須要秘密的宣傳革命的主張，然後集合廣大



至同情於革命的羣衆起事。」

「那末，我們三合會會員就是革命的羣衆了，因為我們的宗旨就是「反清復明」，不過會員因為歷史太久遠了，都已忘掉了他們的本旨，現在只要登高一呼，他們還是可以爲革命出死力的；這個責任我一定可以擔當，爲你幫助的。」

孫先生聽了快樂得幾乎要跳起來了，他渴想了幾年的革命事業，居然到現在才遇見了一個眞實的同志；士良也很滿意，因爲孫先生竟能引他爲同志，於是他們密切的聯絡起來，他們在同一的革命目的之下，深深地樹立了友誼的基礎。但是全校的同學，只有這一位鄭士良是做了孫先生的同志，可以和他暢談革命，其餘的就都是話不投機了。

不久在一個很巧合的機會中，又認識了尤烈。尤烈，字少純，廣東順德人，自幼好與洪門會黨的人交遊，他的族人尤答堂是博濟醫校的畢業生，在順德鄉間行醫，他常常到省城來採購藥品，每次總要到母校探訪舊友。有一天晚上，他和尤烈正走向博濟醫院去，經過十三行果攤，看見幾個人正在紛擾不已，仔細一看，原來就是孫先生和鄭士良等兩三個人，因爲他們想買荔枝，但大家都沒有帶錢，要求果攤老闆明天到博濟去收錢，果攤老闆不答應，就這樣爭論起來了。裕堂見是熟人，就拿出半元錢，代爲解圍。於是他們回到棧裏，大吃大談。尤少純對於孫先生的革命主義，尤其傾心悅服。從此孫先生和士良少純三人，常常密談革命。那時博濟學校中有一位化學教師何際然喜談佛偈，他常說：「不有而有，有而不有」兩句話，孫先生聽了覺得很有趣味，於是每天無事時，也學他說幾遍。當孫先生和士良少純三個人議論風生的時候，許多同學漸漸地注意起來，如果問他們所談何事，孫先生就高誦：「有而不有，不有而有，」使他們不得要領。這兩句神祕的偈語，竟遮飾了當時孫先生的心事。

一年以後，香港新設了一所規模較大的醫校。這醫校的起源，是一位何啓博士爲要紀念他的英籍妻子雅麗氏，就創立一個雅麗氏紀念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這醫院就附設在醫院裏，叫做 Y. h.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以便實習。孫先生因爲在香港鼓吹革命比較自由些，並且雅麗氏學校的功課都比較完善，因此在這學校成立時，就從博濟醫校轉學過來，這時孫先生已二十二歲了。

雅麗氏醫校教師，是有：康德黎 (James Canille)、甘德 (Patrick Mcneon)、譚生 (G. E. Thomson) 如何等，他們對於孫先生的革命，都會有過幫助的。孫先生在這學校裏，還是繼續研究外科。他那時是很勤苦的，在廣州博濟學校時，由家中每月寄六元爲膏火之費，還可以勉強夠用，但在香港却不行了，他只有一面要求朋友幫助，一面自己刻苦的節省。但是他到廣州時，既是和鄭士良密談，現在他敢言無忌了，他盡量洩露革命的懷抱。在課餘放學的時候，他是歡喜邀集幾個比較親熱的同學，到酒店去高談豪飲，直到他認爲疲倦了爲止。錢用盡了，他就很勤奮的讀書，不出校門一步，好像一個與世無涉的人，因此同學中都有些羨他。他有時獨自關着房門，專心研究中國地理，他的臥榻旁邊，掛了一張大地圖，常常對圖注視，籌思何處宜攻，何處宜守。有人進去了，就指着地圖很感慨的說：「如此江山，付之異族，安能忍與終古！」這嚴肅而沉重的話，果然能夠令人動容，但是還沒有促起大家的狂省。那時鄭士良還在廣州博濟學校，他常常從廣州到香港來，和孫先生等密談。

德彰公知道孫先生很努力求學，他很悔恨從前把他財產分讓，就常常寄錢回到家裏，要造成公體幹。孫先生，以助成他的學業，但不幸，這成於在孫先生到雅麗氏醫校後不到一年，就因患了沉重的病症，看不到他兒子偉大功業的成就，就與世長辭了！享壽七十有六歲。他遺留給孫先生的，就是仁慈樸實的性情，和公平正直的美德，他雖沒有親見孫先生的成功，他的精神是永遠不朽的。孫先生自遠成公臥病以後，就請假回家，德彰公也從檀香山趕回來，他們兄弟二人，都親侍湯藥，一直到喪事事情完了，才各自分散。他們經過這一次會面，過去的事情，都不提了，他們相互的敬愛，永遠不變。孫先生從此得到德彰公更進一步的助力，對於革命事業的奮鬥，因此更一往直前的邁進。

孫先生在雅麗氏醫校，讀了兩年，在香港認識的朋友，漸漸多起來，鼓吹革命的熱情，也一天高漲一天。

他對於同情革命的人，格外親熱而且竭誠的羅致，有一位早年的同志叫做陳少白，就是由他設法進雅麗氏學校的，在事前，連少白本人都沒有知道。他在革命的意識之下，只有一樸真誠的心，他需要真正的同志，所以凡是同情於他的人，都要想盡方法結合起來，於是竟把陳少白拉進雅麗氏校了。自少白到了雅麗氏校後，他就住在博濟學校時得到羅士良一樣的可以談心的人了。不久，由少白介紹，孫先生認識楊鶴齡。楊原是與尤烈同鄉，那時尤烈並且也到香港來做事情，因此常常在一塊兒的。楊鶴齡也是中山縣翠亨村人，但因為生長在澳門，孫先生從來沒有和他見面。他家世富豪，在香港歌賦街，有一所先代遺業的商店叫做楊耀記，他在這店內編一樓，專為朋友們聚談話的地方，於是孫先生和少白等常到他的家裏去，四個人在一起總是暢談革命。他們都以洪秀全比擬為理想的革命人物，因為孫先生曾經這樣的說過：

「洪秀全是一個失敗的英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因為他是失敗者，所以滿清政府把他加上一個寇字。人們也就說他是寇了！」

他們議論到這裏，大家相對歎歎，於是孫先生就用諷刺的辭令，笑着說：

「成敗是不能預期的，現在我們也許就是滿清政府心目中的四大寇了！」

大家聽了都笑起來，他們的議論也格外的緊張！孫先生在那時因為同情他的人，漸漸的多起來，他鼓勵革命的精神，也愈見興奮，簡直是隨時隨地都要說革命，不是這樣，就覺得不舒服了，這是少年真摯的熱情表現，也是孫先生對於革命認識的真切，而急切希望革命實現的表現。然而，在當時風氣閉塞的時代，許多不瞭解他的親戚朋友，却都說他是一個怪異的瘋狂少年，他們知道孫先生和陳、楊、尤、三人是相依為命的大談革命，他們就真的叫起「四大寇」來了。

## 第十一章 兩個幻滅的夢境

在幾千年帝王專制下的中國人，因為歷史上朝代的變更，祇看到一家一姓的興替，成王敗寇，此興彼滅，似乎成了一定的律則。因此無形中產生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國襲思想，就是祇有皇帝才能統治整個的國家。鄉下老百姓身當亂世，也都不期而然的渴望着「真命天子」的出現。這一種傳統的帝王思想，成了民間普遍地勢力。歷史上有很多抱負偉大的野心家，爲了這貴有四海的皇帝，引起了不斷的殺伐征討。像劉邦見秦始皇出外，他說：「大丈夫當如是也。」項羽也有「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語。因此有好幾次草莽英雄，崛起民間，向統治的朝廷反抗，結果爲了他們的動機祇是在爭皇帝，等到他們取而代之以後，還是換湯不換藥，於是一部悠久的中國歷史，始終沒有跳出帝王專制範圍。歷代的無辜民衆，在這些野心家爭皇帝的戰爭之下，不知犧牲了多少生命財產，這是一個極慘痛的歷史事實。

現在 孫先生和他的同志，正醞釀着對滿清政府統治的反抗，如果把時間倒退了三千年，正和秦末的陳涉、吳廣揭竿而起，有同樣的情形。但他們是不是像劉邦、項羽一樣的掘着帝王思想呢？在傳統思想支配下的中國，掀起革命的運動，能不能跳出歷史的圈套？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孫先生從個人對革命信念的建立，已經得到了少數同志的附和，他們四大寇對革命的問題，正開始公開討論，但在這初期革命問題的討論中，他們四人之間的思想，是不是完全一致，或是有相當的距離，這也是我們要知道的事實。

孫先生在民權主義第一講，曾經述過當年的情形，他說：

「當我提倡革命之初，來贊成革命的人，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帝王思想的。」  
這的確逃不了歷史的圈套，傳統的帝王思想，始終深印在人們的心坎。但目光遠大的孫先生，他爲了救國家救民族，祇知道爲整個國家民族而革命，在夏威夷求學的時候，他目睹英國式的君主政體，又親聞美國民

治主義的宣傳，從這兩方面事實中，他已深感着民治思想的興趣，因此從不懷疑着帝王的迷夢。據楊鶴齡告語人家，當時四大寇在香港，曾經有一位很率直的人對 孫先生說：

「寧成當以帝王屬君。」

「帝王豈可為哉，子孫求死所而不可得矣！」孫先生聽了這一句話，就很莊重而沉痛的回答他。在這一個回答中，孫先生少年時期的懷抱和遠大的見解，已經充分的表現了。

帝王思想在另一種意義上說，是以迷信思想做基礎的，尤其是相信風水星相組織的中國社會，可以說二者是相伴而來的一種產物。在革命言論時代的 孫先生，他雖有遠大的懷抱和見解，能夠擺脫歷史的傳統思想，但要打破這個帝王思想根源的迷信社會，不是一件很輕易的事情。因此四大寇中的其他三位同志，雖然經過孫先生一度鄭重的說明，但他們多少還是迷戀着這虛榮的帝王幻想，由幻想而演成了飄渺離奇的夢境。

這真像神話一般的故事，也是四大寇中的一位同志傳說出來的。

當 孫先生和四大寇熱烈談論革命的時候，在晚上，他們談得高興了，常常留宿在一起。有一天晚上 孫先生和四大寇中兩位同志就住在一個地方。第二天早上，孫先生已經醒了，但還在靜靜地躺在牀上，凝神思索革命的問題。有一位沒有在這裏的同志很匆忙的從外面進來，走到 孫先生牀前，把帳子揭開，看見他閉着眼睛，以為酣睡未醒，便不敢去喚醒他，於是走到另外一個牀前，毫不客氣的把那人推醒了，並且很興奮的說：

「我告訴你一件故事！」

睡在牀上的那位同志說：「人家正好好的睡着，給你一早跑來吵醒，有什麼故事？你講吧。」於是一位進來的同志就開始講他的故事：

「昨天晚上，我父親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一個白鬚的神人，叫我父親跟着他走，我父親問他：『走到什麼地方去呢？』那白鬚神人說：『不必多問，你跟我走就是了。』於是我父親便跟着他，走了一會兒，忽然

好像騰雲駕霧，身體飄忽忽地只是往天上升，一下子，就到了天空，在一個地方停下來，我父親偷眼一覷，見是一座宮殿，心裏不覺慌張起來，因為在專制時代，如果闖入金鑾殿上，是要犯很大的罪的，因此躊躇地不敢進去。可是那白鬚神人很鎮靜的還是我父親往前走，他說：「怕什麼，跟着我來吧！」於是走進了那座宮殿。舉目一望，裏面的陳設，華貴極了，恍惚從戲臺上的佈景中所見到的一樣，中間掛了一個燦爛的繡幛，兩旁站立着許多宮娥妃嬪。我父親心裏一怔，又低下頭，不敢再看。那白鬚神人便告訴他：「這就是你的家，怕什麼呢？儘管抬起頭來看好了。」我父親便抬起頭來，想看看坐在中間龍椅上的皇帝是誰。你說奇怪不奇怪？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我，他的兒子！」

那睡在牀上的同志聽了這故事以後，披了衣服，馬上起來，一點沒有驚奇的表情，却淡淡的說：

「你這個故事，一點也不奇怪。我也是正在做一個比你父親更奇怪的夢，也夢見了一個神人，你來的時候，我正好夢方酣，却給你打斷了。那神人把我帶到一個小山上去，因為風吹得很厲害，於是我就問他：「這樣大的風，你把我帶到這地方做什麼？」那神人把手向前面一指說：「你看這遠遠的地方是什麼東西？」我一看是個墳墓，便說：「這不是墳墓嗎？」神人說：「不錯，可是你知道這是什麼人家的墳墓？」我說：「這話怎麼說呢？」神人說：「這是你祖先埋葬之地。」我便問他：「我祖先埋葬之地，又有什麼特別呢？」他說：「你知道這個墳墓與普通的墳墓不同，是很有來歷的，你們的祖先埋到了龍眼，是一個真正的龍眼。」當時我便問他：「有什麼方法能夠證明是龍眼呢？」那神人用拐杖向前面一指，就有一條很大的金龍，從墳墓中出現，在天空繞了幾圈，又回到裏面去了。我說：「不錯，是龍眼了，可是龍眼又有什麼好處呢？」那神人說：「你祖先埋到了龍眼，便應在你身上，你要做中國的皇帝了！」」

他們兩人彼此胡言亂語，孫先生都聽得清清楚楚，因此引起了她很多的感想。帝王的迷夢，支配了中國幾千年的人心，造成了一部相斫相伐的慘痛歷史。他們兩人互說詳瑞之徵，完全是帝王迷夢的下意識的發現，也就是歷史的傳統觀念的反映，這是中國革命進程上最大的危機。

「就中國歷史講，每換一個朝代，都有戰爭。比方秦始皇專制，人民都反對他，後來陳涉、吳廣起義，各省都響應，那本是民權的風潮，到了劉邦、項羽出來，便發生楚漢相爭。劉邦、項羽是爭甚麼呢？他們就是爭皇帝。漢唐以來，沒有一朝不是爭皇帝的。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當亂的時候，總是爭皇帝。」

這是孫先生後來在民權主義第一講所說的，大概就是當年聽了那兩位同志胡言亂語以後的最重要的感想，因此在那一講上特別追述一下。爭皇帝爲什麼能引起戰爭呢？這原因是很簡單的，因爲皇帝祇有一個，有權力的人都去做皇帝，但皇帝祇有一個，就非爭奪不可，因爲要爭奪，就非互相撕殺不可，這是多麼悲慘的一件事。革命的目的，是在解除人民的痛苦，如果爲了爭皇帝而革命，豈不是將因爭皇帝而更加重了人民的禍害？那就非失敗不可。現在革命還沒有發動，但同志中四個人已有二個人懷抱帝王的思想，將來演變的結果，一定不出這樣兩途：一是同志要打同志，二是本國人要打本國人，全國長年相爭相伐，人民的禍害，便沒有止境。因此孫先生後來在民權主義上堅決的說：

「共和國家成立以後，是用誰來做皇帝呢？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用四萬萬人來做皇帝。照這樣辦法，便免得大家相爭，便可以減少中國的戰禍。」

這是孫先生眼光遠大的地方，也就是提倡民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的根據。從歷史上研究，太平天國的失敗，是一個最好的教訓，孫先生對於他們失敗的原因，曾經有過精確的論斷，是不在洪秀全的不懂外交，或得到南京以後不乘勢長驅北伐。最大的原因，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以後，就互爭皇帝，鬧起城來自相殘殺。這殘殺的事實，經他簡明扼要的這樣指出：

「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洪秀全既做了皇帝，楊秀清也想做皇帝。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有六七萬精兵，因爲發生爭皇帝的內亂，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消滅他的軍隊。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也專橫起來，又和洪秀全爭權，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便從江西趕進南京，想去排解。後來見事無可爲，並且自己也被人猜疑，都說他也想做皇帝，他就逃出南京，把軍隊帶到四川，

不久也被清兵消滅。因為當時洪秀全、楊秀清爭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那四部份的基本軍隊，都完全消滅，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根本上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

孫先生這些斷續的感想和論斷，雖是在民國十三年演講三民主義時說的，但他的概念的構成，早已發生於三十多年前四大寇中兩位互說異夢的時候。革命運動是必須朝同一條預定的大道前進，所以在開始發動的時候，如果就走錯了路，那是最危險的事情。有遠識定見的孫先生，他早已確定了未來的中國革命的大道。三民主義的民權主義思想的根苗，從當時兩位同伴幻滅的夢境以後，已經在孫先生腦海中深深地種下了。

## 第十二章 最早的政見

紀元前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年）孫先生二十六歲了，就從雅麗氏醫校出來。孫先生在校時，一面鼓吹革命，一面對於學業還是沒有疏忽，所以畢業考試的結果，各門學科都是一百分，僅有一科是九十幾分。學校當局為獎勵他勤學起見，就經過教務會議的決議，在這一科上多加幾分，並且在他的畢業證書上特別注明是「滿分」，由校長，教員十三人，試官八人，及牧師書記官等簽字。在七月二十三日那天，由香港總督羅便臣爵士親臨頒予香港政府的第一張醫照，准以內外科行世，學校當局也贈送孫先生助產器具全套，以資獎勵。從這時起，孫先生就結束了他的學生生活，而開始到社會去從事實際的運動了。

這雅麗醫校現在已歸併於香港大學，孫先生曾經實習過的雅麗氏醫院，也遷到般舍道與那打素醫院聯合一處，已非常日原址荷里活道的舊觀了。

孫先生從雅麗氏醫校畢業後，本來是想自己開設藥房，但正在草擬招股章程時，忽然被學校當局知道了，就禁止他；因為照他們英國的習慣，醫師的地位是很高的，稱為上流人，做買賣的人，就比較低賤了。所以當



時康德黎就對 孫先生很懇切的說：

「你不應該做這種事情，不能用你的名義去開藥房的；因為你是本埠第一屆第一名的學生，應該自愛。」

澳門是 孫先生每次往來香港與故鄉間的必經之地，有一次，孫先生假期回鄉，經過澳門的時候，當地鉅商曹子基，何穗田等的家人，正患着很重的病症，經 孫先生一診而愈，於是大家都驚為神奇。他們現在知道 孫先生已經學成業就了，因此聯合當地紳商一致要求到那裏去行醫。所以 孫先生到澳門，也不是出於原定的計劃。這樣一來，孫先生開藥房的計劃不得不打消了，於是到澳門去掛牌行醫。

孫先生對於外科和解剖的手術，特別擅長，所以不到兩三月，聲名遠起，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耳聞其名，極端欽佩的，就診者戶限為穿。他這一年的醫金收入，竟有一萬元之多，但他並不積蓄，總在各方面用去了；尤其關於交遊的費用。那時康德黎常常到澳門來幫助 孫先生施行較重要的手術。他是 孫先生的教師，但他竟忘了師生的隔閡，對於 孫先生不斷的幫助，他自己這樣說：

「何以我要這樣地到澳門幫這位男兒的忙呢？別的人有爲他而戰鬥，而殉難的，我却爲着愛他與教他。他的天性易於吸引人們注意他，常時預備在診室中或沙場上替他服務；一種不可解釋的潛勢力，一種吸引人們親就他的磁性。」（見 *Carthic: Sun Yet Shi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這是確實的，孫先生的坦率的胸懷和真摯的態度，是永遠的被人們所悅服而樂於聽他指揮的，他偉大的領袖風度，早在學生時代及開始做醫生時代表現了。不久，孫先生又到廣州去行醫，也同樣的獲得良好的名譽；他往來澳門廣州間，非常忙碌，成了廣東最有名的西醫了。後來因爲醫務上的必要，還是要開藥房，所以就任澳門仁慈堂附近的診所，遷到草堆街，擴充而爲藥局，定名爲中西藥局。不久，又接受了當地華人設立的新醫院的聘請，主持院務。這醫院向來是用中醫中藥，施施貧病。孫先生主持以後，以改良醫術醫藥爲目的，竟破例兼用西醫藥劑，他自己一本濟人利物的宗旨，所有酬金，一概不受，因此院務非常發達，當地的葡萄牙人，也聯名紛紛來澳，於是引起了葡萄牙醫生們的嫉視，仗着他們特殊的勢力，到澳門市政廳去告發，說

孫先生沒有葡國的行醫證，結果竟勒令孫先生停止行醫。孫先生氣憤極了，就把藥局搬到廣州洗基，另覓爲東西藥局；並且聘尹文權醫生爲助手。他爲要救濟貧窮人的疾病，特別規定每天上午十時以前就診的，醫費一律免除，因此更得社會的信仰，醫務發達，遠過澳門。

然而，醫生終究不是孫先生終身的職業，他行醫是別有懷抱的。所以一面醫務雖是十分忙碌，但他始終沒有忘掉他的本志；他那時的同志除了楊、尤、陳外，更有：魏友琴、程璧光等。這時尤烈在澳門任廣雅書局內的廣東輿圖局的測繪生，孫先生就常常邀集這許多同志在這書局內的南園抗風軒會議國事。一面由鄒士息結納官黨，聯絡防營，也很有端倪了。孫先生倫敦雜誌中說：「余早年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之存在，此種政治運動，大可名之曰『少年中國黨』之形成。」(It was in Maquan that I first learned of the existence of a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I might best describe as the formation of a Young China Party)，就是指這個時期的活動情形，所謂少年中國黨，是那時國際間對維新政黨的一種普通稱謂。有人說道就是孫先生手創的興中會，不免有些誤解。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以後興中會的創立，實導源於這時期的活動，要比較準確得多。

孫先生那時對於政治改革的觀念，已從空泛的議論轉變到有條理的辦法。他自己說：「文之生，二十有八年矣，自成童就傅，以至於今，未嘗離學；雖未能爲八股以博科名，文章句以邀時譽，然於聖賢六經之旨，國家治亂之源，生民根本之計，則無時不往復於胸中，於今之所謂西學者，概已有所涉獵，而所謂專門之學，亦已窮求其一矣。」(上李鴻章書)這就是說明，他已完成了各種基本學問和專門學術，並且無時無刻不關心到國家生民的根本大計，也慨然以國家天下爲己任。因爲他已有廣博的學識，所以對於政治改革的思想，就有充實的內容和切實的辦法了。他那時在醫務稍暇時，開始做政治的論文，在報上發表，但這些論文，已很難看到，盡現在所能搜羅到的，既有在盛世危言中有一篇叫做農功，據陳少白說是孫先生做的。這篇文章的要點是說，農功的勤惰，可以補救天然的缺憾，所以要農民知道利用科學方法，講求士田的性質；政府要有農官，地方

官吏要負勸農功的責任，務使各盡地利，各極人工。他說：

「古之言曰：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七人，最下食五人；同此土田，同此樹藝，而收穫之多寡，遇乎不同者，農功之勤惰爲之也。故水潦出於天，肥磽判於地，而人力之所至，實足以補天地之缺陷而使之平。昔英國挪佛一郡，木屬不毛，後察其土宜，遍種蘿蔔，大獲其利。伊里島田卑溼，利用機器竭其力，土脈遂肥。撒里利平原之地，既枯且薄，自以鳥糞培壅，百穀無不勃茂。猶是田也，而物產數倍，是無異一畝之田，變爲數畝之用，反磽確爲沃壤，化瘠土爲良田，地利之闕乎人者，概可知矣。」

但是農民的智識有限，怎樣能盡量的發揮地利，來變磽爲肥呢？因此 孫先生又舉西洋各國的辦法來說：「泰西農政，皆設農部，總攬大綱。各省設農藝博覽會一所，集各方物產，用考農功；與化學諸家詳察地利，各隨土性，種其所宜，每歲收成，自百穀而外，花木菓蔬，以至牛羊畜牧，皆入會考察優劣，擇尤異者，獎以銀幣，用旌其能。至牲畜受病，若何施治，穀蠶木蠶，若何預防，復備數等田樣，備各種汽車，專事講求，不遺餘力。先考土性原質，次辨物產所宜，徐及澆溉蠶桑諸法，務欲各盡地利，各極人工，所以物產贏餘，昔獲其一，今且倍滯十百而未已也。……其尤妙者，農部有專官，農功有專學，制得一法，暮已徧行於民間。何國有良規，則互相仿效，必底於成而後已。民心之不明，以官購之，民力之不足，以官輔之，民情之不便，以官除之，此所以千耦其耘，比戶可封也。」

「我國似宜專派戶部侍郎一員，綜理農事，參仿西法，以復古初。委員赴泰西各國，講求樹藝、蠶桑、養蠶、牧畜、機器、耕種、化糞爲腴，一切善法，勸爲專書，必備必賅，使人易曉。每省派藩臬道府之幹練者一員，爲水利農田使，責成各牧令，於到任數月後，務將本省土田肥瘠若何，農功勤惰若何，何利應興，何弊應革，招徠墾闢，董勸經營，定何章程，作何布置，決不得假手胥役，生事擾民。……」

這可說是 孫先生最早的政見了，他對於農政是很關心的。中國是以農立國，農業與民生，關係最切，所

以孫先生這篇文章，也可說是民生主義的最初最簡單的概念，已在這時候潛伏在他的意識中了。他自己曾經說過：「某也農家子也，生於隴畝，早知稼穡之艱難。」（擬創立農學會書）後來對人更具體她表示：「要是不生為貧困的農家子，也許會忽略這重要的民生問題，而不加以注意，是很可能的。」（見宮崎滔天孫逸仙傳）我們在上面說過，他這時對於專門之學。已窮求其一，這農業問題，也許就是他所研究的專門問題之一。所以孫先生最早的政見，注意於農功農政，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實。他這一篇文章，是反對滿清政府中提出貢獻的意見，他對於滿清政府固然是以敵視出之，但那時他還沒有力量可以把它一蹴而倒的，所以他還沒有暴發狂跳的態度，他只是在革命的雷論時代。

那時，李鴻章在北方，正努力創辦所謂新政，是當時在滿清政府下算堪比較誠時務的大員了。孫先生就想把他的大政方針告訴李鴻章，借他的力量來改革一切，也未嘗不可挽救中國的危亡。因此就從廣州到翠亨村去，一個人獨自閉着門，做了一篇大文章，預備給李鴻章。在這一篇文章內，孫先生的見解，從農政更擴充而到全部政治了，但最重要的還是在農政方面。這篇文章的主要骨幹是在下面幾句：

「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墨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變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

這是孫先生政見的四個綱領，他對於這個綱領的實施辦法，關於人盡其才的，是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地盡其利，是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物盡其用，是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貨暢其流，是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

在這四大綱領之後，孫先生又指出中國的病源，在於不知之人阻撓能行之人，使國家的進步，遭受天大的障礙，他說：

「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夫能行之人少，尚可借材異國，以代爲之行，不知之人多，則雖有人能代行，而不知之輩，必竭力以阻撓。此昔日國家每舉一事，非格於成例，輒阻於羣議者，此中國之極大病源也。」

這是 孫先生革命哲學「知難行易學說」的胚胎，如以二十五年以後，他五十四歲時所發表的孫文學說來證明，就可知道，他在學說自序說：「中國事向來之不振者，非坐於不能行也，實坐於不能知也。及其既知之而不行者，則誤於以知爲易以行爲難也。倘能證明知非易而行非難也，使中國人無所畏，而樂於行，則中國之事大有可爲矣。」他對於中國病源的診斷和真知力行的提倡，表現了前後一貫的基本態度。我們可以體認 孫先生革命哲學的創建，是從長時間許多痛苦的經驗和觀察中來的。至於施行四大綱領的緩急， 孫先生的主張，還是在農政，他說：

「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亦爲今日之急務也。且農爲我中國自古之大政，故天子有親耕之典，以示萬民，今欲振興農務，亦不過廣我故規，參行新法而已。……」

最後 孫先生表示自己志願，在農政方面致力，他說：

「文之先人，躬耕數代，文於樹藝畜牧諸端，耳濡目染，洞悉奧蘊。泰西理法，亦頗有心焉。至各國土壤之所宜，種類之佳劣，非遍歷其境，未易週知。文今年擬有法蘭之行，從游其圃之蠶桑名宦，考究其桑新法醫治蠶病，並擬順道往游環球各部，觀其農事，如中堂有意以興農政，則文於回華後，可再行遊歷內地新疆關外等處，察看情形，何處宜耕，何處宜牧，何處宜蠶，詳明利益，盡仿西法。招民開墾，俟商墾辦。此於國計民生，大有裨益；所謂躬行實踐，必求澤之沾沛乎人民者此也。……」

孫先生拿了這篇文章，到廣州和陳少白商量，少白也很贊成，於是 孫先生準備到上海，然後設法把這篇文章送上李鴻章。廣州的藥房，就請少白把它結束。

孫先生到了上海，就想法去找引見李鴻章的人。一天，在鄭觀應（即盛世危言的編著者，是孫先生舊同鄉。）家裏遇見了王韜。韜字紫詮，別字天南逸叟。會上書太平天國忠王取上海策。後來到香港助英勸效師羅琪博士（Dr. Jesso）翻譯四書五經。歷琪回英國，也請他回去，他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在循環日報當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他文章做得很好，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孫先生知道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很熱心的就介紹他一位朋友在李鴻章幕府當洋務文案的羅豐祿。孫先生快樂極了，就約陸皓東一起到天津去，皓東這時已回上海來了。

孫先生到了天津，就去看羅豐祿。那時中日戰爭已經很緊張，李鴻章正在廈門督師，軍務旁午。羅豐祿就把孫先生的文書送到那邊去，李鴻章那裏有空暇來研究孫先生的大政方針呢？他祇是含糊的對羅豐祿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說。』

羅豐祿回來告訴了孫先生，孫先生知道沒有辦法，於是他就和陸皓東北走北京，看看滿清政府所在地的情形，南下武漢，觀察中原大勢，然後仍回到上海來。

### 第十三章 創立興中會

上書李鴻章是失敗了，但孫先生沒有絲毫灰心的表示。當他到北京時，看見滿洲人的驕奢淫佚，庸黯無知，官僚的昏庸腐敗，百政廢弛，他斷定滿清政府的崩潰，是時間問題，因此排滿的志向，愈加堅決了。但是他經過這一次刺激，却增加了很多經驗，他知道革命的運動，決不能依靠現成的勢力，來企圖實現他的主張，他承認上書李鴻章，是一個錯誤的幻覺，顯然是已成泡影了，他現在須要自己樹立一種勢力，站在現成勢力的對面，堅決的奮鬥，衝破這現成的勢力，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然而革命的勢力，怎樣才能樹立呢？那當然要有革命的團體，因此孫先生決定重到檀香山去。

檀香山是 孫先生舊遊之地，那裏有他的同胞哥德彭公，更有許多同鄉華僑，無論在感情上，經濟上都給 孫先生很多幫助的。因此，他這一次重到檀香山，是懷着無限希望的。

太平洋的怒潮，不間斷地在掀起。孫先生第三次到檀香山，他把革命的種子，從太平洋怒潮中帶來了。舊時的親友，他們應當怎樣的對這一個懷有大志的少年，表示刮目相看？他以真摯的熱情，開始向一切認識的以及不認識的祖國僑民宣傳了。然而，風氣畢竟還是閉塞，革命的呼聲，似乎刺痛了他們的耳鼓，大家都掩着耳走開了。胼手胝足的華僑，對於祖國是最關心了，但那時說到滿清政府的腐敗，以及如何改革的辦法，這些政治的問題，似乎與他們的生計問題有些不相關連，他們是不會發生興趣的。富有演說天才的 孫先生，就滔滔地替他們解釋多少疑難，說許多刺激與奮的話，鼓吹，鼓吹得舌敝唇焦了，才得到一部份人的瞭解和同情。經過幾週月的宣傳， 孫先生才決定結合少數同情的人而成立革命的團體，贊助最有力的，就是德彭公和鄧蔭南二人，他二人都願傾家相助，這是很難能可貴的。

大約是紀元前十八年（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事情吧，中國革命團體的元祖，在檀香山創立了，地點是在卑涉銀行（The Bank of Beretice）華經理何寬的家裏，到會的有何寬、李昌、黃華恢、鄧蔭南、劉祥、黃亮、鄭金、程蔭南等，由 孫先生主席，提議組織革命團體，大家就決定定名為「興中會」，並且發表了中國專制政治史上第一篇革命宣言——興中會宣言。

我們從乙酉年 孫先生決志革命算起，到現在創立興中會，恰恰十個年頭。在這十年內，正是滿清政府辱國喪權，倒行逆施，造成了內憂外患，最嚴重的存亡關頭。在這時期以前滿清內外大勢，是由鴉片戰爭到五口通商，接着便是十四年的鴉片戰爭，紀元前五十六年至五十二年（一八五六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之役，中國民族開始在不平等條約的桎梏中，沉淪於慘苦悲痛的生活。而滿清政府的黑暗，和社會經濟的衰邁，亦隨之表現。到了這時期，便每况愈下，如日本的侵台灣，取琉球，到法越戰爭以後，更割安南以求和，滿清政府的懦弱無能，和列強勢力的侵凌威逼，更充分地在全國人面前呈現無遺。於是籌備畫報，版圖日蹙，如我藩屬

緬甸的被滅，黑省愛暹漠河等地的被削，澳門被迫承認葡萄牙管理，西藏哲孟雅的被割，帕米爾高原的被侵，我朝貢國暹羅湄公河地域的被佔，種種悲慘的事實，紛至沓來。在內政方面，紀元前二十五年（一八八七年）河南鄭州黃河決口，二十三年（一八八九年）江蘇、浙江、湖北等省大水，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直隸永定河決口，二十一年（一八九一年）蕪湖、丹陽、武穴等處焚燬耶穌、天主教堂，大鬧教案，二十年（一八九二年）山東各河大水。天災人禍，連年交集。滿清政府反藉此開河工賑災各種捐例，搜括民財，貶價招捐寶官，於是仕途冗雜，各省吏治，愈不堪問。滿清政府的西太后那拉氏却大興土木，修建頤和園，自紀元前二十四年（一八八八年）動工至二十年（一八九二年）告竣，費時五載，耗財至千數百萬兩。同時在社會經濟方面，也起了巨大變動。因為列強藉不平等條約的關係，直接或間接向滿清政府統治下的中國作政治性或經濟性的投資。譬如當時已有外國直接投資的和中國借款舉辦的鐵路，列強已將中國沿海和內河發展了他們自己的航運。因此洋貨充斥市場，原料大量輸出，由於外債入超急劇的增加，現銀外流，逼得中國向殖民地的道路發展。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前三十七年）以後，國際貿易每年都是入超，計一八八〇年入超約一百五十萬兩，至一八九四年增至三千一百五十餘萬兩。十五年間入超的數目增加約達三十倍。而國際貿易總額也由一萬五千七百餘兩，增至三萬八千四百萬兩。中國的落後手工業在外國的精武機器工業競爭之下，紛紛破產了，農林也因爲購買的機器成品而賣出的都是原料，支付了一大筆利潤，弄得入不敷出而日漸貧困。列強又在滿清政府手裏取得了在內地開採礦山，設立工廠銀行，經營各種企業的特權，他們可以利用中國價格低廉的原料和勞動力，以新式的生產工具，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製造商品，在中國市場銷售，以獲得厚利，這種對國家民族經濟上的損失，更是無法計算了。所以孫先生在獄中會宣言上劈頭就大聲疾呼的說：「中國積弱，非一日矣！」這寥寥八個字，包含了無數辛酸憤懣的熱淚。

造成這積弱的原因，滿清政府當然要負一大半責任，而人民智識程度的低落，沒有糾正這腐敗的政府，也不能辭其咎。因此孫先生接着看很嚴正的指出：「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這



種種惡因所造成的惡果，便是：『近之國喪師，萌藩厯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隣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

『夫以四百兆蒼生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固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庸奴誤國，荼毒蒼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極。』這是何等的慨歎！如此大好河山，竟被一大批滿清政府的庸奴，糟塌到了極點。當時最著名的庸奴，第一就是葉名琛。一八五七年，廣州民衆因爲承五口通商之後，憤怒外人驕慢無禮，惹起了許多糾紛，英法聯軍欲以兵戎相見，通知葉名琛限四十八小時讓出廣州。這時本可據理力爭，和平解決，但他竟置之不理，相信『過十五日必可無事。』結果聯軍破城而入，葉名琛也被俘而去。廣州其他守將聯銜馳奏，才奉到咸豐所下革職上諭，內稱：『葉名琛以欽差大臣辦理夷務。如該夷等非禮要求，不能允准，自當設法開導，一面會同將軍、巡撫等妥籌撫馭之方。乃該夷兩次投遞將軍、巡撫、副都統等照會，並不會商辦理，卽照會中情節，亦秘不宣示，遷延日久，以致夷人忿激，突入省城。實屬剛愎自用，辦理乖謬，大負委任，葉名琛着卽革職。』但是上諭已經太晚，葉名琛已被解往海軍各營，片鎮海軍中，終以死聞。第二件事情，是一八七八年滿清政府派侍郎崇厚爲全權大臣，與俄國交涉還伊犁之事。這個糊塗的大臣，竟擅將伊犁南部阿克蘇河流域的廣大平原，奉送了俄國。當時翰林院侍讀學士黃鵬芳一奏，可以看出崇厚誤國的種種：『竊惟朝廷遣使外國，意在安邊。失詞不可，專擅尤不可。史冊所紀，及歷屆奉使諸臣，未有荒謬誤國之種種：『竊惟朝廷遣使奉使俄羅斯，身以全權，降以優秩，宜如何籌劃萬全，以副委任。俄人願歸伊犁，酌予犒師之資，尙屬可行，奈何不顧全局，不慮後患，通商劃界，任意定約，因索地而索地，欲弭釁而招釁？行之則商稅日虧，要害盡失，不行則俄人有辭，可煩唇舌。其心但知畏敵，而不畏皇太后皇上。於重大事件，不請諭旨，擅自許人，不候召命，擅自歸國。』這種荒謬昏庸的事實，實足以鈔輒於異族，不齒於列強。中法戰爭是孫先生以及國人很大刺激的一次戰役，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這次戰役中，李鴻章實際上也是一個誤國的重要人物，因爲他始終堅持和議，雖有諒山之捷，但巴黎和約已定，事已無可挽回，於是簽約，停戰，撤兵，屈降。當時張

之洞謂：『中法用兵年餘，未有如今日之得勢者，我撤彼進，徒中狡謀，悔不可追！』彭玉麟奏稱：『法狡無信，和可許，兵不可撤。』左宗棠也主張：『宜慎要盟。』但滿清政府沒有接受他們的建議，仍諭以『獲勝得不償失，蹙蹙更傷國體。』嚴令撤兵。這完全是李鴻章誤國所致，也是滿清政府的昏庸懦弱的表現。局勢到了這地步，『有志之士，能毋撫膺！』革命的勢力，不得不抬頭起來，革命的呼聲，在孫先生領導之下，開始堂堂正正地怒吼起來了。

『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於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饒，蠶食鯨吞，已效尤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這一段是接着庸奴誤國以後，很明顯地指出列強侵略的可怕。內政和外交，是有不可分的關係。有這樣腐敗的滿清政府，當然招致了這許多繼續不斷的患，而這些蠶食鯨吞，瓜分豆剖的患，更加速的促成了中國覆亡的危機；這真是中國存亡危急的緊要關頭。當時國際上對中國的觀念，非常惡劣，他們認為將步非洲後塵，由列強分據統治。外國出版界，討論中國問題的書籍，大半用這樣可怕的警名：『中國之割裂』（The Break-up of China）『中國之瓜分』（The Partition of China）『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這是孫先生開辦對四百兆國人沉痛迫切的警告，要大家共負起這救民救國的革命重任。

『用特集會衆以興中，協賢豪而共濟；捋此時艱，奠我中夏。仰諸同志，盡自勉旃。』這是說明創立興中會的主要意義，也是宣言的最後一段，用畫龍點睛的方法，說出了孫先生的抱負，他對中國革命的無限熱望，就寄託在這最後一段的寥寥數語之中。

這一篇極簡單的宣言，粗白地指出當時滿清政府及其官吏的腐敗無能，和中國國內外形勢的險惡，種下了民族革命的種子；經過仁人志士們的熱血，灌溉扶持，就很快的發榮滋長起來。這是中國革命火燄的初現，中國的革命史從此就和孫先生的生活史打成一片而開展了。

那時候，加入興中會的祇有二十餘人，收到會費和股份銀（大約就是會規所定的義捐），共有一千三百八

十八元。孫先生本想再從檀香山到美洲去，向華僑推廣宣傳與中會的組織。但是這個時候，滿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節節失敗，充分的暴露它的弱點，全國的人心，開始和滿清政府發現離心的傾向，上海同志宋曜如以為機不可失，就飛函孫先生，要他立刻回國。

這位宋先生也是廣東人，外國人稱他爲宋查理（Charles Jones (Charles) Young）。一八七九年當他還在兒童時就移居美國，畢業於萬德羅爾特大學（Yale Bible University）。他有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回國後在上海協助組織第一個青年會，又從事於印製出售聖經的工作。他是三個兒子，三個女兒，在此後很長的時期內，他們整個的家庭，都和中國革命發生最密切的關係。

孫先生經過一番精密的考慮，認定廣東可以做革命的發動地，於是就和鄧蔭南經日本回到香港，這時大約已是十二月底了。（見檀山華僑）

孫先生經過日本橫濱時，有一個廣東人陳青，到船上來兜賣東西，孫先生因爲他是中國人。而且是同鄉，就向他說起革命來了。陳青聽了孫先生的話，回去就對他的同鄉說：

『今日船上有一個人，很奇怪，他說要在中國造反呢。』

這同鄉好奇心起，就到船上去見孫先生。孫先生見他，就問他姓名，知道是姓譚名發，在橫濱開洋行，兩人就談了一會。譚發聽了孫先生的言論，就非常佩服，他很願意在孫先生領導之下効勞，因此他對孫先生說：

『我雖是一個習識淺薄的商人，我却很想替先生盡點忠心。以後如果有什麼事情，我一定出力幫忙的。』他說了，就向孫先生鞠躬而去。孫先生也很奇異這個人，他因此知道以誠懇的態度去感化人，不是一件難事，革命思想的普遍發展，是有希望的，他對於譚發的自動訪問，留了一個深刻的印象。

從日本到上海，孫先生足不停留的就到了香港，上了岸，就去找陳少白，這時少白大約還在雅麗氏醫校讀書，因爲放假回到廣州去了。孫先生就在當晚坐了夜輪，趕到廣州去找他。經過了許多轉灣，在一個期

友的家裏，終和找到了他，這時孫先生革命的情緒熱烈極了，他不能安閑地在廣州玩，就和少白當晚仍回香港去，他們於是商量聯絡全省革命同志，擴充與中會組織的計劃。不久，鄧士良從澳門來，也就幫助孫先生聯絡同志。少白就到上海去找鄭觀應、陳建威以及其他同志，準備一齊回到廣東來起事。

這時候，香港有一個團體，叫做輔仁文社，由馮禱雲、謝讚泰主持社務，雖以開通民智爲宗旨，但對於清政府也處於反對地位的，因此孫先生要他們加入與中會，以便集中革命力量。馮謝二人一部分社員都很贊成，並且願意取消舊社名義，免致紛歧。於是紀元前十七年（一八九五年）正月二十七日香港與中會正式成立。總機關設在士丹頓街十三號，爲免人注目，以奉行天命的意義，就題了「乾亨行」的名號，裝作做買賣的樣子。

孫先生在這一次到香港擴大與中會組織時，對於革命的經驗和計劃，顯然有進步了。他規定入會的必須一經宣誓，這是對於入會手續鄭重的辦法，而且這宣誓的手續，是成了孫先生此後對於同志和國民要表示信心時很重要的主張。那時又發表了一篇宣言和章程。

這次宣言，和檀香山發表的，詞體上大致相同，僅有一詞一句之更易。比較更明顯一點的，就是檀香山宣言「乃以庸奴誤國……如斯之極。」一段，改爲「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需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僚則剝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亂運劫掠，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是更澈底的鼓動人心的暴露。同時更具體的指出滿清政府的腐敗，稱爲這亂世有了三種事實：第一綱維敗壞，第二盜賊橫行，第三民不聊生。而這三種事實，有互爲因果的作用，循環反覆的演進，表現了整個滿清政府的黑暗腐敗。

關於綱維敗壞，貪污卑劣的事實，在孫先生所著倫敦叢報雜記中，很沉痛的說道：「至中國現行政治，可以數語賅括之曰：無論爲朝廷之事，爲國民之事，甚至爲地方之事，百姓均無發言或與聞之權。其身爲官吏者，操有審判之權，人民身受冤枉；無所籲訴。且官場一語，等於法律，上下相蒙相結，有利則各飽其私囊，有害則各委其責任，貪婪勒索之風，已成習慣。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間有一二被政府懲治或斥革者，皆不善自

謀者。然經一番懲治或斥革之後，而其弊害乃尤甚。」又說：「夫滿政府既藉科斂苞苴賣官鬻爵以自存；則正如養士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穢愈甚，彼人民怨望之潮，又何怪其潛滋而暗長耶？」這正是有志之士能不痛心，而欲大聲疾呼，負起救民救國責任的說明。

由網維敗壞引起盜賊橫行，所謂官逼民反，其結果便是：「哀鴻遍野，民不聊生。」這種社會秩序的崩圯，人民生活的痛苦，是當時任何人可以感覺到的。所以孫先生在上李鴻章書中，也毫不隱諱的說出：「方今伏莽叢開，災荒頻見，嗷嗷之衆，何以安生？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饑饉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殺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

這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所表現的事實，夠令人驚心動目。與中會兩篇前後宣言所包括的意義，不但喊出了當時國人隱伏在心坎中所欲說的話，並且也明確的指出了革命的對象。雖是在全篇的文字上，沒有提起革命的口號，但這強烈的革命氣息，已經很充分的表現着。

在這次新訂的章程中，更可看出孫先生對於革命運動有更進一步的規劃了，就是第一，規定與中會有總會，和分會，並且要分會廣大（章程第一條及第六條）第二，規定會務的範圍，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增國脈等事。」（章程第三條），這好像是空洞的，但在那時的風氣中本來不能明言革命的宗旨，所以這些事業，都可說是與革命宣傳接近的事業。設立分會的辦法，在檀香山時是沒有說起的，但孫先生一到了香港，就主張有分會，這就可見革命勢力的發展趨勢，也就表示孫先生奮鬥的進展；所以不到幾個月，第一次的實際的革命運動，就在廣州發動了。

## 第十四章 第一次廣州起義

香港與中會成立了，便已有了革命的大本營，孫先生就計劃怎樣的去襲取廣州，做革命的根據地。這時，孫先生又掛起了醫生牌子，廣州的滿清官吏，都很仰慕孫先生的醫術，大家爭相延請，於是孫先生出入軍政界，高談時政，放言無忌，往來香港廣州，策劃會務，非常忙碌。但沒有人留心他是一個革命黨領袖。那時，風氣是非常閉塞的，人心是非常渙散的。孫先生偉大的革命計劃，怎樣才能着手呢？這不是一個謎？有人說：孫先生說由乙酉（紀元前二十七年）到乙未（紀元前十七年），這十年中間，是革命醞釀時期，孫先生在這革命醞釀時期，是很孤苦的，很沉着的。這話很難說明。孫先生當時的環境。這時孫先生爲要施展他的革命的抱負，祇有憑藉了醫生的名義，苦心孤詣的聯絡秘密會黨，和智識階級中的有爲人才，準備革命力量的充實和擴展，期待革命機會的到臨。然而事實的推演，是非常曲折的，當時孫先生曾經一度在雙門底聖教書樓行醫，號稱新學領袖的康有爲也從長興里進到廣府學宮講學，適廣府學宮，卽世稱萬木草書，和聖教書樓相隔祇有半里。那時聖教書樓除經濟基督教外，又發售李提摩太、林樂知、花之安等所譯的泰西歷史要，五大洲風俗通考等書，以及當時初出刊的萬國公報等，這些都是當時介紹西洋文化的書籍，有爲不諳外國文字，無法直接瞭解西洋文化，所以對於這些譯本，是非常愛好的，因此他就成了聖教書樓的大主顧。漸漸地，孫先生也認識了他，因爲他是號稱新學的人，所以孫先生很想接近他，使他成爲一個革命的同志，但有爲始終堅持着他的頑固成見，並不因孫先生的一腔熱誠而有所感動，因此他們中間到底沒有建立起一些友誼，後來有爲竟成立了保皇黨，始終和孫先生的革命大業，處於敵對的地位。那時孫先生的處境，真是何等孤苦。但不久孫先生就發現了一個真正的同志，他就是廣東水師統帶程奎光，因爲胃病，延請孫先生醫治，孫先生一面替他醫病，一面就考察他的品性，知道他是有血性的，所以於醫病之外，還和他交

換各種談話，孫先生乘機向他說道：

「你這個病，最好每天清晨，在清靜的地方散步。」

「我也很想，但苦於寂寞。」奎光這樣答着。

「我是起得很早的，可以來陪你。」孫先生向奎光自告奮身。於是從此每天清晨，孫先生總是和程奎光在江邊散步，兩個人的談話，便愈來愈深了。有一天，由江邊走到一間古廟，意思是歇腳，誰知入了廟門之後，重重的門都關閉起來。

「這是什麼原故？」奎光有些奇異，問孫先生。

「你已到了革命黨的機關都裏來了。」孫先生微笑的說。奎光不免嚇了一跳，孫先生於是把革命大義以及種種革命計劃，都告訴給他，奎光聽了很為感動，他就欣然的答應聽命孫先生指揮。孫先生為要準備第一次起義，是如何的苦心孤詣，我們從這兩件事看，就可知道孫先生是怎樣的孤苦而又沉着呢？

革命的局勢，終於漸漸地成熟起來了，孫先生在廣東內地派人運動聯絡的會黨和警勇，都有相當成功了，其中如鄭金部下的安勇，廣東北江的綠林，城外三元里有名的鄉團，香山和順德的綠林，都已經有聯絡了，祇要待機而動。孫先生為指揮聯絡便利起見，不能不在廣州成立一個機關，經過一番考慮以後，為避免清吏注目，還是以講求振興農業為口號，與士良奎光等，正式發起組織農學會，會所就在雙門底聖教書樓，實際上這農學會就是孫先生的祕密的軍事機關，也就是與中會在廣州的總機關。

我們現在從孫先生手著擬創立農學會書的一文中，固然可以看出為適應當時環境的許多冠冕堂皇的話。但他對滿清政府的厭恨，還是復明顯的流露出來，他說：

「我中國衰敗至今，亦已甚矣，用兵未及經年，全軍幾至覆沒，喪師賠款，蒙恥啓羞，割地求和，損威失體，外洋傳播，編成談笑之資，雖欲諱之而無可諱也。」

這不就是與中會宣言中「近之辱國喪師，剪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衣冠，被輕於異族。」

的同一意義而另一說法嗎？所以這一篇徵求會員的信，實際上和與中會宣言，有同樣的革命意味。這篇文章，寫得非常懇切而有條理，他首先說明挽救國家的危亡，是每個士農工商的責任，所以說：『追求積弱之故，不覺遺遺咎於廊廟之上，即舉國之士農工商，亦當自任其過焉。』但士農工商四者原有運貨的作用，西洋各國的所以富強，就是以士類而實四民，民間講求學問的集會，無地不有，因此農有農士，工有工士，商有商士。『記者從羨其國多善政，吾則謂其國多士人。』這是孫先生指出西各國所以富強的根本因素。因此他接着便說：『故欲我國轉弱為強，反弱為盛，必俟學校振興，家弦戶誦，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而後，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一面又批評當時滿清政府中一些自命開通，侈談新政的官僚，專以練兵製械為得計，說他們徒襲外人的皮毛，而沒有顧到立國的命脈。於是堂堂正正的揭舉創立農學會的宗旨和任務，孫先生說：

『今特創立農學會於省城，以收集思廣益之實效，首以繙譯為本，搜羅各國農桑新書，譯成漢文，俾開風氣之先，即於會中設立學堂，以教授優秀，造就其為農學之師。且以化學詳覈各處土產物質，闡明相生相剋之理，著成專書，以教農民照法耕植。再開設博覽會，出重賞以闢農長，又勸糾集資本，以開墾荒地，此皆本會之要務也。……』

最後孫先生又提出了一個口號：『干戈衛國，未掃與邦，』他說：『古有童子，能執干戈以衛社稷。會見許於聖門，葦籬師此誠，將躬操耒耜以農商新法啓吾民矣。』這是孫先生喚起全國人民參加革命運動的一種巧妙說法。

這一篇文章從另一方面看，又與上李鴻章書很多照合的地方，而所舉譯農書，設農校，教農，獎農，墾荒獎勵，更是具體切實，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當時孫先生對於農政的根本見解。這樣一篇富有生氣婉，委曲折，而且見解精闢，辦法過詳的文章，當然會引起廣州城內一般所謂官紳的欣賞，但他們怎樣會瞭解孫先生倡設這個學會的底蘊呢？他們祇有欣羨振興農業的漂亮口號，於是從總督李瀚章以下的一般官紳，表示贊助的或加



入爲會員的很多。孫先生就借了他們做護身符，對於革命計劃開始祕密的無阻礙的施展了。

李瀚章在廣東的時間，本來已經很久了，他爲人昏庸卑劣，賄賂公行，廣東人民對他都表示痛恨。中日戰起，他曾經大規模的募兵，一批一批的開到前方去。在孫先生創立農學會後不久，滿清政府已向日本議和，簽訂了馬關條約，李瀚章也離開廣東，譚鍾麟繼任總督。那時瀚章任內招募的兵，因爲戰事結束，早已解散了，但當月並沒有設法替他們安插，一任他們流落在省城，爲了生計的逼迫，他們對於滿清政府及其官吏，是痛恨透了，經不起黨人一宣傳，他們都可以立刻歸附到革命黨來的。同時，那般巡防局局丁，非常飛揚跋扈，常常借端滋擾民衆，肆行擄掠，因此激起了大多數人民的憤恨，他們就推舉代表向官署去訴願，但昏瞶的滿清官吏，不但沒有把作惡的局丁懲辦，竟反硬說那些代表是作亂，把他們十幾個人都送進了牢獄，這樣暗無天日的政治，真是替孫先生安排着革命的機局，孫先生偉大的革命抱負，於是在這樣一個機局之下一往邁進的開展了。

這時農學會的會務，不，就是興中會的會務，已經很發達，同時，得着會員黃詠襄的一筆捐款，因此又在東門外鹹蝦欄和河南等處，設立分機關，由陸皓東等分別主持。黃詠襄是賣去了一座在香港的蘇杭大樓來充作捐款的，共有八千餘元，他這樣熱心捐輸革命，在那時是很難得的。孫先生看到種種籌備，已經很有眉目了，就在香港總機關部商議攻取廣州的計劃，決定組織革命軍，分北江、順德、香山、客人（客家人）、潮州數路，同時進攻省垣，又購小輪二艘，運輸軍火。陸皓東因爲革命軍必須有一個特別的標記，黃詠襄是代表滿清皇帝的，不能用了，於是他就創擬用青天白日旗。這旗的形式，是分十二個光芒，從潔白的日光中放出來，是表示十二個時辰，永不停止，光明長照，這意義非常深刻，於是大家都一致贊成。這時孫先生在香港的師友，對於這個革命計劃也很同情，其中如何睿博士，助力最多，他在香港任議政局議員，名重一時，對於孫先生的計劃，常常有很多貢獻。還有德臣報記者黎德（Thomas H. Raide）和士蔑報記者鄧勤（Chesney Guncan），也很替孫先生出力的，他們常在報上攻擊滿清政府的政治，鼓吹中國革命，以助興中會的勢力

。這是 孫先生在革命進行中，得到外人幫助的第一件事情。

到七月間，各方面的籌備，都已有相當頭緒了，但香港的乾亨行機關，已經被人注意了，於是就宣布取消，借西營盤杏花樓做臨時會議場所。七月九日開會，決定九月初九日發動，先在香港集合會黨三千人，於初八晚上坐夜船到廣州，把短槍放在木桶裏，充作士敏土購報海關；九日早上到了廣州，就可一齊把刀斧劈開木桶，拿出槍械，進撲各軍政機關，同時埋伏水上及潛伏廣州附近各處的會黨，分路響應。此外，又預定組織炸彈隊，在各要隘處施放炸彈，以助聲威。並以紅帶為號，以除暴安良四字做秘密口號，一切計劃，都很機密周詳。同時推定朱洪起草討論檄文，黎德和高文（T. Cowan）起草對外宣言。黎德並願担任運動英國政府承認中國革命政府，不加干涉。

孫先生為什麼定九月初九發難呢？這是很有意思的。因為這一天是舊歷重九節，廣東風俗到這一天都要掃墓，廣州白雲山一帶，墳墓黨黨，掃墓的人是格外的多。那時廣州往來的人當然是很複雜的，所以在這一天，香港的會黨三千人，如果混到那邊去，就不會引起人家注意了，這是最精密的計劃。

各方面事情差不多都準備好了，這時已往九月初，孫先生就到香港來再召集一次幹部會議，作最後的準備。到會的人大家主張在臨舉的時候，必須有一個發號施令的人，才能集中權力，因為那時楊衢雲挾了一批輔仁文社的舊社員，自成一派，對於進行上，不免發生影響。孫先生也很同意，於是決定發號施令的人稱為伯理理天德（President），就是起事後合眾政府的大總統。票選的結果，一致舉 孫先生為總統。於是大家都向 孫先生稱賀，預祝革命成功。孫先生就把所有在香港的財政軍械等等都交楊衢雲負責處理，他預備回廣州去發動，不再到香港來了。三千個會黨也決定由楊衢雲於八日晚上率領到廣州。這些決議才通過了一天，第二天，楊衢雲忽然對 孫先生說：

「前天商議的辦法，都是很好的，但我在香港，主持一切，不可以沒有一個名義，所以我懇請你把總統職給我當，以後到省城，事情辦好了，再還給你，你看怎樣？」

這也太奇特了，一個起事還沒有成功的總統，爲什麼要爭奪呢？孫先生聽了痛心極了，他想實際運動還沒有開展，就有人爭奪名義，這是一個嚴重的打擊，因此他就很坦白的回答：

『這有什麼不可以呢？但這個總統名義不是我要來的，是大家公舉的，所以你要當，還是去請大家來商量好了。』

孫先生說了，就去找少白、士良，商議辦法。士良聽了，孫先生說楊衢雲要當總統，他就說：

『這是不能答應的，我一個人去對付他，去殺他，非殺他不可！』

『這是不對的，殺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們還能起事麼？照我的意見：我們到省城辦事，辦成功那就沒有問題了。辦不成功，隨便什麼人做總統，是沒有關係的。』少白是主張穩和的，要孫先生就讓總統讓給楊衢雲。

孫先生爲了革命大局，本來不想堅持這個名義的，於是同意了少白的意見，就在當天晚上開會，出席的還有一個英國人和一個美國人，都是化學師，是孫先生從檀香山約來的。在會議席上，孫先生就自己提出來，把總統名義，讓給楊衢雲。少白和士良是早已說妥了，當然無異議，楊衢雲這邊的人，更絕對贊成，於是會議結果，就把總統名義無理由的讓給楊衢雲了。孫先生因爲這事情解決了，第二天他就到廣州去，士良、少白等幾個人，過了兩天也去了，只留楊衢雲一人在香港。

孫先生在廣州，是住在河南鼓興里瑞華坊，每天照常坐了肩輿，出去行醫，實際上是奔走革命。他爲減少病人就診，以專心革命起見，就把診金增加到十元，這也是爲避免外間注目的一個辦法。那時，朱淇的哥哥朱甦生，是在清平局辦事，他知道他的兄弟和革命黨往來，恐懼極了，就冒了朱淇的名義，託清平局勇目將黨人與動向緝捕委員李家，自首。李家得到這個報告，就一面派兵士監視孫先生行動，一面到督署報告粵督譚鎮麟，鎮麟問：『黨首是那一個？』李家焯就說是：『孫文。』鎮麟聽了，有些奇怪，他就笑道：

『孫文是一個醫生，他創辦農學會，李少帥（即李翰章）也贊助的。他好說狂語是有的，造反是不會的

李家鼎撞了一鼻子灰就走了。他派去監視孫先生的偵探，已到了河南瑞華坊，但不知道就是孫先生的寓所，很巧的遇到了孫先生的奧夫，他就問這奧夫，奧夫因為平時常見孫先生很俠義，他非常感動，知道這人來意不善，他就對這偵探說：

『這裏沒有孫醫生，只有一位姓尹的醫生。』

偵探聽了信以為真，也就走了，孫先生的寓所，竟得以無恙。但從此風聲一天緊一天，廣州城裏，大家都聽得革命黨就要起事了。

這事是很迫切了，但是楊衢雲在香港，拿到了總統的名義，就作威作福。他要會黨三千人中間，抽出一部份做偵探隊，又揀選了比較精良的槍械，交給他的衛隊使用，準備省城佔領時，他才率領了進城。因此許多會黨都反對他，不願到省城來。孫先生在廣州，對於這些情形，還沒有知道，他祇是等着人馬槍械一到，就可發動。可是初九早上，這是預定發動的一天，忽然接到了楊衢雲的電報說：『貨不能來』，才知道事情是不對了，孫先生非常焦急，就到農學會機關部和少白等商量，大家知道事無可為，都主張延期，由孫先生打電報給楊衢雲：『貨不要來，以待後命。』這時，綠林首領，軍隊首領，民團首領等都來了，大家討口號，等命令，因為事情中止了，孫先生只得向他們說了許多話，把籌來的錢，發給了他們，要他們回去，再聽命令。一兩派少白等即離開廣州，因為他知道危險的事情就要來了，再遲一刻，這許多黨人都集在這一機關裏，是極易被滿官吏的注目的。少白等走了，孫先生才很安心的料理善後事宜。

第二天，就是九月十日了，楊衢雲却在香港，派丘四、朱貴全率領散處新安（今改寶安）縣屬深圳、鹽田、沙頭角等地集中九龍的會黨二百餘人，搭保安輪船到廣州來了。清吏從多方面的偵探，已經知道革命黨的行動，同時在清關又搜獲香港運來的短槍六百多桿，是革命黨私運的。譚鐘麟得了這訊，大吃一驚，才相信孫先生真的造反了，就急調駐長洲的營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禦，又令李家鼎率兵至王家祠藏蠟燭等處搜查，陸皓東

、程懷、程奎光、程次、梁榮等五人，都被他們帶去，又搜獲軍衣、軍器、鐵釜等物；緊張的風聲就加倍的展開了。各路的會黨，已被譚鐘麟派兵守衛，也都不能趕來，革命的計劃，到這時候已全盤失敗了。

皓東當時和許多黨人，奉 孫先生命令，暫時離散，本來是要到香港去的，但到了船上，忽然想起還有一面青天白日的革命軍旗留在機關部裏沒有取出，他決然的不肯將這面旗落在敵人手裏，趁着船未離岸，就跳上碼頭回到機關部裏，將那面旗取下來，摺疊好了，交給一個同志說道：『我上岸的時候，看見有幾個偵探模樣的人注意着，大約是走不脫了，你將這旗收藏起來，交給首領罷！』果然，他出機關部的門外，不多幾步，便遭拿捕，他這種愛護革命軍旗的偉大精神，就永遠照耀在歷史上了。

第三日，保安輪開到廣州、南海縣令李徵庸已派兵守候。船上本運來槍械七箱，預備起專用的，但上面已壓了很多笨重的貨物，二百多健兒一時無所措手，只得無抵抗的就捕，被捕的有丘四、朱貴全等四十餘人，其餘就一團面散，籌備很久的起義，就此失敗了。陸皓東、丘四、朱貴全，就做了第一次爲中華民國奮鬥第一次犧牲的同志了！奎光也從此死獄中；可勝浩歎！

孫先生在這緊張的空氣中，雖是遭逢着第一次的失敗，但始終是抱着鎮靜的態度，他知道一個人在廣州是無法挽回了，因此從家裏檢點了幾件應用物件，很安閑的走出，略一顧盼，就昂然的去了。他們家人還以爲是尋常出門，不知道外面的風聲已經很緊張，只是 孫先生以大無畏的精神鼓勵着，因此在外表上沒有一些倉皇的形色表現罷了。孫先生從家裏走出來，並不馬上就離開這危險的廣州。這一天晚上，王煜初因曾出於女兒，在大基頭宴客，孫先生還是很從容的赴宴。煜初是香港道濟會的教師，孫先生在雅禮氏醫院時認識的。酒過半巡，才走近他，向他耳語，把失敗的消息，告訴他。說了，就站起來向許多客人敬酒，說道：

『對不起，我因爲有要事先走了，請大家共盡一杯，後會有期！』

於是就舉起酒杯，一飲而盡，許多客人也大家把酒杯舉起飲着，滿室散佈了愉快的空氣，孫先生就會着笑容向大家鞠躬而去。隔了十幾分鐘，譚鐘麟派來的人已經趕到，却不知道 孫先生早已走了。許多客人才驚

奇 孫先生似有神術。這樣的鎮靜，而又這樣的敏捷。

## 第十五章 亡命

有人說 孫先生從不知道怕是什麼，他的勇敢之氣充塞於精神和身體上，而用智慧以駕馭，很像放炮轟擊的時候，高下隨心而定。這是很確切的認識，在這第一次失敗的事實中，這種勇敢而又敏捷的精神，已經充分的表現了。 孫先生的偉大，不是一二天和一二件事所表現的，他是整個的偉大，永遠的偉大。

我們看這次廣州起義失敗了，慘殺的，被捕的很多，廣州已滿城風雨了，但 孫先生不慌不忙的從王家宴會中出來，就坐了一隻小輪船駛到香山唐家灣，這輪船是 孫先生預定的，他並且已學會了開船的方法，因為他早就計劃過，如果從廣州就到香港，一定被清吏跟蹤而至，所以他必須要這樣的打一個灣，這是多麼有機變的謀慮？清吏是無可如何他的。他到了唐家灣，就坐肩輿到澳門，再從澳門搭輪船到香港，這樣經過了幾個轉灣，到香港時已隔了二天了。廣州懸賞捉拿革命黨首領的花紅單，已經貼出了。香港的同志，大家很着急，以為 孫先生遲遲不到，恐怕有不測了，直到 孫先生安然抵港，大家才知道 孫先生是妙算如神。

孫先生到了香港，香港政府已經接受廣東總督的要求，有放逐楊衢雲、陳少白和 孫先生五年的命令。

孫先生再沒有立足香港的餘地了，就去請教康德黎，要他想办法，康德黎因為這是法律問題，就介紹去問達尼思 (Daniels) 律師，達尼思說：這是沒有辦法的，還是離開香港最好。這是 孫先生第一次的失敗，也是第一次的亡命，他到那裏去呢？他就和少白、士良商量，決定到海外去。但是當大一隻到安南去的船，是貨船，不能乘坐的，最後就坐了廣島丸，第二天早晨開往日本去的。船上祇有四個艙位， 孫先生就約少白、士良同去。那時楊衢雲最擔憂了，早在一兩天以前，把辮子剪去。做好幾套西裝，衣箱也打好了，囑咐車夫一步不能離開，一聽到省城失敗的消息，就坐着他的手車，預先叫人把船票買好；頭也不回，一氣坐船到印度的加爾各達

去了。到了印度，還恐怕離中國不遠，便又從印度到南非洲各地去。

廣島九出了香港口，就遇到大風，一路上顛播震盪，經過十四天，才到日本的神戶。到了神戶，看見日本報上有：『中國革命黨孫逸仙』等字樣，大家興奮極了，因為這第一次的失敗，已經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中國革命黨在國際已經響亮的在喊起來了，這不是對他們一個最好的精神上的安慰麼？

他們在神戶住了一天，就到橫濱。那時他們在日本差不多沒有一個熟人，孫先生却記起了去年經過這裏時來訪問他的譚發了，就到他的洋服店裏去找他。譚發一見孫先生快樂極了，立刻替他們在山下町五十二番找了一個住所。這住所是一間很狹小的樓面，只能容六張蓆子，孫先生倒很滿意，就和少白、士良三個人一起住下。這裏是離開了滿清政府的勢力，他們再不能追上來了，大家就很自由自在的在外面逛逛，孫先生却坐在家裏看書的時候多，這是他第一次的亡命生活。

在這安閑的亡命生活中，孫先生不是從此做了逃遁客，不再奮鬥呢？不是的，孫先生借了這機會，就努力推廣與中會的工作。大約又隔了二三天的光景，譚發就介紹幾個人來見孫先生，其中有一位馮鏡如，是在橫濱開外國文具店的，又有一位馮紫珊，是鏡如之弟，也是開文具店的。孫先生就對他們演說革命的道理，要他們組織與中會橫濱分會，當場就派定馮鏡如爲會長，趙明樂爲司庫，趙耀宗爲書記，馮紫珊等爲幹事。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設立秘密會所，這地方接應滿清政府的駐日領事館，黃龍的旗在領事館前面迎風招展，似乎在對孫先生挑戰，這是一個很大的威脅，使孫先生格外的引起刺激而增加了排滿的憤懣。但那時中日戰爭已經結束，馬關條約的惡果，中國雖是喪失了很大權利，人民儘是盡力的反抗。但滿清政府漫不在意的繼續和日本親善，而世新公使立刻要到日本來就任，因此日本政府允許滿清政府引渡革命黨的謠傳，就跟着這中日邦交恢復中起來了。孫先生知道從此不易活動，就一面要鄭士良回國，收拾餘衆，準備捲土重來，一面自己計劃再到檀香山去，然後週遊世界。那時孫先生好似在漫漫的長夜中，滿地都是黑暗，他想飄零在海外，不知道那一天才能回國？遙望着四萬萬人沉睡的祖國，祇有黯然傷心，也就決心剪去頭髮，換了西裝，永遠

的在海外奔走，去喚起華僑民族的思想；做改造祖國的發動力。

孫先生到檀香山，原定計劃是要少白同去的，但那時檀香山島剛被美國合併，禁止華人進口，孫先生說明他是檀香山出生，美國領事才給他護照，因此少白只得留在日本，孫先生就一個人到檀香山去了。孫先生離開日本時，介紹一個日本朋友菅原傳給少白，是從前他在檀香山時相識的。後來少白由菅原傳的介紹認識會根俊虎，由俊虎而認識宮崎彌藏，即宮崎寬藏的哥哥，革命黨和日本人士的交遊，就在這個時候開始。

這是孫先生第四次到檀香山了，他帶着了革命的失敗消息，舊日的親友都要爭看這一個爲革命而奔走的領袖。中西擴論會特請名人演說，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孫先生登岸。德彰公一見了孫先生，愉快萬分，就對他說：

『你辛苦了，但是這不算一回事，應該還要繼續幹下去。』

孫先生得了哥哥的安慰和勉勵，非常感動，就準備再把與中會擴充，以增加革命的勢力。於是在隆記報館設立機關，召集同志，討論促進與中會會務的辦法。但當時一部份同志因爲知道第一次起義失敗了，不免有些灰心，一部份同志都聽得在廣州已舉起了義旗，就踴躍的到那邊去準備參加起義了，所以到會的非常寥落，孫先生就決心加以改組，請預會的同志，斟酌香港與中會的辦法，要舉行宣誓式，由孫先生自己領導，把聖經展開拿在左手，右手向上高舉，懇切的向上帝祈禱，求上帝鑒察，然後照宣誓詞宣誓；其他同志也依式循次舉行。這個形式，也許孫先生爲檀香山同志特立的，因爲這裏的同志，大部份是基督教信徒，所以必須先要向上帝祈禱，是一個變通的辦法。

經了孫先生這樣的提倡，檀香山華僑對於與中會的興趣，才漸漸地增高起來，隔了幾天開第二次會的時候，到會的就有百多人，第三次開會更多了。並且有許多熱血的同志，都想立刻回到祖國去爲革命而奮鬥，孫先生就着他們組織軍事訓練班，借佛蘭耶文的真理書室，做操練地點，請了一位丹麥人曾經當過中國南洋練兵教習隊長叫做柏的，担任教練，每星期操練二次，用木槍代替真槍。參加操練的有葉桂芳、鄧照、鄧金、



杜守傳、許直臣、程展臣、陸燦等，大家都很認真的操練，準備做革命的戰士。但當時因為風氣所限，孫先生一切的計劃，常常遇到挫折，覺得久留了也沒有顯著的進展，就想到美洲去，因為那邊的華僑比檀香山多，如果聯絡得手，力量是很大的。

在孫先生到美國去行期剛決定的時候，一段巧遇的故事却展開了。事情是這樣的：那位康德黎老師，自去年孫先生廣州失敗從香港出亡時，急促間，沒有機會知道孫先生是到那兒去的，彼此消息，隔絕了很久。最近因為回國，也到檀香山來了，這是他的老例，每次回國經過這裏時，他總是登岸遊覽一下的。這一天，他和他的夫人，還有一個日本人的女僕，坐了馬車在街上遊覽，突然跳上了一個短髮西裝，神采奕奕，很像日本人的樣子而又魁偉的丈夫，他們驚惶的疑心遭遇了暴客，康德黎就叫日本女僕用日語來問他，他搖搖頭却說着很流利的英語道：

『我是孫逸仙！』

『原來你就是孫逸仙，你為什麼這樣打躬，我簡直不認識了。』康德黎略定了神，表示很愉快的語氣說。於是大家很親熱的握手。孫先生也就登上馬車，替他們做遊覽的嚮導，一直送他們到船上，孫先生對康德黎說道：

『我想不久要周遊環球，最近先到美洲，再從美洲到英國，到英國來時，一定拜訪你，我們相見的時期大約是不遠的。』

『那一定歡迎，希望你到英國時，一定要到我們家裏來。』

大家就很歡喜的握手而別。隔了幾天，孫先生也就到美洲去了。美洲的華僑，果然是很多，但風氣的蔽遮，比檀香山還甚，所以孫先生從太平洋東岸的三藩市登岸，橫過美洲大陸，到大西洋的紐約市，沿途所到的地方，有的留住了幾天，有的住了十幾天，都盡量的向他們演說：祖國危急得很了！滿清政府太腐敗了！是靠不住的，必須要從民族根本改革做起，才能挽救危亡，這個重大的責任，是大家每個人都有份的。但是他們

聽了似乎不在意的樣子。真正歡迎孫先生革命主義的，每一個地方不過幾個人，多至十幾個人罷了，這真是露澤得連一線微光都沒有了。

但是美洲華僑對於革命不是沒有希望的，他們向來是立有洪門會館，這洪門是明末遺老傳下來的，他們都是明代的忠臣烈士，自明室覆亡以後，努力恢復運動，立志不願在滿清皇帝下面去做官，因此不斷地向滿清政府反抗。到康熙時代，滿清政府的地位已經鞏固了，這些忠烈的志士，也都先後死亡，贖下來二三個孤零遺老，見大勢已去，無法挽回了，才把民族主義的根苗，變為「反清復明」一個簡明的口號，團結一部份人而創立洪門，這是與哥老會、三合會一脈相傳，都以反清復明做目標的。但時代湮遠，他們幾乎數典忘祖，華僑的所以有洪門會館，不過爲了患難相助罷了，政治的意味，已經一些沒有留傳了。孫先生知道他們有洪門會館，對他們「反清復明」的口號是什麼意義？大家都不能答覆，但經了這一問，他們漸漸地有些覺醒；所以後來華僑同志到這裏來一宣傳，他們就恍然大悟，他們原來是民族的老革命黨，於是大家都樂於參加革命，這一次孫先生到美洲，雖沒有顯著的成績。却已散播了不少的革命種子。

孫先生這樣的一路宣傳革命，推廣黨務，却不曉得滿清政府正在四面八方偵探他的行動。從廣州失敗後，葡國總督羅德就報告北京總領各國領事務衙門，說他到新加坡，不久回香港，要焚掠沙面洋行，以報復前次的失敗。總理衙門根據這個報告，就嚴密注意孫先生的行動。當孫先生從日本到檀香山時，滿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就把這個消息報告總理衙門，他們想等孫先生到檀香山時設法逮捕，但因為檀香山係無約之國，兩國交犯專約也沒有訂立，非常着急，就打電報給出使美國大臣楊儒，要他注意。大約六月二十四五左右，孫先生從檀香山到了三藩市，準備往歐洲去，楊儒已經知道了，就向總理衙門請示，總理衙門立刻要他調查孫先生到歐洲那一處？同行的什麼人？並且要他和出使英國大臣龔照璣商量，等孫先生到英國時，按香港、緬甸交犯條約代拿；如果孫先生到新加坡，準備內渡，就電知粵督預防。這樣一來，龔照璣也在英國注意孫先生的行蹤了；他和楊儒往返商討交犯條約的辦法，他們以爲要英國代拿或交出孫先生是不成問題的，

却沒有注意這是政治犯。這時候，總理衙門不知怎樣得到一個消息，說孫先生在三藩市購買軍火，就一兩聲搭庚在橫濱查探，因為美國船到香港，必須先經日本橫濱，一面密令兩廣總督譚鐘麟和廣東巡撫許振祿，先期購線跟緝，會同稅務司密巡。後來揭備從美國打回電報來報告，說孫先生並沒有購買軍火，現在要到英國去了。滿清政府對於孫先生真是恨到切骨了，這樣四面八方的偵探他，正像撒下了一個很嚴密的大網，使孫先生無法逃避，於是孫先生蒙難倫敦的悲壯歷史開始了。

## 第十六章 倫敦使館蒙難

紀元前十六年（一八九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夜間，龍照琿接到從美國揚儒來的電報，關於孫先生到英國的消息，是說孫先生定於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搭 White Star Line Mantic 輪船，到英國利物浦（Liverpool）上岸，這是給他報効滿清政府最好的機會了，於是就叫一個英國人參贊馬格里（Halliday Macartrey）專心辦理這件案子，馬格里就僱了司頓特偵探社（Stuart's Detective Association）派人到利物浦去守候。九月三十日上午十二時，孫先生真的從美國到利物浦來了。孫先生上了岸就往利物浦密德爾車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火車到倫敦，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就到斯屈朗海色爾旅館（Hartell's Hotel, Strand）去休息。這一切行動，都被偵探看得很明白，完全報告了中國使館。

孫先生賂略的安頓了，第二天就到波蘭德（Portland Place 倫敦區名）譯文密街（Devonshire Street）四十六號，去拜訪康德黎，這是賤德島時的約定。康德黎夫婦一見了孫先生，快樂極了，竭誠的招待他，要他就搬到附近的霍爾龐區（Holborn）葛蘭旅店街（Gray's Inn Place）八號，好讓他時常來看他們。孫先生也很悠閒的住下，常常到佛立特街（Fleet Street）驢場（Ludgate Circus）牛津街（Oxford Street）等地遊覽。他看見與旺隆盛的貿易，往來頻繁的車馬，繁榮而鎮靜，並不像中國都市的喧嘩紛擾，而且警察敏

，人民和譟，使他悠然神往的暗暗羨慕。

那時，出使英國大臣龔照璠早已有報告到總理衙門。而馬格里已經和英國政府辦過交涉，要英國引援香港、緬甸交犯條約，代拿孫先生，但英國政府說這條約上能適用那兩處地方，在倫敦是不能照辦的，因此他祇有派偵探跟着孫先生觀察他的行動，龔照璠報告總理衙門，也就是這樣幾點。隔了二天，龔照璠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了一個消息，說孫先生要到法國去了，他就叫法國使館預防着，但是他的屬員說常（當時龔照璠是兼出使法國大臣，法使館的事情，是應當代為負責的）從法國答覆他，說法國對於這種案件是不十分留意的，而英法同例，怕對於孫先生也不能隨便處置。這樣一來，龔照璠對於孫先生是沒有辦法了。但是我們革命領袖的一段悲壯的被囚禁的歷史，終於展開了，這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

十月十一日孫先生被禁在使館了，這一段有聲有色的歷史，在孫先生自己的記載中，說是被使館中人誘迫而進去的，但從許多可靠的史料推究起來，是孫先生秉有大無畏的精神，親到使館來宣傳，才被他們察破而拘禁了。孫先生說被誘迫而進使館，是在國際上宣傳滿清政府的罪惡和愚妄的一種方法，所以他後來也會經自己表示過，是說自己進去的。這是孫先生一生最重要的事實，也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事實。

事情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從德德黎家裏到中國使館是很近的，因為都在波德蘭區。孫先生在前一天從萬國旅店街走出來，想到德德黎家裏來和顧漢天，但在路上，警眼看見中國使館的大門，他就大膽的進去，想去窺探虛實。恰恰碰了一個使館的翻譯師延鏗，也是廣東人，他們就以同鄉的資格來談話了。然而這是極大的冒險呀！雖是孫先生自己說姓陳名震之，但他是整個滿清政府欲得而甘心的人，他們終於看破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革命領袖孫先生。於是這機警而善於做滿清政府奴隸的延鏗，不動聲色和孫先生假意親善，約他明天到這裏來吃午飯，直直的孫先生毫不疑心的答應了他。龔照璠和馬格里知道孫先生已經到過使館，他們得意極了，就準備第二天等孫先生來後的應付辦法。

第二天就是十一日，孫先生果然應延鏗的約而來了，這時候，已到吃午飯的時候了，孫先生就和鄒

廷鏗在使館吃飯。飯吃過了，鄧廷鏗引導 孫先生到第一層樓上參觀了一週，又到第二層一個使館職員李盛鍾的房間，大家坐下談話。這時候馬格里來了，鄧廷鏗就對 孫先生說：『請你再上一層到我的房間去坐坐好麼？』 孫先生隨口答應了就跟他們走上去，馬格里在前面引導着，走到了一個很小的房間門口， 孫先生看見這一間小屋，只有一個窗，窗外有鐵欄圍着，從窗外看去，知道這是在使館屋的最後一邊了，心裏才有些疑惑，他們為什麼引我到這裏來？他不知道馬格里是誰，起先沒有留意他，這時候，他一面要 孫先生進去，一面很傲慢的對 孫先生說：

『你就是孫文，我接到中國美公使的電報，他們告訴我，你坐了麥克斯輪到英國來，並教我捕你，現在這裏就是中國，你到了這裏，就是到了中國。』說罷，就關上了門，又上了鎖，和鄧廷鏗去了。這時候， 孫先生就是在鎖鑰之下的囚犯了。

孫先生被禁了，公使館中像得到了一件珍寶，全體都緊張起來。龔照璣一面打電報給總理衙門，說 孫先生改姓換名自己到使館來了，按照國際公法，中國使館就是中國地方，所以把他扣留，但解回廣東，很不容易，只好相機辦理了，請總理衙門給他一個答覆，但不必使英國駐華公使知道，（當時英國駐華公使是實績樂），一面派鄧廷鏗督同武弁車德文和洋僕二人，輪流看管，不准洩漏消息。第二天，總理衙門就來了一回電，說不給英國知道這件事是很好的，要解回廣東，最好也不要被英國牽涉，一切務須和律師詳商，如果和英國政府鬧翻了，被他們出來袒庇，事情就糟了。龔照璣接到這個回電，就很小心的要佈置着怎樣的把 孫先生能夠安然解回廣東，以邀滿清政府的重賞。

在重圍中的 孫先生，再不能插翼而飛了，他知道已處在危險的境地，因此常被禁的數小時後，就想起要 龔德梁來替他援救，但是身上的鑰匙，鉛筆，小刀，以及紙片都被他們搜去了，因此只得在名片上寫了這樣的幾句：

『我於星期日被綁架到中國使館裏面，將要被偷運出英國到中國去受死刑，求即速援救！』

「致康德黎博士，譚文省街四十六號。」

「目前請照應這個送信的人。他很窮；爲了替我工作，他不免失業。」

孫先生寫好了，就請添火爐煤炭的那個英僕帶去，他答應了，隔了一回，另外一個英僕也進來了，也同樣託他，他也答應了。但後來知道他們都沒有把信送去，直到其中一個英僕叫柯爾（Cole）的，說出來了，才確定這些信不但不送到康德黎，却都送給使館裏的長官。

孫先生被禁的第四天，使館已經決定僱了一只船，把孫先生解回廣東，於是由鄧廷鏗來討孫先生的口供，但是他還要用很婉轉的口氣對孫先生說：

「那天我將你扣留，這是我的職務方面該如此做，也只好公事公辦，今天我來看你，却用朋友的資格來的。現在你最好是直認你是孫文，什麼都完了，你也無容抵賴。」他接着又含譏帶刺的很意殷勤地說道：「你在中國已經很有名望了，皇上同總理衙門都曉得了你的歷史，一個人得着這樣的盛名，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你在這裏，就是生死關頭，你知道麼？」

「爲什麼？」孫先生問他，「這裏是英國，並不是中國，你們想把我在怎樣位置？你們如果把我引渡，你們必先要把我秋捕的事情，照會英國政府，我想英國政府未必肯讓你們把我引渡。」

「我們並不正式引渡你，現在事已辦妥，輪船已釐定，只消把你捆綁起來，塞住你的口，送到船上的秘密地方，就立刻開船。一到香港口外，有中國炮船在那裏等你，那時就用炮船送到廣州衙門，審問完了，就可以正法。」

「這種舉動，未免魯莽吧，」孫先生很鎮靜的對鄧廷鏗說：「因爲我也許有方法在船中同英國人暗通消息。」

「你一經登船，就像在這裏一樣受嚴密的監視，杜絕一切洩漏的機會。」鄧廷鏗以爲孫先生所想像的「一定辦不到的，所以這樣說。」

「但是船上員司的心理，未必與使館裏的人一樣的，也許會有人和我表同情，援助我。」

「那輪船公司和馬格里是很要好的，當然要遵守他的囑咐而行，決不能幫助你的。」鄧廷鏗說到這裏，歇了一歇，又說道：「那是格楞（Glen）公司的船，但是這星期中，怕不能成行，因為公使要節省經費，不願預爲你僱這條船，叫他們先裝貨物，貨物裝好，便只花句旅家票這一筆費了。等到下星期，貨物可以裝好，那就是你解回中國的時候了。」

「這個計劃，恐怕辦不到吧。」孫先生還是很鎮靜的回答鄧廷鏗。

「如果怕辦不到，我們就可以在這裏把你殺死，因為這裏就是中國，凡公使館裏的事，誰也不能來干涉的。」

「那末，你們未免太殘忍了！」

「這是皇上的命令，無論是活是死的，只要能拿你，就有很大的酬報。」

「將來英國政府也許要求中國把你們使館裏的人全數懲治。況且你又是我的同鄉，我的黨員在廣東很多，將來出來替我報仇，不單是你危險，就是你的全家也很危險。」

鄧廷鏗聽了孫先生這樣一說，面上立刻現出驚慌的神氣，於是停止了他那種傲慢的口吻，說道：

「我是照公使的命令行事，此來不過因私緣的關係，向你警告一下罷了。」說罷，就出去了。他出去以後，就在銀照樓面商，把和孫先生談話的結果，詳細報告，因此公使當天就打了一通電到總理衙門，說是船已僱好，價七千鎊，或解或釋，請示辦法。第二天，總理衙門就來了回電：「囑咐船送歸粵，係上策，即照行，七千鎊不是惜。……惟孫丹便應歸鑄，管解亦須加慎。」這樣，一切計劃，都告置就緒了，孫先生的命運，已完全操在他們的手裏了。鄧廷鏗於是又到孫先生前面，假仁假義的說是幫助孫先生。要孫先生自己寫信給馬格里，極力表白，說廣州的事情，他沒有參加，所以特地到使館來求昭雪。孫先生在道山磨六盞的時候，只要有一線生機，當然不會輕意放過，因此就照他們的意思，寫了一封信，但是鄧廷鏗拿了這

封信去後，就不看見他的影子了；孫先生於是悔恨起來了。無疑的，這是他們預定的計劃，要孫先生給他一個文字上的證據，說是他自己到使館來的，等到他們把孫先生送回廣東去了，以便掩飾他們綁架的嫌疑。

孫先生一切絕望了，他在狹小的房間裏，有什麼方法把消息傳到外面去呢？於是盡他所能找尋的紙片，都一一把他利用起來，把他被難的情形寫在上面，擲到臨街的窗外。起先是叫僕人拿去擲，因為他被禁的屋子，並不臨街，但是，這些都被扣留了。於是他才想由自己的窗子裏來擲，因為想把這種信擲得遠，就裹上銅幣一齊拋，銅幣用完，就代以二仙的銀幣，這都是在搜查時幸而遺留下來的。但是這些紙片，雖是有個拋到了鄰家的鉛簷或其他地方，其中一張，却就落在孫先生屋子的窗下，於是叫一個兩僕——不是柯爾——拾來再擲，可是他反把這情形告訴了使館裏的人，他們就立刻在鄰家屋上四面找尋，把所有拋去的紙團都拾去了。因此不一回，他們就把窗子用螺釘釘起來，孫先生與外界的交通，便從此完全斷絕。孫先生失望極了，只有禱告上帝，禱求自慰，他眼看著苦楚的長日，與更凄苦的長夜繼續運行者，要不是耶穌禱來安慰，真的要發狂了。

這是十六日的事情罷，是孫先生被禁的第六天了。那天，孫先生在晨禱後站起來，忽然覺得胸中充滿了一種甯靜，富有希望與自信的心緒，好像顯示他的苦難已上達於天聽，給他不少的希望，似乎一切尚有可為。因此孫先生決定再奮鬥，向那一個比較忠厚的英僕打聽在一度的懇求；要他幫助。這時候，柯爾進來了，孫先生就很懇切的問他道：

『你能幫我力量麼？』

『你是什麼人？』

『我是逃至外國的中國囚幕犯。』孫先生這樣的回答他，但覺得他不甚明瞭自己所說的意義，於是又問他：『你知道阿美尼亞人（Armenians）的事件麼？』他說得很曉得。於是孫先生隨着這條線索，告訴柯爾：中國皇帝要殺他，就如土耳其蘇丹要殺掉阿米尼亞的一切耶穌教徒一樣。中國皇帝之所以要殺他，就是因為他



是耶教徒，並且是一個力求政治改革的革命黨人，最後 孫先生還鄭重的說：

『你們英國人，是沒有一個不和阿米尼亞人表同情的，因此我知道大家對我也是一樣的表同情，假如大家都知道我的情形。』

這報富有感動力的言詞，終於打動了柯爾的心坎，但是他對於英國政府不肯幫助 孫先生，是一個疑問。於是 孫先生告訴他，英國人一定肯幫忙的，若不然，中國使館只要明告英國政府把他引渡，為什麼一定要嚴密的把他幽禁在這裏？ 孫先生又進一步說：

『我的生命，完全在你手裏，你如果肯把我被囚的事情，傳揚出去，我就可以得生，不然一定是死。你以為是救人的好，還是送人死的好？你以為我們的責任，對上帝重呢，還是對僱主的重？你以為保護公正的英國政府的光榮好，還是幫助腐敗的中國滿清政府的罪惡好？』

這樣反覆的勸着，懇切的感動着，任何人都要感奮起來，願意出死力來救助了，但 孫先生不就要他表示意見，還是很猶豫而又堅誠的要他對 孫先生所說的話，仔細考慮一番，下次進來時，再切切實實的回答，他是否願意救 孫先生。

公使館對於 孫先生這樣的拘禁，在國際上本來是不對的，所以在拘禁後的第六天， 孫先生固然是很奮急，照照環會也有變態了，因此這一天又打了一個密電到總理衙門說：『扣留至今，多無知者。釋放亦宜早，免露痕跡。乞速示。』這大概所僱的船，貨物不能夠就裝好，時間延長起來，他們有些張惶了。

在這緊要關頭， 孫先生的救星終於到了。這是和柯爾談話的第二天的早上，柯爾竟來了，這是可想而知， 孫先生是怎麼過這危險的時音。希望之團震開了，柯爾把回音寫在一張紙上，夾在煤斗中，暗示着 孫先生去拿。 孫先生當他去後，就很快的去拾起來唸着：

『我可以試為你送一封信到你的朋友那裏去；但是你不可以在椅子上寫，因為外邊從鎖鑰洞中看進來是很明白的，外面監守着常常注意你。你必須在你的床上寫才好。』

我們要感謝這位做義的柯爾，他給孫先生一條生路了。於是孫先生依照他的話，伏在榻上，面對着牆壁，拿出一張名片寫幾句話給康德黎。等柯爾進來時，指示了放的地方，他走去拾起來，孫先生又把所有的存錢，大約有二十英鎊，都給他做酬勞；他拿了就走。

柯爾拿了這一環，隨即向中華民國創造者的生命的救命書，怎樣的去奔走活動呢？然而實際發動的，倒是他的妻子，因為他不能即離開倫敦，所以他的見義勇為的妻子就替他去做一件歷史中最光榮的工作了。那是在深夜十一點三十分鐘了，康德黎家裏，忽然門鈴響起來，康德黎很驚奇的從床上起來，打開門來，不曾看見人，祇見一封信，是從門底下的縫裏塞進來的，他就檢起一看：

『你有一個朋友，從上星期一起，被囚在中國使館。他們打算把他送回中國，到了中國以後，他們一定會把他殺了的。這個可憐的人，真是慘極了。除非立刻有辦法，他就要被解走，並且不會有人知道的，我不敢簽我自己的名字，但是這件事是真的，請你相信我所說的話。你能盡什麼力就立刻盡，不然來不及了。他的名字，我相信是叫（Sin Yin Sen）』

這就是柯爾的妻子送來的信，康德黎看了，非常着急，就不顧深夜，到梅爾蓮（Marylaine）巷的警察署長那裏去，又從那裏到蘇格蘭場（Scotland yard）總警察廳去。他把孫先生這一件非常的事情報告了，但他們都說這件事與他們無涉；並且說他報告過他們以後，他的責任已經盡了，他應當回家去，不要做聲。康德黎這時便已於早上十一點三十分了，於是祇有回家去休息。第二天，他一早起來，就到他朋友那裏去商量，又到孟生博士的家裏。孟生博士，也是孫先生在香港雅麗氏學校時的教師，康德黎走到門口時，却遇見了柯爾，原來他已被警署鎖自己出外要挾。孫先生被囚的種種秘密消息發表出來，並且他已經到過康德黎家裏，知道他到孟生博士家來了，所以趕上來的。柯爾見了康德黎，就把孫先生的信拿出來，這封是：

『中國使館已經雇好了一隻船，載我回中國去。我沿途將被封鎖起來不能與任何人通消息。唉！我的大難出了一』

柯爾又告訴他們說，中國使館藉口 孫先生是一個瘋人，下星期二，就是二十日，就要把他解回中國。

『如果馬格里在這裏，這件事還有辦法。最可惜的，是他不在這裏，我們到那裏去找他呢？』康德黎很惋惜的說，因為他昨天晚上已經找過馬格里，知道他到鄉下去了。

『馬格里是在城裏，他天天都到中國公使館裏，把孫君幽禁的就是他，要我嚴密防守着，不教孫君逃脫的，也是他。』柯爾很坦率的說了出來。

這是一個可驚的報告，康德黎和孟生立刻感到營救計劃格外的困難，格外的覺得沒有把握。他們決定小心從事，要借重於最高的權力機關來降服這般狡猾而有力的人。

他們一面寫了簡單的回信，教柯爾拿回去安慰 孫先生，一面再到蘇格蘭場要求警察廳出來干涉，但結果還是無效。他們着急了，於是到外交部去試一試，但是這天是星期，沒有辦公的人，祇遇着一個值星的書記，他們把這些詳細情形報告了，他允許於次日將這件事呈報上級官長。可是事情太急了，不幸的悲劇也許就在目前。終於由孟生獨自到中國使館去，要求見 孫先生，以為這是使中國使館裏的人有所顧慮，但出來接見的就是狡猾的鄧廷鏗，他以最虛偽的言詞應付了孟生。

這一切都無結果，怎樣辦呢？使義心腸的康德黎並不因此灰心，他深怕 孫先生當夜就起解，就決定去找偵探以監視使館的行動。他就到佩星和爾街 (Passing Tai Street) 去找司賴特偵探社了。這是多麼危險呀！這偵探社就是馬格利便用來偵探 孫先生行動的一家，現在康德黎却也要他們偵探中國公使館。微倖壓了，他們因為是星期日，沒有一個人辦公，康德黎很失望的走了。他們的焦急，當然是到了極度，但是他沒有知道這是對 孫先生命運的一大關鍵，要不是這樣，給馬格里一切知道了，孫先生就立刻被他們毒害，等不到幾天以後，英國外交部出來交涉了。

康德黎從佩星和爾街出來，經過許多周折，才僱到了一個偵探。並且乘便去訪倫敦太晤士報的記者，他在一張會客的綠由單上，大書：『中國使館之誘捕案』(Case of kidnaping at The china Legation)但是

一向持重而帶有紳士氣的大晤士報，當然不肯冒昧發表。這時已是晚上十二點鐘了，偵探還沒有到，他很不放心，就親自從家裏出來到使館監視，必要時還須要干涉。但一到門口，這偵探來了，便一起坐上馬車到使館那邊去。

這是一個月光皎潔的晚上，孫先生因為中午時候，從柯爾送來的煤斗中，得到康德黎和孟生的回信，他精神上帶著極大的安慰，幾天來驚心駭魄的生活，到這時候才定了神，他安然的休息了。却不知道他的老師和愛朋友的康德黎正置身寒冷的夜氣，坐在街頭祈禱他的命運。玻璃窗從月光和燈光中，映演出種種情況，一切無可掩蔽的，康德黎竟沒有什麼異樣的變動，他就很安心的回去，這時候已是二點多鐘了。

十九日是星期一，也就是發動營救孫先生的第二天，康德黎又添了一個偵探，但是這天英國外交部長沙理士堡（S. Balfour）侯爵知道了，一方面教康德黎進是一個節略，一方面由外交部派了六個偵探在中國使館四周守候，於是康德黎的危險，到這時候可以說是沒有了。第三天沒有動靜，假定柯爾所說這天二十日起解的話是真的，使館就沒有辦法了。第五天上午。英國外交部次長山德森（T. H. Sanderson）有一專函致馬格里，叫他下午去見總長沙理士堡侯爵。大概馬格里的外交手段不得結果，據說英國總警察長預備用人權狀向中國使館提人。就在這一天（二十二日），孫先生在幽囚的小室裏，經柯爾的巧妙傳遞的方法中，看見地球報（The Globe）上有這樣注目的題目：

『可憐可怕的新聞——革命家在倫敦被誘幽禁在中國使館內。』

接着就記載詳細的情形。無疑的，這是康德黎努力的結果。孫先生見到英國輿論界出來干涉了，知道生命可以保全，心中充滿着感激之忱，就如已經定罪的人，遭逢了大赦一樣。

二十三日下午四時，英國外交部正式派員到中國使館要人。在這時候，中國使館不能不把孫先生交出來。途由馬格里引着孫先生下樓，出見康德黎和外交部所派人員等，於是孫先生在無數的新聞記者和山山海海的人群中，走出了中國使館的門口。晚上，回到康德黎家裏，他全家的人，都很快樂的歡迎着，大家舉起了

禮杯，向 孫先生的頭顱祝禱。

## 第十七章 完成三民主義

孫先生倫敦蒙難這幕悲劇告終了，他在國際上却成了一個名聲赫赫的大人物。當事情擴大以後，倫敦的報紙除地球報以外，也都用大字登載起來，最令人注目的就是荷蘭教授（Professor Holland）在倫敦泰晤士報上所發表的論文，引起楷文狄希（Mr. Cavendish）胡特（Mr. James G. Ward）等的討論，他們對於國際法的研究都很有聲望的。十月三十一日發言者報（The Speaker）還在繼續刊載關於 孫先生案件的言論，一直到十二月三日，香港支那郵報更發表了一篇關於 孫先生的歷史及主張比較詳細的論文，使貼附香港的廣東政界，格外震驚。所以當時海軍衙門派駐英使館的一個叫做凌鳳的，在他的日記上，這樣的記着：

「十九日，（即十月二十五日）獲孫文一案，反為該人成名。當解放時，有其同盟梅生等暨報館諸人，啓門尋討。翌晨時報，大發議論，並繪其像，謂當被囚時有人告曰，此番獲解回華，當梟首；或用鴆毒，或貫水銀，裝箱帶回。但在他國之地，豈能行彼國之法。然此密謀，他人不知，何以別生枝節如是？這是確實的，孫先生帶着這樣一個機會，使他的成名格外快，並且更迅速的促進他事業的完成。但孫使館的梟首，鴆毒等等密謀，如果做到了，孫先生也就完了，所以凌鳳怪外間怎樣會知道這事，使滿清政府能罪惡，隨着 孫先生的聲譽同聲的宣揚開來。」

孫先生從使館出來以後，新聞記者和文人學士來訪問他的，絡繹不絕，他把這事情經過情形，一一回答他們，幾乎使他舌敝唇焦，大約隔了二十天左右，就從康德黎家裏回到原住的地方，就是葛蘭旅店街八號。

可是滿清政府對於 孫先生案件這樣的下落，是不能干休的，所以停止活動很久的司賴特偵探社，從二十三日 孫先生出使館門口起，就又緊跟着他的行蹤，而從事秘密偵察了。同時，北京總理衙門還是怕 孫先生

回國，所以又有密函致兩廣總督譚鍾麟和廣東巡撫許振樺，教他們設法在新嘉坡、西貢、香港等埠，相機密探。直到譚鍾麟報告總理衙門，說孫先生在倫敦，一時不會回國，但譚鍾麟和許振樺還在南方嚴防，甚至要等孫先生一到香港，就實行暗殺，不使他生還。孫先生和滿清政府，真是勢不兩立了。

孫先生脫險後在倫敦的生活怎樣呢？這却不能不感謝司賴特社許多偵探的一番忙碌，使我們得到不少的材料。這報告自十月二十三日起一直到第二年的八月十二日止，那時孫先生已經離開英國往加拿大到日本去了。他們所報告的，當然只是些表面的行動，但這究竟是那時期孫先生比較詳細的『起居注』，從這裏面很可以看出孫先生生活的一方面。

大概那時孫先生每天早上十一點左右，從葛蘭旅店街出來，或者一直到譚文省街四十六號去看康德黎，或者到上霍爾龐郵局去寄信，那時孫先生大概寫信到外面去的很多，據偵探報告，簡直是每天或隔一天都到郵局去的。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是孫先生常到的地方，有時從早上十一點多鐘進去一直到下午七點才出來，這種很久的七八個鐘點，都在參考室中研究，他只是用功極了。那偵探社的報告中，一再說：『他的行動很有規律，幾乎每天到大英博物館，譚文省街四十六號，霍爾龐郵局。』他們又說：『在大英博物館書館，他不變的總是進閱覽室，並停留幾小時，偶然的需要吃些點心，就離開到有萊街的金龍麵包公司之後，有時仍回大英博物館書館。』有時下午到阿爾培脫路（Albert Road）直達脫公園（Fisher's Parken）去休息，但手裏常常拿着一份新聞紙。每天七八點鐘，就回到寓所去，晚上却很少出來。

當孫先生離開使館的最初幾天，是常到紅十字醫院或醫學校去，有時往動物園等處參觀，孫先生雖是位大醫以後，但對於學問研究的興趣，並不因此有絲毫減心，他反利用這個機會，盡量的加以考察和研究。據偵探見到的，孫先生除常到大英博物館書館以外，石室圖書堂（Hall and Library Stone Idling）處亦常去，倫敦大學（Imperial Institute），和南肯星敦博物館書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等處也常去的。同時也常到憲政俱樂部（Constitutional Club）去做過幾次調查的工作，到雷頓頓農業家畜展覽會，到葛

街工藝展覽會等處參觀或考察。大概在最無事的時候，才到立近脫馬戲場 (Regent Circus) 去消遣。

歷史上再沒有像這樣巧的事情了，四十七年前（一八四九年）馬克思在大英博物圖書館完成他的資本論的著述，現在孫先生也在這圖書館常常出入，偉大的三民主義的全部思想，也在這環境中確立起來了。但當時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是想從亞丹史密斯以來各家經濟學中別開一個局面。那時歐洲社會主義的運動正在風起雲湧，馬克思以唯物史觀為論點，斷定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內在的矛盾，革命是有必然性的不可避免。但是他本身理論就有矛盾；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序文中，這樣說：『在一切生產力還有未盡發展的餘地的時候，原有的社會制度是不會消滅的；新的，較高的生產關係在它所藉以存在的物質條件還未成熟於舊社會的胚胎之前是不能出現的。』所以他手創的第一國際（也在倫敦成立的）終於經過內部的激烈爭論之後，靜悄悄地歸於解體了。這個時代思潮的轉變，恰恰留待四十七年後孫先生來支撐和推進。英國從那個時期起，歐洲大陸的社會主義運動，雖是繼續發展，但他們却成爲自由主義的黃金時代。這樣，在自由貿易，自由競爭的下面，小資本被併吞於大資本，勞動階級的生活，更陷於困苦；同時，由於國外競爭的結果，使農業工業同樣的受到打擊。於是從一八八〇年以後，社會主義的運動，還是回到復活的路上，是一種很自然的趨勢。孫先生正在這英國社會主義各種理論和運動充分發揮和進展的時候，在倫敦用苦功的研究，這對於他思想上當然免不了受到重大影響的。

常孫先生到倫敦前後的英國實際情形怎樣呢？阿格 (Frederic Austin Ogg) 在近代歐洲經濟發展史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上說：『到一八八〇年之後，英國勞動階級安心滿意的情況已經大不如前。工業情形已不及從前穩固，工人地位亦時有搖動之虞。於是又有人開始發論，說英國國庫稅收富已大增加，惟獨勞筋力之人得不着應分的利益；這種論調，很受歡迎。當時社會貧乏的情況，雖不如五十年前那樣可憐，而實不亞於五十年前之盛行。據當時統計，每年二十人至二十五人中有一人全賴卹貧官吏的賑濟爲生。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九年商業蕭條，接連着有兇悍而不成功的反對減少工資的罷工，引起一般公眾的注

意集中到工業上不調協的情形。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三年工商界雖有短期的繁榮氣象，但到一八八五年前後工業停滯的時期又開始了。社會的和工業的改良越更使人失望。』在這樣情形之下，社會主義者就有最好的努力機會了。那時倫敦流行一種刊物，叫做倫敦無告者之慘哭聲（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in London），又有福音教（Evangelical）徒的救世軍（Salvation Army）的出現，接着，一八九〇年更有布什威廉（William Booth）的英格蘭之地獄案相與解脫方法（In Darkest England and the out）一書出版，喚起了大多數人的深刻注意。一八八〇年社會民主黨前身的民主協會（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成立，一八八三年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成立，到孫先生將到倫敦前的三年，一八九三年獨立勞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也宣告成立了，所以孫先生當時在倫敦經過書本的研究，和各方調查考察的結果，在思想上有這樣的波動：

『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知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

但這時期一切的社會革命運動所表現的事實，已不是馬克思所見到的了，馬克思所預料的無產階級的必然性的革命，也沒有實現。孫先生怎樣的完成他的新的革命理論呢？那時，有一個美國人而影響英國很大的亨利喬治（Henry George）的進步與貧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書，無疑的，對於孫先生思想上有很大的助力的。這本書一八七九年出版，到一八八二年在英帝國銷到十萬本以上。他曾親到過倫敦與愛爾蘭遊行演講，引起英國人民的擁戴和愛爾蘭政府的逮捕。他這本書，是把英國以前研究地租說的穆勒（John Stuart Mill）斯本斯（Spence）多甫（Patrick E. Dove）諸人的方法湊合而集其大成。但是他堅決的斷定，貧困與進步的正比例的發展，是由於那種個人沒有絲毫的勤勞，坐享衆人改良的結果的地主階級所造成的，亦即地租制度所造成的。這樣，他不但與穆勒的所謂財富和工資基金的太少，所以不能普遍的增加工資的學說不同，他更否認了馬克思的所謂資本掠奪工資，勞工反對資本家的理論了。孫先生因為中國是農業國，並且他早年的思



想是傾向於農業問題的，他知道中國的土地問題，遲早要發生的，因此他對於亨利喬治的理論，是很同情的。

孫先生革命的懷抱到這時候，從空洞的理論而到有具體主張的時期了。大概孫先生早年革命意識的衝動，是單純的由於民族思想，由於認定必須從異族統治中解放出來，中國才有出路，因此民族主義的思想體系較早完成，在夏威夷求學時代所見到的民主國家的設施，促成他的民權思想，後來表現於反對帝王夢想，和第一次廣州起義時選舉合衆政府總統的行動。在倫敦蒙難以後，由於常到大英博物館書室，憲政俱樂部等處研究調查後，對於歐美各國政治得失的源流，各國現行憲法的精義和利弊，都有較深的認識，故在民權主義方面，關於五權憲法的思想，便在這時完成了一個輪廓。孫先生自己說：『兄弟革命雖然是遭過了一次失敗，但是並不灰心，把革命的事情，還是向前做去。在全球奔走之餘，便把各國政治的得失源流，拿來詳細考究，預備日後革命成功，好做我們建設的張本。故兄弟當亡命各國的時候，便很注意研究各國的憲法。研究所得的結果，見得各國憲法，祇有三權，還是不很完備，所以創出五權憲法。』（民國十年五權憲法演講詞）

至於民生主義，可以說也成熟於這時期，雖然在上李鴻章書中『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三大綱要，和農功一文所說的，都是有關經濟民生的大計，並明言『農商之大政，爲生民命脈之所關；』與中會章程中也說：『必使吾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此外對於民生的疾苦，也很關心，如與中會宣言中所說哀鴻遍野，民不聊生，上李鴻章書中所說嗷嗷之衆，何以安生。這些都和民生主義的思想有關。現在看到歐美的事實，更證明民生問題的重要，必須和民族民權兩問題，同時解決，才能夠免除第二次革命的危機，才可以永享和平幸福。所以孫先生說：

『予欲爲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

現在孫先生全部的革命理論已經確定了，這時候雖是僅有概念的建立，還沒有完成具體的著述，但他在歷史上的價值，是與馬克思的完成資本論一樣的。我們如果從後來孫先生更進步的思想來看，三民主義是駕

馬克思主義以上而成爲世界革命的最高經典，那麼孫先生在大英博物館書館的一番用功，更有不朽的紀念價值了。

孫先生在大英博物館書館中的情形，現在沒有什麼材料可以記載。但在二十七年以後，孫先生曾經自己寫過一段很有意味的小小故事。他說：有一次正在大英博物館書館內看書，遇到幾個俄國人，他們互相交談以後，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有一位俄國人便向孫先生問道：

「中國的革命，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

孫先生那時雖是初次失敗以後，但捲土重來的勇氣，還是很大，他希望一二年內就要再發動一次革命，並且要這一次革命必須成功。不過對那些俄國人，不能說得太輕易，於是很穩健的這樣答覆：

「大約三十年可以成功。」

「你們在那種大的國家發起革命，只要三十年便可成功嗎？」那位俄國人聽了孫先生的回答，竟這樣驚訝起來。

「你們俄國的革命，什麼時候可以成功呢？」

「大概一百年後能夠成功，我們便算滿足了；此刻正是在奮鬥，成功雖然在一百年之後，但是現在不能不奮鬥，如果現在不奮鬥，幾百年之後，也不能成功。因爲要奮鬥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們現在便努力奮鬥。」

孫先生追述那時的情景說：「我當時聽了他們這番話之後，想到我的答話，便覺無以自容。因爲我在初次失敗之後，本希望中國的革命，急於成功，不過爲對外國人說話穩健起見，故多說三十年。及聽到他們的答話，知道他們的計劃穩健，氣魄雄大，加我好幾倍，所以我在當時就非常抱愧。」（民國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演說）孫先生這幾句話的意義，是在勉勵他的信徒。事實上當時孫先生已經確定了革命主義的理論基礎，他對於中國革命正滿懷着無限光明的希望，他的勇氣也比俄國革命黨要大得多，

所以敢預言三十年成功。誰能料到，中國革命的初步成功，就在十五年以後實現，俄國革命也不到一百年的四分之一就告成功？所以，孫先生那時的預言，是相當穩健的。但革命事業是最艱苦的工作，孫先生經過這一次失敗，並且和外國革命家交換了意見，他更認定要加倍奮鬥，加倍努力，才能達到成功而希望。他在此後每次奔走革命的時候，總是有很多人問他：

『我們看到不知失敗過多少次了，爲甚麼還沒有喪氣，總是這樣有信心？這是甚麼原因呢？』

『我不管革命失敗了有多少次，但是我總要希望中國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總是這樣奮鬥。』孫先生遇到了這樣的問話，總是拿這一句話來回答。孫先生自己承認這句話，就是那時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內和俄國人談話以後，所得的結果。我們在這裏便可知道，孫先生這一次倫敦蒙難以後留居歐洲期間，不但在思想上完成了他的革命經典——三民主義，在行動上對中國革命成功的信心和奮鬥精神，更確立了不可動搖的堅強基礎。

孫先生在留寓倫敦的第二年，（紀元前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完成了一部英文著作倫敦蒙難記(Kidnapper in London)，在勃里斯托(Bristol)的箭匠書店(Arrowsmith)出版，把蒙難的經過，記載得很詳細。同時劍橋大學教授吉爾斯(Prof. Gills)請孫先生寫了一篇自傳，孫先生在這一篇簡短的文章裏，說明自己是信仰耶穌教、湯武、華盛頓和達爾文學說的。此外又譯了一本赤十字救傷第一法，原著者是倫敦紅十字會總醫生柯士賓，這是孫先生對於醫學上唯一的譯作了。孫先生譯這本書的用意，也許爲將來革命軍軍事醫學上的準備，是很有意義的。

大約孫先生在倫敦留居了十個月，到第二年七月十一日才，坐了紐美諾亞號，(Numidian)郵船到加拿大的蒙德里利爾(Montréal)港，第二天又到溫哥華(Vancouver)，準備到日本。在那邊停留了二十天，到八月二日就坐了印弟亞皇后號(Empress of India)郵船向橫濱進發。

## 第十八章 日本志士的活動

孫先生這一回到日本，是很有意義的，因為第一，孫先生革命的主張，既經完成，必須要更廣大的宣傳，準備第二次的革命，但那時歐洲的華僑很少，也沒有留學生，要鼓吹革命，也無從鼓吹。日本與中國，在地理上是很接近的，是便於革命的策劃；第二，因為那年孫先生到倫敦以前，陳少白留在日本，對於與中會的推廣，已有相當成績；孫先生回到內地，當然是不可能了，因此祇有到日本，準備憑藉在日本的與中會的基础，來做第二次的革命工作。

孫先生到日本的時候，大約是在紀元前二十三年八月底九月初的光景。到了橫濱，就去找陳少白，患難餘生，看見了老朋友，真覺得有異樣的快樂。那時少白一個人在日本，因為幾個華僑想學習國文，就利用機會，發起組織學校，但少白這時想到台灣去，現在孫先生來了，他就把這事情報告孫先生，要請他贊助。孫先生就替他置校名，叫做中西學校，教員由少白提議託梁啓超在上海代請。梁啓超是少白當第一次廣州起義時，孫先生要他到上海來招募同志時認識的，那時梁啓超正和康有為進京會試，路過上海，同住在洋酒全安棧內，就此相識起來了，少白因為他是主張維新的，革命黨裏當教員的人又很少，所以就託他代聘。孫先生也與梁談。不久，少白就到台灣去。但梁啓超介紹的教員，還沒有到日本，他已把中西學校的名稱，改了大同學校。孫先生因為這是小節，也不去交涉，這是維新黨和革命黨最早的聯絡，也是最早的伏下了衝突的導火線。

在孫先生未到日本以前，少白已認識了幾個日本朋友，如曾根俊虎、宮崎彌藏等。那時宮崎彌藏病得很重，他有一個兄弟叫做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正在暹羅，他就寫了一封長信，說橫濱有一個中國革命黨的重要人物，要他趕快回來。宮崎寅藏回來的時候，他的哥哥已經死了，他就由曾根俊虎的介紹，認識了少白。少白把中國革命的要旨告訴了他，並且給他一本孫先生的倫敦叢雜記，他對於孫先生竭誠傾慕，就立刻要少

白寫信介紹在香港、廣州、澳門的與中會的同志，因為他在報上看見孫先生已經離開英國，他準備到廣東去訪求孫先生。但是他到了香港、澳門，孫先生却已來日本，他就趕回來。那時孫先生就住在少白的寓所，宮崎寅藏一到了橫濱，就到少白的寓所，但少白已經走了。這時候大約是在早晨，孫先生還沒有起床。宮崎寅藏剛剛坐下來，看見裏面走出來的人，就是在照相上見過的革命領袖孫先生，他快活得幾乎要跳起來。孫先生因少白也會提起過宮崎寅藏的事情，所以一見面大家就很親熱。但孫先生那時不十分能說日語，他們就用筆談，縱論中國革命形勢。孫先生問宮崎寅藏日本政府能否幫助中國革命。宮崎說：這事情必須要問犬養，犬養會說：大臣大隈很容易講話的，祇要陸軍參謀長贊成同意，事情就好辦。大概犬養已經和大隈談過，不過他為審慎和秘密計，不願意說出來罷了。犬養就是犬養毅，因為那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為外相，犬養毅幫助大隈辦理外交事務，他在大隈前面是很有講話力量的，宮崎寅藏等許多志士，都是奉了犬養毅的命令，調查中國革命的。據說孫先生就和他討論革命的發難地點：

『……今日有是志者，到處皆是，惟不敢言而已。（原文矣字，疑為已字之誤。）是以吾輩不憂無同志，祇恐不能發一起點而已。（同上）有一起點，即如置一星之火於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惟此起發之地，閣下以何為最善？前者弟以廣東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廣地一月之內，必可集山林慄悍之徒三四十萬，但有前年之失，當地之官，已如驚弓之鳥，到處提防，我輩舉動，較前略難矣。是廣東者，今日非善矣。不先擇定一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也。』

『還是以四川為負隅之地，在張羽翼於湘、楚、汴梁之郊原耳。』

『但四川不近海口，接濟軍火為難，奈何？』

『軍火一項，雖近海口，亦所難，無已，開接濟之道於浙東之沿岸乎？』

『是亦失之太遠，誠如前之所言，在山東、河南、江蘇交界，可招二三萬衆，則以江蘇之海州為最善矣。蓋起點之地，必先得人，其次接濟軍火之道，其三不近通商口岸，免各國藉口牽制，海州之地，於此三者皆得。』

。且可握運河，絕精米，此亦制北京之死命。」

『取道於海州之事，弟已於十餘年前思量之，曾到彼地盤垣十八天，細看海口之形勢，不惟入巨船，只離州城二十里，雲台山在海中，有可靠大艦耳。且州城有厘金，每小船通過稽查甚嚴。』

『到此時不怕厘金卡矣，弟所謂起點者，則先奪取一地，而意亦並指雲台山也。』這是孫先生的答覆，但孫先生接着又改變口氣寫道：『先奪雲台結束已度，而入縣城，或事可集，然是不備而常好之地。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於聚人，利於接濟，快於進取而已。在海州則進取接濟，亦利於廣東矣，惟聚人則弟於此毫無把握；蓋萬端仍以聚人爲第一着，故別處雖有形勢，雖係接濟，而心仍不能捨廣東者，則以吾人之所在也。』

『如閣下之此地，可招二三萬衆，亦可集事矣。蓋海州既有兩便，又有其人，則北可進握山東，以窺北京；南則奪取淮揚，以通大江，則糧食無憂也。有人有糧有器，成敗存乎運籌帷幄之靈耳。』

『從海州到河南，由東之交界，約要十數天，此間一帶之地，土赤民貧，無糧運之可續，我數千之衆，檢巡之間，或寡敵所乘，弟故以爲起點之地，先要選（原文撰字）形勝之區。』

他們談話的內容很廣泛，從孫先生第一次起義失敗經過起以及革命後的遠東國際形勢，和孫先生到日本後的起居問題等都談到，並且談得很投機。

宮崎寅藏在他所著的三十三年落花夢中，還記載了一段孫先生討論革命宗旨和政治建設問題等的談話。

孫先生說：

『余以人羣自治爲政治之極則，故於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豈唾手可得？必也革命。……』

『且夫共和政治不僅爲政體之極則，且適合於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便利者也。觀中國古來之歷史，凡經一次之擾亂，地方豪傑，互爭雄長，亘數十年，不幸同一無辜之民，爲之受禍者不知幾許。其所以然者，皆由於衆義者無共和之思想，而爲之盟主者，亦絕無共和憲治之類備也。故各逞一己之兵力，非至併吞獨一之勢

不此，因有此傾向，即盜賊胡虜，極其兵力之所至，居然可以爲全國之共主。……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之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爲一邦之長，以盡其材。然後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此所謂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那段談話，可以看出 孫先生民權主義思想的最早形態。所謂滿足英雄的野心，也許受了早年在求學時代四大寇帝王幻夢的刺激。就是第一次起義揚衡雲的力爭總統，也何嘗不是英雄思想的作祟？所以 孫先生說共和政治有革命的便利。 孫先生此後民權主義的完成，固然根據了世界最進步的潮流，和中國立國的精神，但他初期思潮的發動，和上述兩件事實，不無多少關係。

宮崎和 孫先生經過幾度接觸，他就回東京去報告犬養毅，從此以後，常常到 孫先生這裏來和他暢談，不久平山周也來了，他們對於 孫先生都一致的推崇和尊敬。

犬養毅回宮崎寅藏、平山周的報告，對於 孫先生也非常欽仰，急於一見，於是就在 孫先生到日後的第二年正月（紀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宮崎寅藏、平山周代表他到橫濱來歡迎 孫先生到東京。當日的情形，犬養毅曾在一篇談話中表示過，這談話的題目是革命志士之風骨，就在前年（民國二十年）發表於東京朝日新聞。他說：

『襁褓洋服之孫逸仙氏，具有革命志士之風骨。孫氏與余第一次會晤，係在明治三十一年，由宮崎滔天、葉道孫氏同至余處，並爲余介紹。宮崎者，一富有興趣之丈夫也。憶外務省曾命其調查中國革命之秘密結社，在橫濱會見孫氏，意氣非常契合，即相偕以赴東京，並督誘外務省報告云：「中國革命之秘密結社之本，已攜來在此，以代報告書如何？」自是政界中人，一掃前此之褊見，而樂相周旋矣。當日余資乏，時爲新歲正月，僅以鹽魚一尾饗客，而所邀至五十八之多，如頭山滿、平山周、青島一雄等皆在焉。彼等對於此眷懷故國，寄身海外之孫氏，咸表擁護之同情。協商結果，遂請孫氏遷居早稻田附屬之小屋內，

並於門上標以「中山樵」三字，蓋以用中國人名義，恐引人注目也。於是此假名之「中山」二字，竟成舉世盡知之孫氏名號；即現時中國人所通稱為孫中山先生是也。」

這是孫先生與日本政界交際的開始，犬養毅所說的，當然是根據他的回憶，是很可貴的史料。但關於孫先生改名中山的經過，似乎說得太簡畧了，應該拿平山周的話來補充，他說：

「同車訪犬養，歸途過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數寄屋橋外對鶴館，掌櫃不知總理之爲中國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門標，乃執筆書（姓）中山，未書名，總理忽奪筆戶名（名）樵，曰：「是中國山樵之意也。」總理號中山，蓋原如此。（平山周對總理年譜長編初稿簽註意見函）」

大概孫先生遷居東京，是由於犬養毅諸人的邀請，但最初住的不是早稻田附近的小屋，平山周因爲陪同孫先生一起去的，所以說得近於事實。當時日本還有租界制度，不准內外雜居，平山周就託名聘請中國語教授，才得開商場外僑居住的許可的先例。九月，孫先生又遷居麴町區五丁目，一直到十月，才遷到早稻田鶴町居住。從這時候起，孫先生認識了許多日本朋友，在政界的如大隈、大石、尾崎、副島種臣等。在野的志士，如頭山滿、平岡浩太郎、中野二郎、菅野長知、的斐半介、福本日南、內田良平、中村彌六、井上稚、原口聞一、平岡小太郎、清藤幸七郎、山田良政、安川、犬塚、久原、鈴木、秋山、菊池宣野等。其中平岡浩太郎，是九州福岡煤礦的主人，家裏很有財產，對於孫先生傾慕極了；孫先生住在東京時，他知道孫先生境况不佳，每月房租飯資，都由他一人負擔，這樣豪傑的性情，是很難得的。平山周因爲能說簡單的英語，孫先生和日本朋友談話時，他可以當翻譯，所以常在孫先生的寓所裏。

那時，日本志士都說東洋的和平，在乎中日兩國之真正的提攜，兩國之真正的提攜，尤賴於國民雙方相互的理解與擁護，所以對於中國革命是非常關心的，對於中國革命領袖孫先生尤其是熱烈的歡迎。正如平岡小太郎所說：「吾輩在此理想之下所結合之同志，皆能與孫氏有理解之思想相照合，而出以極懇悅之共鳴，於是同志間一片俠氣，竟至由協助而完成孫氏回天之事業。」（見平岡小太郎回想）那時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



黨也許沒有十分注意，對於一般志士的奔走聯絡，也許不能公開的加以援助，幸有犬養毅一面聯絡了許多志士，一面在大隈面前解釋，他在那篇談話中也說到這一點，他說：

『當時政府及政黨，對外國亡命來日志士，從來予以密切之注意，但以對外關係之故，表面上賤不能不取以彈壓主義也。余在當時與憲政本黨已有關係，然無論憲政本黨，或舊自由黨系人，對於中國革命派，而欲其加以援助者，實未多見，尤以大隈侯對於浪人之舉動，極爲嫌惡，故頭山滿會謂余曰：「政黨方面，諒解浪人之煩擾者，僅君一人而已，君意謂何？」』

這是確實的，當時犬養毅對於孫先生是有很多幫助的，但是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中國第一幕的九一八事變以後，接着就於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發動淞滬戰事，就在犬養毅出任內閣總理的時代，他們早已忘掉當年和我們革命黨所講的什麼中日提携，確保東洋和平的話，遂造成了中日兩國之深仇大恨，甚至影響世界局面的紛亂，這是人類感情上的一大奇變啊！

孫先生在東京住了很久，後來因爲經濟上的關係，還是回到橫濱去住，同時，那邊華僑很多，孫先生想在那邊做一番宣傳的工夫，有時還是到東京來，於是他就往還於東京橫濱之間。但是橫濱的華僑，風氣的銅窳，怕聽革命的宣傳，和在別個地方的華僑，沒有什麼分別，孫先生鼓吹了很久，加入與中會的不過百多人。但橫濱的華僑加入會黨的很多，孫先生就不斷地向他們開導，有時予以經濟上的援助，他自己祇是穿着一件很破舊的西裝，但始終很鎮靜的抱着樂觀的態度。犬養毅有時對孫先生笑着說：

『閣下倘長此抱着釋迦、孔子等說法的態度，怎樣能夠做這樣龐大的黨的黨魁？』

孫先生靜默的沒有回答，祇有報以一笑。

這時候，楊雲雲在南非洲聽到孫先生已到日本，並且外國報紙都宣傳孫先生已籌得二三百萬塊錢，預備再行革命，他就不辭跋涉到東京來見孫先生，當他到橫濱時，孫先生正在一個友人的俱樂部內，聽到楊雲雲要來見，立刻勾起了那年第一次廣州失敗的往事，情緒複雜極了，同座的許多友人，也認爲是出乎意料的

事情。他進來了，孫先生就請他到旁邊一間房內，把門關上了，向他斥責當年失敗的責任。孫先生說：

『當時你要做總統，我就讓你做總統；你說要最後到廣州，我就讓你最後到廣州。你說什麼到了時期，你自己不來，那還罷了，隨後我打報電要你不來，隔一日，你又不多多少派了六百人來，把事情鬧糟了，消息洩漏，人又發了，你得了消息，便一個人拚命跑掉，這算是什麼把戲？』

孫先生俯首紅臉，知道過去偌大的風波，都是他一個人造成的，他內心頓時起了極度的懺悔，他對於孫先生嚴正的聲斥，只有承認，便吞吞吐吐的說：

『以前的事，是我一人的錯誤。現在聽說你籌得大款，從新再起，因此不怕遠趕來，是想再為革命奮鬥，請你原我前過，容我再來効力。』

『大款從什麼地方來呢？你能認錯，那就沒有事，將來有機會再共事吧。』孫先生很和藹的答覆他，說着要讓他走出來。俱樂部內的人，都看見他臉上罩着一層灰白而有淺紅的顏色走過，就向他略事寒暄，大家心裏却非常感動。孫先生對待朋友不使難堪的那種偉大精神。

## 第十九章 革命黨與保皇黨的對立

現在我們要說到與孫先生同時代的維新黨的活動情形了。維新黨的首領是康有為，孫君超是有為高本軍營的學生，也是一個重要份子。康有為和孫先生同為廣東人，但他是理學傳家的世家子，不像孫先生是一個貧苦農家子弟，因此他是富於忠君的思想，常常在想怎樣的才能替滿清皇帝効忠，這和孫先生提倡革命的主張，顯然是不同的。但他們活動的開始，都是直接受了甲午中日戰爭影響的結果；當孫先生上書李鴻章的時候，不久康有為為新中舉人，也就聯合一批新舉人公舉上書。當孫先生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康有為的排學會、保國會也相繼成立。當孫先生在廣州第一次起義時，康有為會派人向楊衢雲和孫先生磋商合作，

陳少白也在這時期，認識了梁啓超。那時維新黨祇是在士大夫階級中活動，並沒有廣大的羣衆，所以很想與革命黨聯絡，但一部份維新黨人，却代表了士大夫階級的口吻，對於革命黨是和會匪一樣的看法。

（當 孫先生在倫敦蒙難省釋以後，國際上已引起很多同情和注意。康有爲的信徒麥孟華在時務報上作的論會匪宜設法安置一文內，却說：『今日之會匪，其勢之大，其人之智，更非髮逆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與中諸會匪，或煽於東南，或熾於西北，或動於內地，……孫汶之案，沙侯語難（即沙士伯豈侯），徒辱國體，實張彼箠。忍而置之，則養癰貽患，起而救之，則乏下手之策。』這種論調簡直是替滿清政府張目，但他們祇迎合了士大夫階級的心理，却沒有廣大羣衆擁護的基礎，不像革命黨在海外深入會黨中間。維新黨一直到紀元前十四年（一八九八年），清帝德宗接受康有爲變法維新的主張，康梁大活動於宮廷之間，才算他們最得志的時期了。這時期是正當 孫先生避跡日本的時期。

孫先生這一次剛到日本的時候，橫濱的中西學校正籌備就緒，由少白的提議，請梁啓超代聘教員，梁所聘的教員，不用說，都是維新黨的重要份子，如徐勤、陳默庵、湯覺頓等，並且改校名爲大同學校。孫先生以爲大家都爲國事奔走，對於這一個校名的變更，絲毫不介於懷。徐勤等到日本後，對於 孫先生也非常尊敬，所以雖是各有宗旨，在感情上也很融洽的。但 孫先生往還東京橫濱各埠，非常忙碌，對於校務，不能兼顧，徐勤就乘機進握教育權，並且與橫濱的僑商，朝夕酬酢，廣爲交際。把當時興中會創立這學校時的形勢一比較，到現在幾乎已成反客爲主的形勢了。

康梁的百日維新運動，終於失敗了，熱心的日本志士，却想利用這機會使革命黨與維新黨聯合起來，其謀國事。因此當康有爲由京返滬轉道香港的時候，宮崎寅藏就在香港引薦康有爲到日本，梁啓超也由平山周保讓，從天津下塘沽，繞道赴日；先康有爲七日到東京。康有爲到了東京，孫先生因爲同是爲政治奮鬥而出國的人，他滿懷着一腔同情，特地找宮崎陪着他去看康有爲，但是迷戀着君恩浩蕩的康有爲，怕和革命黨接近了，不能表白他的心跡，雖是 孫先生親自臨門訪問，他竟不敢出來見 孫先生。宮崎寅藏對此事有這樣一段記

載：

「翌日，孫逸仙君來訪，欲余介與康君相見。康君托事而謝絕之。孫君之求見康也：蓋對於彼之現狀，不堪同情，一相見而慰異鄉之托命，所謂古義照人心也。然康君之避而不見者亦有理由：蓋孫君之價值，自民黨之一面觀之，則希世之英雄，銅石範而香花祝者也。然自清帝一面觀之，則背叛之逆賊，以十萬金購其頭顱而不惜，而孫君之視清帝亦爲不共戴天之讎。至於康君者雖一朝蹉跌，受刑章之捕，蹈海亡命於千里之外；而螭坳藝迹，夢想三天，尙冀賜環有日，宣室重逢，爲僞朝建不世之業。故自行述而言，不能與罪人相交接；自利害而論，尤不願與政敵相周旋；此所以望氣而却步，舉扇而恐元規之塵汚。」（三十三年落花夢）

康有爲的爲人，在氣度宏大的孫先生面前，自然益見其褊狹而不足有爲了。後來，由犬養毅的發起，邀請孫先生和康梁等一起到他家裏去會面。犬養毅的意思，是要他們討論兩黨合作的辦法。那時少白已經從台灣回到日本來，孫先生和他就踐約而去，但康有爲竟托故不到，由梁啓超代表他和少白談論，終於一無結果而散。

康有爲派的不能和革命黨合作，是爲要將來他們再回滿清政府留餘地，因此不久，他們就打起保皇的旗子，一面反對西太后，一面却擁護德宗。在這情勢之下，於是保皇黨和革命黨對立的形勢，愈其顯著了。那時天津的國民報發表了一篇中山樞傳，是保皇黨人所做的，對於孫先生大肆攻擊。橫濱的大同學校也發現不許孫文到校的紙條，他們對於革命黨着着進逼了。大同學校的教育權早被保皇攫取了，担任校長的就是徐勤。那天孫先生到學校裏去看那些教員們，但他們都出去了，沒有看見一個人，只有棹上放着這樣的一張不署姓名的條子，孫先生看了很奇怪，就走了出來，見着幾個與中會的同志，就把這段意料不到的事，告訴了他們。大家聽了，都非常不平，一齊到大同學校去大興問罪之師，徐勤見來勢洶洶，不敢出來，他們吵着要追究棹上字條的來歷，徐勤就站在門口說：『不要誤會，字條不是他寫的。』當時一部份校董也在，就出來調停。與中

會的同志，都責徐勤不念本本水源，有些激烈的同志，要同他們火併，經孫先生一再制止，才沒有意外事情發生，但這樣一鬧，大同學校就成爲兩黨短兵相接的地方，後來日本志士也出來調停，推犬養毅爲名譽校長，校務才得繼續維持。這也是革命黨和保皇黨衝突的一場小風波。

但是康有爲的徒衆，傾向革命黨的也有，大概徐勤、麥孟華等是跟着他老師一致主張的；梁啓超、韓文舉、歐渠甲、張智若、王照之流是同情革命的。梁啓超那時在橫濱辦清議報，時時流露革命言論，態度最顯明。康有爲因爲徒衆不能夠完全聽他的話，他氣極了，天天和他們爭吵，被日本當局知道，恐怕他們要鬧出什麼事來，就叫他離開日本，於是他就往加拿大去了。康有爲走了，梁啓超和孫先生就格外親熱，他曾致函孫先生，有這樣的話：『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曾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可見他是比較有理性，不是固執着成見和孫先生爲難的。孫先生有時也約他到寓所來談天，有時他們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譚。那時兩黨合併的計劃，進行得已經很成熟，梁啓超已和少白洽商，想在合併後推孫先生爲會長，梁爲副會長。但不久，梁啓超和陳少白在香港會面，繼續討論合併辦法，推陳少白和徐勤草訂聯合章程，徐勤表目答應了，暗中却和麥孟華商量，立即飛函報告康有爲，說卓如漸入行者圈套，非速設法解救不可。卓如是梁啓超的別號，行書是曾孫先生，他們說梁啓超人孫先生的圈套，就根本不解。孫先生的宏大的懷抱，但康有爲是主張絕對不許與革命黨往還的，他知道梁啓超真的和革命黨商議合併辦法，他急極了，就派人拿了一筆款子，到日本來要梁啓超到檀香山去辦理保皇黨，不許稽延。這樣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合併，從此中止，梁啓超個人的理想，也從此打破了。但他一面遵照師命，不得不去，一面依然不能忘情孫先生，臨行的時候，還在孫先生面前說，他們雖用保皇的名義，實際還是革命，所以必須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孫先生因爲愛重其人，也就相信他。他又說檀香山是孫先生的第二故鄉，與中會的發源地，要求孫先生介紹同志。孫先生坦然不疑，就介紹他去見德彰公，以及其他親友，梁啓超就欣然的到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始終是保持着偉大的態度，他毅然介紹梁啟超到檀香山去，是爲公誼，爲國事。但消息傳來，梁啟超到了檀香山後，得着德彰公的便利，結納華僑，却大倡保皇之說，並且漸漸地進而組織保皇會。他說革命與保皇是名異實同，華僑不曉得內容，以爲有孫先生的介紹，於是加入保皇會的很多。孫先生知道了，就寫信給梁啟超，責他背約失信，然而與中會會員大半已變爲保皇會會員，情形正和橫濱的大同學校，如出一轍。保皇黨的反覆無常，破壞革命運動的陰謀，終於暴露。孫先生的前面，孫先生這時正在東京籌劃第二次起義，沒有方法到檀香山去肅清他們的邪說妖言，祇有留待將來有機會再作一番苦鬥，但他的內心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後來回憶這時期的情形，有這樣的話：

『自乙未初敗以至於庚子，此五年之間，實爲革命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適於其時，有保皇黨發生，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爲尤甚。』

這一段艱難困苦的實際情形，波譎雲詭，變化無窮，將在以後各章加以敘述。

在這時期內，孫先生是一個貧乏的亡命者，滿清政府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曾經利用這機會游說孫先生，說：『如果肯歸順滿清政府，一定可以得到高官厚祿。』李盛鐸在滿清政府是屬於后黨的，他到日本來是偵察康梁和孫先生的行動，他以爲孫先生一敗塗地，再沒有重起的希望，如果趁這機會勸降，一定能夠成功，但不曉得孫先生是有金鋼百煉的革命黨，毫無猶豫的拒絕了他的游說。所以孫先生自己說過：『滿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窮途之困苦所不能撓。』（心理建設自序）也就在這時期內開始充分表現。

## 第二十章 援助菲律賓獨立與革命形勢之重振

孫先生淹滯日本，中國的革命風雲，表面上是暫時平靜了，但太平洋上的風雲却已兩變其顏色。這就是菲律賓人脫離西班牙人的羈絆轉而反抗美國的一個壯烈的獨立戰爭。菲律賓是和古巴（Cuba）同爲西班牙的殖

民地，他們不斷地向西班牙反抗。一八九七年獨立戰爭又起來了，但結果是失敗。這時候是正當美國的勢力向太平洋猛烈進展的時候，因為爭奪殖民地的緣故，也就和西班牙開戰了，聰明的美國就利用了菲律賓和古巴的獨立軍，要他們內應。戰爭的結果，西班牙在內外夾攻之下，當然是失敗了。美國就代替着西班牙的勢力而統治它們，古巴以及波爾多黎各（Puerto Rico）島，都歡迎美國干預他們的內政，但菲律賓島却毫不躊躇的要求完全自由。這是出乎美國意料之外的。它們就對菲律賓的獨立運動，施以嚴重的壓迫。菲律賓獨立軍領袖阿奎那度就把抗拒西班牙的軍隊轉而向美國血戰了。一個久處在殖民地地位的菲律賓島和強大的美國抗戰，當然是不能取勝的，原因是缺少新式的軍械，阿奎那度不得已通電亞洲各國求援，並密派代表彭西（Pozo）向日本購取軍械。彭西對於孫先生很是敬仰的，並且知道他和日本民黨有關係，就託了一個香港朋友介紹見孫先生，並以購械全權委託孫先生。這是顯然的，大家都是為民族獨立而革命，因此孫先生一見了彭西，就表示十萬分的同情，對於購械的委託，毫不推諉的接受了。那時孫先生對於國內軍事的規劃，一無成就，所以一聽到菲律賓獨立軍的求援，認為是一個絕好機會，就主張率領與中會會員投入菲律賓獨立軍，幫助他們去反抗美國，等到菲島的獨立運動成功了，再由菲人協助中國完成革命。這是何等遠大的目光，菲律賓代表和孫先生志趣了。孫先生的提議，大家都一致的贊同。於是孫先生履行代購軍械的約定，和宮崎寅藏商量辦法了：

『你應該請菲律賓法購軍械，並且安全的送到那裏嗎？』

實崎是一個熱心愛國的人，聽了孫先生的囑託，就慨然接受了這個使命。但他對於這事情，是完全外行，就轉商於大卷然，大卷然告訴他說：私運軍火，必須避過警吏的注意，都不是我們所能做的，但商人負利忘義，是可能隨便託他的，必須找忠實而有肝膽，並且具有商人手腕的人去辦才好。後來就介紹中村野六擔任這件事。

人選既經決定，孫先生就負起間接的使命和他接洽，但為避免警吏的注目，由宮崎寅藏和平山周做傳達消息的機關。同時孫先生為要和彭西接洽便利起見，就從東京又搬回橫濱來住，因為彭西是住在橫濱的。經

過了許多周折，中村彌六從大會社購到了大批的軍械，又向三井會社僱一只吉打丸輪船，準備載運到小呂宋去，搭船同去的有日本志士二人，就是高野和及林。但不幸這輪船離開日本，到了上海外的洋面，忽然沉沒了。平山周和原植本來也想到菲島去從軍的，原植原是一個陸軍大尉，他辭了職準備去的，結果因事中止，竟逃去這個危險。菲律賓代表以及菲律賓的獨立軍，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當然是悲傷極了，孫先生也爲了這件事非常懊喪，被壓迫民族的命運，是同樣的可憐，孫先生內心的煩悶和焦急，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在這艱澀的境遇中，透露了一線光明的，便要算是長江閩粵各會黨一致併入興中會的一件大事了。這是孫先生經過許多籌劃和佈置而成就的一個結果。原來當孫先生和保皇黨離合不定的時候，早就注意到宣傳政策和切實聯絡會黨的計劃。所以一面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主義，同時，招待同志和聯絡會黨，一面命平山周到長江一帶去聯絡哥老會。因爲平山周在中國北方，曾經認識了一個湖南哥老會首領畢永年；畢永年是和保皇黨人有往來的。這時候平山周就要他到日本去見孫先生，保皇黨恐怕他爲孫先生所利用，就向他哄騙說：『哥老會立刻要起事了，你趕快回國吧。』他很相信的就回到上海，但後來知道並沒有這些事，就和平山周到湖南的長沙、瀏陽、新陽一帶去，遇見了很多哥老會頭目李雲彪、黃鴻鈞、張堯卿等。那時陳少白在香港早已加入了三合會，當面又討做白扁，鄧士良也奉了孫先生的命令，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於是香港發動，要畢永年率領長江一帶的會黨到香港來大會合。不久，畢永年就率領各頭目到香港來，於是集合兩廣福建長江一帶會黨首領於一堂，歃血盟誓，一致公推孫先生爲會長，並鑄一印信，以昭節重。這次大會，宮崎也參加的，就由會黨推他和少白帶印信帶到日本去送呈孫先生，這是中國革命史上一個最顯著的異數，各地最複雜的會黨竟能聯合起來，革命的聲勢陡然增加了不少，而統一指揮的就是孫先生。

當少白和宮崎回到日本見孫先生的時候，第二批援助菲律賓的軍械，已經又購到了，但在嚴密的警吏監視之下，沒有方法載運，還是繼續存貯在大倉會社內。菲律賓獨立軍陷在重重的圍困中，終於因爲沒有接濟而失敗了。孫先生因爲見到興中會的聲勢已經重振起來，菲律賓的獨立軍却一蹶不振，也不用這些軍械了，就



和彭爾商量，請他們把去運去的軍械轉供給與中會，好讓他們在中國重行掀起了個革命的風潮。彭爾對孫先生誠懇的提議，非常感動，就很慷慨的答應，不久他也從日本到西貢去了。孫先生很愉快的好像獲得了什麼似的，人已有了，軍械也有了，他就很興奮的計劃第二次的起義。

在苦鬥中的孫先生，曙光終於透過黑暗而出現了。這時候是正當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的前後，滿清政府的戊戌政變已經過去，也就是康梁百日維新的政績，完全已成陳蹟了。西太后自己臨朝，后黨的勢力日甚一日；她爲要防止德宗權力的再起，更想進而廢止他的皇帝名義，於是立溥儀爲大阿哥，爲廢立的準備。那時康有爲在南洋，一聽到這個消息，知道『皇上』有危險，報恩的機會到了，就聯合僑商通電反對。各地反對的聲浪也很多。西太后對於本國人的反對，當然也有些顧忌，但是她所最憂慮的還是由各國的干涉，從巧的，這時候義和團在山東鬧事，宣稱有神術，不怕火器，他們的鬧事漸漸地蔓延到北平來，昏庸的滿清政府却異想天開，要利用他們來威懾各國，於是一意的放任，讓他們去殺外國牧師，搗毀公使館，結果動了國際的公憤，英、法、德、意等八國聯合起來進兵北京，把西太后和德宗嚇跑了。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智識階級的感覺到滿清政府的必須改革，已漸漸地普遍了。在孫先生初到日本的時候，留學生是很少的，而且都不瞭解革命的意義。到這時候，却大不相同了；在不滿百數的留學生中，主張根本革命的却佔了大半。那時介紹西洋民權思想的書籍，開始由留日學生編譯而發見了，如譯書彙編和開智錄等，所譯的有盧騷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律，約翰穆勒的自由論等，對於國內思想界，都有很大影響，孫先生在這風氣中，對於革命的運動，更增加了許多勇氣和決心；這是失敗後重見的一條光明之路，孫先生更堅決的走向前去了。

這時候，梁啟超早已回到日本，繼續辦報。他們在這風潮中，也想活動起來，但他們的目的，是在勤王，而孫先生的根本革命是不同的。然而那時兩黨都在聯絡會黨，中間做牽線的便是畢永年。畢永年有一個很親密的的朋友叫唐才常，他和譚嗣同同鄉，嗣同被西太后殺掉以後，他就著志替他舉兵除奸，因此他始終是擁護保皇黨的。畢永年曾經偕唐才常到日本見孫先生，平山周也有很多次的斡旋，都勸他加入會中。在那時康有

爲在新加坡已向華僑籌到一筆巨款，他就決心要利用這款子在漢口起事。但一面仍和畢永年訂殊途同歸之約。因此，在這大革命醞釀之前，革命黨和保皇黨又暫時聯合了起來。

亞細亞的風雲，接着其律賓獨立軍的厥仆而重行開展了。孫先生這時候正派人在廣東籌備軍事，但梁啓超、唐才常等已決定在長江沿岸各省起兵，以漢口爲中心。他們準備出發回國去，梁啓超和他的同志就在橫濱紅餐館開歡送會，同時請了孫先生、陳少白和宮崎等到會。在歡宴的席上，大家舉起了酒杯，各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情形，要是梁啓超、唐才常等能夠聽命孫先生，這一次大家回國在南北同時發動，在統一的指揮之下，滿清政府也許就會崩潰，這一次歡宴就不啻痛飲黃龍了。但他們別有懷抱，終於兩敗俱傷，使滿清政府又延長幾年壽命，這是何等可惜！

孫先生對於保皇黨起事的目的，雖不能贊同，但他在公誼上，還是幫助的，如林述唐離日前，孫先生還替他介紹漢口某俄國商行的買辦與中會會員容星橋。林述唐是和唐才常同時回國的，他和長江會黨很有關係的，但他得了孫先生介紹容星橋以後，在漢口有不少的便利。這是孫先生始終和保皇黨編狹心理最顯著的不同地方，也就是造成孫先生偉大的領袖資格的原因。

## 第二十一章 聯合李鴻章運動的失敗

第二次革命運動 孫先生已經準備就緒，但快要臨到發動的時期，香港的同志要求孫先生聯合李鴻章在兩廣獨立，組織新政府，以避免流血的革命，這也是革命史上留下的一個幻影，事情是沒有成功，不過更促進了孫先生對於革命進行的信念而已。

這一段事實的經過很複雜，現在簡單的說：那時李鴻章是做兩廣總督，他因爲在中日戰爭時，對日本屈伏了，全國輿論都不滿意他，因此在滿清政府中很失勢，後來康梁在海外倡議保皇，滿清政府要他出任兩廣總督。

是在防止康梁在廣東起事的。現在義和團事件發生了，北方陷在混沌的狀態中，香港同志何啟和陳少白商議，想借重香港總督的力量，勸告李鴻章聯合 孫先生在廣東獨立，理由是說保全兩廣，免得跟北方一樣的混亂，這是一方面的情形。同時，李鴻章的親信劉學詢，早就有意拉攏 孫先生，紀元前十三年（一八九九年），他到日本和 孫先生往還甚密， 孫先生並且介紹他去認識犬養毅，由犬養毅引見大隈重信。劉學詢的拉攏 孫先生是要向滿清政府邀功的，因為他知道滿清政府對於康梁已經厭惡，但他仍逍遙海外，無法應付。孫先生久居外洋，對於華僑是很有聯絡的，所以他想利用 孫先生來抵制康梁。但是他的如意算盤，沒有成功， 孫先生和他接近，是利用他來籌款的；他決不會拋棄了革命立場，和任何一個在滿清政府下的官吏妥協的。因此， 孫先生一面拿定了主見，一面還是讓一部份同志去活動。

這大概是在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的五月，何啟和陳少白等在香港的活動，已經大體成功，並且和劉學詢以及在李鴻章幕下的另一要人曾廣銓也疏通好了，要他們從中助力。他們就徵求 孫先生的同意，用 孫先生的名義做領銜，上書香港總督，大意是說：滿清政府的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英國和中國有密切的關係，商務教堂，遍於內地，因此要求借重他們的力量來改造中國。接着就說到滿清政府政治的腐敗，尤其是着重於外交方面的情形，以激動英國人的注意。但最重要的，是把這次義和團亂事和滿清政府的關係，說得很詳細，目的是在暴露他們的罪狀，主要的幾句話是這樣：

「就現在之已見者，則如妖言惑衆，煽亂危邦，醜禍奸民，褒以忠義，是謂壽民變。東亂既起，不忌剿平，又借元兇，命爲前導，是謂挑邊釁。教異理同，傳導何罪？唆發民庶，屠戮遠人，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經禍根，蕩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攸關，移砲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節帶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爲至理，竟囑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啓發貢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兵權，是謂用債帥。裂土瓜分，擊破取覆，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爲挑撥，遂啓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

滿政府之的確罪狀，苟不反正，爲禍何極？」

最後又附着治平章程六則，內容是：一、遷都于適中之地；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以總其成，於各區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三、公權利於天下；四、增添文武官俸；五、平其政刑；六、變科舉爲專門之學。其中第二條關於政治的組織，中央政府首長的職權，是規定在憲法之內的，並且注重各省的自治，如省的一切政治，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的遙制，這是一種聯邦政府的理想。第三條公權利於天下，各國稅等類如有增改，必先與別國妥議而行，這是因爲要求英國對忙不能不這樣說的。在這信上署名的，除了孫先生以外，就是楊衢雲、鄧士良、陳少白、史堅如等，以及其他與中會會員。那時楊衢雲已回到香港，幫助少白等聯絡會黨。

從這信的全篇主旨中，可以看出有一個言外之意，就是說義和團式的亂事，是影響在華各國的利益，香港密邇兩廣，如果有事情了，必受莫大的影響，所以必須預籌保全的辦法。換言之，是要香港總督勸告李鴻章獨立。香港總督認定廣東是他們英國的勢力範圍，對於中國亂事的漫延，當然很注意的，並且他和中國人感情極好，他受了何啓的運動，又接到這封書，倒很開情，就寫了一封信，由沙面領事轉交李鴻章，很委婉地說明此意。

李鴻章那時對於這個提議，不免有些心動，但他是以清帝后的存亡爲關鍵，所以還是保持穩健的觀望態度。劉學詢見李鴻章已有些活動的意思，就報告孫先生，要孫先生立刻到香港來商量。孫先生就派平山周先到香港來探聽虛實，隨後自己也從日本搭法輪印地亞斯動身到香港來。孫先生自紀元前十五年（一八九七年）九月來日本以後，到現在已過了四個年頭了。這次隨孫先生同來的，有鄧士良等，還有幾個日本志士，如宮崎、清藤幸七郎、內田良平、福本誠等。

船到吳淞的時候，日本志士，還是記起保皇黨在漢口的起事，想和革命黨聯絡策應，就由清藤上岸到上海去找平岡小太郎，要他担任長江一帶和日本同志的通信聯絡機關。平岡從上海坐了淞滬火車到吳淞港，親到印

地亞船上見孫先生。那時正盛夏的天氣，孫先生橫臥在床上，很安閑的閉着眼睛，靜默的思索着，一晃了平岡小太郎很愉快，把這事情說過了，就在船上喋血爲盟，幾個人喝葡萄酒，吃燒羊肉，以代晚宴。大概孫先生和日本志士的訂交，都是這樣豪放而痛快的。

孫先生到香港的時候，大約是六月十七十八左右，李鴻章已派了安瀾兵艦來迎接，請孫先生到省城去會商，但孫先生經過審慎的考慮，覺得不能隨便答應去的，就派了宮崎坐這兵艦代表他到省城去，他自己因爲那年香港有五年放逐的命令，也不能上岸，就換了船到西貢去。以便聽取這裏的消息以後，再定行止。和孫先生同去的有一個英國少年摩根，他是孫先生四年前在倫敦相識的，不久以前，他從遠道來訪孫先生，孫先生便派同志招待他住在香港，現在見到了孫先生，因此就請他回到西貢去。

宮崎奉了孫先生的命令，到廣州去訪劉學詢，和他詳談了一夜，劉學詢說各國聯軍未攻陷北京以前，李鴻章還是不能有所表示；請宮崎轉達孫先生。宮崎知道時機還沒有成熟，就離開廣州回到香港，那時孫先生已經到西貢去了。隔了二日，劉學詢派人送三萬元到香港來，說是送給孫先生的，宮崎就代收了。那時康有爲在新加坡，由僑商邱菽園招待。他並且資助康有爲軍費至百萬元之多。宮崎當和孫先生同來香港時，早就以赴新聯合康派的意思請命於孫先生，孫先生雖嘆否否，因爲他以過去的事實來看，革命黨和保皇黨的合作，恐怕是不能實現的了，但他又不好過意反對日本志士的一番熱誠，所以祇有含糊的答應了。但宮崎的用意本來也是不錯的，他思利用過去他曾救過康有爲的責任，同他是後游說，要他幡然改計，幫助建立民國，就可把邱菽園資助的這筆款子，移作革命軍的軍費了，最少也可以分出一小部份。因此孫先生和劉學詢商量去了。可是事情並不像宮崎所預料的那樣順利，康有爲短小貧乏怕死的康黨，因爲宮崎到過廣州，和劉學詢見過面，他們恐懼他是奉了李鴻章的命令，到新加坡來行刺康有爲的。因此當他到新加坡後的幾天，康有爲就同當地的英國官廳告發，說他們是來行刺的。新加坡英國官廳派人向他搜查，看見三萬元的紙幣，和一把日本刀，就認爲行跡可疑，把他下獄，清藤也同樣的下去，這是出乎宮崎意料的一件冤案，他到這時才充分的認識保皇

黨的面目，從此他不敢再說和革命黨聯合了。

這時候，孫先生已到了西貢，住在 Grand Hotel，他還是很關心廣東的消息。一面向劉學詢問李鴻章最後的切實態度，一面要楊衢雲、陳少白、福本、平山諸人，仍在香港繼續軍事計劃。六月二十三日平山周把劉學詢送來三萬元和宮崎到新加坡去的信息，告訴了孫先生，孫先生就於七月六日和摩根從西貢到新加坡，想去看宮崎。

當孫先生到新加坡的時候，宮崎和清藤已下獄六天。孫先生知道了這個消息，就親自到英官前保釋。於是英官下令不許宮崎、清藤五年內登陸，這一場奇獄從此結束。孫先生於是親和宮崎、清藤、摩根等搭佐渡丸輪船回到香港。但這一次到香港，情形不同了，因為新加坡英官早已通知香港總督，要他防止孫先生一批人上岸。因此輪船到了香港，水陸警察，都嚴密的注意着。香港與中會會員陳少白等，只得到船上來迎接孫先生。

這時，北方的義和團事情已經平息了，清帝母子也安然回到北京來了，滿清政府就要李鴻章回去當議和代表，君臣之見深於民族意識的李鴻章就不顧一切的準備北上。載洵李鴻章北上的一只安平輪船，正在佐渡丸開到香港後的第二天，從廣州開來準備向北去了。何嘗、陳少白等知道事情不妙，於是要求香港總督，等他過港拜見時，當面勸阻他不要北上。孫先生知道這一切，就斷定這事情是沒有希望了。

革命的計劃，經過這許多周折，不免停頓了，熱血沸騰的日本志士有些不耐煩，但他們不知道孫先生的深謀遠慮。幾個人聚居在佐渡丸中，瞻望着茫茫前途，就把船房做會議室，開始討論革命的新計劃了。那時是在深夜，靜寂的香港海上，他們都正興奮的辯論着。孫先生首先提議：

『由福本全權辦理香港的事情，由平山周等協助他。推鄭士良在內地起義，由原楨做參謀，聯合日本諸同志以占領某地，兵進一半而至廈門。宮崎和孫先生秘密到臺灣，以便聯絡。』

『這樣的計劃，是足以使同志放心的，而且清藤和宮崎剛剛受了縲絏的恥辱，應當怎樣的奮發前進。我們

現在的計劃，祇有趁今夜月黑人靜的時候，由九龍登岸，疾走內地，行迅雷不及掩耳的革命，事情才有辦法。在衆人靜默的空氣中，福本首先表示異議，宮崎等聽了，也很贊成他的主張。

『這是最無謀劃的事情了，我們這幾個人，不是像把一塊肉投在饑虎的前面麼？』孫先生搖着頭表示不能同意福本的主張。但宮崎似乎很饑渴的盼望實際革命的到臨，他說如果我們還是回到日本去，有什麼辦法呢？於是孫先生很莊重的對他們說：

『我的生命，負四百州之重，一切的謀劃，雖未必都能成功，但終不能採取這種自絕的方法。』

『如果回日本去，事情還是不能辦，那還不如就死在這裏，否則解散同盟，免得人家說我們是拿革命做口頭禪的。』宮崎很焦急的說，接着又帶嘲帶罵的說：『革命不能一定靠謀算，如果等謀算定了才做，不是和秀才造反一樣，結果到三年也沒有成功。太懦怯了！我不能和你共事了。』

『你要死，爲什麼不跳到海中去？免得奔向內地去革命。』孫先生有些怒意了。

討論變成辯論，當然沒有什麼結果，福本去睡了，只有宮崎和清藤在艙房。孫先生仔細想起來，知道宮崎大概在新加坡受了刺激太深，所以感情很偏激，還是回他解釋一下，以挽回剛才的形勢。於是獨自走向宮崎前面很懇切的說：

『你太急了！』

『你也未免太多慮了！』

『你當然知道我多慮，也不是怕死，但爲什麼一定要窮困我的究竟，你太不明白我現在的處境了。』孫先生很痛心的說。『福本已充滿着熱淚。』就回到自己房間去睡。不一回，清藤也去了。宮崎也那一個就寢，福本卻很偉大的談話，說道：『甲板上有警察。』宮崎走出一看，真的幾個英國警察和中國巡警，在甲板上還有滿載了警察的小輪船在巡邏，宮崎才悟到孫先生的意思，很佩服。孫先生的意見之明，覺得自己太愚了，就到孫先生那邊，聲明謝罪，從此絕對服從孫先生的命令，聽他的指揮。孫先生聽了

倒好笑起來，因為他早就忘掉剛才的事情了，大家釋釋一語，就各自歸寢，一言不語。

第二天，李鴻章的輪船從廣州到香港來了，和平革命和急激革命的關鍵，就在這一剎那間。香港的風潮，到船上來報告。孫先生說，今天十一點鐘，香港總督希德和李鴻章會面時討論獨立問題，如果事情成功了，就特許孫先生登陸。孫先生和宮崎等，就在船上等候消息。到了傍晚的時候，陳少白、楊衢雲等到船上來報告，說李鴻章竟不接收香港總督的勸告，已北上去了。和平革命到這時候已完全無望，於是大家也發起事變。孫先生因為當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對革命主張很贊成，已經有過數次接洽，答應起事時設法援助，所以孫先生對於這一次革命，決定變更計劃，不到廣州發難，預備在惠州起事，沿海向東前進，他自己到台灣發難。同時主張，革命軍必須能夠打到廈門，他就可渡過台灣海峽，親自督師。這時候宮崎沒有話了，大家商量開，就開軍事會議，討論結果，把發難的責任委之鄒士良，就以鄒士良為總司令，原擬為參謀長，但鄒士良當時在部長，兼入內地，聯絡會黨，畢永年為民政部長，平山周為外交部長，李紀堂在香港任經理。畢永年和鄒士良到廣州市城與陳響漢，那時，李紀堂還是初次見孫先生，就捐出三萬元為革命軍費。計劃定了，孫先生就留一部份日本同志在香港，幫助陳少白、楊衢雲等辦事，自己就和宮崎坐了原船到上海往日本去了。這是惠州起義前的大概情形。

## 第二十二章 惠州起義

惠州革命發動了，孫先生回到日本準備一切，預定革命軍到達適當地點以後，就馬上前來指揮。不久，命平山周總領楊衢雲專在香港辦理財務，不必到內地；關於內地聯絡會黨等事，由鄒士良找人代辦，以專責成。那時很空黨漢口的事情，正在積極醞釀中，孫先生想兩方同時發難，使滿清政府、顧此失彼，窮於應付。因此回到日本沒有多久，就於八月卅一日到上海來，預備着手指揮長江一帶的會黨。這時平山周剛從香港到



門司，孫先生過門司時，約他一同到上海。不幸曹才常在漢口失敗的消息，當孫先生的輪船，到了上海的第二天就得到了，長江一帶正宣布戒嚴，孫先生祇得留在船上，不能登岸，因派平山周上岸奔走，代他傳達消息給各方面。第四日，九月三日，孫先生仍舊回到橫濱，同時派平山周趕赴香港催促陳少白、楊雲裳等即到台灣，準備發動，以待孫先生親來指揮。

這次惠州革命的發難地點，是在歸善縣和新安縣中間的三洲田，這裏靠近九龍，距離香港也祇有一天的水路，從東江出來，可以直達省城；有險要的高山，茂密的森林，迂迴的路徑，是用兵最好的地方。鄧士良率領了六百個英勇的同志，隱蔽在那裏，是隨時可以發動的。但六百人中祇有洋槍三百桿，子彈三千發，後來雖從附近清軍防營中秘密買到了槍械若干，但還是不夠用。因此孫先生最初主張暫時不要發動，鄧士良和黃福得到了命令，便嚴密戒備，等待機會發動。可是時候延長了，糧食發生恐慌，就派八十人留守大本營，其餘的散在附近鄉村。這樣又怕風聲走漏，於是把近鄉糧牧走進山寨的，都拘留起來，不許出去。因此謠言四起，都說三洲田有幾萬人馬，在那裏密謀造反。到舊歷閏八月上旬，粵督德壽據各方緊急報告，立派水師提督何長清抽撥新舊精勇及虎門防軍四千餘人，於初十日進駐深圳；陸路提督鄧萬林也率領惠州防軍填紮淡水、鎮隆，把三洲田的出路，緊緊的包圍起來，可是他們傳聞革命軍聲勢浩大，還不敢深入，祇得伺機回動。

這時，孫先生已經到了台灣，和平山周等在台北新起街，組織機關，兒玉源太郎派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代表與孫先生接洽。鄧士良在前方，已經把戰機迫切的情形報告，只等孫先生下命令，就可以發動。孫先生這時正在當地加聘軍官，因為會黨中人都沒有新式的軍事智識，所以必須要有富於軍事學識的人去訓練指揮。那時準備還沒有就緒，鄧士良的急電已經到了，孫先生在這緊張關頭，還是與鄧士良節電應付。但這個命令還沒有到三洲田大本營，何長清的水師二百人已移駐新安縣沙灣，並又從橫岡移回三洲田。士良為先發制人計，決於十五日，派統將黃福率領敢死隊八十人，夜襲沙灣。何軍猝不及防，一聽到革命軍來了，頓時張惶起來，交戰沒有多時，軍心大亂，傷亡無數，革命軍奪到了洋槍四十餘支，彈藥數箱，俘虜三十餘人，其餘的也

都東竄西逃。這是出乎預料的第一次勝利，革命軍的聲勢，立刻大振。士良趁着這勝利的餘威，想直攻新安，一口氣打到廣州；同時，新安和虎門同志汪恭喜等也集合了數千英勇的黨人，正待三洲田大軍一到，即可合攻新安城。那時，孫先生接到了勝利的消息，非常快樂，就一面電令鄭士良，要他改從海道，向廈門出發，以便親自前來指揮；一面急電宮崎，要他把預借的菲律賓軍械，立刻運來。並向兒玉接洽，就近接濟軍械，使人多械足。格外充實革命軍的力量。

鄭士良得到了命令，就把軍隊集中橫岡，改變計劃，取道東北，直向廈門進發，可是新安和虎門的軍隊因此不能會合了，在沙灣的軍隊，祇有六百個人，懂得軍事學識的沒有一半，因在平山、龍岡的中間，又召集了一千多人，軍械不夠分配，就拿戈矛替代補充，整列隊伍，浩浩蕩蕩地，從鏡陸前進。這時，何長清的水師，雖遭失敗，還有三千人，陳帥於淡水之上，陸軍鄧萬林也率兵千餘堵截要道。鄭士良率領大隊人馬，開到佛子坳時，清軍已扼險相守。鄭士良深怕寡不敵衆，祇有出奇制勝，分做三路進兵，派拿戈矛的在前面，拿軍械的分爲左右兩翼，趁敵軍不備，偷偷的爬到山上，兩面夾擊起來，敵軍頓時大起驚慌，沒有反抗的能力，紛紛潰散，士良親率領大隊，追趕上去，當場殺死守備嚴某，俘虜歸善縣丞兼管帶杜鳳梧，和敵兵數十人，奪到洋槍七百餘支，彈五萬發，馬十二匹。一時士氣大振，聲勢浩大，這是閩八月二十二日第二次的勝利。

這一次勝利以後，得到了一個很大的響應，就是博羅附近的梁慕光、江維善等，也率領千餘人，圍攻博羅縣城，另派一小隊進撲惠州府城，以分清軍的兵力。但狡黠的惠州知府沈傳義早把從博羅到惠州的浮橋截斷，又派壯勇二百人把守着。同時粵督也先後檄調提督馬維騏、劉邦盛、總兵黃金福、鄭潤琦、都司吳祥遠、莫善積等，各帶大兵前來救援，就在惠州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處，與革命軍接戰。革命軍因爲寡不敵衆，只得分作幾路，散到附近各鄉村去，惠州城的圍攻，終於沒有成功，於是清軍專以全力對付鄭士良的軍隊。

士良自佛子坳大勝以後，正向永湖進發，一路所向披靡，秋毫無犯。各地鄉民都燃放爆竹，興高采烈的歡迎革命軍。也有拿酒食來慰勞的，也有投身革命軍，一路跟去殺敵的，浩浩蕩蕩，聲勢非常雄壯。二十四日

到永湖時，人數已增加到五六千，但從永湖再前進時，走不到幾里路，就遇到了從淡水退回和惠州派來的大隊清軍；狹路相逢，便迎頭痛擊，清軍出其不意，又遭遇了一次大敗，紛紛向惠州、淡水、白芒花等處四散逃竄，鄧萬林中槍墮馬，也抱頭而逃。這次奪到敵軍洋槍有五六百支，彈藥數萬發，馬三十餘匹，又俘虜敵兵百餘人，叫他們都剪去辮髮，充作軍役。隨天晚上，又出發向白芒花追趕清軍，到達時天已明亮，却不見一個清軍的蹤跡。那裏的村民五六千人，看見了革命軍，都很踴躍的前來歡迎，並且也有很多投軍的，革命軍這時已增加到一萬左右的人了，在行軍的途中，不免感到一些困難。這是第三次的勝利。

從十五日發動，到第三次勝利，祇有七天工夫，竟三戰三勝，這確是出於意料的事情。士良到了白芒花，便再向廈門進發，一路不見敵人蹤跡，直到第十日，就是二十六日，到達崩崗圩，看見清軍已在對岸守着，士良便據高臨下，對準着清軍，展開了陣地戰，隔江對射，相持不下。到了晚上，趁夜色朦朧中，派了一個小隊偷襲清營，給敵軍一度打擊。第二天清晨，再以全力進攻，清軍便又大敗。這時革命軍的子彈已經不夠，無法追趕上去，因此轉向三多祝前進，在那裏整編隊伍，集中糧餉，準備再到梅林，這是發動後的第四次勝利。

在革命軍節節勝利的時候，清軍的不堪一擊，已經充分的暴露，滿清官吏，深恐有負皇恩，慌張極了。南海縣令裴景福就異想天開，想利用陳廷威和革命黨議和。陳廷威是第一次廣州起義時，孫先生要陳少白從上海去找來的，這次也派他在北江聯絡綠林，但他只是躲在家裏，捏造事實，虛報孫先生，是一個意志薄弱而貪生怕死的人，他知道滿清官吏要議和，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便和陳少白商量，但少白意志堅定，把他痛罵了一頓，他就快快而去。隨後又和楊衢雲商量，這一回他居然達到了心願，因為楊衢雲也極力主張停戰議和的，他們商量了以後，就和裴景福的代表植槐軒討論議和條件。孫先生在台灣，接到楊衢雲的報告，知道事情不妙，怕又鬧出像上一回廣州起事的亂子，就打了一個電報給陳少白說：「提防七指。」因為楊衢雲幼年時代曾經學過機匠，三個指頭被機器軋去了，所以叫他七指。第二天，又派了楊心如帶了一封長信給陳少白，說楊衢雲要求接納議和的事實，信末又附着這樣一句：「看畢即可燒去，以存忠厚。」少白看了，就把這數千字的

長信燒掉，這是革命黨的一個小小波折，孫先生又是很寬宏的饒恕了他。

但那時，最重要的還是在怎樣的接濟大批軍械到前方的革命軍。可是不幸的事實，連接的發生了，第一是當時從日本打來的電報，說中村彌六所購的軍律寶軍械都發壞，是一個巨大的騙案。第二是日本的政局，隨著惠州革命的進展而起重大的變化，從山縣內閣而變為伊藤內閣。伊藤博文對於中國的革命，却一反山縣的態度，他首先禁止兒玉幫助中國革命黨，並禁止軍械出口，也不許日本武官投助革命軍。因此孫先生所預定的計劃，到這時候全部失敗了！前方革命軍勝敗的關鍵，就在這一點，他不忍數萬健兒就此苦鬥犧牲，就急派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帶了幾個人，從香港經海豐而到革命軍的大本營，把這一切告訴了鄭士良。

這時，革命軍正在白沙準備向梅林前進，鄭士良從山田良政手中接到孫先生的傳令，原來是：

「政情急變，外援難期，即至廈門，亦無所得，軍中之事，請司令自決進止。」

這好像是一個晴天霹靂，全軍二萬餘人，聽到這個消息，立刻激起了無法抑止的悲壯慷慨的情緒，有的竟痛哭失聲，那壯烈的呼聲哭聲，幾乎震動了山谷和原野。現在一切都失望了，於是祇有回到三洲田大本營，以便從香港購取軍械，再會合新安和虎門的同志，進攻廣州，但當革命軍還沒有到達三洲田，經過橫崗時，何長清的小隊，已在前面阻擋，士良在這進退無路的時候，祇有揮着熱淚忍痛解散這二十天中患難相共的幾千個英雄同志，他自己就和黃福、黃耀庭等先後到香港來。山田良政因為不曉得路經，在這離亂中，從大隊裏落伍了下來，給清軍擄去殺害，這是日本同志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個人。

惠州革命是這樣的失敗了！但是當鄭士良在惠州苦戰的時候，史堅如在廣州曾經幾次發動響應，都沒有辦法，最後就決心謀炸廣東巡撫兼署總督的滿州人德壽。但結果只有炸去了撫署的圍牆數丈，德壽却一些沒有傷害，堅如雖心不死，竟大膽的回到撫署附近去夜驗，於是被清軍營勇截獲，在南海縣署就義。廣州的事情在惠州革命的風潮中也曇花一現的失敗了！史堅如年少英雄，竟隨着陸皓東做了為革命殉難的第二個健將，孫先生一想到這兩位先烈，就非常悲痛。這是惠州起義失敗經過的大概情形。

## 第二十三章 惠州失敗後的革命大勢

這次惠州起義的失敗，菲律賓軍械不能如期運到，可以說是一個最大的原因。孫先生因此在失敗後不久，就從台灣回到日本，把這事詳細查究。孫先生一到日本，才知道日本同志也正在一致的非難中村彌六，但孫先生爲息事甯人起見，祇要求大倉會社償還原價六萬五千元，以便轉交彭西，了却這一個責任。可是大倉會社因中村從中得利太多，祇答應拿出一萬二千五百元。這時犬養毅和遠藤諸人，也非常憤怒，一聽到大倉會社的話，就格外攻擊中村的見利忘義，同時又發現中村偽造的函件和印章等，中村的人格，更宣告破產。東京萬朝報把這一切欺詐的情形，都盡量的發表出來，事情愈弄愈糟了。犬養毅因中村是進步黨員，有闢全黨的名譽，就派人諷中村自行脫黨，但中村竟不肯，犬養毅就用總務委員的權力，把他開除黨籍。孫先生也因爲中村毫無誠意，請了兩個律師三善和梅井，想在法庭起訴。但後來經過詳細的研究，知道這事情與中、日、菲、德國國都有關係，牽連太多了，可以變成一個國際的極大交涉，不是一下子可以解決的。恰恰這時候，頭山滿出來調停，勸孫先生就收回中村的賠償一萬三千元，孫先生也就答應了，這一場很大的風波，就算了結。

這一個騙案草草了結了，孫先生因爲有事情，就派宮崎到上海去一下。宮崎在這案情中也是一個重要人物，他因爲發現受欺詐，也盡過許多奔走的義務。但他到上海以後，許多日本同志竟對他大不滿意，惡聲四起，甚至有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告訴孫先生。這大概是同志的誤會吧！孫先生也不想窮究這事情。就沒有什麼動作。不久，宮崎從上海回來，到橫濱去見孫先生。宮崎所辦的上海的事情，沒有什麼成績，孫先生也不責難，却把這信拿出來給宮崎，很溫和的說：

『你到上海去的幾天中，許多同志對於你有很多閒話。』說着隨手把信拿給宮崎看，接着又說：『你看了

這封信，不必動怒，古往今來的事情，都是成則爭功，敗則嫁罪；英雄的志氣，就像螺旋式的槍彈，要打破疑難的空氣而往前去，決不後退，所以你不能因此就失去向前的決心。」

宮崎出乎意料的讀到這一封攻擊他的信，但聽到孫先生這樣的一番話，也就心中爽然，再沒有像在佐渡丸中那樣的偏激的感情了，孫先生等他讀完了這封信，就拿來燒掉，笑着說：

「你胸中如果有一些不平靖的波動，就像這信一樣把它燒去了吧。」

宮崎很滿意的回到東京。犬養毅也爲了同志間對於宮崎有誤會，特邀集了許多日本同志，設宴調解，在歡樂的談會中，終於因爲內田良平的窮問，頭山滿又因事未到，無從解釋，宮崎和他就拔刀惡鬥，結果宮崎的額上受了傷，經過了十多天才痊愈。事後，宮崎悲憤交集，就寫了一封長信給孫先生，詳述這次解決菲律賓軍械案的經過。這是顯然的，他受了委屈後的訴苦，也可看出他對於孫先生慈祥偉大的氣度的感動的深刻。我們從他這一封長信中，却可以看出當時這案情的真相，也是一件無意中留下的革命史料。

當孫先生在日本交涉菲律賓軍械的時候，廣東都督德壽，已密奏滿清政府，通緝孫先生等，同時，因爲史堅如的事情，更注意到楊衢雲。但孫先生遠在日本，滿清政府是無可如何的；楊衢雲在香港，也不是廣東都督勢力所能到達的。隔了不多時，德壽就賄買了一個陳林，把楊衢雲在香港暗殺，這時楊衢雲正在學塾中授課。孫先生接到這個消息，非常悲痛，就於十二月七日在橫濱永樂樓開會追悼，當衆演說楊衢雲的生平事蹟，並發起募捐，以撫恤他的遺孀。同時又用了自己的名義，代發訃告，寄發各地同志。楊衢雲爲人好虛榮，意志薄弱，兩次起事，都出了亂子，但他畢竟也是最早發起革命的一個人，孫先生於公，固然不滿意他，於私是一個情深手足的同志，所以這樣的悲痛，這樣盡力爲他謀劃善後。那時革命黨人的情義，是何等的深厚親切啊！

從惠州失敗到楊衢雲的被刺，一個未盡的餘波，到這時暫告平息了。第二年，紀元前十一年（一九〇一年），滿清政府因爲義和團的變亂，引起八國聯軍的大禍，議和的事情，已經辦妥了，就是由滿清政府拿出賠款四

百五十兆兩；這是最惹起人民反對的一件事，因為亂事是由政府造成的，但這樣巨額的賠款，勢必須從人民的膏血中榨取。因此海內外志士，都感到滿清政府是失望了，就漸漸地傾向革命，對於孫先生也不像從前一樣的不敢接近了。那時，東京留學生的思想言論，都集中於革命問題，吳祿貞在留日學生會館演說，比會館爲美蘭我城的獨立廳；沈翔雲、戢翼堂、張溥泉等也發起創刊國民報，鼓吹民族主義。馮自由、馮斯傑、王寵惠等組織廣東獨立協會，孫先生也加以贊助。那時，漢口起事失敗而逃亡日本的人也很多，梁啟超還是在橫濱辦清議報，新民叢報，常常到孫先生這邊來談話，但議論始終不能接近。孫先生到東京時，就在對陽館做會客地點，去見孫先生的人，絡繹不絕，革命的空气，已籠罩了留日的學界。

時代不斷地前進，革命的思想終於取得了領導時代前進的主力。在這時代以前，因為國人由於傳統思想的支配，對人是崇拜士大夫階級，對政治則君臣之義，超於一切。因此當戊戌變法進行的時候，康有爲、梁啟超一流人物，在國內的聲望，居然高於孫先生。康有爲是出於所謂「以理學傳家」的家庭，且新由舉人得中進士，他的主張又是迎合了不忘君臣大義的士大夫階級的心理，因此取得了一時的領導地位。孫先生第一次廣州起義以後，國內人士，雖然因此有知道他的名字的，但是報紙上講到孫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點水作「汶」，形容他與強盜亂賊一樣。以爲這位姓孫的有什麼紅眉毛，綠眼睛，是最厲害的公道大王。一般帶着傳統的腐敗頭巾氣習的人，都以爲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經生文人，甚至疑心他不識字。（見吳稚暉先生著我第一講中山先生。）到了康梁變法失敗，孫先生在惠州第二次起義以後，他的身份，就大不相同了。粵督德壽對於史堅如和惠州之役發布的告示和奏摺，雖然在孫文的「文」字上，仍舊加上三點水作「汶」，却把孫先生和康梁並稱，什麼「無非因康梁孫汶各逆，從中煽惑」，什麼康孫各逆，勾結土匪。」把這次革命運動，也牽到保皇黨身上去，對於康梁未免冤屈了一點，但是把「礙眼隨紅眉毛」的孫先生，公然放在「帝師」一例，却承他過於抬舉了。

滿清政府對於孫先生的看法如此，留學界對於孫先生革命思想的接受，又是那麼深切而熱烈，孫先

在這時事實上也成了領導時代前進的唯一人物了。在這裏，我們可以把吳稚暉先生的一段紀載，寫在下面：

「那天他們已經約定鈕（揚生）先生，要邀我同到橫濱去看孫文。我雖不曾談成一跳，暗地裏吃驚不小，這時聽見孫文與梁啓超，都在橫濱上下其議論。我說：「梁啓超我還不想去看他，何況孫文。充其量，一個辜澤英雄，有什麼講頭呢？」他們二人（尚有程家樞）微笑而出，約我下午在淺草上野公園精養軒候他們回來，同吃晚餐。他們傍晚果然回來了，我馬上去問孫文的狀貌，是否像八蜡廟裏的大王爺爺，魁梧奇偉麼？鈕先生說：「你大大的弄錯了，一個溫文爾雅，氣象偉大的紳士。」程是已經來往得好久的，說道：「你不相信他是革命的領袖麼？」我說：與「梁啓超如何？」程搖頭道：「梁是書生沒有特別之處。」鈕厚說道：「你沒有看見，看見了一定出於你的意料之外。」其時鈕先生以書院有名的學者，被梁鼎汾所賞識，介入湖北陸軍學校，與後來申報主筆的陳冷血，梁所謂爲二難，亦受到張之洞看重。我就問他：「梁鼎汾是頑固人物，不必論，難道孫文就有張之洞的氣概麼？」他說：「張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問，孫文的氣概，我沒有見過第二個。你將來見了，就知道了。」於是我就倒有點尷尬，就把辜澤英雄的猜想，完全解除了。」（總理行館）

吳先生這段話，可以代表當時經生文人對於孫先生認識轉變的經過。他那時事實上已把孫先生看作洪秀全以上的人物，不久也成了一位很重要的革命同志。

、紀元前十年（一九〇三年）三月，章炳麟、秦鼎彝、周宏業等，發起在十九日明崇禎帝殉國的忌日，舉行亡國紀念會。這是最能表現民族主義的一種儀式。要求孫先生署名爲發起人，孫先生就立刻答應。但是不久清使蔡鈞就知道這事情，要求日本政府干涉，勸阻章炳麟等中止舉行。到十九日。東京上野精養軒的前面，已站滿了許許多多的留學生，這裏是預定的開會場所，他們都不知道日本政府的干涉，而從各方面趕來的，日本警察向他們一一勸阻，但已來的和繼續前來的，都不肯散去。這時候，孫先生率領了幾十個學僑從橫濱來，也是參加開會的，一見這情形，就急中生智，把開會改作聚餐，日本警察無可如何，只得紛紛退去。聚餐完



舉了，孫先生就急急回到橫濱，在永樂樓召集同志，補行開會。這一次事情，因為有章炳麟的一篇開會緣起，和孫先生的竭力提倡，對於留學界思想上，有很深刻的影響。

孫先生見東京的革命空氣，非常濃厚，可以不必親自鼓吹了，就想到別地方去，剛剛這時安南總督轄美（DUBOUCHÉ）託東京的法國公使轉請孫先生到河內去參觀博覽會，已經連接邀請了幾回，因此就在這年冬天，決定到安南去。轄美對於孫先生非常傾佩，這一次很懇切的邀請孫先生，是要對於中國革命有所貢獻。

孫先生於是在十二月初九日由日本搭日輪八幡丸到香港，這時香港五年放逐孫先生的時期早已滿了。孫先生就安然上岸，到上環永樂街中國日報社視察一番，就在社內三樓作寓所。住了一星期，就轉道西貢，往河內去了。這次孫先生到香港，香港政府雖沒有干涉，但孫先生離開了，就繼續下令禁止上岸，一直到民國成立時，才把這個命令撤消，所以這一次孫先生在香港，可說是民國未成立前最後的一次了！

孫先生這一次到西貢，雖是第二次了，但上一次匆匆的就走，並沒有認識什麼人，這次來自自然也沒有熟悉的人了，孫先生就祕密他的行蹤，不願把真姓名拿出來，化名爲杜嘉諾，充作美國某大報館的記者，到西貢來採訪新聞，但住了不多時，華僑李卓峯、曾錫用、馬培生等，不知怎樣的竟知道了孫先生的真名，就像獲得了珍寶似的，竭誠招待，並且都很慷慨的捐助鉅款。孫先生過了相當時候，就離開西貢到河內去。

這時，河內華僑中來了一位生客，他的名字叫做高逸生，住在火車站對面的一家中等旅店，深居簡出，不苟言笑，在莊嚴的面容上，帶着似有重大憂愁和不可告人的祕密的神密。這裏有一個老華僑黃陸生，是洋服店的老闆，有人看見這一位神秘的生客，就告訴了他。他雖是一個商人，却富於民族思想，對國家大事，尤其關心。他那時正同情於康梁一派的立憲運動，一聽到河內來了這樣一位生客，他激動的說着，這也許就是一位亡國的維新人物吧，這種熱心愛國的志士，是應當尊敬的，他就想法要和這位生客接近。這時正當舊曆新年，全埠的華僑，都依照祖國慣例，關舖休息，盡量快活的慶祝新年。陸生就趁這機會，請了幾個夥伴驅車訪問，

標聽這位高達生是不是康有爲一派的人。由旅店掌櫃的介紹，他才見到高達生，那掌櫃說：

「他是一個當地的殷實華僑，在埠上復有些面子，今天特來拜訪，想和先生出去逛逛。」

這位高先生對於華僑，是很喜歡接交的，和他閒談了一回，就同坐車到各處遊玩，大家談了一些很平常的事情，玩了一回，就到陸生的洋服店樓上開坐，漸漸的就談到國家大事。陸生極稱維新變政的好處，並以滿清政府沒有斷然採行，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但高先生却大不爲然，他說：

「那班主張維新的人，是最不澈底的，變政也不是最好的辦法，康有爲這些人結果一定會失敗，要希望他們來救國，是絕不可能的。」

這議論，使陸生嚇了一跳，實出了他意料之外。因他初意以爲高先生或即是康有爲，現在高先生却反對康有爲，這真是奇怪了。但他又不便問他不是康有爲，抑是另外一個人，或是高達生就是高達生。談完了話，陸生送高先生回到旅店以後，他整夜沒有釋去這個疑團，苦苦的想高達生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第二天，高達生回拜黃陸生，在洋服舖樓上，兩人痛快的談着，陸生從高先生犀利的辭鋒中，才恍然大悟，知道高達生不是康有爲，原來就是孫先生，高達生是僱名。他高興得不禁隨着孫先生的大笑，也笑得仰前倒後，緊緊地握着孫先生的手，說道：

「原來先生是中國革命黨領袖，我真相見恨晚。」

我們現在追敘孫先生剛到河內的情形。那時韜美因爲等不及孫先生的來，已請假回法國去了，他臨走的時候，託秘書長哈德安 H. Debande 代表接見，因此孫先生到河內以後，祇到了這一位哈德安，却沒有遇到韜美。高達生就是當時孫先生的化名，現在被黃陸生發現了。不久，龍州總督辦蘇元春不知怎樣的也知道了孫先生到河內的消息，就派了二個幹練的武弁來偵察他的舉動。孫先生看見這兩個武弁，跟在後面左右不離，早知道是滿清官吏派來的偵探，他就不慌不忙，和他們接近。一天，孫先生竟邀請這兩個武弁，二人知道孫先生已經察破他們的行徑，竟不敢牽起琴來，孫先生看出他們的心事，就把自己的杯箸和他們的

劉調，拿看酒杯說道：

「請吧！我生奉做事，光明磊落，決不會拿毒藥來害人的。」

三人聽了辭面相覷，孫先生就繼續說了許多關於革命意義的話，最後很鄭重的說：

「我們的革命，是漢人的一種天職，蘇元春也是漢人，如果明白我們的宗旨，應當早有獨立的決心，爲什麼在這天南一角，還擁戴着滿清政府呢？請你們把這個意思轉達貴督辦吧！」

被偵探的却窺破了偵探的行動，這兩個人一聽了孫先生的話，暗暗地驚歎。孫先生膽量見識的偉大，口上却訥訥地不能說什麼了。第二天就不看見這二人的蹤跡，早已回到龍州去報告了。

黃蔭生自發現了孫先生以後，他所認識的當地華僑如甄吉亭、甄璧、楊壽彭、張煥池、曾齊等，也都先知道了，他們於是一齊到孫先生的寓所來，要求加盟興中會，經過孫先生一番詳細的指示，不久就成立了興中會分會，但對外面仍不說出孫先生的真姓名。這次興中會在河內成立，可以說就是替四年以後鎮南關和防城、欽廉諸役預伏的種子，但當時孫先生也沒有想到會有這樣大的效果，這真是一個意外的收穫。這時候、陳少白在香港抱病，孫先生就要他到河內來，一面養病，一面幫助孫先生辦理事務。陳少白來了，用在日本時慣用的一個日本名字，叫做服部二郎，他就住在孫先生的旅館裏。不久，陳少白認識了幾個到河內來參觀博覽會的滿清官吏，他們也很同情革命，但孫先生始終不願把真相告訴他們。一天，其中二人來看陳少白，孫先生恐怕他們看破了，反有不便，就把帽子戴在額前，很鎮靜的出來，和他們周旋，少白也就問他們介紹道：「這一位是新加坡的華僑，是廣東人。」大家隨便談了一番就散去。陳少白住了十二天，就別孫先生先回香港。孫先生到第二年，紀元前九年（一九〇三年）六月光景，才回日本橫濱。

當孫先生旅居河內的時候，革命的風潮已從日本影響到國內，並且普遍的在發展起來了。如紀元前十年有洪全福、李紀堂等在廣州的起義，上海的蔡元培、章炳麟等也成立了中國教育會和愛國學社，收容南洋公學和南京陸師學堂等因學潮而退學的學生。紀元前九年，上海蘇報因爲介紹鄒容的革命軍一書，並發表章炳麟駁

康有爲政見書，引起了滿清政府和人民的交涉，正在會審公廨起訴。蘇報的主持人陳範、陳攝芬等都向日本逸來。因此孫先生一回了日本，留學生和亡命客都前來訪問，橫濱山下町的孫先生的寓所，頓時熱鬧異常。

那時，在日本留學界中有一個極困難的問題，就是駐日清公使會經向日本政府交涉，凡留學生抱革命思想的，一律撤消他的官費，禁止學習陸軍。當時中國學生肄業兵事的，只有振武學校，但入學資格以官費生爲限。這樣一來，同志中想把私費來學陸軍的，都無從問津。於是要求孫先生想辦法。孫先生對於軍事人材來是很注意的，就請日本同志日野少佐，在東京青山附近，籌備組織革命軍事學校。孫先生對於戰術，是很贊成最新式的南非洲波亞人的散兵戰術，日野也同樣的有研究，因此就拿這波亞戰術做教學的原則，定學期爲八月。爲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一切採取秘密主義，但第一期來學的祇有李錫濤、桂少偉等十四人。後來外面有些知道了，都說這軍事學校是東京的梁山泊，那時革命空氣的緊張，也就可見一斑了。

## 第二十四章 檀香山的論戰

這時期是孫先生從事革命運動最緊張的時期。他自紀元前十五年從倫敦脫險東歸以後，差不多前後六年，都在日本，到現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界的革命空氣已經普遍發展，孫先生於是決心再作環球遊歷，更擴大革命的宣傳。他第一步的計劃，還是先到檀香山島，再由此經美洲以達歐洲。在離日前，把東京的黨務，託馮自由辦理，那時廖仲愷夫婦、馬君武、胡毅生、黎仲實等，都已加入其中會，贊成革命，孫先生就他們物色同志。橫濱的家務，托山下町九番地法國郵船公司買辦黎煥輝代爲照料。一切安排妥當了，就坐了西比利亞（Siberia）號輪船往檀香山去了。

孫先生這一次到檀香山是在紀元前九年十月五日。這裏是他的第二故鄉，所以一到了還是住在茂宜島姑刺（Maui）的德彰公家裏，那時楊太夫人和盧夫人都在那裏，久別骨肉，一旦團聚，自有無限的快樂。但這

家庭的快樂，不能阻抑了他革命的興趣。他不留戀，不休息，又到了區去展開了艱苦的革命工作。

檀香山是興中會的發源地，孫先生自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一度到這裡，相隔七年的光景，現在的情形，就有些不同了。因為四年以前，梁啟超曾經得了孫先生的助力，到過這裏，他却背約失信，積極提倡保皇，迷惑了不少思想純潔的華僑，也誘騙了很多興中會會員，投到他們的旗幟之下。現在他們的機關報新中國報，正天天發表似是而非的謬論。幾位立場堅定的興中會會員，看到保皇黨勢力的日見發展，也都緘口結舌，不敢反抗，他們正期待着孫先生來領導搏戰。

孫先生對於這革命策源地的被人劫持，看得非常明白。他在這時期，曾經寫信給烏木山僧說：「彼黨狡詐非常，見今日革命風潮大盛，彼在此地，則以借名保皇，實則革命，在美湖竟自稱其保皇黨為革命黨矣。欺人實甚矣。旅外華人，真偽莫辨，多受其惑。」他又檢討過去沒有注意到這裏保皇黨活動的錯誤，在這信上痛切的說：「向來專心致力於興師一事，未暇謀及海外之運動，遂使保皇縱橫如此，亦嘗有不能辭也！」因此孫先生這次重來檀香山的主要工作，就是肅清保皇黨的勢力，鞏固革命黨的基礎，盡力掃除此毒，以一民心。」對保皇黨的鬥爭工作開始進行了，孫先生採取了多方面的方式，他首先用言辭來激動人心，因此在荷梯爾街（Hotel Street）戲院和利霞街（Jillibria Street）的華人戲院作大規模的演說。十二月二十四日檀埠西字早報（Honolulu English Press）有這樣一段記載：

「昨天下午，著名革命家在荷梯爾街戲院，很勇敢的向大眾說道：「革命是拯救在國際現狀下處很危險地位的中國的唯一法門，希望華僑盡量的贊助革命黨。」許多華僑很靜心的聽着，都表示接受的熱誠。這位革命家身穿很樸實的衣服，頭上留着很短的頭髮，很像一個小呂宋人。他的言論舉動，顯然有一種感化人羣的力量，加以態度溫和，秩序整肅，他原是一個天生成的大領袖。他說：「中國最早提倡革命的，就是湯武，因為他是伐罪弔民，所以現在還稱他是聖人。現在我們爲什麼要革命，因爲最近北方的義和團事情中，已經充分的暴露了滿清政府的弱點；二萬個外國軍隊，竟打破了北京城，要是我們四萬萬人一齊

起來就可以把他們推倒。我們的目的，是在建立民國，到革命成功了，就效法美國，選舉大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

孫先生演說的天才和力量，本來是很顯著的，林白克曾經描寫一次孫先生演說的情形，非常生動，他說：

「有一次孫先生演說，環聚而聽的很多，中國人外國人都有。在一個大廳裏面，聲音恐怕很不容易傳達，到四處罷。孫先生說了幾句開場話之後，向前面走幾步，聽衆掌聲雷動。他靜默了一下，再前進一步，掌聲又起，夾雜一片歡呼聲。他等了一等。將手舉起，聽衆肅然，寂靜無聲。孫先生仍舉手靜默，屹立不動，乃開始演詞。他演說時差不多換了一個樣子，聽衆響亮的聲音，中人如有電力。他的話句句是真實的，個個字是迅疾，準確，鋒利，像一枝機關槍，只聽得嗒嗒嗒的聲音，高，下，疾，徐，如合音節；演詞平穩如流水，終尾很清楚，戛然而止，他依舊靜立在講廳迴聲的中間，而他的話已深入聽衆的腦筋裏了。歡呼和鼓掌聲又起，但是孫先生像立在海岸上，看海裏的波浪，他再舉手，喧鬧的大衆又靜下來；他又雄辯滔滔地講了一回；於是——停頓，呼聲又起。這時孫先生一口氣差不多說五百字。」(Linsbarger, Paul M. Sun yet sen and the China Revolution)

孫先生公開演說先後舉行了幾次，每次一連二三天，聽衆多至千餘人，真是唇焦舌敝，不辭勞瘁。他爲要糾正陷溺在保皇黨欺蒙之下的聽衆，每次演說終了以後，總是站在演說台上很久，對着聽衆說：「聽了我的話，如果有疑問的，就請提出來討論。」因此有許多把革命和保皇的意義分別不清的，都紛紛起來請求解釋，孫先生不假思索，一個個都很滿意的答覆了他們，於是有不少的人，都走出了保皇黨的迷途，重歸革命的大道。希爐(Hilo)埠的華僑，甚至自動的歡迎孫先生到那邊去演說，隨着成立與中會分會。檀島的革命空氣，從此又活躍起來了。

孫先生不久又把一家原有同情革命的報紙，名「隆記日報」，改組充實起來，作爲文字鬥爭的疆地，這時

康有爲正在加拿大等處發展保皇黨，大發活動，哄騙華僑，到處捐款。又發表了一篇「最近政見書」，勸告華僑擁護保皇，排斥革命。他聽到檀香山的情形，就大罵新中國報陳繼儼（儀侃）等無用，爲什麼讓孫先生倡言革命，不加阻礙，保皇黨黨員，竟拱手把黨員送給革命黨。陳繼儼等因此在紙報上更肆言詆毀革命，嘲罵孫先生，甚至公然大言：孫先生在檀島不宜多事。孫先生認定保皇黨的氣餒高漲一分，革命運動的前途，就多一分困難，因此不得不把保皇黨的陰謀，康梁的爲人，向華僑宣布，在陸記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敬告同鄉書，最重要的話是這樣：

「夫康梁一以進士，一以舉人，而蒙清帝載活（即光緒）特達之知，非常之寵，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維新，言聽計從，事雖不成，而康梁從此大名已雷動天下。此誰爲爲之，孰令致之？非光緒之恩，曷克臻此？今二子之遭逐外國而倡保皇會也，其感恩圖報之未遑，豈尙有他哉？若果有如公等之所信，彼名爲保皇而實行革命，則康梁者，尙得處於人類乎？直禽獸不若也。故保皇無毫釐之假借，可無勉義矣。如其不信，則請觀康有爲所著之最近政見書；此書乃康有爲勸南洋、美洲華商，不可行革命，不可說革命，不可思革命，只可死心踏地以圖保皇立憲，而延長滿洲人之國命，續長我漢人之身契。公等何不一察實情，而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以己之欲，推人之欲，而妄誣康梁一至於此耶？或曰：言借名保皇而行革命者，實明明出於梁君趨之口，是何得誣？曰：然，然而不然也。梁之言果真誠無僞耶？而何以梁君門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視梁君爲敵爲漢仇耶？梁爲保皇會中之運動領袖，閱歷頗深，世情諳悉；目擊近日人心之趨向，風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覺爲革命之氣所動盪，偶爾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叢報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壞，忽言愛國種之過於恩光緒，忽言愛真理之過於康有爲者，是猶子病人之偶發囁語耳，非真有反清歸漢去暗投明之實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氣者也，康既刻心寫服以表白其保皇之非僞，而梁未與之決絕，未與之分離，則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與保皇理不相容，勢不兩立，今梁以一人而待二說，首鼠兩端；其所言革命屬真，則保皇之說必僞；而其所言保皇屬真，

，則革命之說亦僞矣。」

這是把革命與保皇的濛濛判別得很清楚，康梁的心事也說得非常透闢，因此華僑讀了這篇文章，大家都很感奮，保皇派却大起恐慌，陳繼儼就在新中國報上也發表了一篇敬告保皇會同志書，是針對着孫先生的敬告同鄉書，大發議論，他同時提出了許多關於民主革命的問題，如革命可以召瓜分，因為那時列強瓜分中國空氣非常濃厚，保皇派的人都拿這個題目來非難革命。他又說中國實行民治的人民自由民權問題，又說到立憲的秩序問題。這些似是而非的議論，却挑起了孫先生筆戰的興趣，於是在隆記日報上繼續發表了一篇駁保皇報，對於這新中國報的主筆下一個嚴重的駁斥。現在我們把這文章對於上面三個問題的駁覆分錄如下：關於第一個問題，孫先生說：

「彼又曰：『中國之瓜分，在於旦夕，外人窺伺，乘間即發，各國指認之地，照會政府不得讓與別人』云云，曾不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無振作也，人民不奮發也。政府若有振作，則強橫如俄羅斯，殘暴如土耳其，外人不致側目也；人民能奮發，則微小如巴拿拿（今譯巴拿馬），激烈如蘇威亞，列強向之承認也。蓋今日國際，惟有勢力強權，不講道德仁義也。滿清政府今日已矣；要害之區盡矣，發祥之地已亡；浸而日削百里，月失數城，終歲於盡而已。尙有一線生機之可望者，惟人民之發奮耳。若人心日辟，發奮爲難，大舉革命，一起而倒此殘腐將死之滿清政府，則列國方欽我敬我之不暇，尙有窺伺瓜分之事哉。既認引管子之作內政，以寄軍令，何以偏阻漢人行革命覆祖邦？今日之作內政，從何下手？必先驅除帝制，復我政權，始能克免其今日簽一約割山東，明日押一款賣兩廣也。彼滿清政府，不特簽約以割我賣我也，且爲外國不靖地方，然後送之；廣東之新安縣、廣州灣已然之事也。倘無滿清之政府，爲之助傑虐虐，吾民猶得便宜行事，可以拚一死以殉吾之桑梓。彼外國知吾民之不易與，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則彼雖貪欲無厭，猶有戒心也。今有滿清政府爲之鷹犬，則彼外國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攜之便矣。故欲免瓜分，必非先倒滿清政府，則無挽救之法也。」



關於第二個實行民治的人民自由民權和法律的問題，孫先生說：

「彼又會謂中國人無自由民權之性質，僕會力斥其謬，引中國鄉族之自治，如自行斷訟，自行保衛，自行教育，自行修理道路等事，雖不及今日西政之美，然可證中國人稟有民權性質也。又如中國之民，向來不受政府之干涉，來往自如，出入不問；婚姻生死，不報於官；戶口門牌，鮮註於冊；甚至兩鄉械鬥，爲所欲爲，此本於自由性質也。彼又反唇相譏曰：「此野蠻之自由，非文明之自由也。」此又何待彼言。僕既云性質矣；夫天生自然謂之「性」，純樸不文謂之「質」；有此野蠻之自由，則便有自由性質也，何得謂無。夫性質與事體異；發現於外，謂之事體，稟賦於中謂之性質。中國民權自由之事體，未及西國之有條不紊，界限森然，然何得概謂之無自由民權性質乎？惟中國今日富於如此野蠻之自由，則他日容易變爲文明之自由；倘無此性質，何由而變，是猶琢玉，必有其玉質，乃能琢成玉器；若無其質，雖琢無成也。彼又曰：「中國人民富於服從權勢之性質，而非富於服從法律之性質。」試問無權勢可以行法律乎？今如檀島，若政府無權勢以拘禁處罰於犯法之人，其法律尙成爲法律乎？夫法律者，治之體也，權勢者，治之用也，體用相因，不相判也。今該主筆強別服從法律與服從權勢而爲二事，是可知彼於政治之學，毫無所知也。」

這一段辯論的要點，是在革命後能否實行民治的一點，孫先生是承認人民有能力可以建立民國的，但保皇派却主張先君主立憲，然後過渡到民主立憲，這是他們最巧妙的主張，因此關於立憲的問題，孫先生有很嚴正的一段話，就是說：

「彼又曰：「立憲者過渡之時代也，共和者最後之結果也」。此又可見彼不知立憲爲何物，牽強附會也。夫憲法者，西語曰 Constitution 乃一定不易之常經，非革命不能改也。過渡者，西語曰 Transition 乃變更之謂也。此二名辭皆從西文譯出，中國無此成語也。該主筆強不知以爲知，而妄曰 Constitution Transition 時代，一何可笑也！推彼之語，必當先經立憲君主而後可成立憲民主，乃合進化之次序也。」

而不知天下之事，其爲被天荒者則然耳；若世間已有其事，且行之已收大效者，則我可以取法而爲後來居上也。試觀中國尙未有火車，近日始興建，皆取最新之式者。若照彼之意，則中國今日爲火車萌芽之時代，當用英美數十年前之舊物，然後漸漸更換新物，至最終之結果，乃可用今日之新式火車，方合進化之次序也。世上有如是之理乎？人間有如是之愚乎？今彼以君主立憲爲過渡之時代，以民主立憲爲最終之結果，是要行二次之破壞，而始得至於民主之域也，以其行二次，如何行一次之爲使耶？夫破壞者，非得已之舉也，一次已嫌其多矣，又何必故意以行二次。夫今日專制之時代也，必先破壞此專制，乃得行君主或民主之立憲也，既有力以破壞之，則君主民主隨我所擇。如過渡焉，以其滯乎中流，何不一掉而登彼岸，爲一勞永逸之計也。使該主筆若不知民主爲最終之結果，其倡言君主立憲猶可說也。若乃既爲美政，而又認爲最終之結果，胡爲如此矯強支離，多端辨難。粵勿以此事雖善，誠爲救中國之良劑，但其始不倡於吾師，其終亦不成於吾手，天下上等之事，必不讓他人爲之，故必竭力阻之以致不成而後已！是重私心而忘公義也。」

這是孫先生討論實際政治的最早的文章，詞嚴義正，保皇報無話可答。後來民報和新民叢報的筆戰，根本理論，也都依據了。孫先生這篇文章，所以也可說這是革命論與君憲論筆戰的綱領，是很重要的一段史實。保皇黨在檳島的勢力，從此遭受了嚴重的打擊。但孫先生爲要爭取會黨的力量，擴張革命的聲勢，和鞏固革命的基本起見，更親身加入致公堂。這致公堂就是洪門的一種組織。洪門本來是三合會，哥老會的支流，在美洲的華僑，都是這組織中的人，致公堂便是他們組織的名稱。保皇黨在美洲，不但誘騙與中會會員，並且混淆了致公堂，把持一切。致公堂一日爲保皇黨所把持，革命黨便一日無法發動華僑參加革命，所以孫先生加入致公堂，就是要使華僑從保皇黨的欺蒙之下挽回過來，加強革命的力量，這意義是非常遠大的。紀元前十六年孫先生到美洲時，已遇到了很多洪門的人，但他們因爲孫先生是「風仔」（洪門稱非同道者爲風仔），所以不能發生感情，對革命活動的進行，受了很大影響。這次孫先生看出了這個根本原因，便毅然加

入他們的組織。介紹的就是楊文納，致公堂職員中的保皇黨徒知道了這個消息，就極力破壞，有一位洪門叔父（洪門稱前輩爲叔父）鍾水養挺身而出，對他們說：『洪門宗旨，在於反清復明，孫君未入洪門，已實行洪門宗旨多年，此等人應招納之不暇，何可拒之門外？』這些反對派就無話可答。致公堂於是擇日爲孫先生演特別開台戲（洪門稱拜盟曰演戲）。同時拜盟者六十餘人，當場由主盟員某大佬封孫先生爲洪棍。洪門軍職，例分洪棍，紙扇，草鞋三級。洪棍就是元帥的別名。他們又稱介紹人爲舅父，因此有人說楊文納是孫先生的舅父，乃由洪門關係而來的。但最巧的，孫先生的太夫人，也是姓楊。

保皇黨既無法破壞，孫先生加入洪門，就到處散播謠言，說革命黨的聯絡會黨，是出於一時的利用。孫先生又對他們痛罵一番，他說：『不知革命與洪門志同道合，聲應氣求，合力舉義，實有應盡，非同利用，如彼等欲暗改洪門之宗旨，而令洪門之人，以助其保救大清皇帝也。』

## 第二十五章 重遊美洲

孫先生在檀香山經過了這種種奮鬥，把保皇黨打得落花流水，奪回了革命發源地的地盤，工作已算告一段落，於是準備到美洲去，繼續進行鬥爭。因爲致公堂總機關是在三藩市，所以孫先生這次重遊美洲，他的任務是很大的。楊文納在這時，又向孫先生建議，他說這次孫先生在檀香山和保皇黨大鬧家戰，他們難免被嫌報復，運動美國關員阻礙他登岸，因此主張設法取得一張夏威夷的出生證明書，以備不虞。孫先生對於這個建議，躊躇了很久，經楊文納一再慫恿才答應。於是由德彰公託了幾位老年的同鄉，向茂宜島當局代爲證明，取得了一張正式文件。當時德彰公所經營的牧場，因爲夏威夷政府修改土地法，取消私有制度，大受損失，已經沒有從前的富裕，故於孫先生遊美的旅費，不能多所供給，祇送了一枝很珍貴的龍涎香，以備孫先生途中萬一發生經濟困難，可以變價補充，他們手足之間的感情，何等真摯而深切。

這大概是在紀元前八年的春天，孫先生已決定到美洲去，在臨行前的幾天，預備在檀島作最後一次的演講，講台則大書特書：『孫逸仙博士演講革命。』這一天剛巧有一個滿清皇叔到美國去參觀聖路易博覽會（St. Louis Exposition），經過檀香山，檀島的一部份僑商，設筵歡迎他，孫先生就臨時停止演講，也參加歡迎宴會，這確是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有一個華僑就很率真的問孫先生：

『先生不是排滿的革命家麼？爲什麼也參加歡迎皇叔的宴會？』

『我何曾有歡迎的意思，我到這裏來是要認識這個所謂皇叔的面目而已。』孫先生帶着很和藹的笑容回答他。

隔了幾天，已是三月三十一日，孫先生就搭高麗（Korea）號郵輪從檀香山到三藩市去，一個小小的波折就發生了。

這事情不出楊文納的預料。檀香山保皇黨陳繼儼等探悉孫先生赴美有期，他們就通知三藩市的同黨，設法阻止孫先生入境，以爲黨爭的報復。三藩市的保皇黨人得到了這個通知，立刻向滿清政府領事何祐報告。何祐認爲這是向他主子邀功的好機會，於是照會美海關，謂有中國亂黨孫某將於某日搭某船抵美，請禁阻其入境，以至美清二國邦交等語。保皇黨的詭計居然收了相當效果，因此當孫先生坐的高麗號郵船到達三藩市時，就有幾個團員登輪查驗旅客護照。他們看見了孫先生的名字，立刻說道：『這個人是中國亂黨，應該暫時留在船上，聽候訊問，不准登岸。』

孫先生眼睜着許多旅客，一個個很愉快的到達了目的地，他却和幾個無辜的同胞，不幸的留在船上，從海港中遙望着巍峨的三藩市，不免悵悵若失。但團員并不向孫先生故意爲難，當他發現他的護照，是一張夏威夷的出生證明書以後，他們就通知何祐，準備允許他上岸。因爲夏威夷是美國的屬地，依照美國法律，不得阻止入境。可是這萬惡的何祐却極力說明孫先生是在廣東香山縣生長的，他的出生證明書，一定是偽造的，仍請美海關禁阻入境。於是孫先生又延長了他在船上困居的時間。這船上的水手，有很多是惠州的洪門會員，他

們知道了。孫先生被迫困居的消息，都來慰問致敬，並且送了很多食品，因此孫先生也不覺得什麼痛苦，祇有靜候訊問。

不久，美海關竟把孫先生送進了碼頭上的木屋，使孫先生和陸上的朋友，都隔絕了消息，這便陷入了最苦悶的境狀，隨着經移民局訊問以後，竟判令出境，候原船撥回檀島。這是孫先生倫敦蒙難以後，又是失去了自由的一次，他內心是如何的焦急呢？正在徬徨無計的時候，他在羈留的同伴所看的中西日報上，突然發現總理伍盤照三字，機警的孫先生就得了一條光明大道。因為他從模糊的回憶中，記起了這位伍先生是一個著名的基督教學者，向來從事傳教及辦報事業，蜚聲於時。八年以前，孫先生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亡命出國時，廣東的教友在斗山、楊渡甫二人早會替他寫了一封介紹信，現在還放在竹篋中，沒有用過。他正這困窮時，正需要這位熱心的教友來營救，於是立刻寫了一封信，要求一個賣報的美國小孩子，送到沙加緬都街中西日報社。

中西日報是伍盤照經營的一種事業，他另外又兼充領事館顧問的職務，何祐如有重要對外事件發生，多同他諮詢辦理。那次，他忽然接到了孫先生這封信，拆開一看，祇有這樣幾個字：

「現被移民局批撥出境，請即來木屋相見！」

他平時對孫先生早已久仰大名，知道這一宛是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因此立刻得到了移民局的准許，趕到碼頭上的木屋裏去晉謁孫先生。相見之下，握手甚歡。孫先生把被迫困居，判令出境的經過，告訴了他，並且說：「現距十日上訴的限期，已很迫促，請各教友竭力援助。」伍盤照很熱心的答應了。孫先生的要求。臨行時，孫先生又拿出當年左楊二人的介紹信，交他帶回，因為這信上同時又介紹了一位司徒達南牧師。伍盤照回去以後，就找司徒達南和其他許多教友，交他帶回，因為這信上同時又介紹了一位司徒達南牧師。伍盤照回去以後，就找司徒達南和其他許多教友，籌商營救的方法。他們知道孫先生已經加入洪門，準備通知致公堂，請其出面向華盛頓工商部上訴。伍盤照為防備何領事老羞成怒，稟請公使，橫加阻力，於是先向他警告一番。狡猾的何祐，起先不敢公然承認這是他受人囑託而幹的事情，他說這是奉了滿清政府命令的。伍盤

照對他說：「孫先生是革命黨，不能指爲亂賊。現在很多同鄉人，已經決定向美政府請訴，你如稟報公使，必將激動衆怒！」他聽了這個嚴正的警告，於是答應小心行事，不敢再搗亂了。

伍盤照阻止了何祐的搗亂以後，又去訪問致公堂英文書記唐瓊昌，把孫先生被阻入境羈留木屋的經過，盡情的說了出來。那時三藩市致公堂本爲全美各埠洪門的總機關，但以代遠年湮，大多數已經忘了反清復明的本來面目，並且也有身跨保皇黨的。祇有總堂大佬（主席員之稱）黃三德和這位唐瓊昌，平日熱心革命，尤欽佩孫先生的爲人。他們聽到了這個消息，大爲憤激。唐瓊昌就陪着伍盤照去找他們的法律顧問美律師那文，請他依法相助。並且又約幾位同志到木屋去慰問孫先生。孤立無援尙在被困中的孫先生，到這時才得到這許多義深情重的同志的援助。

他們援助工作的進行，首先由那文向移民局聲明，即向美政府工商部上訴，並依照移民法例，得以五百元保證金，保釋候判。那時五百元保證金同籌措，也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最後由致公堂以士波福街的一座大樓的產業，向一家保險公司共保，才担保孫先生出外，聽候美京判決。

孫先生從木屋出來的那一天，致公堂的職員和基督教中的有志者，都到碼頭上去歡迎。在木屋中幽居三星期，孫先生，於是在熱烈的歡迎聲中，踏上了美國之門。

孫先生這次入美羈留木屋的事情，實爲我國一件恥辱的事情；因爲在這裏反映了當時我們的國際地位。孫先生曾經說起這件事，也很痛心，他說：

「記得到美國上岸的時候，無論所坐的船位是那一等，美國人便來盤問你是中國人呀，是日本人呢？如果是日本人，便可自由上岸；如果是中國人，便要入關（按即木屋）檢查，必須麻煩好幾日，始可自由上岸。兄弟有一次到美國，在關內住過三星期。但我還是很儼倖的；有不幸的，甚至空花旅費光陰和所受檢查的種種痛苦，見到美國而不能上岸，由原船送回中國。……就是像從前舊金山的大旅館，也不許我們住。上海從前的外國公園，也寫出招牌說：「狗同中國人不准入。像這樣一想，便知道中國人民在世界上

是甚麼地位？」（民國十二年十月對全國青年聯合會演說）

當時美國海關的法律，對於國際地位低落的國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無可諱言的是一種特別奇例，再加上保皇黨和滿清官吏的搗亂，使孫先生重陷於困苦的環境，浪費了二十多天寶貴的時間。當孫先生寫信給親戚照求救的時候，他身上已一個零錢都沒有，他無法酬報送信的那個賣報小孩，祇得相信封上註明由伍鑑照付給。他那時情況的窘迫，由此可見。

孫先生從木屋出來以後，洪門同志，一致歡迎。因為照他們的慣例，誰起兵抗清的，誰就是大哥，孫先生既已加入他們的團體，當然是一個大哥，因此也就受到了這種特殊的歡迎，和紀元前十六年到美洲時的情形，大不相同。隔了幾天，美工商部的判決文也送到了，這判決的內容是：「孫某既持有夏威夷出生證書，當然取得美國公民所享受之居留權利，絕無可以撥送出境之理由。」於是清領事及保皇黨徒中傷計劃，粉碎無餘，孫先生在美國，可以自由活動了。

現在三藩市的聖瑪利公園中，已經建立了孫先生巍峨的銅像，四十多年前，這個小小的波折，也許還留在若干年老的中美人士的腦海，但由於我們國際地位的增高，和中美邦交的進步，這一段故事，會變成了講述中華民國 國父歷史時一個最有趣味的資料。

我們回過頭來說本題，那時保皇黨在三藩市還是有相當勢力，致公堂機關報大同日報，就由康有為的門人歐陽甲把持。他看到洪門同志這樣熱烈招待孫先生，不免眼紅，於是天天發表排斥孫先生的言論。黃三德、唐瑞昌等，忍無可忍，立刻把他停職，請孫先生另薦同志担任主筆，孫先生因託馮自由轉薦劉成禺，從此大同日報的論調，完全改變，洪門的宗旨，大昌於粵美。中西日報也要求孫先生代聘駐香港的探訪員，孫先生就推薦了陳少白、鄭寶公二人担任。他們更以無代價翻印鄒容革命軍一萬餘冊，致公堂担任了寄書的郵費，向各埠大量分發，全美華僑得此有宣傳品的啓導，不及半年，風氣爲之大開。

孫先生又得黃伍諸人之助，假士作順街長老會正道會所，開救國會議，說明革命主義的大要，並募購草

命軍需債券，及徵求與中會會員。到會的大多數是基督教徒，他們對於購券，十分贊成，但要他們加入與中會，却未免畏縮，結果認購債券共有美金二千七百餘元，正式宣誓加盟者祇有鄺華汰一人。後來鄺華汰又到下其利埠募得一千三百餘元。這次對擴張與中會會務，可以說並沒有多大成功，但已經建立了相當基礎。六年以後，孫先生重來這裏的時候，爲發動廣州起義而募款，就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艱苦的革命工作，是從一點一滴的奮鬥中，繼續不斷地成長起來。孫先生又從各方面觀察，覺得致公堂各埠分埠對於總堂的聯繫不夠，這個有歷史性的團體，已有組織散漫，精神鬆懈的趨勢。這種情形，對於保皇黨，而不利於革命黨。因爲革命黨和保皇黨對華僑羣衆的態度，是剛剛相反的：革命黨需要華僑嚴密的組織起來，以自覺的精神來實行固有的反清的民族革命的任務；保皇黨則不然，他們害怕華僑民族意識的覺醒，害怕華僑的組織力量，但他們又不能不利用華僑。因此當時美洲華僑那種散漫的形勢，正十分便於保皇黨的利用。孫先生針對着這一點，因此發起洪門總註冊。洪門總註冊的意義，就是把華僑會黨的力量統一組織起來，華僑的組織愈嚴密，愈強化，保皇黨的欺騙和蒙蔽，便無所施其技了。致公堂的職員，對於孫先生的提議，都一致贊成，註冊工作就很順利的開展起來。在這期間，孫先生特親自訂定了一個「致公堂重訂新章。」這新章的唯一意義，就是把華僑原有組織的舊瓶，裝進了革命思想的新酒。換句話說，就是把致公堂變爲一個激進的革命團體，把華僑舊會黨的力量變爲一枝洪大的革命力量。

新章分爲『要義』和『條款』兩部份。在『要義』裏，首先揭出了致公堂原是民族革命的組織，但因內部散漫，宗旨漸忘，遂爲保皇黨所利用，而走入歧途，唯一補救的辦法，只有重新團結起來：「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興復復仇之志，聯閩結義，聲應氣求，民族主義賴之而昌，秘密社會因之日盛，早已遍布於十八省與及五洲各國，凡華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國爲隆盛，蓋居於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結合聯盟，皆無所禁，此洪門之發達，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舊，每多不合時宜，維持乏人，間有未懷兼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聯絡一氣，以成一極強極大之團體，誠爲憾事！近且有背盟負義，趨入



歧途，倒戈相向者，則更痛恨也！若不亟圖振作，發奮有為，則洪門大義必將淪廢矣。有心人憂之，於是謀議改良，力圖進步，重訂新章，選舉賢能，以整頓黨務，而維繫人心。夫力分則弱，力合則強，衆志可以成城，此合黨團體之貴也。我黨同人在美國者，不下數萬餘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爲謀，無所統一，故在平時則消息少通，有事則呼應不靈，以此之故，爲外人所輕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維持業務所宜急也。」

其次，便提出致公堂當前所應負起的三個重大任務：第一是：『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捍禦禍害，憫恤同人；』第二是『聯合大衆，團集大力，以圖光復祖國，拯救同胞；』第三是：『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先濟內奸而後除異種。』第一種是互助的任務；也就其致公堂會員彼此之間的任務；第二種是排滿的任務；第三種是肅清保皇黨的任務。第二三兩種是致公堂華僑對國家民族的任務，也就是應負起的當前民族革命的任務。關於第二種任務，『要義』裏說：『當今爲爭競生存之時代，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爲心，五洲土地已盡爲白種所併吞，今所存者，僅亞東之日本與清國耳。而清國則世人已目之爲病夫矣，其國勢積弱，疆宇日蹙，今滿洲爲其祖宗肇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猶不能自保，而謂其能長有我中國乎？此必無之理也。我漢族四萬萬人豈甘長受滿人之羈勒乎？今之時代，不競爭則無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滅亡也；惟競爭始能獨立，此美國、日本之所以興也。當此清運已終之時，正漢人光復之候，近來各省風潮日漲，革命志士日多，則天意人心之所向，吾黨以順天行道爲念，今當應時而作，不可失此千載一時之機也。』

關於第三種任務，『要義』裏說：『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餘有之也，因有漢奸爲虎作倀，殘同胞而媚異族，始有英二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曹國藩、左宗棠以爲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專尊滿人而抑漢族，假公濟私，驅財肥己，官爵也，銀行也，鐵路也，鐵路也，商務也，舉堂也，皆所以餌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隱，不肯附和，遂大觸彼黨之忌，今值本堂舉行聯絡之初，彼便百端誣謗，含血噴人，蓋悉本黨聯絡一成，則彼黨自然瓦解，而其所奉爲

君父之滿賊，亦必然覆滅，則彼漢奸滿奴之職，無王可伏也。其喪心病狂，罪大惡極，可盛誅哉？凡我漢族同胞，非食其肉，寢其皮，何以伸此公憤，而挫此敗類也？本堂雖疲弱，亦必當仁不讓，不使此謬種流傳，遺害於漢族也。」

在「條款」裏，則不特揭出反滿反漢奸的任務，而且揭出了三民主義的革命任務：

- 一、本堂以驅除殘虐，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
- 二、本堂以協力勸成祖國同志履行宗旨爲目的。
- 三、凡國人所立各政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爲益友，互相提攜；其宗旨與本堂相反者，本堂當視爲公敵，不得附和。

這條款中經舉的四大宗旨，就是後日同盟會的四大綱領，是孫先生自三民主義思想的形處，到革命綱領的確立，最早的具體表現。

新章經致公堂大會通過後，即公推孫先生和繼堂大德、黃三德遍遊全美各埠，鼓吹洪門革命。擇保皇黨。經過一個多月的奔走，周遊美國南北數十城市，然後到了紐約。孫先生於六月十六日，曾從加利福尼亞省途中，寫信給東京的島田山階，可以看出他此時的收穫。這信說：

「弟近在苦戰之中，以圖滿蒙在美屬之保（皇）黨。（孫黨）已到這位，大處俱備得手。今擬遍遊美、法、荷、華人之處，次第播之。大約三四個月後，當可成功。保（皇）黨當梁賊三此之時，頗爲興盛，今已漸漸冷淡矣，播之原爲不難。惟是當始之初，而保（皇）黨不無多少反動之力，因此有一二廢徒，極恐彼黨一散，則於彼個人之利益，大有損失，故極力阻撓生事，以阻吾人之前途，所幸此則洪門之勢力極大，舉散漫不聚，今已與各大佬商妥，設法先行聯絡各地洪家，成爲一氣，然後可以再圖其他也。故現時正在奇貨不齊之秋，尙無從爲力，以策圖國內及日本之局面也。大約數月之後，當有轉機也。幸致繼在東各同志，暫爲堅守，以待好機之來。……」

從惠州起義到現在為止，革命的形勢，正走上開展的階段，保皇黨雖百計破壞，也沒有阻撓了這方與未艾的革命潮流。所以孫先生在自傳中說：『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留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較之往昔大不同矣。』

孫先生到紐約時，剛巧日俄戰爭很劇烈。他想借這個遠東問題緊張的機會，指出美國上下援助中國革命的一條路線，因此發表了一篇英文宣言，題目是中國問題之解決（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主要的意思，是說明滿清政府不能代表中國的，現時中國所流行的種種不能滿意的事情，都是滿清政府的罪惡。中國在歷史上是很能和外邦交通的，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健全的中國政府，才能謀中國的富強和世界和平的建立。同時又說到美洲的致公堂，是中國的愛國會，將來滿清政府的下落，就可取決於這個組織和同志。最後說到『奇禍』的無稽，中國人民是天然的和平守法的人民，所以一旦中國覺醒了，對於世界的影響很大。但如果果列強瓜分了它，便一定釀成像這次日俄戰爭一樣的大禍；如果列強保全中國主權的獨立，那不是滿清政府所能担負得起，還須要經過一番革命，這是美國上下尤須幫助的一點。這一篇可說是革命黨最早的外國宣言，是有很深刻的意義和歷史價值；也是孫先生在革命進程中到另一階段開始的一個徵兆。

## 第二十六章 在歐洲的活動

孫先生在美差不多住了七八個月。他除了上述種種活動外，對於革命理論的研求，和三民主義思想的完實，也隨時留心。他曾經發起在紐約和一個留學生討論五權憲法的故事，從時間上推測，恐怕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因此知道，孫先生創造五權憲法，到這時已經其說完成了。

孫先生這次在美洲的旅費，僅僅從檀香山募捐的四千餘美金，他住下了七八個月，走遍了南北美洲，從事種種活動，到這時，已經用完，因此想到歐洲去，爲了旅費困難，竟一時不能動身。那時歐洲留學生以湖北人

爲最多，都是湖北總督張之洞從兩湖書院中挑選思想最激烈的學生派送出來的。這些學生大都與當時武漢的花園山機關通聲氣，企圖秘密聯絡軍隊起事，所以被張之洞分派東西洋留學，免生事端。大同日報主筆劉成禺就是花園山機關的同志，他知道孫先生有游歐的意念，但沒有旅費，就寫信告訴留比的湖北同志賀子才，說孫先生要到歐洲來了，但很窘，請他們設法籌集旅費，賀子才等本來是想和孫先生接近，有了這樣一個機會，大家就非常歡喜，那時留比學生可算完全是花園山的嫡系，大約有三十餘人，德國二十餘人，法國也有二十人餘。賀子才就向各同學努力游說，請他們大家拿出錢來匯到美洲去，請孫先生來。結果在比國籌得四千餘法郎，德國二千餘馬克，法國一千餘法郎，由賀子才匯寄孫先生，孫先生知道歐洲留學界有這樣一番熱情，就決定到歐洲去。賀子才接到孫先生的回信，知道孫先生的行期和輪船的名號，就一面邀留德同志朱和中到比國來，一面等輪船到埠了，就和李仁柄、李蕃昌等，到比國北海口奧斯坦得(Ostend)埠去歡迎。

這時候已在冬天了，先生穿着皮袖的外衣，手攜着一只皮包，匆匆地從輪船下來，一見了這幾個歡迎的同志，就充滿了愉快的情懷，和他們一一握手。乃由賀子才引導，坐了馬車到餐館去。吃過了飯，一直陪到北京布魯塞爾(Brussels)請孫先生下榻在胡秉柯的家裏。

許多富於熱血的年青留學生，都希望得到一條革命的正道，因此大家一見了孫先生，都紛紛前來請教，於是一篇革命的談話開始了；

「我們在武漢各營校中，都有同志去聯絡，我們的方略，想從改變新軍的頭腦着手，然後由這些新軍在營中起義，我們在外面響應。」賀子才、朱和中以及其他湖北留學生都這樣的說。

「兵士是以服從爲主，要他們首義，是很困難的，首義的事情，還須要革命同志自己擔任。」孫先生搖着頭說。

「現在湖北軍營中的同志，已經很多，官兵都有，照這樣做去，總會有一天全軍都變成我們的同志。」他們很有把握的作答。

「這恐怕是一個理想而已，事實上做不到的，要真實的擴張革命勢力，必須深入會黨，並且要和會黨發生密切的關係。」孫先生還是表示不能贊成他的主張，接着便說明會黨的宗旨和歷史道：「會黨的宗旨，本來是反清復明，不過到現在他們的宗旨却已漸漸地晦塞了，我們應當向他們闡述過去的歷史，使他們恢復本來面目；並且要替他們改良條教，使一般智識階級也能參加。因為會黨的規章，還是由明末陳近南先生訂定的；陳先生因為不到士人無行，所以拿最粗最鄙的儀式，和一切不通的文字定為條教，使一般士人見而生惡，不肯加入，因此會黨的組織，保存到現在。可是時代不同了，現在應當使學界也加入，去領導他們，才有辦法。你們知道張文祥的事情麼？張文祥是一個會黨的總頭目，犯了很多案子，滿清政府要捉他。這時左宗棠剛剛做兩江總督，滿清政府就命令他緝拿張文祥。不久，張文祥自己到江甯來，左宗棠的軍隊都紛紛出城，他派了幾個人去查問，他們就是去歡迎龍頭大哥，問誰是大哥，竟就是所要通緝的張文祥。左宗棠聽了，大吃一驚，於是叫他的心腹，也加入會黨，運動他們舉左宗棠為龍頭，等到他在會黨的勢力樹立了，就再下令通緝張文祥。我把這件事說明，不是希望諸君要做左宗棠，但從這個教訓中，可以知道，這些下等社會有組織的團體，祇要有人去指揮，一定能夠發生很大的力量，我們不應遠離他們，輕視他們。否則，這些團體存在著，而我們不和他們聯絡，我們一有舉動，他們可以隨時阻礙我們的。」

大家聽了，孫先生這一番話，恍然大悟，個個都首稱是。孫先生這樣的反覆宣導，經過了三天三夜，大家才一致信服，因此是組織革命團體的意見，都一致很贊成。到了第三天晚上，何秉柯的家裏，來訪同孫先生的留學生格外多了，孫先生就問大家道：

「參加開會的都在這裏麼？」

「都在。」衆人齊聲答覆。

「我們今天開會，不是一種泛泛的聚合，是革命黨加盟的一種儀式，諸位今天來了，必須每個人當眾宣誓以昭信守。」孫先生以極莊重的語調，向大眾宣佈。

「我們願意爲革命而犧牲，爲什麼要用這宣誓的形式？」有些表示懷疑，提出了這個抗議。

這不是形式，是一種信念的表示，而且也不是我獨創的，近代會黨的加盟，也有這一種手續，古代的尙書中，也有秦誓、牧誓，都是宣誓詞。我們革命黨應當有終身不變初志的信念，所以當加盟的時候，必須鄭重宣誓。」孫先生這樣的解釋了很久，大家才無異議。於是孫先生請他們拿紙筆來，當場寫了這樣一種誓詞：

「具願人某某，當天發誓，驅除隳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 年 月 日

某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孫文

當時有此留學生四萬和孫先生接觸的機會太少了，竟有人誤以爲孫先生是生長在檀香山，不懂本國文的，現一看見他對於宣誓問題，引證經典，並且當衆朗誦誓詞，大家都暗暗驚奇他的學貫中西，便愈加信服了，因此都很願意宣誓，一個鐘頭以後，宣誓的有二千餘人。孫先生就向他們一一握手，很愉快地向他們祝賀道：

「你們現在不是清朝人了！隨着又傳授了很多秘密的徒手自衛，如問：『你從何處來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賤皓東、史堅如，』等等。大家聽了，都很快樂的歡呼着，這是革命黨在歐洲第一次組織成立。第二天又有八十餘人，這天晚上也有一個集會，大家靜聽孫先生關於革命的演說，都極爲滿意，到第三天，他準備到倫敦去，於是大家擁着他遊歷各公園，以資留別。孫先生乘便到德堡（Dresden）拿破崙就擒的地方，對這一位失敗的英雄，憑吊了一番。

孫先生在此國大約住了一星期，就到倫敦去。來和中也回到柏林，準備鼓吹柏林的留學界也組織革命黨。

孫先生這一回到倫敦，就攔的時間很短促，起先住在城西青星敦街，訪問了久別的康德黎以後，就在荷蘭公園附近的摩根家裏歇下來了。這位摩根自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惠州事件失敗後，曾一度被保皇黨拉攏去，但不久就發現他們的欺詐，因此回國後再不問中國的事情，現在知道孫先生到歐洲，就以友誼的資格，請到孫先生住在他的家裏，這也是不忘舊情的一種風道。吳稚暉先生到這時才遇到了孫先生，他說一見面，就覺得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紳士，然而止學地氣大，是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爲自然的偉大。孫先生這回在倫敦，旅費又是不充裕，幾位留學生湊了三四鎊送他。但三天以後，他已把那個錢買了一大堆緊要書籍，使許多留學生大爲驚訝，因爲他們知道孫先生住房錢也恐付不出了，爲什麼買這許多書，其實孫先生爲了要圖滿主義，博采旁收，雖然天天在奔走奮鬥中，但從不間斷他的讀書生活，這次短距離旅行中，也帶了四隻箱子的書籍。倫敦的留學界對孫先生這番真摯的接受，不像北京那樣的熱烈，加盟的祇有孫鴻哲等數人。

朱和中回到柏林，留德學界，早有一部份已知道孫先生在北京組織革命團體，都要求朱和中請孫先生到柏林來，和中共是寫信和孫先生商量。孫先生因爲倫敦的情形，未免冷落，他毫不疑遲的答應到柏林來，到了柏林，就住在朱和中的家裏，留德的學生天天來問他，討論革命的問題。熱鬧的情形，和在布魯塞爾差不多。大約過了一個星期，大家對於革命的意義，都很明瞭，於是準備加盟。那時留德學界差不多以加入革命黨是算光榮的事情，所以到家庭、陳匡時、周澤春、王濤科、王相楚等等都加入了。這是革命黨在歐洲第二次開會。

留德學界接受了，孫先生因爲安南總督賴德芳的介紹，向法國政府有所接洽，就準備到巴黎去一下，巴黎留德學界聽到孫先生要來了，都非常高興，預加入革命黨。孫先生知道留德學界這些情形，也很快樂，就留比荷胡萊柯先到那處去準備一切，因此，孫先生到了巴黎，沒有經過什麼宣傳，就有十幾個人加盟，以唐考寓所，爲通訊機關，這是第三次成立革命團體，於是歐洲的革命聲勢，格外緊張起來了。孫先生在巴黎就專心辦理外交事情，當時法國政府的參謀部和孫先生已接洽得很成熟。孫先生有時缺乏交際上必

的費用。孫中山留歐同志湊集起來幫助，因此孫先生在歐洲的活動，並不感到什麼困難。後來又由籍美的介紹，和法國的殖民黨也有接洽。一天孫先生正在利僑尼街的瓦克拉旅館等待殖民大臣覆信的到達，兩個留法同志湯彌銘和同國勝忽然來訪問，孫先生當然很誠意的接待他們，但他們是要約孫先生到外面去吃飯的，孫先生固為大衆都是同志，就毫不推却的跟他們出來了。吃過飯以後，孫先生回到旅館裏，却發現一件詭異的事情，就是他帶來的一只皮包，已經被人割破了，所有比、德、法留學生加盟的書畫以及和法國政府安南總督往來的重要文件，都被偷去了。這是太神秘了，孫先生大吃一驚，立刻幻想到幾年前在倫敦蒙難的一切困苦情形，恐怕的事變，好像就在後面準備上演了。但孫先生所恐懼的，是加盟同志的生命和法國政府往來交涉的暴露，這一切都可以影響大局的，因此在無可如何中，祇有電告比、德各同志，設法調查。

留比同志接到了孫先生的警報，立刻公推胡秉柯到法國來偵查。不久，就查明這事情的真相，原來是留德的王發科和王相楚所做的。王發科是一個怕事而又好名的人，他的加入革命黨，不過跟着大衆一時好名心的衝動罷了；所以等到加冕了，就懊悔起來，他怕帶了革命黨的頭銜，回國去不能在滿清政府下做事，時時想法要脫黨。這時王相楚和周澤泰也爲了這個問題常常吵鬧，他們二人本來是不和睦的，因此互相拿匿名信攻擊，在留德學生會中揚揚爲煙草氣。王相楚無法應付了，就和王發科商量，他們一談之下，更覺得問題嚴重，因此又聯合了陳匡康準備一起叛盟，免得將來有禍。他們計劃決定了，三個人就秘密到法國去，向唐易巧言遊說，要求他把書畫帶還。唐易說這不是兒戲，怎樣可以反悔無常，沒有答應他們。他們更着急了，就再去找湯彌銘、向國勝，這才是投機了，於是決定由湯向二人，假意地邀請孫先生到外面去吃飯，二王就乘機潛入孫先生的房間，把皮包割開偷出書畫，却不料孫先生要法國政府外交的文件也一齊拿出來了。他們四個人拿到孫先生送許許多多重要文件，就到駐法公使孫寶琦面前，叩頭哭訴，說他們誤入革命黨，現在已經悔悟了，隨着繳呈書畫和外交文件。那時的孫寶琦一則算很開通，其時張靜江、李石曾兩先生，都是他的隨員，二則恐怕辦得不妥當，也許會釀成幾年前倫敦使館的一幕，他就板着臉呵斥他們道：



「你們加入革命黨，已經背叛清朝，現在來自首，又是背叛革命黨，並且這還陷害同學的舉動；你們這樣不忠不義，還有人格良心麼？趕快把名冊還他，否則我先撤掉你們的官費，送你們回國。」

說着，就把誓書退回他們，但是法國政府的文件，却被他留下來，他就叫侍役把他們趕了出去。後來孫寶琦把這些法國政府的文件都入奏滿清政府，因此他飛黃騰達，就是這一次二王給他的機會，這也是革命史上的一件奇事。

他們四個人被孫寶琦痛罵一頓，實出意料之外，弄得進退無路。還是湯銘有主意，獨自一個去向孫先生謝罪，把割皮包的事情，却推到王發科他們幾人身上。孫先生若無其事，說道：「沒有什麼緊要，」接了他的名冊，仍講幾句勉勵他革命的話，待之如初。這寬宏的度量，是出於孫先生的自然態度。這一個風波，於是告終。但孫先生在巴黎奔走三個月，向法政府一切交涉的結果，經這一次都已破壞了，還是不免有些傷心，那時所能安慰孫先生的，就是同志加盟的一天增多一天，日本的同志而增多了幾倍，鄒催孫先生回去主持大計，於是孫先生決定再回日本。

孫先生準備東歸以前，又到倫敦去一下，倫敦的革命團體，不久也成立了。在倫敦住了不多幾次，就回到巴黎，準備從馬賽啓程東歸。在臨行時又有李石曾、王鴻猷等加盟。巴黎的革命團體，從此擴大了，同時孫先生還遇見了張靜江，他是駐法使館的商務隨員，兼營古董生意。他一見了孫先生，就很稀奇地問：

「你是主張革命的，孫先生麼？」

「是的。」

他聽了很高興，就很爽直的說：「你是主張革命的，我也很贊成革命的，我老實告訴你吧：我在法國做生意，賺了幾萬塊錢，你發動革命的時候，我目前可以拿五萬元來幫助你，打電報的時候依着A B C D E的次序，A字要二萬元，B字要二萬元，E字要五萬元，這就算是你打電報給我要錢和要多少錢的密碼。」這真是一個豪爽慷慨的人，孫先生很愉快的和他訂交，就回到日本來了。

## 第二十七章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孫先生這一次到日本，大約是在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年）的秋天。這時候，日本留學界的情形比從前大不相同了，幾乎都是從各地亡命而來的革命同志，最著名的就是華興會的黃克強、宋教仁、陳天華等；廣東同濟湖漢民等也在東京法政學校肄業。黃克強，初名黃軫，號慶年，後改名與，別號克強。是湖南善化縣人，湖北兩湖書院的高才生，以官費留學日本。紀元前九年（一九〇三年）俄國侵佔東三省的事情發生，國內外學界都非常憤慨，克強就首先發起拒俄義勇隊。紀元前八年庚申組織華興會，湘籍留學生大多數加入。他們一面努力向國內學界鼓吹，一面聯絡會黨，並在長沙明德學校中，盡量宣傳，更設立東文講習所，作運動的機關，一瞬國內外學界加入的，漸次增至四五百人；他們另外又設立同仇會，專為聯絡會黨機關；哥老會員加入的此十萬人，聲勢在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唐才常一役之上。他們預定趁紀元前八年（一九〇四年）九月西太后萬壽節日，分長沙、岳州、常德、衡州、寶慶五路起事。宋教仁也在此時，跟着黃克強等同湖活動，擔任常德方面發難的任務。不料在萬壽節的十日前，事機洩露了，湘撫嚴密查拿，克強以聖公會教師黃青庭及章亞伯衛護出險，逃往上海。宋教仁這時剛到長沙，一聽到事情有變了，也逃往上海。他到了上海，黃克強、陳天華、張繼、章士釗等十餘人，又因萬福華槍擊王之春雲的嫌疑，正被搜捕房拘究，因此就是不停留地一直到日本。不久，黃克強和陳天華等因得譚璋、袁海觀的營救，也逃往日本。於是黃宋等不留日學界，特別露頭角，頗織一種雜誌，名曰二十世紀之支那。

這是孫先生未到日本以前的形勢。那時宮崎寅藏等見到湖南革命同志的增多，也很留心，他們極力主張華興會和與中會應當密切的聯合起來，使革命力量集中。因此宮崎常常和克強、教仁接洽，說孫先生是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再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人物了。克強、教仁等對於孫先生因此非常敬仰。等到

孫先生一回了日本，東京和橫濱道上往來的各省留學生頓時非常忙碌，那時孫先生還是繼續住在橫濱；奔走最多的要算是陸家樞了，他也是主張華興會併入興中會另組革命團體的一個，因此由他介紹，請孫先生到東京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和朱教仁會晤，討論這個重大問題。

這是七月二十八日的事情，孫先生應陸家樞的邀請，和宮崎從橫濱到東京來看朱教仁了。這時陳天華也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大家見面了，就談到本問題。孫先生先問教仁這裏同志有多少？教仁還沒有答覆，陳天華就把前年長沙的風潮說了一下，又說到他們革命的方略。孫先生聽了就很懇切的繼續現今大勢和革命方法，最後更鄭重的說：

『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的瓜分，但憂自己的內訌。如果這一省欲起事，那一省更欲起義，大家不相聯絡，各自爲謀，結果便造成秦末二十餘年的爭鬥，和元末、朱、陳、張明的變亂，這時候各國乘機干涉，中國就可以立刻覆亡。所以現在我們革命的主要問題，就是怎樣的互相聯絡，使革命的力量，切實的團結起來。』

這確是當時革命形勢中的病態，要不是像孫先生富有這偉大的領袖天才，把各地革命同志整個團結起來。中國革命的口號，雖是已經喊了出來，不曉得現在已變成了怎樣一個局面呢？因此孫先生這一次在歐洲結合許多同志，是重組革命團體的初步，現在到日本來，更想擴充興中會變成一個整個容納各方面革命份子的團體，這是孫先生憑多年經驗對於革命運動更有進步的表現。

宋教仁等對於孫先生的意見，非常贊成，孫先生同時又和黃克強商議，黃克強也很願意重組一個革命團體。因此就在一月三十日假東京赤坂區松町，黑龍會舉行籌備會。到各省留學生七十餘人，除甘肅一省因無留學生，沒有人來，其餘十七省的都有。日本同志宮崎寅藏和末永節也來參加。

開會的鈴響了，孫先生就首先起來說明開會宗旨，並提議組織革命團體，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大家對於組織革命團體是一致贊同的，但對於名稱有很多意見，有的主張稱爲對滿同盟會。孫先生說革命黨的宗旨，不重在排滿，應當兼顧到廢除專制和創立共和二大意義，所以不能單純的說是排滿。大家都以聽這革命團

體的宗旨了，但這是一個秘密組織，如果把革命二字很明顯的提了出來，恐怕在實際行動上有許多妨礙，因此討論的結果，決定簡稱爲『中國同盟會』。孫先生隨着提出宣誓詞，請大家執行宣誓。誓詞的內容，和在歐洲時所用的差不多，但有些人對於平均地權四個字，大起疑問，要求孫先生把它取消，孫先生詳細地解釋了一番，大家就毫無異議。因此黃克強提議，請贊成的就書立誓約，當衆宣誓，於是大家都實行宣誓，由孫先生領導先開始，誓詞的原文是這樣：

『聯盟人 省 府 縣人某某等，當

天發誓，驅除殘暴，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七月

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某某某』

這是繼與中會以後而組織的革命團體從此產生了。孫先生從這一次在歐洲奔走號召到最近日本同志的大團結止，都是一貫的在一個目標之下前進，就是集中革命力量，擴大革命組織。但這一次活動，和十年前創立興中會的時候，有顯然不同的地方，就是孫先生三民主義的思想已經滲入了革命的組織和每個革命份子的腦海裏，所以這一次中國同盟會成立，可以說是三民主義革命團體的正式成立，也就是中國革命第二階段的開始。孫先生看到這一個出人意表的發展的趨勢，所以很滿意地在自傳中說：

『同盟會成立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這確是一個可靠的預言，中華民國就憑着這一個革命團體而產生的。孫先生因爲大家都已宣誓了，就當衆傳授秘密口號，如：『漢人，』『中國物，』『天下事』等等，並向各會員一一行新握手禮。又由會員推定馬君武、陳天華等爲會章起草員，預備下次開會時討論。這狹小的會場，充滿了這樣許多人，這樣濃厚的革命空氣，中華民國的最早最先的細微的胚胎，就在這時候開始滋長起來。最巧的，人頭滿擠的坐席，這時候忽然坍倒了，孫先生就立刻像預言家一樣的向大家笑着說：『這是滿清政府顛覆的先兆』。大家聽了，都鼓掌歡呼，像怒潮在狂風中呼喊着，真是緊張極了。

隔了幾天，即八月十三日，東京留學界在麴町區富士見樓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孫先生。這是永遠留著的一個熱烈的印象，到會的有一千三百多人，座無隙地，門外站立的還有很多，都不願離去，望著大門，立在路旁，紛紛擾擾的，非常喧鬧，宋教仁攀到門上向大眾說明了，並開門放他們進來，大家才算無事，因為他們都是很有誠意的要來瞻仰孫先生的丰采。這富士見樓建築在駿河臺的山麓，後面有一條清流激湍的小河，遊艇很悠閒地在往來着，對岸就是雄偉的砲兵工廠，煙突很森嚴的一個個高聳着，黑煙一縷縷的籠罩着天空，機器的聲音、不斷的響着，和富士見樓中滿擁着人的熱烈的情緒，好像一樣的都在表示歡迎這革命領袖的到臨。

在這緊張而又靜寂的期待空氣中，宮崎和末永等從外面進來了，繼着就是孫先生，在幾個人擁護中很安詳的走着，會場中頓時掌聲大起，站在後面的，跼足以望，一時像潮湧一樣的波動着，但大家都肅靜無嘩。這是東京留學界從未有過的盛況。經過主席說了幾句介紹詞以後，孫先生以嚮然可親的面容，颯爽不羣的姿勢，從人叢中出現於演講台上，掌聲又散佈了全室；於是孫先生很謙遜的開始感謝歡迎的盛意，繼而環遊全場的經過，掌聲綿綿不絕，最後孫先生很莊重的說到革命問題：

「鄙人從前提倡民族主義，表示同情的只有會黨，至於中流社會以上的人，竟寥寥無多。可是沒有經過多少時候，思想進步得很快，民族主義傳播於各種社會之中，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大家都承認革命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雖以鄙人之愚，也因為曾經做過民族主義的運動，所以蒙諸君這樣的歡迎，這是應該為中國前途慶祝的。諸君到日本來，是在吸收他們的文明。但是日本的文明，不是他們所固有的，從前是取之於守國，後來又師資於泰西。所以中國如果把自己固有的文明發揮起來，一定可以駕乎日本之上。（鼓掌）中國不但可以駕乎日本之上，並且還有更發展的希望。鄙人這次從美洲到歐洲，一路上所謂古代文明中心地，像埃及、希臘、羅馬等都看不到了。現在阿利安民族的文明，不過在近數百年前才發生的。但中國的文明，早在五千年以前很發達了，這是西洋各國所不及的。然而中國因為傾向保守，於是被西洋文

明追趕上來；而且獨步一時。不過照最近十年中國思想變遷的趨勢來看，進步的速度很顯著，從這樣的速度來推斷，十年二十年以後，不難把所有的西洋文明一齊吸收過來，或者勝過他們，這也不見得不能辦到的。因為各國的進步，都是從舊的變到新的；英國倫敦從前沒有電車，祇有馬車，日本也是這樣，但鄙人離開這裏不到二年，這一次回來所看到的，竟迥隔一世，從前的馬車，現在都改爲電車了。所以說幾年以後的中國，還是像現在一樣的沒有變動，是誰都不能相信的。（鼓掌）

『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我們生在中國，實在是很幸運的，各國的賢豪，欲得像中國這樣的一個舞台而利用之，而不可得。我們有了這樣的大好舞台，竟反而無所藉手，蹉跎歲月，使錦繡山河，依然被異族所佔據，到現在還是不能光復故物，建立一個大共和國，這不是最可羞辱的事情麼？（鼓掌）』

『列強各國因爲知道我們不能利用這些土地，所以大家都想來染指，我們見到事情迫切了，於是不勝危懼，但如果我們能夠發憤自雄，列強就對我們很敬佩，怎敢來侵害我們呢？我們不想自己振作，祇是任人家來欺凌，這決不是辦法。（鼓掌）』

『所以鄙人沒有什麼話，祇有希望諸君把振興中國的責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從前日本維新開始，也不過幾個志士做原動力，祇有二十多年，就一躍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我們今天立刻發動起來，不是事半功倍麼？（鼓掌）』

『有人說：中國現在尚在幼稚時代，一切改革，很不容易有速效。其實不然，各國發明機器的，都是積數十年的經驗，才能成就一件事物，但是仿造起來，祇要幾個月或者一年的光景就得了，我們中國的改革，也就像這些情形。（鼓掌）』

『又有人說：各國都從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開始到共和，有一定的次序，不能躐等而進的。所以中國現在應當只可爲君主立憲，絕對不能一躍而爲共和。這是很謬誤的說法，我們拿修築鐵路這件事來看，就可明白了。鐵路上的汽車，起先是很粗惡的，後來加以逐漸改良，假如中國能

修築鐵路了，試問用最粗惡的汽車呢？還是用最近改良的汽車呢？從這個譬喻中，就可知道是非了。（鼓掌）而且菲律賓的土番，能夠起來抗拒西班牙、美利堅兩大強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的黑人，從前都是豈如鹿豕，現在都成爲自由國民。所以說中國不能建立共和，是誣中國人不如菲律賓的土番和北美的黑奴了。（鼓掌）

「因此，我們如果說中國不能建立共和，是違反進化的定律，是不明白文明的價值。而且世界上各國的立憲，從流血中得來的才算真正的立憲。同一的流血，我們爲什麼不從事於直截了當的共和立憲，而從事於這不完不備的君主立憲呢？譚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如果擇其中而取法之，當然不是聰明人的行徑。因此我希望諸君把這些謬誤的思想，淘汰淨盡，從最上的改革着手，同胞幸甚，中國幸甚！」這是 孫先生在東京對中國留學界第一次公開演說，播下了很多革命的種子。所以一星期以後，即八月二十日，同盟會正式成立的時候，到會的就增加一百多人。

這一天開會，是在東京亦區區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這屋子和滿清政府的駐日公使館恰恰是貼隣，所以有許多會員多誤走了門口，也是一件趣聞。下午二時開會，由黃克強宣讀會章後，就投票選舉經理和職員議員，結果大家一致舉 孫先生爲總理；其餘黃克強爲庶務，陳天華爲書記，宋教仁、程家權等爲交際，謝良牧爲會計，鄧家齊爲執法部長，胡衍鴻等二十人爲議員，曹亞伯、胡毅生等爲各省主盟人。選舉過了，孫先生又傳授了很多秘密口號。最後又通過把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爲同盟會的宣傳刊物，於是大家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以後，宣佈散會。孫先生也帶着很愉快的笑容，從會場中走了出來。

## 第二十八章 革命的宣傳與南洋黨務的開拓

中國同盟會成立了，革命的份子在一主義下切實的結合起來，革命的聲勢，頓時震動了全國。孫先生

爲要普遍的傳佈革命思想，就一面派馮自由回到香港，組織香港、澳門、廣州等處同盟會分會，並整理中國日報的編輯，以擴張革命的勢力，一面把二十世紀之支那正式實行改爲同盟會刊物。但臨到實現了，二十世紀之支那，因登載了一篇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被日本當局禁止發行，於是臨時改名民報，這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個刊物。最初主持編輯的，是由孫先生派定的胡漢民、朱執信等。在第一期上面，孫先生自己做了一篇發刊詞，開始把三民主義的理論，充分的發揮，他說：

「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治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辨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說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爲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變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施維於小己大羣之間，而成爲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逐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爲既往之陳迹，或於我爲方來之大患，當鑒我羣所有事，則不可不并時而弛張之。嗟夫！所陟卓者，其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爲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比迹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速去。中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觀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環顧歐美，彼且瞠乎後也。」

這是孫先生對於三民主義第一次的文字說明，因此自這篇文章發表以後，偉大的三民主義，如日中天，大家得到了一個規範，對於三民主義的本體，知道了它的內容。那時，正當日俄戰爭以後，日本以臺灣三島，



竟戰勝了俄國。國內有許多人以爲這次戰爭是立憲政治和專制政治的戰爭，大家都相信立憲兩字，是確有強國的效力，彷彿一紙憲法，便可以抵百萬雄兵。於是滿清政府也想東施效顰，派了五個大臣往立憲各國去考察，保皇黨在那裏大大地鼓吹，像橫濱的新民叢報，就是他們的嚆舌。因此這時候，國內外思想界顯然劃分兩個壁壘，就是一面是革命黨的民主革命論，一面是保皇黨和滿清政府官吏的君主立憲論，前者是以孫先生爲代表，後者是以康梁爲代表。這是顯然的，滿清政府的立憲，是要緩和革命的空氣，但康梁竟和他們一鼻孔出氣，替他們張目，在革命的宣傳上是有很大影響的。這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吳樾在北京車站轟炸滿清政府派往考察立憲的五大臣，就是革命黨爲對君主立憲的第一聲。

所以民報出版了，首先就是駁斥新民叢報的君主立憲論，使革命的理論愈辯而愈明顯，因此引起了極嚴重的筆戰。保皇黨所持的理論，還是說革命可以召瓜分，中國人民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等這些問題。梁啟超還引了許多歷史事實，證明滿洲是中圖領土，滿洲人入主中國，不是以異族入寇，是一種內亂的結果，因此連民族革命的口號，都否認了。那時在民報上參加筆戰的，要算汪精衛和胡漢民的文章，最有力量了。關於革命可以召瓜分的問題，孫先生在檀香山隆記日報上的文章和在美國發表的一篇中國問題真解決都已說到了；汪胡就根據了駁斥梁啟超。關於人民實行民主政治的能力問題，孫先生在服保皇報一文，和這次在東京歡迎會中的演說，雖是也有說明，但那時孫先生更有精詳動意見，就是：

○察君權與民權之關係，其極機所在，爲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燹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至此關係，厥爲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專專權，復設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於人民權利義務，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舉舉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違者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舉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

，復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合不負常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東擅，其苦無難。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一縷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爲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

這就是說由民族革命到民權革命的過程，是以約法做過渡的，所以民主政體的建立，不在人民政治的實際能力，祇要把民權隨著軍事的力量一面逐漸推廣，一面切實訓練，等到全國軍事底定了，約法也普遍了，就可了由約法而變爲憲法，就是民權政治的實現。這是孫先生實際的革命方略。比較以前所講過的更切實而有條。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說這固然是很好的規則，但首難革命的人，是否有這樣優美高尚的人格，汲汲於民享理。這是一個疑問。假如有這樣人格的人了，但祇有約法，也是靠不住的；並且附從革命的，是否個個都有這樣優美高尚的人格，其他的革命軍，能否服從這個宗旨，人民能否相安無事？這都是表現了保皇黨的短視和怕事的態度。民報也有一篇很長的駁斥文章，最扼要的一句話，就是：「欲決革命之成功與否，當決民族主義與民衆之昌明與否。」這是確實的，孫先生對於革命的前提，是在適應大多數人民的需要，所以約法是建立在大多數人民的共同心理，而轉以強制大多數人民的行動，決不是空洞的理想。此外，梁啟超又造了一個謠言，說孫先生的民生主義實行的時候，必須殺四萬萬人的半數，對於平均地權的理論，也盡量的攻擊。民報和新民叢報幾乎每期都有相互辯論的文章，這是革命史上關於革命理論的大規模論戰的時期。

孫先生諸事略略辦妥了，又準備離開日本先到南洋，再到歐洲。這一次跟孫先生同行的，有謝良牧、胡毅生等。經過上海吳淞時，安南總督賴美知道了孫先生的行蹤，就派了布加奧到船上來訪問；這是前年在巴黎交涉的結果；布加奧是直接奉了法政府陸軍部命令的，但和孫先生第一次見面，賴美在法蘭時一會和孫先生約完，把他的名片，一分爲二，一半留在孫先生那邊，一半就留給將來被介紹的人，以便見面時，拿

出來對照。這次布加卑就拿了給美名片的另一邊而來的，因此一見了很融洽。但匆促間沒有談什麼，孫先生約下次從歐洲回到香港時再見，於是握手而別。

從上海到香港，在船上又召集了陳少白、馮自由等許多同志，指示同盟會會務。這時候香港中國日報和有所謂報因為抵制美約的事情，意見不合，互相攻擊；有所謂報本來也是主張革命的，而孫先生以為都是革命的同志，不應當自己鬧意見，就勸他們和解，這是孫先生對於團體革命同志的一貫的態度。船停了一天，就離開香港，孫先生乘道到西貢、安南，對於同盟會的推廣，也有很多努力，但住不上幾天，就到新加坡。

孫先生這次到新加坡，已是第三次了，前次是從歐洲回來時路過，因為當第一次來的時候，爲了宮崎的事情，禁止五年不許登岸的影響，沒有登岸。但新加坡僑商張永福、林義順等知道，孫先生在船上，都來謁見，於是就告訴他們歐洲的革命團體已經成立了，這次到日本去準備組織革命團體的總機關，將來在南洋也成立分機關，托他們準備一切。所以這一次，孫先生來新加坡，張永福等早已準備妥當，等船一到了，大家到輪船埠頭上去歡迎，並且請孫先生就住在張永福的晚晴園別墅。

大約是孫先生到新加坡後的第四天晚上，幾個僑商都已被孫先生說得明瞭了，孫先生就要他們宣誓加盟。這時在晚晴園的有李竹樓、陳楚楠、張永福等，孫先生寫好了盟書，就自己先行起立舉起右手，以最莊嚴的態度，在他們的面前宣誓，大家心中忐忑，覺得革命黨的儀式，確有些不同。待孫先生把誓詞宣讀完了，就由李竹樓起，依照孫先生的儀式輪流做去。大家宣誓完畢了，孫先生就把誓詞上的三民主義意旨，解釋了一番，並嚴重的說：

「我這同盟會的組織，是希望發展得很大很大的；我們的責任，當然是犧牲，但是犧牲到什麼程度，我們總不能預說。假如犧牲到兩個人存在，也算是同盟會存在的一日。」

這話是何等悲壯，大家聽了精神奮發到了極度，熱淚充滿了兩眼。隨即便選舉陳楚楠爲正會長，張永福爲副會長，孫先生的誓書就交陳楚楠保存，又一傳授他們握手符號及秘密口號。當大家正在這聚精會神的時

候，屋外的風聲忽然大起來了，屋內也聽得很大的繼續不斷的響聲，晚晴園的茶房雜役都呼喊起來。孫先生等也很驚訝，就大家走出會客廳來觀察一下，原來是一百多隻烏鴉，在滿屋內不出聲的亂飛亂竄，把屋子內掛燈畫屏衝動攪亂，好似海潮地震的一樣。差不多經過了半點鐘光景，那烏鴉聽得氣力疲了，才漸漸地分飛散去。張永福等看了之後，都莫名其妙，坐下靜默了一回，孫先生却先衝破了這沉寂的空氣，開口說：

『那是不足為怪的，因為外面要起颶風，這些烏鴉被大風驅逐飛進了這屋子，是在閃避大風的危險，算不得是什麼怪異的徵兆。』

這本來是很尋常的事情，但孫先生知道他們被從前讀史書的迷信觀念緊緊地籠罩着，以為這是奇蹟。爲要打破他們的神怪思想，再不要迷信祥瑞，大家努力工作，不顧成敗利鈍，要認清一條正路向前去，所以首先拿這句話來解釋。但那位李竹癡聽了還是絮絮地說：

『魚躍孟津，武王伐紂，這勝利的故事，歡祝大家，今晚結社，定卜前途成功。』

大家聽了相顧而笑。第二天，林義順、李曉生、謝心準等也來加盟，於是新加坡分會，就逐漸充實起來，晚晴園也從此充滿了革命的空氣。孫先生和他們朝夕相見，無話不談，他們好像得到了一位良師，從種種方面都比加盟前不同，大家都非常滿意。大約住了十多天，孫先生要到歐洲去了，臨行時留下了一個祕密名字，叫做『高野』，預備通訊和電報上用的。

## 第二十九章 法國武官的活動與南洋黨務的擴展

紀元前六年（一九〇六年）三月，孫先生在歐洲的事情已經辦妥了，就從馬賽啓程東歸。經過香港的時候，在船上約布加卑來會談，布加卑問孫先生中國革命的實際形勢，和各省軍隊的聯絡情形，如果運動成熟了，法國政府可以立刻幫助。孫先生說現在還在準備時期，因此請他先派幾個得力的幹員來相助，以辦理關

查聯絡的事情，布加卑就滿口答應，由他們駐紮天津的參謀本部派定武官七人，歸 孫先生指揮調遣，這樣決定了，就握手道別，孫先生也一直回到日本。

孫先生到日本以後，就派廖仲愷駐天津，協助布加卑調查中國革命實力及翻譯各報所載革命消息；派黎勇錫與某武官調查兩廣，派胡毅生與某武官調查川滇，派喬義生與歐極樂武官調查長江沿岸各省。一切部署就緒了，孫先生因為內地方面，既然有這樣的調查聯絡，祇要靜待消息，因此又偕胡漢民重到新加坡，準備更擴大同盟會的會務，使成爲南洋革命的總機關。

孫先生到了新加坡，早有林義順等在碼頭上歡迎。他和胡漢民二人上了岸，先到張永福的舖子新長美號坐談一回，然後坐了馬車（當時汽車很少）回到晚晴園安歇。許多同志一聽到 孫先生來了，大家都來會見，晚晴園頓時又熱鬧起來，每天晚上總有許多同志會餐，大家就公推謝心準長住晚晴園招待，門外加用幾個門警荷鎗守衛，情形好似莊嚴了許多；因為那時新加坡保皇黨對於 孫先生非常注意，所以必須要有相當的保衛。

過了幾天，孫先生命胡漢民起草分會章程，就在晚晴園召集開會，把章程通過了。這時候，人數已比較從前增加了很多，因此 孫先生提議把前屆職員重行改選，選舉結果，張永福爲正會長，陳楚楠爲副會長兼財政主任，林義順爲外交主任，謝心準、李曉生爲文牘科主任，於是這分會的規模比從前擴大了很多。

孫先生這一次在新加坡，一般同志對他的比從前格外親熱而崇敬，張永福有一段回憶說：

「我們在七八年以前的人生觀，本是求樂主義。小桃源俱樂部（按此俱樂部在 孫先生未到新加坡前，由張永福等發起組織的，）雖是我們集會討論國事的場所，同時亦是我們隨意消遣的地方，胡天胡帝，其樂陶陶，真是尋得桃源可避秦了。然自認識了 孫先生後，凡遇先生來星住在晚晴園的時候，我們就漸漸有些覺悟，知道一味的娛樂是不正當的，以後每三五星期，總不見往小桃源俱樂部一次，因為晚晴園有 孫先生和許多的同志，每天午後以至十一二點鐘，總是到晚晴園和 孫先生說地談天，講那過去未來的故事。雖然多是無關緊要的閒談，但是每每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問題發生，隨時就請 孫先生解釋。他總能

原原本本根據科學說給我們聽，比較別人說的要增加許多道理，增加許多興趣，我們因為這樣進益不少，求樂主義的人生觀，亦一變而為求知的人生觀了。每日自下晡以至半夜，總離不開這晚晴園的晚餐會。外間以為我們是神經中了革命毒，及迷信革命太過，但是我們很明白，這正是我們得到正當認識的起頭。我今回想當日情形，要再有晚晴園一般真娛樂，是再不可能的，設使非有 孫先生循循善誘我們，我們那能得這樣的進步呢？」（南洋與創立民國）

這是代表一般華僑老同志的情形，因為那時的華僑，暖衣飽食，本來想不到就要急切的革命，他們的智識程度，也是有個得很，所以在那時的風氣中， 孫先生不但是做他們革命的領袖，同時也是他們智識的指導者，於是許多華僑認識了 孫先生以後，都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像張永福所說的一樣。現在我們約略說幾位 孫先生在新加坡的故事，也是永遠留在那遠華僑腦海中的最深刻的印像，而使他們對 孫先生格外的崇敬和信仰。

那時 孫先生每晚開園，和許多同志朝夕談話，但一到同志們散去了，就獨自坐在書棹前，很靜寂的埋首看書，四壁滿掛着地圖，隨時可以指出各省要塞的位置，各國重要的軍港。但從不看見他拿着一本小說或其他無謂的書籍，許多同志都很驚異。 孫先生的用功。但 孫先生對於象棋很有興趣，行篋中除書本外，就以象棋和棋盤為重要的伴行物，棋術雖不十分精，似乎胡漢馬還比他強些。在晚晴園中，晚餐客去後，時時約張永福等奕。至夜深人靜了才各自罷手。一天， 孫先生和張永福在客廳奕棋，已過半夜了，外面細雨絲絲，隨着微風吹進窗來， 孫先生說：「我們上樓在房內繼續工作，」就捧着半局的棋盤走出客廳，張永福也拿着棋盤跟着登樓，就在林階墜，謝心準所睡的前設局奕奕。他們工作開始了不多時，謝心準却在夢中嚶語，喃喃不知所云，最後才聽得很清楚的在叫：

「雙文呀！雙文！」

這是因為謝心準這幾天讀西廂記着了魔，所以夢中也喊起雙文來了。 孫先生聽了還是很沉默的下棋，但張永福却忍不住要笑出來了， 孫先生於是解釋道：

「謝君的胃大概是不能消化，神經過弱，因此有這種現狀。」

說罷一笑置之，依然繼續下棋，到金雞報曉，才大家分別休息。孫先生這種解釋是在常識的範圍中，當然是很合理的；但這就是大概張永福所說的不可思議的問題吧，孫先生始終是站在指導的地位，對他們不斷地指導。還有一件故事，就是有一回，因為一個同志家裏的妻子小產，在晚晴園的幾個同志，偶然中批評起謝士，謝犯，畫安胎符，種種神話。孫先生也在座，聽了便說：

「這還可以用的。」

「果真有效麼？」他們問着。

「當然有效的。」孫先生很有定的回答。他們都很奇異，似乎不能相信孫先生的話，於是追問這有效的原因，孫先生就這樣說道：

「你們不必懷疑，這些是有科學原理可以解釋的；心理學和精神學二者，都可以造成這小產及安胎的原因，所以要有效果，還是從這方面去着手。譬如養有一對黑色的馬，你要牠受胎，將來生出來的是別種顏色小馬，這亦可以用科學原理把人工使牠變化；大凡畜牧家多能明白這道理的，我的哥哥在檀香山亦時時把所畜的馬匹改變顏色來玩耍。這可以知道凡受妊的孕婦，在精神上須有適當修養，調劑其意志，對妊娠當然有適當保護；但究竟亦以該婦人生平是否迷信為分別，如果這孕婦平素是迷信深重的，還是順她的意志用符法來安慰她，那當然就有可能有效果。」

這一個很圓融巧妙的解釋，自然說服了許多同志。但從這幾句話中，很可以看出孫先生對於中國民族的風俗和習慣，不肯跟着人家隨意批評反對的，他一面拿科學原理做根據，一面還是尊重自己民族的風俗和習慣的，所以許多同志除了絕對信服以外，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孫先生對於騎馬是很精明的，他可以坐沒有鞍子的馬，騎得很穩當，在新加坡時，也會騎馬到郊外去運動，所以隨口就拿馬變顏色來做例子，可見他對於騎馬的興趣了。

孫先生這樣的住了很久，新加坡的同盟會基礎已經很鞏固，於是準備推廣到其他各埠，親自帶了李竹癡、陳楚楠、林義順到吉隆坡(Kuala Lumpur)，在青年益智會居住，認識陳占梅、陸秋泰、陸秋傑、王清江、邱怡領、彭鏡波、劉襟和一位七十餘歲的老華僑阮英舫等，借了陸秋泰的花園開會，公舉王清江爲會長，和其他職員，於是吉隆坡的同盟會分會也開始成立了。孫先生一行人等，就沿途往大露巖(Parak)，怡保(Tech)一帶前進，想把會務更大的擴展開來。到了怡保，行裝已搬入新改良旅店，準備安歇。却不料這時候怡保的華僑勢力，完全被康有爲黨徒所佔據，那大資本家胡子春與廣西總督岑春萱是有些關係，因此希望帝統萬年，並且想藉康有爲的力量在滿清政府下面去做官；而那些其他聰明的資本家勢利之見本來是很深的，他們富了就要想貴，認康有爲是保皇領袖，自然想巴結他，以爲做官的終南捷徑。他們這樣的想着，同時就把孫先生等看做他們的敵人，因此一聞孫先生到來，就想以極大的阻力來打擊他。那時孫先生等因爲同處於他人統治之下，力量比較薄弱，敵不過這海外土豪紳的胡子春，當然以避衝突爲上策，所以看出風色不對，就乘夜偕林義順、陳楚楠、李竹癡等搬着行裝到別家旅館去暫住，第二天早上，回到吉隆坡，大家商量了一回，覺得同盟會的推廣工作，還是不能因此停頓，於是派林義順、陳楚楠二人到檳榔嶼(Penang)去，由孫先生寫了一封介紹信，給那邊的一個僑商吳世榮。孫先生等就從吉隆坡回到新加坡。不久，林、陳二人也回來了，向孫先生報告檳榔嶼的情形確是不錯，分會已經很順利的成立，孫先生聽了很愉快，因爲失敗於怡保，還能成功於檳榔嶼，革命勢力的擴張，不是沒有辦法的。

過了二個月，張永福等所負責通訊的福建黃乃裳，潮州許雪秋、陳芸生、蕭竹漪等，也先後到新加坡來見孫先生，報告閩潮兩處地方的情形、和運動的成績。因爲他們一向在那邊規劃起義的事情，和張永福等早有聯絡，當孫先生上一回在新加坡時，張永福等已經詳細報告過，孫先生要他們來加盟，所以這一次特地從潮州趕來，和孫先生見面了，就在晚晴園加入同盟會。大約又過了十多天，黃乃裳、許雪秋等領了孫先生的委任和機密命令，就分頭回去，準備一切。孫先生也交下祕密電碼和通訊方法，通訊地點等，帶了胡漢民和



魏信侍、陳和，回到日本去了。

孫先生回到日本的時候，派往各地的法國武官和隨同協助的同志，已經分頭積極進行，但歐極樂的事情，却已失敗了，不久，喬義生就從上海到東京來報告了。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喬義生奉到了孫先生的命令，引導歐極樂到武昌，就在武昌高家巷聖公會的日知會閱書報社開歡迎大會，軍界同志來參加的，座爲之滿。歐極樂演說革命，非常激烈，由喬義生當翻譯，大家聽得很奮發。但滿清官吏早已派了兩個密探，混在人叢中，有人說新軍統制張彪也化裝混在中間，這也是可能的事。於是一切的情形，都被他們知道，告訴了湖廣總督張之洞，因此，不久日知會會員劉家運、朱子龍、季雨霖、胡瑛等都以嫌疑被捕。這時喬義生已跟着歐極樂漫遊長沙、沙市、九江、南昌、南京、上海、廈門、福州各地，備受當地同志的歡迎。當他們回到上海時，本想再到武昌，但在報上却見到張之洞通緝喬義生的消息，因此就中止到武昌，歐極樂回到天津，喬義生既有到東京來了。孫先生聽到他的報告，非常惋惜。這時候，派往天津的廖仲愷，因爲他夫人何香凝的催促，早已離開那邊，因此孫先生就改派喬義生到天津去，歐極樂也表示非常歡迎。但是意外的事情，竟連續的發生，當喬義生正要出發到天津去的時候，忽接歐極樂來電，說：事已洩露，請暫緩行。隨後又接到他的報告。原來當他從上海回到天津的時候，滿清政府因爲得了張之洞的奏聞，就密派英人偵探，每日不分晝夜，偵伺左右。後竟賄通歐極樂南下的一個廚子，一天晚上，歐極樂出去時，忘掉鎖門，便給他乘機把所有南方通訊都拿去了。這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孫先生苦心孤詣的計劃，又遭了一次嚴重的失敗。

滿清政府得到了這一切證據，就向法國公使大開交涉。但這是孫先生和法國政府直接交涉的結果，法國公使事前是一些不知道的，所以他無法答覆滿清政府，就請命於他的本國政府。法國政府倒也痛快，他們教駐華公使不要顧問這件事，於是滿清政府無可如何，孫先生暗暗歡喜。可是不久法國政府改組，新起的內閣是不贊成這種政策的，於是把天津參謀部根本撤消，布加卑也奉召回國，孫先生的計劃依然不能實現，倒掀起了一個小小的國際風波，孫先生常常引爲這是一件憾事。

## 第三十章 革命方略

法國武官的調查工作，雖告失敗，但革命的聲勢已經比從前格外伸張了，孫先生趁着在日本有許多同志可以討論的機會，於是決定草訂革命方略，把革命進行的大綱和革命軍發動時對外關係，軍隊編制，籌餉，因糧，安民，招降等等要點，都規定在這裏，成爲一本革命黨人的必備秘本，這是孫先生革命理想和行動綱領具體完成的開始，是最有意義的一件大事。同盟會本部許多同志都很贊成這個提議，於是開始討論草訂內容的辦法。第一關於革命軍發動時發號施令的機關，主張必須組織軍政府，這是大家一致同意的。第二關於革命軍發動時應該有代表一種新的革命的旗幟，以有別於滿清政府的黃龍旗，却發生了許多紛歧的意見，孫先生的主張，是要沿用與中會的青天白日旗，他說：

「革命軍的旗幟，決不能忘掉最先流血的先烈的精神；青天白日旗是先烈陸皓東所發明的，與中會諸先烈爲了這旗而流血的，不知有多少，我們應該永遠留作紀念。」

「可是這旗幟的形式，太不美觀了，並且和日本的旭日旗相近，最易引起誤會的。」黃克強首先表示異議。

「青天白日的顏色，非常鮮明，是表示光明正照的意義，還不美觀麼？如果和日本旗相近，可以再加上一種紅色，成爲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三色旗（*Tricolor*），也是舉世共曉的民主主義的旗幟。總之，這旗是革命軍的唯一標識，我們必須要永遠採用的。」

「如果以與中會的旗來代替同盟會的旗，那末我們在湖南起義時也會用過一種旗，我們也可以說這是華興會的革命標識，要同盟會來採用它，因爲這旗也曾有人爲它流過血。」克強似乎帶了些意氣這樣說。

「我們平均地權的宗旨，是和古代井田的意思差不多，我們還是用井字來做革命的標識吧！」廖仲愷想緩

物兩方面的意見，這樣的提議着。

「用金瓜斧鉞式，以發揚漢族的精神，也可要得。」又是一種調和的提議。

「那還是用十八星式吧，以表示十八行省。」

「如果因爲三色太單調，可以增加爲五色，似乎更合乎中國歷史上的習慣，所以我們不妨採用五色旗。」這樣複雜而紛歧的意見，大家都不能解決了。這是很明顯的還是同盟會未成立前各地革命志士各自爲政的痕跡的遺留，孫先生爲顧全大局起見，不想以口舌來爭辯，祇有拿努力來表現到事實去。章炳麟、劉揆一等也沒法調解，主張把這個問題保留起來，暫時不討論，這一場辯論因此結束，但是在革命史上終於留下了一個遺憾，雖是此後潮、惠、欽廉、鎮南諸役起義，都用青天白日旗，克強也親身參加，率領英勇的同志衝鋒陷陣，對於這旗也表示默認了，然而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規定國旗，反沒有採用它，這不是顯示着同盟會同志的易於爲環境所轉移麼？所以這一次討論，大家對於，孫先生意見，不肯尊重，不能不說是革命史上的一個遺憾！

國旗問題既然擱置起來了，但孫先生主要目的，是在編訂革命方略，所以辯論終結了，就開始這革命運動綱領的規劃。幫助孫先生這一個重大工作的，是胡漢民和汪精衛。在這一箇方略中，孫先生當時全部的革命理想和計劃都已充分的表現出來了。全書共有十三節，一、軍政府宣言，二、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關係條件，三、軍隊之編制，四、將官之等級，五、軍餉，六、戰士賞恤，七、軍律，八、路地規則，九、因糧，十、安民布告，十一、對外宣言，十二、招降滿洲將士佈告，十三、掃除滿洲租稅釐捐佈告。關於革命發動後的各方面，都很詳細的規劃妥當。軍政府宣言，是一篇革命的真體綱領。第一段是闡明革命的意義，和軍政府的責任，說：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六十年之積腥，復四千年之祖國，謀四萬萬人之福祉，此不獨軍政府責無旁貸，凡我國民皆當引爲己責者也。維我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雖間有異族篡據，我祖我宗常能驅除光復，以貽後人。今漢人倡奉義師，殄除胡虜，此爲上繼先人遺烈，大義所在，凡我漢人

「當無不曉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國，祇以驅除光復自任，此外無所轉移。我等今日與前代殊，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之外，國體民生，尙當變更。雖經緯萬端，要其一貫之精神，則爲自由、平等、博愛；故前代爲英雄革命，今日爲國民革命。所謂國民革命者，一國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愛之精神，即皆負革命之責任，軍政府特爲其機關而已。自今以往，國民之責任，即軍政府之責任，軍政府之功，即國民之功。軍政府與國民同心戮力，以盡責任。」

這就是說同盟會的革命主義，一方面是承繼先民的遺烈，要恢復中華，驅除韃虜，但另一方面還要變更國體，就是創立民國；並且注重民生的暢達，就是平均地權的實行。也即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說明。這是國民應該共負的責任，所以說是國民革命；軍政府不過是一個推動革命的機關，它的責任和成功，就是國民的責任和成功。因此這宣言的第二段，就接着說明這四大綱領的要義，說：

一、驅除韃虜：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爲邊患。後中國多事，長驅入關，逼我漢人爲其奴隸，有不從者，殺戮億萬。我漢人爲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洲政府窮兇極惡，今已貫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清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爲滿奴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之國家。敢有爲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爲者，天下共擊之。

三、建立民國：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立民國政府。凡爲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共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爲者，天下共擊之。

四、平均地權：文明之福社，國民平等以享之；當以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爲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制國民之生計者，與共擊之。」

這個說明比起與中會宣言更有力且具體了，無疑的，這是孫先生革命經驗的進步。但是在這一篇宣言中，更重要的還有實行上列四個綱領的步驟的規定，使孫先生的革命抱負，更能具體的表現出來。這步驟怎樣規定呢？就是分爲三個時期，他說：

『第一期爲軍法之治。義師既起，各地反正，士地人民，新脫滿洲之羈絆，臨敵者宜同仇敵愾，內輯族人，外禦寇仇，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軍隊爲人民戮力破敵，人民供軍隊之需要，及不妨其安甯。旣破敵者，及未被敵之地方行政，軍政府總攝之，以次掃除積弊致治之害。如政府之壓制，官吏之貪婪，差役之勒索，刑罰之殘酷，抽捐之橫暴，辮髮之屈辱，與滿洲勢力同時斬絕。風俗之害，如奴婢之蓄養，纏足之殘忍，鴉片之流毒，風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縣以三年爲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軍法，布約法。

『第二期爲約法之治。每一縣旣解軍法之後，軍政府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會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及人民對於政府之權利義務，悉規定於約法，軍政府與地方議會及人民皆遵守之。有違法者，負其責任，以天下定後六年爲限，始解約法，布憲法。

『第三期爲憲法之治。全國行約法六年後，制定憲法。軍政府解兵權行政權，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以組織國會。一國之政事，依憲法中之行。

『此三期，第一期爲軍政府督率國民掃除舊污之時代；第二期爲軍政府歸地方自治權於人民，而自爲總統國事之時代。第三期爲軍政府解除權柄，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之時代。俾我國民循序以進，養成自由平等之資格，中華民國之根本，胥於是乎任焉。』

這個實行步驟的規定，在孫先生和保皇黨辯論中，大體已經說過，但這裏似乎說得更透闢，更具體。愛德華在革命的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一書說：『所謂革命，乃是在前此未經特定爲

「合法的」方式裏，由前此未經特定爲「合法的」機關，來執行統治權。革命在普通的意義中，是不合法的，除非得到成功，便立刻合法了。革命不是法律，但在一種真切的意義裏，乃是「超法律」。它乃是純粹的主權，乃是人民的意志，在直接的活動。所以它是一切法律的創造者與毀滅者，是一切權力的最初發動和最終的結果。這幾句話，很可以拿來說明孫先生這三個步驟的意義。因爲革命是超法律的，是一切權力的最初的發動和最終的結果，所以第一個階段，必須經過軍法時期，這軍法時期就是由軍政府領導國民推翻一切舊有的法律而實行革命的統治時期。但是軍法時期又可說是培養滋長民權的時期。孫先生說：「兵權一度，則民權亦一度，兵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所以軍法時期的後面，必須緊緊地接着約法時期。約法就是愛德華所謂是純粹的主權，是人民意志直接活動的產物，也就是由「不合法」的行動，而達到合法的。經過這兩個階段，而後實現憲政，民主政治的基礎，當然是非常鞏固的。這是孫先生規定這三個步驟的根本意義。梁啟超以及一切保皇派的種種懷疑和揣測，正如愛德華所說，是由於他們從法律假定(Legal Fiction)上所生出的迷信，他們距離瞭解革命意義的程度，不免太遠了。

革命進行的程序，既然有這樣精密的規劃，依這個方略而前進，當然第一步是軍法時期，所以這方略上除了上面一篇宣言以外，其餘都是軍法時期內軍事的規劃和一切重要工作的綱領，如軍隊的編制，將官的等級，軍餉，戰士的賞恤，軍律，略地規則和困糧等。安民佈告，對外宣言，招降滿清將士佈告和掃除滿清租稅釐捐佈告等，是預定着佔領一地方以後張貼的。方略第二節軍政府與各國民軍之關係及條件，是規定軍政府和各軍都督職權的分際，我們在這裏可以看出孫先生對於軍法時期統治機關運用上的理想。這條條的規定是這樣：

- (一) 各處國民軍，每軍立二都督，以起義之首領任之。
- (二) 軍都督有全權掌理軍務便宜之事。
- (三) 關於重大之外交，軍都督當受命於軍政府。
- (四) 關於國體之制定，軍都督當受命於軍政府。

(五) 國旗，軍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對外宣言，軍都督當依軍政府所定，不得變更。

(六) 略地，因糧等規則，軍都督當依軍政府所定，惟參酌機宜，得變通辦理。

(七) 以上各條，爲軍政府與軍都督未交通前之關係條件，其既交通後，別設規則以處理之。

第五和第六條差不多是關於革命方略上運用的規定。軍政府是事實上秉承革命領袖的意志而統治一切的，這個條文是說明軍政府和軍都督的關係，依照這條文做去，當然不會有意外的紛亂發生，於是革命方略上所擬設的一切辦法，都可推行無阻，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規定。

這是中國第一部革命經典，孫先生的革命主義和理想都已化爲條文和進行的程序，而充分的表現了。法國社會學家勒邦 (Le Bon) 曾經說過：一切大革命，必定有一種重要宗教成分，如果沒有超越理性的科學原動力，就沒有大革命。(The Psychology of Revolution) 這所說宗教的成分，是人類精神上自覺的表現，是給予在聖賢階級中的人的一種帶救力的暗示，使人們在這個新信仰之下前進。索勒爾 (Sorrel) 又稱這革命的精神動力爲 (Social Myth)，因爲這是從無效理有專物的批評與將來景況的無數希望中，逐漸浮現的一種新理想，是有一種新天地的描寫，使人易受感化。(Reflexions on Violence) 這樣說來，孫先生的革命方略，是給予人民一個最好的理想範疇了，它是綜合許多人的自覺而把它具體化了，它不僅有現有專物的批評，並且還有將來景況的規劃。無疑的，這是中國人新信仰的起點，是新的革命宗教的教條。因此，隨革命方略規定以後，中國革命的發動力更推進到另一階段，革命黨員的活動，更得到一個新的軌範，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變遷。

## 第三十一章 民報週年紀念與萍瀏起義

革命方略制定了，許多同志無形中都有了一個中心思想和運動的綱領，大家都很興奮的期待着革命機會的到臨。這一年（丙午年公歷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恰恰是民報發刊一週年的紀念，於是同盟會本部許多同

志都主張趁趁。孫先生在東京的機會，舉行一個紀念節的慶祝大會。孫先生也很贊成。開會地點，是在東京神田錦輝館，到會者有六千多人，全場空氣，非常緊張，比去年歡迎孫先生的大會，還要熱烈。主席是黃克強，報告開會宗旨後，由章炳麟宣讀祝辭。於是孫先生很安閑的走到演講台上，向大眾見面，開始發揮革命主義的真諦，滔滔的演講。六千多聽衆一見了孫先生，就掌聲不絕，夾雜一片萬歲的呼聲。孫先生說了幾句讓遜的話以後，就說到三民主義的本題道：

「……那民族主義，却不要什麼研究，纔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做路人；也決不會把古人當做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人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着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做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鼓掌）但是有最緊要一層，不可不知：民族主義並非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鼓掌）因為我漢人有政權，纔是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却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鼓掌）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那裏？政權在那裏？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地球上人數不過一千幾百兆，我們漢人有四百兆，占了四分之一，算得地球上最大的民族，且是地球上最老最文明的民族，到了今天却成爲亡國之民，這不是大可怪的麼？那非洲國杜，不過二十多萬人，英國去滅他，尚且相爭至三年之久，菲律賓島不過數百萬人，美國去滅他，尚且相持數歲，難道我們漢人就甘心於亡國？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鼓掌）閉眼想想歷史上我們祖宗流血成河，伏尸蔽野的光景，我們祖宗很對待住子孫，所難過的就是我們做子孫的人。（鼓掌）再想想亡國以後滿洲政府愚民時代，我們漢人面子上從他，心裏還是不願的，所以有幾回的起義。（鼓掌）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那滿洲人也倡排漢主義，他們的口頭話，是說他的祖宗有團結力，有武力，故此制服漢人，他們要長保這力量，以便永居人上。他們這幾句話，本是不錯，然而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是漢人無團體。（鼓掌）我們漢人有了團體，這力量定比他大幾千萬倍



，民族革命的事，不怕不成功。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鼓掌）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鼓掌）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不尋仇之理。他當初滅漢族的時候，攻破了，還要大殺十日，纔肯封刀，這不是人類所爲，我們決不如此。惟有他來阻害我們，那就盡力懲治，不能與他並立。照現在看起來，滿洲政府要實行排漢主義，謀中央集權，拿憲法做愚民的器具，他的心事真是一天毒一天，然而他所以死命把持政權的原故，未必不是怕我漢人要剿絕他，故此黔虎難下。所以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要把持政權，制馭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鼓掌）

「這是對於民族主義的根本意義，加以說明，並且指示狹義的排滿主義，不是民族主義的本旨，因為當時一部份同志不免誤解民族主義而有狹義的排滿趨勢，所以孫先生特別提出來聲明。但那時滿清政府假托立憲的名義，實行中央集權，以排擠滿人在政治上的力量，是很毒辣的手段，因此民族革命的運動，脫不了政治革命的意味，於是孫先生接着就說到民族主義：

「民族革命的大要如此。至於人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將來民族革命實行以後，現在的惡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掃而空，却是還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要去這政體，不是專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試想因太虛驅除蒙古，恢復中國，民族革命已經做成，他的政治，却不過依然開漢唐宋相近，故此三百年後，復被外人侵入；這由政體不好的原故，不是政治革命，是斷斷不行的。（鼓掌）研究政治革命的工夫，終我經營，至於着手的時候，却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接備滿洲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驅逐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講到那政治革命的結果，是建立君主立憲政體，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算漢人爲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佛蘭西大革命及俄羅斯革命，本沒有種族問題

却純是政治問題，佛蘭西民主政治已經成立，俄羅斯虛無黨也終要達這目的。中國革命之後，這種政體最爲相宜，這也是人人曉得的。惟尙有一層最要緊的話，因爲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會弄到亡國。因爲中國從來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爭，爭不到手，寧可各據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三百年，還沒有定局。今日中國正是萬國耽耽虎視的時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爭，四分五裂，豈不是自亡其國？近來志士都怕外人瓜分中國，兄弟的見解却是兩樣，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恐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鼓掌）

民族革命與政治革命的精義，經孫先生這樣一說，已經非常透澈。這是一個根本理論，要是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不相補而行，單純的民族革命的結果，是依然不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同樣的；在異族高壓之下，更不難於單純的政治革命。並且在民族革命的進程中，沒有政治革命的準備，便隱伏着革命勢力分裂的危機，這孫先生苦口婆心要切實糾正革命力量的一個重要說明。不僅僅是在理論方面的闡述。但中國革命是有三方關係的，民族的，政治的，方面的問題解決了以後，還有一個民生的問題。關於這問題，孫先生在以前很少系統的解說，這一回却發揚得格外淋漓。孫先生說：

「……如今先說民生主義，其要緊的原故。這民生主義是到十九世紀之下半年期纔盛行的。以前所以沒有盛行民生主義的原則，總由於文明沒有發達，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着緊，這個道理很覺費解，却可以拿淺近的事例來作實驗。大凡文明進步，個人用體力的時候少，用天然力的時候多，拿電力汽力比個人的體力要快千倍。舉例來說：古代一人耕田，勞身焦思，所產穀米，至多不過供數人之食，近世農學發達，一人所耕，千人食之不盡，因爲他不是專用手足，是借機械的力去幫助人工，自然事半功倍。故此古代重農工，因他的生產剛够人的用度，故不得不專注重生產，近代却是兩樣，農工所生產的物品，不敷不足，祇愁有餘，故此更重商業，要將貨物輸出別國，好謀利益，這是歐美各國大概一樣的。照這樣說來，似乎歐美各國應該家給人足，樂享幸福，古代所萬不能及的。然而試看各國的現象，與剛纔所說，正

是反比例，統計上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遍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裏，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貧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了。社會黨所以倡民生主義，就是因貧富不均，想要設法挽救，這種人；日與月盛，遂變為一種很繁博的科學，其中流派極多，有主張廢資本家歸諸國有的；有主張均分於貧民的；有主張歸諸公有的，議論紛紛，凡有諍見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是決不能免的，這真是前車可鑒。將來中國要到這步田地，纔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這種現象，中國現在雖還沒有，但我們雖或者看不見，我們子孫總看得見的。與其將來弄到無可如何纔去想大破壞，不如今日豫籌個防止的法子。況且中國今日如果實行民生主義，總較歐美易得許多。因為社會問題，是文明進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會問題也就不大，舉一例來說，今日中國貧民，還有砍柴割禾去謀生活的，歐美却早已絕跡，因一切謀生利益，盡被資本家吸收，貧民雖有力量，却無權利去做，就算得些蝨頭微利，也決不能生存，故此社會黨常言，文明不利於貧民，不如復古，這也是矯枉過正的話，況且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惡果，須要取那善果，避那惡果，歐美各國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總由少數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此不平等的世界。我們這國成命，不但要做國民的國家，而且要做社會的國家。（鼓掌）這決是歐美所不能及的。歐美為甚不能解決社會問題？因為沒有解決土地問題，大凡文明進步，地價日漲，譬如英國一百年前，人數已有一千餘萬，本地之糧，供給有餘，到了今日，人數不過加三倍，糧米已不夠二月之用，民食專靠外國之粟。故英國要注重海軍，保護海權，防糧運不繼。因英國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變為場，所獲較豐，且徵收容易，故農業漸廢。並非土地不足，貧民無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業却全歸資本家所握，工廠偶然停歇，貧民立時飢餓。祇就倫敦一城算計，每年冬間，工人失業的常有六七十萬人，全國更可知。英國大地主威爾遜士打公爵有封地在倫敦西區，後來因擴張倫敦城，把那地統圈進去，他一

家的地租，占倫敦地租四分之一，富與國家相等，貧富不均，竟到這地步，平等二字，已成口頭空話了，本凡社會現象，總不能全聽其自然，好像樹木由他自然生長，定然支蔓，社會問題亦是如此。中國現在查家還沒有出世，所以幾千年地價從來沒有加增，這是與各國不同的，但是革命之後，却不能照前一樣。比本方現在香港、上海地價，比內地高至數百倍，因為文明發達，交通便利，故此漲到這樣，假如他日全國改良，那地價一定是跟着文明日漲高的，到那時候，以前值一萬銀子的地必漲至數十萬數百萬。上海五十年前黃浦灘邊的地，本無甚價值，近來竟加至每畝百數十萬元，這就是最顯的證據了，就這樣看來，將來富者日富，貧者日貧，十年之後社會問題，便一天緊似一天了，這種流弊想也是人人知道的，不過眼前還沒有這現象，所以容易忽略過去。然而眼前忽略到日後却不可收拾，故此今日要籌個解決的法子，這是我們同志應該留意的。（鼓掌）聞得有人說民生主義，是要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爲己有，這是他未如其中道理，隨口說去，那不必去管他。（衆大笑）解決的法子，社會學者所見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地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爲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贏利八千，當歸國家，這於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永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歐美各國地價已漲至極點，就算要定地價，苦於沒有標準，故此難行。至於地價未漲的地方，恰好急行此法，所以德國在膠州灣，荷蘭在爪哇，已有實效。中國內地文明，沒有進步，地價沒有增長，倘若仿行起來，一定容易。兄弟剛纔所說社會革命在外國難，在中國易，就是爲此。（鼓掌）行了這法以後，文明越進步，國家越富，一切財政問題，不至難辦。現今苛捐，盡數蠲除，物價也漸便宜了，人民也漸富足了，把幾千年捐輸的弊政，永遠斷絕，漫說中國從前所沒有。就歐美日本雖說富強，究竟人民負擔租稅未免太重。中國行了社會革命之後，私人永遠不用納稅，但收地租一項，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國，這社會的國家，決非他國所能及的。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要落人後。（鼓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爲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總之，我們革命的目的，是爲衆生謀幸福。（鼓掌）

國不願少數滿洲人專制，故要民族革命；（鼓掌）不願君主一人專制，故要政治革命；（鼓掌）不願少數富人專制，故要社會革命。（鼓掌）這三樣有一樣做不到，也不是我們的本意。（鼓掌）達了這三樣目的之後，我們中國當成爲至完美的國家。（鼓掌）』

孫先生早期的平均地權的理論，在這一篇演辭中，可以看出一個概念了。所謂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富人之田爲己有，是暗指梁啟超的造謠，那時保皇黨頭腦的幼稚，也可想而知了。最後 孫先生又提出了一個新奇而精密的政治主張，就是五權憲法，這可算是第一次正式發表，孫先生說：

「尚有一問題，我們應要研究的，就是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憲法二字，近時人人樂道，便是滿洲政府也曉得派些奴才出洋考察政治，弄些豫備立憲的上諭，自驚自擾。（衆大笑）那中華民國的憲法，更是要講求，不用說了。兄弟歷觀各國的憲法，有文憲法是美國最好，無文憲法是英國最好。英國是不能學的，美國是不必學的。英國的憲法，所謂三權分立，行政權，立法權，裁判權各不相統，這是從六七百年前由漸而生成了習慣，但界限還沒有清楚，後來法國孟德斯鳩將英國制度作爲根本，參合自己的理想，成爲一家之學。美國憲法，又將孟氏學說作爲根本，把那三權界限更分得清楚，在一百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一百二十年以來，雖數次修改，那大體仍然是未變的。但是這百餘年間，美國文明日日進步，土地財產也是增加不已，當時的憲法現在已經是不適用的了。兄弟的意思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那五權除剛纔所說三權之外，尚有兩權：一是考選權。平等自由，原是國民的權利，但官吏却是國民公僕。美國官吏，有由選舉得來的，有由委任得來的，從前本無考試的制度。所以無論是選舉，是委任，皆有很大的流弊。就選舉上說，那些略有口才的人，便去巴結國民，運動選舉，那與學問思想高尚的反都因訥於口才，沒人去物色他，所以美國代表院中，往往有愚蠢無知的人，夾雜在內，那歷史實在可笑。就委任上說，凡是委任官都是跟着大總統進退。美國共和黨，民主黨回來是起而反對，逼着換了大統領，由內閣至郵政局長，不下六七萬人，同時俱換，所以美國政治腐敗散漫，是各國所沒有的。這

機看來，都是考選制度不發達的原故。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制度不好，却被外國學去，改良之極成了美制。英國首先仿行考選制度，美國也漸取法。大凡下級官吏，必要考試合格方得委任，自從行了此制，美國政治，方有起色，但是他祇能用於下級官吏，並且考選之權，仍然在行政部之下，雖少有補救，也是不完全的，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大小官吏，必須考試定了，他的資格，無論那官吏，是由選舉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須合格之人方得有效，這法可以除却盲從濫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中國向來銓選最重要資格，這本是美意，但是在君主專制國中，黜陟人才，悉憑君主一人的喜怒，所以雖講資格，也是虛文。至於社會共和的政體，這資格的法子，正是合用，因為那官吏不是君主的私人，是國民的公僕，必須十分稱職方可任用，但是這考選權如果屬於行政部，那權限未免太廣，流弊反多，所以必須成了獨立機關，纔得妥當。（鼓掌）一為糾察權，專管監督彈劾的事，這機關是無論何國皆必有的，其理為人所易曉，但是中華民國憲法，這機關定要獨立。中國從古以來，本有御史臺主持風憲，然亦不過君主的奴僕，沒有中用的道理。就是現在立憲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兼有監督的權限，那權限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比方美國糾察權歸議院掌握，往往擅用此權，挾制行政機關，使他不得不頹首聽命，因此常常成爲議院專制，非有雄才大略的大總統，如林肯、麥堅尼、羅斯威等，纔能達行政獨立之目的。況且照正理上說，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却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論理上說不去的，故此這機關也要獨立。（鼓掌）合上四權，共成爲五權分立，這不但在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见，可謂破天荒的政體。兄弟如今發明這基礎，至於那詳細的條理，完全的結構，要與大眾同志協力研究，匡所不逮，以成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這便是民族的國家，國民的國家，社會的國家，皆得完全無缺的治理，這是我漢族四萬萬人最大的幸福了，想諸君必肯擔任，共成此舉，是兄弟所最希望的。」

孫先生說到這裏，一篇莊重的演說辭竟告一結束，全場震聲大作，並且高呼萬歲，孫先生帶着和藹的笑

容，走下了演說臺。接着還有章炳麟的演說，也極慷慨淋漓。主席黃克強於是又介紹日本來賓斷水、外柔、宮崎資勳、二秋菴、鳳梨、懷仁等相繼演說，他們都是東京革命評論社社員，對於中國革命是很熱心贊助的，因此所說的都是激勵我們革命黨人的話。日本來賓演說完了，黃克強起立又作一個總括的說明道：

「今天 孫先生所說的，是革命的宗旨及其條理，章先生所說的是革命實行時代的政策，各位來賓所說的是激發我們革命的感情。大抵諸君聽見，沒有不表同情的。但是兄弟所望於諸君的，却還要再進一步。表同情三個字，不過是旁觀的說話，凡是革命的事業，世界人人都表同情的，惟有自己的國民，却不是要他表同情，是要他負這革命的責任。（鼓掌大喝采）諸君現在都是學生，就拿學生的責任來說，一千八百七十年的時候，奧國宰相梅特涅利用俄皇的勢力，結神聖同盟會，壓制革命黨得普王的贊成，到了十月，開宗教革命三百年祭，同利俾瑟戰勝紀念祭。耶路大學學生齊去市外運動各州響應，革命黨從此大盛，這樣說來，歐洲大革命的事業，是學生擔任去做的。（鼓掌）日本的革命，人人都推西南一役，即西鄉隆盛所倡率的義師，就是鹿兒島私立學校的學生；這樣說來，日本革命的事業，也是學生擔任去做的（鼓掌）諸君莫要說今日做學生的時候，是專豫備建設的工夫，須得要盡那革命的責任。今天這會就是我們大家拿赤心相見，誓要盡這做學生的本分的。（鼓掌）」

這樣一說，全場空氣格外緊張了。於是同盟會會員田桐、喬義生等四五人都紛紛演說，對於革命大義，大家盡量發揮。這一個慶祝會，在革命史上可算是空前的盛況了。

在這緊張的革命空氣中，萍瀏起義的消息，突然傳到東京，這是使許多同志格外興奮的一件事。但萍瀏黨人的起義，早已醞釀很久了。當革命方略制定後不多時，東京同盟會幾個熱心的會員，如劉道一、蔡紹南等早已回到瀏陽、醴陵、衡山等處去鼓吹革命，這幾處本來是湘贛兩省哥老會聚合的淵藪，前年長沙事情失敗後，哥老會大龍頭馬福益逃至廣西，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年）他從廣西回到湖南，想在瀏陽再起義，不幸給江督瑞方捕獲了，施以酷刑，然後絞掉，哥老會人聽到這消息，都非常憤恨，早想起來爲他報仇。這一年贛、湘、

鄂各地恰恰都鬧饑荒、萍、醴、瀏幾縣，更鬧得厲害，許多工人，受到米貴減工的打擊，對於地方官吏更滿懷怨恨，許多曾經馬福益領導過的會黨頭目，如李金其、蕭克昌、龔春台等，久有揚臂的大志，一聽了劉道一、蔡紹南等的鼓吹，格外興奮起來了。於是第一步運動萍鄉礦工首先發難，分三路進兵：一據瀏陽進窺長沙，一守萍鄉安源礦路為根據地；一由宜春、萬載，東出瑞昌、南昌，以進取江南。定於十二月各處同時起事，但因爲事機不密，先期洩露，姜守旦、龔春台等，就急急在十月十九二十等日，在瀏陽縣屬的高家頭、金剛頭；萍鄉縣屬的高家壑等處發難起來了。二十一日萍鄉的礦工攻佔上栗市，二十二日，瀏陽的會黨，在文家市、牛石嶺、紅錢鋪、永和市、官莊等處，同時發難，佔領南高市、西鄉潭、塘高址，官服、太監調請地，與萍鄉上栗市，袁山關等處的革命軍相呼應。駐津、瀏、醴的湘軍，都被革命軍打敗，革命軍的聲勢，已漸展到衡山、宜春、萬載各地。湘、鄂、贛、蘇四省督撫，都非常震驚，立刻飛調大軍圍攻，革命軍到底是缺乏軍事智識的訓練，經不起和久練的滿清軍隊抵抗，於是從最初的勝利而變爲最後的慘敗，殉難的黨人，有一百數十人，其他被株連通緝的也很多，是惠州革命以後，最悲壯的一幕了！

劉道一等從東京回去的時候，原是出於個人的熱心，孫先生事前是沒有知道的，等到萍鄉的事情發動了，才知道他們正在熱烈的幹這悲壯烈的義舉，非常快樂，就和黃克強商量，派甯調元、胡瑛、馮卓林、孫毓筠、段書雲、樑道涵等，分赴湘、鄂、蘇、皖、贛各省，聯絡軍隊，急圖響應。同盟會許多會員也都激昂慷慨，想飛渡內地，與滿清去拚命，每天到機關部去請願的很多，稍有緩却，就痛哭流涕，以爲求死不得，大家革命情緒的激越，可算自發動革命以來最顯著的，但南方失敗的經過，似乎大匆促，這許多熱血同志，已經避不及了，甯調元等都被各省監禁起來，楊卓林並且在南京被害。劉道一在衡山鄉中，聽到萍鄉的消息發動了，也不及參加，想到長沙有所計劃，被撫署遊擊熊得壽逮捕繫獄，在瀏陽門外加害，這一次失敗的起點，真是悲慘極了！孫先生聽到劉道一的死耗，萬分悲痛，從熱淚中寫了這樣幾句哀詞：

牛壁東南三楚雄，劉鄒死去霸圖空。



尚餘遺孽艱難甚，誰與斯人慷慨同？

塞上秋風悲戰馬，神州落日泣哀鴻！

幾時痛飲黃龍酒，橫攬江流一篲公！

這沉痛的哀詞，不但是憑吊劉道一，是憑吊許多為萍瀏起義而犧牲的烈士，也是孫先生對於革命熱望的表示。真的，滿清的遺孽太多了，還有誰來繼續剷除呢？革命的大業，是永遠須要繼起的慷慨悲歌的烈士，但無論失敗到怎樣地步，這一次起義，是顯然增加了很多革命的聲勢，也是給孫先生不少的革命成功的希望。

## 第三十二章 日本放逐與南方革命的再起

萍瀏起義失敗以後，民氣的激揚，已不可復抑。滿清政府知道這是由居留東京革命黨人鼓勵而起，因此命出使大臣楊樞力求日本政府驅逐革命黨重要人物出境，使他們無活動餘地。日本政府爲要討好於滿清政府並希圖從中索取權利起見，竟答應了，在紀元前五年（一九〇七年）一月，正式迫孫先生離境。這是孫先生的家常便飯，十二年前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香港政府就有禁止五年入境的命令，到紀元前十二年（一九〇〇年），已五年滿期，孫先生上岸了一下，又重申前令，革命黨人的生活，是常常遭受人家威脅的。但這時孫先生活動的範圍，比從前更廣大了，因此對於日本放逐的命令，毫不在意。同時孫先生因爲萍瀏起義失敗以後，必須要繼續不斷的從事實際行動，使滿清政府疲於奔命，而且上一年早已派黃克強到過廣西，和桂林巡防營統帥郭人漳游說反正，現在郭人漳的軍隊，剛由廣西調到廣東的羅定，正是活動的絕好機會。另一方面，在潮州黨人的運動，已經成熟，準備起事的報告，正在這時到達，潮州的事情，是由許雪秋主事的。雪秋自在新加坡加盟，奉了孫先生命令回來以後，積極進行，事機更熟，孫先生也派了喬義生、方瑞麟、郭守教、張煊、方次石、方漢城、梁鳴九，及日本同志菅野長知，池亨吉等前往援助，於是決定一月七日發動，分兩路

起事，一路從浮山進取郡城；一路從黃岡進取汕頭；第一路有郡城內的十八館同志爲內應，第二路由惠來、陸豐、揭陽、豐順等地同志，準備響應。其他總務，財政，外交等事宜，也都派定了負責的同志。這樣決定了，就在七日晚上發難，許雪秋、方瑞麟、謝良牧、李次溫等都騎了馬到涵子橋邊，靜候義軍到臨。但浮山一路發動後，數百同志走到澄福舖，忽然風雨大作，各鄉同志不能如約集合，祇在大雨淋漓中旋聚旋散，不能到達潮州城。雪秋等候至天明，看見毫無動作，就悄然而散，黃岡一路也停止發動，這次的事情，就這樣流產而失敗了。雪秋於是一面通告各同志暫停動作，一面把經過報告孫先生，孫先生接到了報告，就答覆道：「以後潮屬舉事，須與惠州欽、廉同時並起，以牽制清軍，萬勿浪孟從事，徒傷元氣。」因爲孫先生早有準備西南大革命的成算，所以要雪秋等待機再動，一面也就決心離開日本回到南方來了。

在這裏我們必須要特別說到的，承繼孫先生革命大業，現任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蔣介石先生就在這一年，由於陳英士（其美）先生的介紹，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他那時正在東京振武學校（士官軍校的預備學校）肄業，醉心民族主義，他在自題照像上有這樣幾句詩：「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他抱負的偉大，於此可見。董顯光所著蔣介石先生傳中，有這樣的記載：

「當這位認真的青年站在孫總理面前的時候，孫總理立即感覺到蔣委員長一定會負起革命的實際行動來。在孫總理舉行了某一次熱烈的演講之後，這一位年輕的士官學生便跟他討論起一大批的革命計劃，當時孫總理就受到很大的感動，曾經把這事情向陳其美說過。他指着蔣委員長說：「將來這個青年一定成爲我們的革命事業中的英雄；在我們的革命運動中，就正是需要這樣的人物。」（Holliston K. Torg: Chiang Kai-Shek Soldier and Steerman）

這一段事實，太富有歷史意義了。可惜那時並無大藝術家在場，否則很可以把這革命的開創者和偉大的承繼者的有歷史意義的聚會描繪出來，使它永垂不朽。

這時候孫先生很窮困，竟沒有方法籌集一筆旅費，正好有一個日本朋友鈴木五郎仗義疏財，他是一個道

船發財的人，宮崎和他非常熟識，就運動他幫助了一萬四千塊錢。孫先生有了這一筆款，就很有把握了，於是拿二千元交給民報社作為出版費用，其餘都留作同志的路費。但民報社一部份同志，對於孫先生這種辦法，竟發生許多誤會，因此起了種種糾紛，我們留待以後再說。

這次跟孫先生一路去的，有黃克強、胡漢民、汪精衛等，二月初一日到香港。孫先生派克強、精衛留駐下來，準備到鄂人漳營中去游說。克強住在一家日本人開設的松原旅館，是要避免外人的注目。但不久有一個同志張伯喬從廣州來報告消息，說人漳又調駐欽州，並且省城的當局已探得克強的行蹤，要求港督引渡。同時松原旅館也忽然有幾個清吏派來的偵探窺伺；克強知道一時不易着手進行，因此派胡毅生跟人漳到欽州，相機行事，自己就回到日本。精衛和漢民也搬到普慶坊機關部去暫住，於是許多同志，如許雪秋、劉師復、鄧子瑜、廖平子等都來接洽；經過幾次計議，他們都先後分赴廣州、汕頭、歸善、欽州各地去積極進行。孫先生也帶了胡漢民到新加坡轉往安南，經營粵、桂、滇軍事。

孫先生坐的是日本船，先到新加坡，就擱了幾天。負責潮州軍事的幾位同志如黃乃裳、許雲秋、陳芸生、蕭竹瀾等，也都先後到新加坡晚晴園來，向孫先生報告一切，面領機宜以後，就回去分頭工作。孫先生又和張永福、林義順、陳楚楠等會面幾次，準備趕赴河內佈置一切。離行時交下密電碼，通訊暗號及通訊地址等。在革命運動中，通訊是一件很重要的技術，關於革命起義的情報，軍事機宜的指示，軍械軍餉的籌劃，和其他一切活動情形，都須要通訊來聯絡和指揮。孫先生在這一個重要技術上，也費了不少腦筋。三年以前，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年）孫先生匆匆過此時，曾和張永福等約了一個密電，那是很簡單的，祇是就已有的電碼，稍為變通它的番號罷了。當日約定的原則是：來電照加一〇三，去電照減一〇三。如收到來電是二二二三，就應該加上一〇三，即二二二六號，是代表電碼上的一個什麼字。如果要發二五九六這個字，則須減去一〇三，用二四九三這個假號發出去。這種辦法，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似乎和明碼一般，完全不能保持甚麼秘密，但在那時，也有它的效力。

孫先生這次在新加坡，又自己發明了一種新的電碼密本，親自編寫，印發應用。以後就成爲同盟會在紀元前四十年左右通用的密本。全部密碼共計二十六頁，每頁用一個英文字母代表，但不必依次排列。每頁之內，各分十行，每行二十字，全頁二百字。二十六頁統計，除少數空格之外，共約五千多字，普通所用的字數，大體已敷。至於它的用法，大致如下：

每面十行，各以一個字母代表。由左至右，分寫上 A B C……J 等。每行二十字，同樣各以一個字母代表，由上至下，分寫 A B C……T。因爲當時收發電報，多在海外，故以英文爲主。應用的辦法，是以三個字母爲一組，把它看成一個單字，再查電本。第一個字母，代表頁數，A 字母查 A 面，Y 字母查 Y 面。第二個字母，代表橫直的各列，如 G 字母在第七行，S 字母在第十九列。第三個字母，代表直的各行，照中國習慣由右至左的數法，B 字母在第九行，H 字母在第三行。拿目前通用的密碼本來說，即是先橫後直的意思。不過目前的中文電報，是以四個號碼組成一個單字，前兩個號碼代表頁數；而這個辦法則以三個號碼（字母）組成一個單字，把第一個號碼（字母）代表頁數罷了。當時的原電，現存的已少，我們曾經在張永福所著『南洋與創立民國』中，見到一張影印的電稿，茲將原文列出，並舉例說明於下（同時亦可大略推知密碼全部）：

原電係以五個字母組成一個單字，共十二字。Keann weach rihgy Jrimj siewh

haina enieh retwh rthiy exreh bheiz myfzo

但把每三個字母看成一組，當做一個單字來算的話，則共有二十字。如：

Kea mnw eae hnl hgy jri nls dax hhn ina emi ebr elw

rih hly exp alh sci zmy fxj

按密碼本翻出來，乃是「××君昨晚由西貢搭法公司來星望落船招待孫。」

爲甚麼發電時用五個字母爲一組，而譯電時又用三個字母爲一組呢？這除了關於祕密的作用以外，還有一個節省電費的好處。照當時電報局的通例，明碼每字不得超過十個字母，急電或緩電相同；密碼則祇以急電爲限。

，而每字不得超過五個字母。因此，孫先生爲達迅速和節省的目的，便決定了這個辦法。比如上面所舉的例，電報紙須付出十二個字，却可以收到二十個字，幾乎能節省一半。如果祕密洩露，又可隨時另行約定，更改頁數的字母，和將橫直字母的次序改換。

以後（紀元前二年），孫先生在日本又另外印有鉛本一種，字數稍多，字母的編排也稍有不同的地方。此外，還有一種文字信件祕密通訊法，原底式也由張永福保存着，是用表格式，直行十八格，橫行二十五格，填直行格內，每行可填入幾個數目，每一個數目下，空着不填，由右至左，按次填去。全頁共有九十九個數目，由一至九十九。沒有填數目的格內，不是完全空着的，間或填入特別的記號——○。全頁共有二十五個圈，分註在三、六、一〇、一四、二〇、二五、二八、三〇、三四、三八、四一、四五、五〇、五八、六〇、六三、六五、六九、七一、七七、八二、八六、八八、九四、九八等二十五個數目下的空格內。這種圈的分佈，沒有一定的規則，既是任意錯亂的羅列，則除了保存這個底式的人以外，便不容易找到線索。可惜張永福對於這底式的用法，沒有說明，大概這一個個圈，就是所代表的祕密符號了。從這一件小事情上，我們可以知道孫先生對於革命工作的規則，真是無微不至，精神實注。

孫先生離開了新加坡，就到西貢，又轉赴海防。在西貢時，和王和順等會面，並由和順的介紹，認識了一個在法國銀行裏當買辦的曾錫周。這位曾錫周很能幫助革命，前後捐助的錢不少。

由海防到河內的時候，甄吉亭、黃隆生、楊壽彭等都熱誠招待。孫先生爲避免人家的注目，仍用五年前到此用過的假名，叫做高達生，漢民也改稱陳同。在甘必大街六十一號租了一所房子，作爲機關部，開始和在安南的同志接洽。孫先生的行動，十分機密，他曾致函新加坡同志張祝華說：「河內同志已成立分會，諸會員多熱心之士，辦事認真。惟弟居此，嚴守機密，除三四辦事之人外，無知弟在此者。兄處如有舊信至河內分會，不可提及弟之所在。其與弟往復信件，若係公函，可寄至香港轉交，若係兄等祕密函件，則寄來此處。因現在有事之時，較諸平日，更當機密，方便於籌策。兄對於新加坡同志，亦望堅守此祕密爲要。」

這時，關於經費的籌劃，是很困難的。孫先生曾經寫信給香港馮自由，要他和陳少白向香港富商陳庚如、陳席儒、楊西巖等，合籌軍餉十萬元。少白曾於去年（丙午年）爲了粵督岑春煊攘奪粵漢鐵路的事情，和陳楊等一致反對，在他所主持的中國日報上，大事鼓吹，因此他和陳楊等原是很熟悉的。但他這次把孫先生的信送到德忌利士輪船公司陳庚如以後（陳爲該公司買辦），竟杳無消息。因此他很悔恨當初不應和這些資本家合作，第二天在中國日報上發表民族與鐵路一文，痛論：『今日救國，須以實行民族主義爲根本問題，根本既解決，則其他枝節可以迎刃而解，爭路事件不過枝節之一端，有志救國者，應從根本設想。』孫先生知道了這消息，也很失望。幸這時還有商賈曾錫周等的幫助，此外河內同志楊壽彭、黃隆生、梁和、甄吉亭等，海防同志劉岐山、甄璧等，提岸同志李曉初、李卓峯、黃景南等都先後贖助巨款，不致陷入絕境。其中黃景南是在提岸開設賣豆芽小店的，市人都稱他爲『芽菜祥』，他因爲傾慕孫先生的人格，信仰孫先生的革命主義，每天把賺下來的錢，都存貯在『撲滿』裏，拿來捐助革命軍餉，尤爲難能可貴。同時，孫先生又忽然想起了前年在歐洲遇見的張靜江，他約定祇要拿A B C D E幾個字母打電報去，就可依照數目寄款子來，因此命漢民打一個A字電報去試一下，果然不久就有一萬元匯來了。這樣經費有了來源，就準備各方面軍事的發動。

孫先生這時期的軍事計劃，是側重在惠州、欽廉等地。惠州的事情，想從潮州兩陽等處，同時並舉，使清軍不能兼顧，潮州余既成恰恰這時也到安南，孫先生就要他回去準備發動。當余既成回到潮州的時候，黃岡同志因前次失敗後，正在待機再起，設立總機關於挑水巷泰興號，定三月一日，合海陽、揭陽、惠來、饒平、澄海各縣，同日舉事。各方面都部署略定，不料事機不密，被黃岡都司隆啓，同知謝蘭馨偵悉一切，立刻報告了潮州鎮總兵黃金福，金福於二十一日派兵捕去余姓二人，形勢就緊張起來了。余既成、陳湧波到香港向汪精衛等報告，這時漢民也奉了孫先生命令到香港來幫着主持一切，各同志都主張先舉事，以便營救被捕同志。漢民說：

『這不是孫先生原定的計劃了，必須靜待一下，萬不可因這小故就輕舉妄動，這無計劃的舉動，必然遭受很大的無謂犧牲。我們應該候孫先生命令到達以後，再發動不遲。』

「我們的同志，因為人被清吏捕去了，都非常憤激，形勢十分緊急，怕再不能制止他們不動了，並且逼着激昂的士氣，似乎很可發動一下，也不失為一個利用機會的上策。」既成和湧波都這樣主張。

「既是這樣，你們不妨先回去，和黃岡諸同志仔細商量一下，如果能夠靜候，就候到孫先生命令來了以後，和惠州、欽、廉同時舉事；如果的確不能制止他們的動作，就請先打電報來，以便準備。」漢民還是很懇切的勸着，說罷，又拿了一束電報紙，交給余陳二人，留作打電報用。

既成、湧波走後，漢民也就把這些情形報告孫先生，但很久沒有消息。大約在四月初，有黃岡紳士余某，突然把二十多黨人的姓名，密報守備黃其藻，其藻就轉呈鎮總兵黃金福，於是已熄的革命火焰，又燃燒起來了。黃金福也正等着機會要撲滅革命黨，接到密報，就派巡防營哨弁蔡河宗帶兵前往查辦，定四月九日出發。但黨人早於八日得到這個消息，決定先發制人，由吳炳文、吳稚等統兵數百人，在九日晚上，埋伏於黃岡附近，等蔡軍經過，就起來截擊。可是等到黎明，蹤跡杳然。原來蔡河宗從洲洲航路而來，已進紮協署了。黨人的計劃既然失敗，本來可以暫時不動，但跟着蔡河宗來的一個偵探，仗勢橫行，聲言要搜查泰興機關，因此又激起黨人的憤恨，立刻開會討論應付辦法。但倉卒之間，大家還沒有具體主張。這時湧波、既成恰從汕頭帶了一筆款子回來，主張立刻舉事，遲了就被敵人所制，一面派余耶到汕頭傳達消息，一面派余永興於十一日下午七時在距離黃岡三里的連厝，召集各同志，聽候調遣。這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天朗氣清，黨人的精神都興奮極了，九點鐘時已會集七百多人，隊伍整齊，號角齊鳴，聲勢非常浩大。由主盟余永興誓師，並宣佈軍法十條，一時軍聲雷動，震撼了靜寂的山岳。誓師典禮告終後，已經十時左右了，就開上前陣，由湧波、既成等領一隊入南門，攻守備署；由林鐘、張亦麒、張躍等領一隊入東門，攻拓林司巡檢署，由余渭螺、余御言，余寶等領一隊入西門，攻海防廳和都司署，主力軍集中在協署。那時清兵駐守協署的，除蔡河宗一哨外，還有警察三十人。革命軍一下衝鋒令，就擊斃了兩個守衛的清兵，其餘部隊都退守二門，死力抵抗，大家相持不下，湧波見形勢不佳，急中生智，就把協署縱火燒起來，以寒敵心而壯士氣。不一回，火光冲天，軍威大振，蔡軍失去了

屏障，祇有鐵械投降。同時攻打南門，東門，西門幾路，也大獲勝利，俘虜拓林司巡檢王繡武和城守把總許登科，因為他們都不肯受命，於是宣告死刑。此外都司陸啓同知謝蘭馨和士紳余某等也都逃了，革命軍因此佔領了黃岡。雪秋原由孫先生早委定為東軍都督，但這時遠在香港，因此大家都推余既成為正司令，陳芸生、陳湧波為司令，在舊都司署，成立軍政府，依照革命方略的規定，就布告安民，並通知商店照常交易，廢除一切苛捐雜稅，人民都歡欣鼓舞的表示擁護。

黃岡在滿清政府統轄之下，輕輕地被革命黨奪回去了，這是在革命史上何等光榮的事情；在滿清官吏的心目中，却急得魂不附體了。兵備道沈傳義接到黃岡失守的消息以後，就挈眷逃到汕頭，急電粵督周馥報告，周督也就下令統帶胡令官率第十二營，水師提督李准率親軍三營續備隊一營，馳往救援。並電兩福建總督請派漳州鎮督帶福毅常備軍赴詔安堵截會攻；一面痛責黃金福失職之罪，着即立功自贖，鬧得滿城風雨。黃金福迫不得已，率領了他的部隊扼守泮州要道，於是又掀起了一場革命戰爭。

當黃金福部隊開向泮州的時候，泮州的同志，就飛報黃岡軍政府，請求派兵迎擊，並願為內應。十三日傍晚，余既成、張亦麒就帶了一軍到泮州去預備迎戰黃金福，陳湧波也總領一軍往攻潮汕。黃岡距離泮州，大約有二十里路程，必須經過兩道小河，第一道河的水很淺，可用竹筏渡過，第二河就是巫峽河，水很深，非用船不可。但大隊人馬到了河邊，想渡河是很困難的，因為船隻缺乏，是最顯著的事實，於是祇有用小艇陸續的載運過去，這樣很遲緩的前進，時間是很不經濟的，等到人馬完全渡過，已經東方大白了。清軍早已發覺革命的行動，因此頗有準備，革命軍祇是把他們的鎮姓巡官一名擄去。待兩方隊伍接近時，忽然聽到鑼聲大響，革命軍以為這裏鄉人的內應，就趕緊開向前去。不料這正是清軍的詭計，他們早已暗通這鄉裏林姓大族，聯合來犯，因此革命軍前進時，就彈如雨下，頓時陣亡了五十餘人。湧波正在出發潮汕，一聽到泮州戰情緊急，就回頭趕到泮州來助戰。這時清軍已佔據了東灶後高山，革命軍開到下園鄉，就分兵將黃金福包圍，血戰二小時，清軍已有不能支持的形勢，革命軍正逼迫他們繳械，忽然從山上望見一隻輪船很急速的開來，清軍知道他們



的救兵到了，就死力抵抗。加奔泮州鄉人又幫着清軍內散兵幾百人，冒死衝鋒救，被圍的清軍，立刻增加了生力，革命軍却寡不敵衆，因此祇得退守下圍鄉。

留守黃岡的陳芸生、方漢城等幾個人知道前方吃緊，一面電知香港同志，請他們探報廣州的軍事行動，一面親率百餘人前往泮州助戰。但這時清軍扼守險要，居高臨下，處處都佔着便利的形勢，革命軍雖奮勇進攻，但軍械窳劣，射擊力不能到達清軍，自十五日清晨一直到夕陽西下，死傷了不知多少，大家知道萬無勝利的希望了，因此又退回到黃岡來，準備整軍再戰。但黃岡人民看見革命軍退回城裏，不免浮動起來，一時謠言紛起，陳芸生爲鎮定人心起見，就把已捕獲的鎮巡官和偵探魏大老等六人正法，一面即在當天晚上又集隊出發潮汕。不幸李準帶兵二千來汕抵抗的消息，忽然傳來了，基礎未固的軍政府同志，當着這樣勢窮力蹙的情形之下，自然不能再應付，大家很焦急的商量着，有的主張退守饒平，這是一個掩土重來的計劃。但當芸生發現僅有足夠一天的糧餉以後，知道再沒有維持的可能。他又不忍向人民搜括，經過幾次鄭重的討論，祇有暫解解散軍隊，等機會到了再勦。這樣決定了，由既成、余道等十餘人沿途保護着方漢城、陳芸生到香港，湧波也率領了十個同志避匿黃岡左近的南嶺山。轟轟烈烈的黃岡革命，就這樣失敗了！黃岡人民自革命軍克復以來，立刻感到是從滿清政府束縛之下解放出來了，所以都很愉快的安居樂業，一見到軍隊解散了，却起了極大的恐怖，爲的恐怕無紀律的清軍騷擾，因此在十六日早上全城七八萬人，都攜老帶幼，各自逃生。黃金福起等還不敢進城，直等到蔡河宗報告革命軍已全都撤退，才敢帶兵進城，但清軍一進了城門，就大肆搶掠，到十八日，惠潮嘉道，潮州府才出示安民，人心稍定，逃亡的人民，也漸漸地回來，這一個革命後的騷動，也平靜了。從一月七日，潮州事情到這次黃岡起義，是孫先生革命運動第三次的失敗，同時也是前次惠州失敗以後，第一次在南方革命的再起。

孫先生在潮州黃岡軍事運動進展中，早已向日本祕密地訂購軍械，想從潮州海口、泮洲港、籍盤港、後宅港等處選定了一個地方起卸，但正在兩方洽商中，黃岡的事情，已經在很短促的時期內失敗了，運械的計劃，

也就暫時停止。同時孫先生也曾令調黃耀庭、余紹卿、鄧子瑜三人從南洋回到香港來規劃惠州和陽江、陽春等處軍事，以便響應黃岡。黃耀庭在庚子惠州、三洲田一役，曾充革命軍先鋒，大家知道他是善於作戰的，並且與惠州會黨素來極有關係，所以孫先生要他擔任這次惠州發動的主幹。余紹卿是兩陽大盜，在綠林中很有號召力，教他在軍事上活動，也很適宜的。但他們三人於三月初回到香港機關部，余紹卿領去了一千五百元以後，就杳無消息，黃耀庭也領了一千二百元，聽到香港警察對他注意，就急急的逃回新加坡，再不敢問事了，祇有鄧子瑜一個人還留在香港進行一切。孫先生知道余紹卿走了，原是野性難馴，不足深責，但黃耀庭居然也怕警察而逃，倒不免有些詫異，但也無可如何，祇是笑着對左右說：

「黃耀庭怕是患了畏葸病吧！」於是惠州的事情，都責成鄧子瑜一人擔任了。

鄧子瑜與內地會黨也很通聲氣的，他原定計劃，在歸善、博羅、龍門等處分三路起事，派陳純、林旺、孫鶴等統率同志，但結果祇有七女湖一路發動。七女湖距離惠州府城二十里，是歸善縣的著名墟場。四月二十二日少數會黨就揭竿而起，一舉而劫奪清軍防營槍械，斃巡勇及水軍巡船哨弁多人。二十五日，進攻泰尾，守兵聞風就逃，於是連克楊村三蓬等墟。二十七日又乘勝進展至柏塘，清軍拒戰，被革命軍殺了一個哨弁，並且把他們完全繳械，跟着又分攻八子爺、公莊等處，各鄉會黨都紛紛來會，聲勢大振，震動了惠州城的人心。惠州官吏立刻向省城告急，粵督急徵調駐惠各路營勇。東路巡防各營管帶洪兆麟、李聲振、吳贊等率所部合拒，猶恐兵力不敷，又調新會右營守備中踏巡防第十營管帶鍾子才趕速赴援，這時革命軍在水口、橫瀝、三徑、蕉浦等處進兵，已經很順利，所向披靡。當五月二日，洪兆麟率兵到八子爺時，林旺所部從山上激擊，洪兆麟中鎗墜馬，士兵死傷的，更不知其數。李聲振、鍾子才各部也連戰連敗，革命軍的聲勢，真是壓倒了腐敗的清軍。

李潛的水師這時剛到汕頭，本想攻撲黃岡的革命軍，但黃岡革命軍早已自動退却。粵督就急電李準要他從汕頭移師惠州，順道由澳頭登岸，革命軍也就奮力迎戰，混戰了十多天，來去飄忽，使清軍疲於奔命。但不久鄧子瑜從香港派人來報告，才知道黃岡起義失敗後，沒有其他響應，並且彈藥缺乏，勢難持久，因此祇有把

隊伍轉移到梁化墟附近的小村落中，一切鎗械也埋藏了地下，又宣告解散。子瑜在香港，不多時被勒令離境，孫穆也被清吏以腐劫的罪名，向香港政府控告，不久引渡解回廣州加害。這是接着潮州黃岡以後，孫先生的第四次失敗！

### 第三十三章 防城起義與汕尾運械

潮州、惠州失敗以後，接着又有欽廉防城的起義，孫先生經營革命的苦心，和遭遇困難的事實，在這次事情中，更是格外表現出來。因為欽廉起義，自孫先生派克強和郭人漳聯絡以後，早已醞釀了很久；所以當潮州發動時，孫先生再三要許雪秋等暫時不動，但事實上他們不能不動，一動又立刻失敗，使兩方面失聯了聯絡，這是很可惜的。

引起欽廉革命的種子，是很確實的由於滿清政府苛捐雜稅的壓迫人民，激起了一種猛烈的反抗運動。欽廉原是地瘠民貧，但欽州的那黎、那彭、那思三墟，土產蔗糖很多，橫徵暴斂的滿清政府，對於這地方的蔗糖就加了很重的捐稅，人民因為負擔不起，就在這一年（紀元前五年丁未）春間舉了十幾個紳耆到官廳去要求蠲減這項捐稅，但官廳竟把這幾個人拘禁起來，想把他們加以恫嚇，就可平靜無事了。可是被壓迫的人民爲了生計的要求，逼着他們不能不反抗到底。在同一目標下的鄉民愈聚愈衆，於是產生了一個萬人會，是抗捐運動的總機關，以劉思裕爲領袖。他們第一步工作，就是規奪被捕的十幾個代表，因此和清軍衝突開火，鄉民死了數十人，但反抗的聲勢益見澎湃。欽廉道王秉必嚇得手忙脚亂，向省城告急，指劉思裕等爲土匪作亂，粵督周馥立刻調統領郭人漳統率防軍三營，標統趙聲帶新軍一營，砲兵機關槍各一隊，馳赴欽州，會同總兵何長清合力攻擊。孫先生在河內得到這個消息，非常快樂，因爲欽廉人民能夠反抗政府，而政府所派軍隊的長官郭人漳早已與黨人通聲氣，趙聲本來是一個最熱心的黨人，如果聯絡一致，就可立成大事，於是立召漢民從香港回來，規劃一切。這時欽州三那鄉民代表梁少廷、梁建葵也到河內來見孫先生，要求協助。孫先生於是派鄒敬川

劉廉州良屋去聯絡劉思裕，一面調查虛實；又派胡毅生到趙聲營中去約郭人漳一齊乘機起義。不久，郭趙二部從省城出發，劉思裕即派陳泗帶了密函去見胡毅生，要他轉達郭趙二人，說欽廉團兵已與黨人聯絡，不必攻打。但陳泗到了北海，郭趙所部已經開拔走了，陳泗卻沒有勇氣再趕上投遞這封信，於是郭人漳不曉得內情，經過夾仔村時，派管帶林虎帶了一營兵進逼劉思裕，思裕以為既已派人和郭軍通好，現在郭軍開來，當然不會有什麼的，因此毫不準備。却不料竟事出意外，郭軍突然開火了，劉思裕結果死在亂軍手中，數萬資產，也因此完全損失，人民死傷的更不可計數。這一場大禍，完全是由陳泗一手釀成的。毅生在軍中還沒有知道，因為消息隔絕，才很着急的去見孫先生，孫先生却早已調查明白，把這經過告訴了毅生，於是大家都非常痛心。

這時候，孫先生已經僱克強從新加坡回來了，因此派他和王和順跟着毅生再到北海去。孫先生的意思是要王和順在欽州腹地担任收編民團的主幹，以便再起事，克強和毅生仍和郭趙二人去聯絡，這樣兩方並進，不致有呼應不靈的缺點。

王和順是出身行伍的豪客，曾和遊勇胡欽、陸亞發在廣西起事，一舉而佔據南甯，威振清廷。他這次從西貢到河內來歸附孫先生，孫先生對他解衣推食，禮遇至優。那時因為僕役不多，機關部裏許多同志的衣服，都由孫先生的一位親屬陳四姑親自洗濯。和順却引為不滿，見諸辭色。克強大不為然，他對孫先生說：「先生以國士待和順，而和順不以禮相還，豈稍抑之？」

「和順是行伍出身的人，舉止不免粗豪，我為國納賢，怎麼可以因一點小事情，和他計較呢？」孫先生沒有接受克強的意見。和順聽了孫先生這樣的話，因之大為感動，他的態度，也從此改變。現在孫先生要他到北海去，他却有些為難了，原來他是一個膽怯的人，孫先生再三叫他快去發動，他總是不敢，並且提出種種要求，孫先生因此很婉轉的勸勉他說：

「你總去發動好了，在發動的時候不能夠機械都完備的，從前沒有聯絡，尚且可以發動，現在有了聯絡，

爲什麼反而不能呢？」

和順沒有理由回答，祇好勉強強強的答應去。他隨身却是帶了許多毒藥，這毒藥給 孫先生看見了，就當場指出他的錯誤道：

「我們不可以帶這些東西，我們不必怕殺，假使給人家捉住了吃毒藥，這就是怕死的明證。廣東人所說的「大丈夫自有人來殺我，我不自殺！」這是革命者的勇氣，你還是不要把毒藥帶去吧。」

這許多話又把和順說得無話可答，於是決定和克強發生出發。克強不多時又轉赴欽州。和順等到了陸屋，再約郭趙發難，郭趙都說如果有堂堂正正的革命軍起義，當然立即響應。當時計劃，想由和順率先進取南甯，由趙聲以所部自後尾追，相機暗動，如果南甯攻下了，再用這方法去攻佔其他地方。但後來因爲運動南甯的清軍，沒有成功，這個計劃始終沒有實現。那時三那父老對於和順非常歡迎，已故劉思裕的姪兒顯明也率領幾百人來會。但遷延了很久，和順天天想等機會來動作，都沒有成功，顯明也引衆散去，於是和順統率餘衆在板城墟屯紮，一切糧食，都由鄉民供給。這樣很平靜的過了幾個月，很好的，駐防城衛軍左營左哨官劉輝廷給黨人說服了也決心反正，右哨哨官李燾堂是以劉爲馬首是瞻，他們是防城全城僅有的駐軍長官，他們能夠反正是再好沒有的機會了。孫先生因爲防城近日龍港，有海上接濟的便利，非常贊成，就一面派王和順爲南軍都督，梁楚葵、梁少廷爲副都督，準備一切。一面去電香港馮自由及日本長崎萱野長知，催促他們把已購軍械運至白龍港起岸，以備革命軍取用。同時在河內就地召集同志，並加聘許多法國退伍軍官，預備軍械一到，佔據防城至東興一帶沿海之地，就可組織軍隊，這樣很周密的計劃和佈置，如果一一實現，這次起義就很有辦法的，但不幸却橫生了許多枝節，使 孫先生這周詳的計劃，依然失敗。

這次失敗的關鍵，很像七年前惠州起義是一樣的爲了運械問題，但上一次是因爲所託非人，並且是一個日本人；這一次却起于自己同志的內訌，現在我們說起來，是非常痛心的。原來這次 孫先生運械，早在本年四月時着手計劃，自黃岡事情失敗以後，孫先生還是繼續進行，並派萱野長知於五月七日回到日本，要他專

辦這個事情，此外宮崎寅藏、三上豐勇、前田九二四郎、宮崎義弟等，也都幫忙。二十日萱野就從長崎來電說明購械租船二事，都已辦妥，祇要款項一到，就可完全辦好，孫先生因即看馮自由在香港向正金銀行匯去日金一萬元，交長崎寶屋轉借查野，祇等着第一批軍械運來。很好的，防城起義的事情也在這時決定，因此要他們改在白龍港起岸。但是不知怎樣的，東京同志把這件事告訴了章炳麟，章炳麟知道了就進行破壞的陰謀；這事情是和上次孫先生離開日本時留交民報社二千元的事情有直接關係的，我們應當在這裏約略的補述一下。那時炳麟在民報社擔任編輯，就以民報社看他的地盤，他以為鈴木送給孫先生的錢，都給民報社的，而孫先生到祇交出二千元，其餘的都充作潮惠起義的需用，因此就大發雷狀式的牢騷，摸不着頭腦的大鬧大吵。同時竟把掛在民報社的孫先生的照片撕下來，下面批了幾個字，叫做：『賣民報之孫文，應即撤去。』他以為孫先生還是在香港，就把照片連批語寄回香港。後來潮州、惠州軍事相繼失敗，在東京的陶成章等更附和炳麟反對孫先生，炳麟竟又提議革除孫先生同盟會總理的職務，庶務幹事劉揆一大不為然，力排衆議，因此和同志起了一場架，劉光漢更引日人北輝次郎、和田三郎等主張改組同盟會本部，東京的同志鬧得烏煙瘴氣，同盟會幾乎風雨飄搖。也有人勸孫先生引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古語，向東京本部引咎謝罪的，但孫先生先嚴正的答覆他們：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決無引咎的理由，這個黨潮也就漸漸地平靖下去。但章炳麟始終對於孫先生抱持惡意態度的，這一回孫先生派同志到日本買軍火，他當然要乘機報復了。當時孫先生所購的軍火是村田式，炳麟就亂噓亂吵地說道：『孫某所購軍火是村田式，這種式子在日本早已不用了，運到中國去不是使同志白白地丟了性命麼？可見孫某實在是不講道理，我們要破壞他。』他說了這些話，一部份同志也竟盲目的附從。其實炳麟這幾句話完全沒有根據，因為當時滿清政府軍隊所用的槍械是老毛瑟，比村田式不見得高明，甲午年中日戰爭的時候，中國是用老毛瑟打敗仗，日本是用村田式打勝仗的。不過炳麟存心造謠破壞，就不惜顛倒事實罷了。當萱野正在積極準備啓運時，他們就聯合北輝次郎等用明電打到香港中國日報，說這一批軍械，萬萬不能用，這是無異於告訴敵人說，革命黨在私運軍械，於是這個計劃被章炳麟

「手破壞而又歸失敗了。」

欽廉同志正在磨拳擦掌的很奮興着，等待軍械一到，就可樹起革命的旗幟，大規模的起事了，那裏知道東京本部已起了一場風潮，一直等了好幾天，都沒有消息，才忍不住於七月二十七日在欽州王光山起事。一舉而防城劉李二帥，立即反正，殺清知縣宋鼎元及其幕賓家屬十九人，於是全城大定，由鄺敏川統率少數隊伍，留守後方，其餘大隊即向欽州府城進攻，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襲取府城爲根據地。但這時氣候惡劣，大雨傾盆，道路泥濘，使行軍增加了很多困難，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府城外，遠遠望見城上燈火密佈，不便動作，就退到離城四十里浦口下營。郭人漳是駐在這府城之內，克強也在裏面。克強得了和順等在城外的消息，就和人漳商量，以出巡爲名，帶了六十人的小部隊，出城與和順見面，他說欽城不必進攻了，到晚上就可自動反正。到二十九日早上，郭人漳却突然派霍時安到和順這裏來說：「城中欽廉道五瑚友駐欽宋安樞部，已經戒備，使他不能發動，請革命軍不必來了。」革命軍聽了這話，就派人去偵察，的確看見形勢不好，因此決定改道攻靈山。郭人漳見革命軍果然不來攻城，就派一營尾追革命軍的蹤跡，一面派兵攻陷防城，後來怕這事給霍時安傳出，就借端把他殺掉，這人反覆陰險得可怕，但這時革命軍還不曉得他的詭謀，竟貿然開向靈山去了。

革命軍從欽城到靈山，一路上都受到鄉民熱烈歡迎，民團多攜械來投，有一個張拾義的妻子，也率隊數十人來會，於是人數愈聚愈多，大約有三四千人，但槍械祇有幾百桿，太不夠分配了。軍行三日到南勞墟，開軍事會議，決定先攻佔距靈山城十二里的六峯山砲台，和山下這城的環秀橋。同時派同志陳發初預備製造雲梯五具，以備攻城。環秀橋的名字，是多麼豔麗？據說這環秀二字是一家富戶美婢的名字，曾經留下過很多豔跡，這裏的鄉民都拿來做談話資料的，現在却再灑上了革命志士的鮮血，它不但是豔麗，更是悲壯了！八月一日，革命軍才到達這環秀橋，清軍從六峯山砲台和縣城上兩面夾擊，革命軍在彈雨槍林中還是奮勇攻城，可是所造雲梯祇有三具，其中二具又是壞的，祇有從一梯攀援而上，先後約有二三十人入城，苦戰二日，傷亡無數，因此退兵到木頭塘同志的丁屋內宿營，這不能不算是一次很慘痛的失敗！

在革命軍這樣慘敗中，忽然來了一個奇特的消息，說欽州城內的黨人已經起來響應了，如果班師回去，就可把欽城佔領。革命軍聽了，就拔隊回去，那知將近城下，宋安樞部就開城迎戰，革命軍才知道已經中了詭計，於是且戰且退，向廉州伯通花會廠五王山等處而去。這時趙聲駐在離廉州城八十里五利的五利，接到了宋安樞請援的急報，不免有些爲難，他爲要避去人家的注目，祇有派兵，但他既派了兵，却繞道而行，以免和革命軍衝突，他的用意也算是很苦了。革命軍在獅子山和宋部營帶李福華、黃秀如兩營相遇，交戰一日一夜，還是不能支持，於是敗退至羅蒙小洞，餉械都缺，已到勢窮力蹙的境地了！王和順藉口說要去請示，孫先生，就帶了二十人到安南去。其餘的民團，也漸漸離散。梁建葵、梁少廷因此分領數百人退入十萬大山屯聚，以待後命。後來劉輝廷等因王和順久無消息，也想到安南來見孫先生，到法界平寮時，却被扣留了。李耀堂也率領所部屯聚在邊界洞中，直等到第二次欽廉起義，他們又出來會合轉戰。防城起義就這樣失敗了！這是孫先生第五次失敗的經過。

換着這次失敗後更有一件傷心的事情發生，我們不應把它忽略的，這就是日本運械的一件舊事的餘波。當五六月間，孫先生計劃在白龍港運械的事情，既然被章炳麟等破壞了，但孫先生還是希望在另一適當地點能夠把軍械運來，以便起來。不久蒼野長知從日本到中國來，和許雪秋回到河內去見孫先生，就談論到這件事。雪秋主張以海豐縣屬的油尾爲接收軍械的地點，因爲那邊距離香港汕頭很近，交通便利，黨人也很多，他能先期召集，等軍械一到，就可大規模的起事。孫先生覺得這是很合理的提議，因此就派他主持這件事，並促蒼野回日本去辦理一切。這時正在欽廉軍事緊張之中，孫先生正注意那邊的軍情，似乎把這運械的條件忘却了，現在欽廉的軍事完全失敗，却正是油尾運械的事情接着出演的時候了。

蒼野回去以後，就積極進行，不久有一個電報打到香港來說：船械兩事都辦妥了，請立即派熟悉油尾水勢的引港人到日本，以便指導運械的輪船。馮自由等在香港就找到海豐人陳二九等二人做引港，托鄧慕韓做翻譯，因爲慕韓這時剛逢暑假要回國，就乘便担任這個任務。這樣準備妥當了，定於九月一日從長崎出發，船行五



日，六日就可到達。約定由許秋在汕尾預備二十艘大漁船游弋附近洋面，準備接收，白天以白旗為號，晚間以紅燈為號，彼此信號相符，就可起運，免生意外。這次所購軍械，我們可以簡單的開列如下：

明治三十八年村田式快槍

二千枝

快槍子彈

一百二十萬發（每枝帶子彈六十發）

槍頭小刃革囊及各種屬品

二千具

日本古刀

五十具

將校用指揮刀

二十具

短槍

三十枝

短槍子彈

三千發（每枝帶子彈一百發）

此外還有望遠鏡等軍用品很多，全部價值很大，除已先付一萬元外，其餘款項都由山下汽船會社主人三上豐表担保清償。所僱的輪船叫做幸運丸，載重二千八百噸，是日本紀州和歌山縣藤岡幸十郎所有，也是山三上幫忙的。這時三井洋行也要載煤炭送到香港去，荳野、三上為節省費用起見，就叫這輪船主人把軍械順道載到汕尾港起岸。這次有好幾個日本同志同船去籌備到戰地效力的，除荳野外，還有陸軍大尉定平伍一、前田九二郎、金子克己、三原千尋、松木壽彥、望月三郎等。犬養毅知道了，也送了極古的寶刀三柄，以壯行色。

這滿載着革命軍軍械的幸運丸直向中國海開來了！雪秋自奉命後，早已委派許佛童、范媽魯、林鶴松、李子偉、吳金彪等前往佈置，預備軍械到時，就可召集海陸豐沿海海岸會黨數千人，聽候指揮。現在船快要來了，他就帶了柳聘儂、譚劍英等幾個人於九月三日到汕尾去，但這天他在香港上小輪船時，突然看見碼頭鎮總兵吳祥雲的偵探，就害怕起來不敢去了，祇派柳聘儂等先去。幸運丸在六日黎明時準期開到了，停留在距離汕尾十里左右的海面上，等待有船來，就可搬運軍械，但信號發出了，沒有人答應，直等到十點鐘，才看見一隻小船

以白旗爲號開過來，萱野知道雪秋失約了，就對小船的人說道：「你們這樣一隻小船，有什麼用？必須在下午四時用很多大船來，才能起卸；否則我們就開走了。」這小船去後，駐在礮石附近的清軍小兵艦，早注意到這幸運丸，因爲那邊海面本來不是停泊大輪船的，現在幸運丸逗留了很久，不免形跡可疑。因此他們逐浪駛來，偵察一切。幸運丸船長知道被情艦注意了，他不覺心虛驚惶起來，就急急忙忙要開去，萱野還想要他在別處暫泊一下，到晚上再來，但船長因爲這船原是租給三井洋行載煤的，如遇意外，不能回覆三井，因此他就直往香港開去。船到了香港，許多中日同志還是商量想往平海起卸，但這事情早已給香港政府知道了，因爲在汕尾的兵艦看到了這船以後，已經報告粵督，粵督就要求香港政府加以扣留。因此十日早上，香港日本領事就找到山下汽船會社經理，要他趕快卸貨，仍舊開回日本去，免得惹禍。這樣一來，運械計劃又功虧一簣的，完全失敗了！後來幸運丸回到日本，所載軍械，又給警察查到，把它全部扣留了去。三上豐夷本來是保證購械欠款的，現在又須負責承受這輪船所未卸完的三井煤炭，這二項損失是很大的。雪秋知道事情弄糟了，不敢去見孫先生，却寫信報告說：「這件事情是日本船的不好，」其實我們平心而論，日本船固然因虛驚而失事，而最大的錯誤還是在雪秋一人啊！

在這時期內，還有一件事情，孫先生認爲很痛苦的，就是引用會黨；所託非人。那時有一個廣西人梁蘭泉，又名梁秀春，在軍界及會黨中，有相當勢力。他在邊防帶兵時，縱兵殃民，無所不至，後爲岑春煊撤職查辦，就逃到河內來。他受了這一次打擊，鬱鬱不得志，於是設法加入同盟會河內分會，企圖實現他報復的圖謀。河內同志因爲他過去會廣招游勇，在會黨中有相當地位，很有用處，雖明知他爲人心術不正，也都沒有拒絕。當孫先生到河內以後，本來不願意給梁泉知道的。後來因爲事情一天天緊張，需人甚急，梁泉本人雖不是一個正派，但他結識了很多有用的人，由他的關係來羅致這許多有用的人，也是一個辦法。並且他爪牙甚多，如果不透過他去招致這批有用的人，被他發覺以後，一定要破壞的，將來的惡果更大。孫先生經過再三考慮，就接見了他。

蘭泉見了孫先生以後，屢告奮勇。但這人貪而多忌，愚而自私，是一個最不可靠的人。孫先生一面接見他所引薦的人，並擇其可用的人，分派工作，一面也允許給他相當任務，以防生變。但他攬權自利之見甚重，看見他所引薦的人，多分派了任務，便心懷嫉妬，百端破壞，經孫先生嚴重的斥責，寬宏的原諒，一面嚴防生變，他才不敢動作。同時他手下的人，也已看出他是一個毫無血誠的人，並不樂為所用，但因為過去沒有機會和孫先生見面，不得不求他介紹，現在他們見到了孫先生，傾心聽命，就已成了孫先生的革命幹部，他再要破壞，便沒有辦法了。

孫先生既允許蘭泉分派任務，自不能食言。前後給他五千元，令其運動謀事，但他反覆失約。當王和順進行防城起義的時候，大約在七月初，孫先生派他到三那去運動，他接受了命令，竟失約不去。後來派他到海濱去估價一個地點，担任接運軍火的工作，又一再延期，不馬上就去。經孫先生嚴令催促，他才勉強表示就走，但拿到了經費以後，還是不走，祇招了一批「咕哩」來裝點門面。先後招了幾百個沒有身稅執照的人，騷擾喧鬧，弄得不成樣子。其中有七八十人，走到邊界，被滿清官吏通知法國當局把他們一齊扣留了，在警察署囚禁了好幾天。後來他們供稱欲回廣西起義，並非盜匪，法國當局才知道這是國事犯，一概釋放。這七八十個被囚者釋放以後，法國當局因為他們都未繳納身稅，不許逗留境內。河內分會於是大動俠義，立刻發動會員捐款，一下子募足了二千元，代他們繳了身稅，更送他們路費，分別遣回。孫先生在這時，也很滿意，他說：「當時法國官吏，見其俠義，多所優容。法蘭西人護會，亦為之助。以百餘人之分會，而救七八十人於危難之中，不獨此七八十人感激涕零，即會外人亦感動，多有因此紛紛入會者，夫河內之地，風氣未開，商務未振，會員皆業小生意，財力不宏，而能於數日之間，集款二千，為善後用。」（致陳楚楠等函）

但蘭泉狼子野心，嗜利無恥。他看見河內分會募集了二千元來救這七八十人，就想把這筆款子攪為己有；公然向分會要求，說這筆款子應該由他經手分配，分會沒有允許，他便惡狠狠的說：

「我此時不能為公衆之利，亦能為公衆之害。如果不答應我的話，我就派人行刺高遠生。你們看：高遠生

的家前後左右，都已有人埋伏了！」

他這無賴的真面目，從此完全暴露。這一天晚上，孫先生寓所的周圍，果然來了十幾個人。他的陰毒詭謀，是在宣揚孫先生規劃革命的祕密，以爲要挾欺詐的工具。分會同志，看到這情形，非常憤怒，都主張處以重罰。孫先生因爲革命的機局，正在開展，各路的布置，亦已妥當。不願因黨內的爭持，破壞大局，因此始終出以和平態度，寬恕了他。

不久，蘭泉被龍州官吏列舉他在邊防時種種罪惡，移請法國提解，他由西貢出走新加坡。孫先生恐怕他到新家坡以後，又去誘惑同志，實行騙詐陷害的手段，因此密函陳楚楠等注意提防。孫先生在這信上說：「蘭泉之行爲……有護反噬，罪不容誅，弟在此間談事，陰防潛朝之外，當防此人。兩事棘手，多因此故，已被毀壞不少，今日所有僑諸路，皆由密防慎謀，始不爲蘭泉所誤。律以自利僑事之咎，亦罪不容誅。此人來時，各同志切不可與之往來。」可見孫先生對這個梁蘭泉痛恨之深了。但，他那時對這件事情，始終保守機密，在這信上說：「弟此書所言，皆祕密之事，兩兄及子瑜兄等可共閱之。」這種以革命事業重於一切，而對、寬厚偉大的態度，真非一般尋常人所能企及。

### 第三十四章 鎮南關起義

孫先生慘澹經營的革命運動，已經接連着的失敗，這是何等悲痛？但革命是適應人心的要求，它是普遍發見的；當孫先生在兩廣方面，再仆再興的從事革命，其他聞風興起，獨樹一幟以建義的也很多；像這一年當黃鵬和七女湖事情失敗後不久，就有五月一日廣州劉恩復謀刺李準的事情發生，結果因他自己炸傷了沒有成事。不久，更有五月二十六日徐錫麟在安慶槍殺清安徽巡撫恩銘的轟轟烈烈的壯舉，六月更有秋瑾被害的事情。

發生。革命的空氣，已經籠罩了全國。這些事情，雖不盡由孫先生直接指揮，但無疑的，是更助長了孫先生革命의 聲勢，更證明革命的普遍的需要。因此，在防城起義失敗，汕尾連城未成以後，十二月五日，（陰歷十月三十日）安南法文東京日報有這樣一段記載：

「本月二日（陰歷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六時，號稱第二旅順口的鎮南關要塞，忽然給中國革命黨佔領，經過猛烈的射擊以後，左面的第一砲台就攻下了，接着又攻佔了第二砲台，革命軍的青天白日落地紅的旗幟，就在這上面飄飄地招展着；第三砲台雖暫時支持於清軍之手，但亦遭着同前一樣的境遇而陷落了。據傳說，駐屯鎮南關本營的清軍，已反戈而投入革命軍去了。」

這是一個革命軍勝利的捷報，也是陷在連遭命運中的孫先生轉入佳境的喜訊。但事情的發展，不是偶然的。當五六月間，孫先生正注意於欽廉軍事的時候，也早曾計劃在鎮南關的軍事，因為這裏是廣西邊境上的天險要隘，它的重要超過平宜關和水口關，所以法文報上常常稱它為第二旅順，那時孫先生曾派關仁甫到駐屯鎮南關的清軍營中去游說反正，因為仁甫是和清軍營長黃瑞與本來相識的，經他游說以後，黃瑞與已答應候機而動，同時邊防統領總教練易世龍和龍州道幕客陳曉峯二人，也很贊成革命，但不幸，廣西巡撫張鳴岐不知怎的就知道了他們的祕密，不久易陳二人都給他殺害了，孫先生的計劃，就遭受了打擊而暫時停頓了。但那時有一個雲南會黨的張頭目，忽然很速的來省，孫先生，他說願意自任雲南方面的革命軍急先鋒，孫先生在這弱者不羨富，渴者不擇水那樣的心境，就欣然接見他，在一間密室中，討論了很多關於複雜的計劃，最後孫先生宣布軍事進行的大勢道：

「我們目前的軍事計劃，還是首先要佔領鎮南關，如果在雙方鏖戰的時候，突然把附近的水口關也攻下了，那就可以在二日內佔領憑祥，更進而溯龍潭，再二日而完全克復龍州城邑。如此則有革命歷史的太平府，與殷富絕匹的南寧大都會，只有如隨風的楊柳，而全部克復了。這時候，就可以在靠近西邊境內開勞苦與果地，密撤雲南的軍隊，一齊起來，待機會成熟，就可襲擊海口，乘天下狼狽之時，即通風應援的天淵，而威脅雲

自。若此時總督錫良聞訊親征，則或出通海，或下建水，出一奇兵，以擾昆明。只要我們懸軍二月，堅持努力，在東方扼廣東潮州之地，則有陳湧、許雪秋等正張其巨眼，渴望機會的到來。惠州七女湖的壯士三千人，也不是有人在揮刀而噬髀肉復生嗎？最近游說欽廉二州的官兵使之反戈，一直以前，黃克強不是已經很有成就嗎？而在他的故鄉長沙一帶的地方，還有在斷頭台下含恨千載而尚未瞑目的馬福益殘黨，不是也在臥薪嘗膽，等候復仇時節的到來嗎？還有，請再看山西、山東、四川、貴州等的剝悍；安徽、江西的強勇；其他長江以南所潛伏着各地的哥老會，三合會等，或是旬日後起事，或在一月後響應，至遲在二月前後，都喊着『排滿復漢』的口號，四面盪起，而決定了滿清政府的命運。』（見池亨吉：支那革命實見記）

這樣滔滔地詳述了一回，主客也就慨然了好久。張頭目完全接受。孫先生的指示，就準備回雲南去發動，於是。孫先生就在機關部派許多人辦理關於革命方略上所定的幾種文件和其他準備事項，一切都辦妥了，張頭目帶了這些東西，就匆匆地去了。

這是何等偉大的革命的軍事計劃？但張頭目去後，沒有什麼動人的消息，似乎再不能靜待有機會的到來，於是。孫先生先派人到鎮南關方面去活動，繆果憑祥士司李祐卿竟被。孫先生所派的人說服了，他允許幫助奪取鎮南關，但必須有人去主持。這時克強、和順因為防城靈山的軍事失敗了，早已都先後回到河內來，因此孫先生就派和順到憑祥去和李祐卿見面，這樣，久已沉寂了的鎮南關軍事計劃，又活復起來了，同時也就緊接着汕尾運械失敗後的革命運動又開展了。

和順奉了。孫先生命令，在十月五日的拂曉就離開了河內機關部到那棧村去會見李祐卿，但到了文煙想越過國境的時候，忽然被法國守兵疑他為日本偵探而拘禁起來了。孫先生聽到這個消息，十分焦急，想盡了種種方法去營救，並證明他是中國革命黨才得安然釋放，辛辛苦苦地越過了國境。大約是他到了那棧村的第二天十日吧，孫先生接到了他的電報說：『一切準備，皆已成功，機會亦已成熟，即擬於十三日晚七起事，萬一如有障害，則十五日夜暮即當直擊鎮南關的要塞而破之。』這是無疑的，他已經和那棧的游勇領袖接洽妥當了。

，這一個意氣激越的報告，立刻使孫先生和機關部的許多人，都興奮得不得了，這樣一來，大家都期待看像牛步那樣而來的十三日，但到了那天，沒有什麼消息，這夜就過去了。翌日早起，都等候第一聲的捷報，然而依然別無消息，這一天就過去了。現在只有這一夜，怎樣過去，大家都充滿着明天可以聽捷報了的心理，但這是很煩悶的希冀，艱難安靜的度夜。不料十五日的黃昏，王和順忽然悄悄地歸來了。孫先生問他怎樣回來了？他說是爲了生病。咳！這是什麼一會事啊！本來的期待太大，因此失望也隨着大了，大家都罵他是自誤而思推諉的畏意病。但孫先生經過詳細研究以後，才知道和順是綠林出身，本來和那樣的游勇沒有感情，大約李祐卿因此不願和他合作。可憐膽怯的王和順就這樣毫無結果的回來，連真相都不敢說出來，只是推託生病，孫先生知道他的苦衷，也不深責。於是另派黃明堂、關仁輔和何伍經營這事。至於王和順，因爲曾經主持防城軍事，於是派他聯合靈山失敗後退入十萬大山的同志，謀襲水口關，以爲聲援。明堂和仁輔等，本來是游勇首領，事前早與台上守兵聯絡成熟，現在同受革命軍重任，發動軍事是很容易的。

事實的真相，果然和孫先生所臆想的距離不遠，當他派人和黃明堂等商量時，他們只要求王和順不來加入爲一條件而翕然允諾了。十月二十四日的早上，他們就有密電來說，已經決定在十月二十六日晚上起事。到了那天，機關部的幾個人，因爲鑒於從前王和順的失望，所以毫沒有什麼感動；是大家相互祈望他們能成功而已。可是在各人的胸襟中，總不能安定；在一間會客室裏會見後，忽然散開了，散開後，又忽然聚了攏來，沒有一個人能安靜着的。當時有一個日本同志池亨吉，是孫先生約他來當英文祕書的，也在這機關部，他因爲在遊戲的當兒，從高處跌了下來，傷了左肩，感覺得非常疼痛，這天晚上，他就獨自先去睡了，在夜闌更深，萬籟俱寂的時候，他正轉側反側着，突然看見孫先生走近他的臥床，他就慢慢地起身來，孫先生急忙的制止他，在天生成的溫和的面上，笑問他道：

「你睡着了麼？」池亨吉因爲疼痛得不能說話，祇是默默的望着，孫先生却又破顏一笑地說道：「你也尚且如此，我實在睡不着。我一生的運命，就在今天晚上了，幾年的辛苦，如果在這方面能夠成功

，就是將來發展的端緒了。一想到這裏，我時時刻刻心裏有如聽着鎮南關方面的砲聲，雖是要想睡，但竟不能睡着！」

他亨吉聽了不由的表示着深切的同情，就緊握着孫先生的手。不一回，鄰床也發出了很大的聲音，是在嘆着道：「誰能睡得着呢？」就突然地起了身來，原來是目光炯炯的胡毅生。在隔房漢民和克強也互相和聲地說：「誰能睡得着呢？」說着克強已經走了出來。這時已經將近三點鐘，窗外也聽到一聲聲幽靜的鷄聲。可見這時各人期待着革命軍捷報的心理，是何等急切而煩悶啊！

勝利的捷報終於傳來了，原來二十六日晚上黃明堂等確已率領那樸村游勇八十人，快槍四十二桿，領着鎮南關苦後的間道突然向關上右輔山砲台開始發動了，經過了幾次的攻擊，在第二天早上佔領了，就像上面北京日報登載的文字所說。孫先生得到了這個勝利的報告，真是快樂極了。沈毅的機關部，也頓時現出活躍的景象，大家忙着準備做軍服軍帽，奔走接洽各方面的事情，預備明天（二十八日）都到陣前去督戰。受了傷害的池亨吉，也忘了他的疼痛，願意參加。各人的心中，都掃除了陰霾，現出了無限的光明。

稀微的晨星，還是在寒冷的天空閃爍着，暮秋蕭瑟之氣，一陣陣襲到身上來，幾乎發抖，這正是十月二十八日早上四點鐘的時候，河內機關部的同志正在跟着孫先生出發到鎮南關去。一路同行尚有克強、漢民、毅生和盧仲琳、張翼樞，（他們是在黃岡已離學校讀書留德軍的）等，另外還有池亨吉和一個法蘭西退職的兵士刷D男爵。六點鐘到了車站，大家就坐上了越面鐵路的车子直向同登站進發。不久，車過紅河橋，一面是雲南省迤邐而下，橫斷富良江的下流，一路蜿蜒，更達東京府的中央，延長計一千八百餘里，可算是東亞大陸除黃河鐵橋以外最長的大橋了。出了紅河橋，東京都城，就隱沒在曉霧模糊之中而不見了。這車子的速率和進行的姿態，真是反映出這許多人的勇氣和希望，他們是同坐在一個車廂裏，裏也沒有其他的人來雜在中間，似乎都忘却了凜冽的曉風吹來，只是很快樂的相互縱談，沈默寡言的孫先生，也破除了習慣，在興奮愉快的表情之下，變成了歡喜多說話的樣子，他說：



「我只有一个宿願，就是欲入中國最南角的鎮南關，懸軍萬里，旌旗堂堂，貫通中國的腹地，而出中國最北角的山海關。一出山海關，就可把愛新覺羅氏送上了末路，現在這個宿願的前半，快要成功，其餘後半的就，還不曉得在那一天？唉！真不曉得在那一天？」痛快淋漓的說了，就哈哈地笑了一陣。

孫先生這發興奮的快樂，的確不是尋常的，因為他自本年一月離開了日本，航行到新加坡，再由新加坡出來，就此藏身匿跡於河內，在這二百四十多天的中間，滿清政府的密探，時或懸賞二十萬兩，以求其首級，或以雲南一省爲報酬，要求法國政府加以逮捕。孫先生在這陰霾滿佈的幽暗生活中，因為是出不出戶，缺乏運動機會的緣故，曾經發生劇烈的胃弱症，這樣的遭遇，是多麼艱難辛苦？現在竟突破了重重地圍困，疾馳於荒漠的大原野之中，於新鮮的曉氣中，姿意呼吸，對於他真可以說是蘇生復活了。同行的許多人，也都感覺到新的光明的照耀，於是都不期然而然的連呼「革命黨萬歲！」這樣不知不覺間已到了諒山的同登站。大家下了車，步行到文煙鎮。這時那模村的游勇代表，已經都知道革命首領來了，所以預備好了幾匹馬來迎接。孫先生等和游勇代表略略討論了關於戰略的問題，就各自上了馬，揚起了馬鞭，奔向那模村出發了。一路上，看見突插雲表的奇峯，高出海面約三千餘尺，在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的時候，法國會以一萬精兵，沒有奪得這險要之地，因此稱它爲第二旅順；現在却有鮮麗無比的三色革命旗與無數軍旗，在這上面的要塞上驕傲的飄揚着。他倆沿着崇巒起伏的羊腸小道的懸崖峭壁去，就折入到那模村的捷徑，隔山的砲聲，正隱隱地傳來，孫先生面上更顯出喜悅而興奮的神采，拍馬前進，就一直衝到許多人前面去，因為他自幼就有騎馬的經驗，所以走得很穩當，雖然克強是一個軍事家，也自嘆勿如。他享吉老是落在後面，祇有自笑爲殿軍，他就大發詩性，撫着馬背高吟着：

感來意氣不論功，魂夢忽驚任馬中；  
滾滾東亞雲萬疊，鐵鞭叱咤馬天風。

大約走了一點多鐘的時間，就到達了那模村目的地，這時是下午五點鐘的光景，由游勇首領何伍出來接待。葛先生等就在他家裏很匆忙的吃晚飯，充實了一天來沒有吃的空腹，吃過了飯，就圍住了微弱的豆油燈圍

始討論爬登鎮南關山的辦法，決定立刻要上去。這時天已黑了，因此用枯蘆結成了幾十個火把，由精壯的游勇，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火把，照耀着擁護了。孫先生等前進，同行的有六十多人，銜枚疾走，氣象壯嚴。下憑祥街約半里許，由此就左折而入鎮南關山後的間道，開始爬山的工作，這時書生的孫先生却爬得比任何人都快，克強因為是一個胖子，越爬越喘氣，非常辛苦；法國砲兵上尉D男爵，因為身上背着一支廢煙槍的箱子，非常累贅，所以都落後了。漢民大概在何伍家裏吃的東西，不十分舒服，爬到半路，覺得口渴得很，把護衛的葫蘆裏的冷水又喝了些，這樣就肚子作起怪來了，忽然昏倒在地上，大家都很着急的要把他抬起來，孫先生就本着醫生的態度，對大家說：「這是不要緊的，只要睡一下就可以好了！」說着就把漢民의 脚部襯高，頭部放低，這樣一來，他就頓然蘇醒，等一回，就起來說：「不要緊，我可以和大家同去。」大家聽了，都放下了心。又繼續爬上去。大約在九十點鐘的光景，才到達砲台，早有黃明堂等出來迎接，一時軍樂大作，奏起了歡迎革命領袖的歌曲，夾着一片歡呼的聲音，衝破了這深夜靜寂的山上空氣。孫先生見了明堂等，約略談了一下，因為一天來奔走，疲倦極了，就和大家睡覺。在這砲台裏面是什麼東西都沒有的，於是祇有把堆在台下的茅草當作寢具，D男爵却拿出他的煙槍來大吸了一下，以補充他的精神。這一夜，就這樣約過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就起來。這時清軍參將陸榮廷尙堅守鎮南關本營，專候龍州大兵圍撲，白天祇是派小隊回三砲台轟擊，沒有什麼大接觸。所以明堂等早已很焦急的等候。孫先生親來指揮，然後龍州大舉進攻。這一天晚上，這一方面孫先生已經趕來了，敵人方面的援兵却也來了很多，孫先生等起身後，就聽到敵人的槍聲，一直從鎮南關傳來，於是大家開始向第一砲台檢閱內部。這第一砲台是西北的，稱為鎮北，由黃明堂堅守着，其餘二台，一為鎮南，是何伍守的，一為鎮中，是李祐卿守的。第一砲台比較是堅固，有十二生的克虜伯大砲一門，七生的大砲一門，新式四響機關砲一門，七生的野戰砲四門，白砲數門，大小砲彈數千發。D男爵也觀察了一下，他看見大砲的器具，有很多不完全的，標尺也已經沒有了，因此雖是滿列着許多砲，但都不中用，後來他酌量放了幾個大砲，向距離四千密達的清軍營寨轟擊，第一彈就命中，清兵死傷六十餘

人，立刻呈露紛亂現象。但事情太不湊巧，再看別個砲台，砲的方向是向安南的，開炮就是向安南打，不能向中國境地的清軍打，大砲的方位是改不過來的，於是當時橫着兩個嚴重問題，一個是大砲的方位改不過來，有了大砲等於無用；一個是其餘幾枝槍也都是老式的無用之物，必須重加配修。D男爵要想把砲的方向改過，但是沒有工匠，一個人弄不好，就是有了工匠，也不是一二天可以辦得好的，弄得他沒有辦法；就是配槍的話，又是非下山不可，這樣大家不免焦急起來了。有的主張在這無辦法的環境中，如果遷延下去，何如下山後另我辦法。孫先生却不忍離開這裏，很興奮地說：

「我真不願意下去！因為第一，我是十多年沒有踏過中國的地方，我現在踏在這個山上覺得很高興，我簡直捨不得下去，我認爲我們在這裏總是有辦法的；第二，他們幾十個人敢佔砲台，（指黃明堂等）就是要希望我們來，要是我們走了，這個砲台不是馬上失守了麼？」

孫先生這個話，是很有理由的，但事實上再不能逗留在山上了，所以漢民也申述他的意見說：

「如果我們在這裏沒有辦法呢，我以爲坐守在這裏是不必的。我們守這個砲，而這個砲也沒有戰鬥的作用；守這幾十枝槍，也沒有最終的目的。至於他們守砲台的將領，也會明白我們在這裏是無法幫助他們，就必定想我們下去了想方法來策應幫助，決不因此而失望的。」

在這議論的時候，忽然發現了一個粗野醜婦，她說奉了陸榮廷的使命求見孫先生，大家就向她問了一番，她拿出陸榮廷的一封信，大意是說：他也會統率游勇，專與清兵爲敵，現因時運不濟，暫時歸身異族，但並沒有忘掉本志，這次革命軍起，他起初以爲近於輕舉妄動，及至看見今天早上砲火的猛烈，才知道原來是一代豪傑。孫先生已經親臨前陣，籌劃一切，無任欽佩！現在願率六百餘人前來投誠，聽候調遣。最後又說：明天有清軍五百自憑祥開來，後天更有二千人自龍州開來，事情已相當迫切，請格外珍重。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一砲的結果，竟有這樣許多人來投降。但大隊的敵人，已經快要趕上來了，死守在這裏，到底不是辦法。事實勝於雄辯，孫先生就一面答覆陸榮廷，如果每人帶着槍械彈藥來歸降，佔領了龍州甯甯以後，每人賞給一

百元。一面準備下去籌劃款項和槍械。同時孫先生看看兩方面作戰的情形，也覺得太滑稽了，當時我們這方面的兵總算是很勇敢的，他們兩面山頭隔著，一面打著，一面罵著，一面說：『我們怕你們麼？你敢走過來，統統打死你們！』一面罵說：『不要逞強，我們的槍再多一點的時候，統統把你們捉起來了！』他們這種打罵並舉，相映成趣。但他們到底還是缺乏訓練，僅僅靠勇敢是不中用的，如果這樣下去，總是毫無辦法，因此覺得除了下山，實在沒有第二條道路了。

這一天晚上，孫先生和漢長、克強等，就從原路下山。這時已經下過大雨，山路上滑得很不容易走，同時因為距離敵營太近，又不敢拿火把，因此比覺比來時更困難，漢長和克強跌了七八十跤，別的人也都是跌了二三十跤，這是孫先生等沒有本領，既跌了三跤。後來池幸吉就發明了一個方法，就是用溜下去的方法，一直滑下去，滾下去，一百滑得快，一面又可以少跌跤。於是大家都就這樣溜下來了。到山腳的時候，大約已是半夜了，於是仍到那權村何他家裏去休息，這一夜就在那邊過去了。

孫先生等一行人，在那權村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六點鐘，就到同登站坐車回河內去。正午到諒山，河內關家的列車剛和孫先生這面的車子相交。忽然有一人，高呼着革命黨萬歲，走進了孫先生等的客車裏來，大家很驚訝的舉目相視，原來是馮勝。他是河內華僑的領袖，對於孫先生革命是有很多幫助的。這一回他因為鎮南團革命軍勝利，剛從河內趕來，想到戰地去慰勞，想不到在這諒山站上看見了孫先生等，因此很快樂的從那邊拿上過來。他帶了許多美味的食品，一箱香檳酒，於是就這道車上拿出來，請大家痛飲，算作一個慶祝大會。大家很高興的一飲而盡了幾瓶，其中最能飲酒的，便是法國砲兵上尉D男爵了，孫先生也飲了不少。大家就這樣高興的飲到深夜，却不料已經引起警察的注目。這警察看見孫先生等行蹤詭異，既不類工人農人，也不像商人或學生，早已引起他的疑竇，及至看見剛才的情形，他就聯想到在報上見過孫先生照相的印象，因此心中十分明白，就跟蹤孫先生等一路到河內來，這就種下了一個惡因。

苦守在鎮南關上的革命軍，到底又是失敗了！在孫先生去後三天，十一月初三日，清軍了隗、龍濟光等

各路援兵四千多人，真如陸榮廷所說，就紛紛會集，把三砲台四面圍住，向山上環攻。明堂等雖是悉力拒戰，迭傷清軍鎗弁古景邦，營長黃瑞興、馬朝輔等多人，倒塌因為糧盡彈竭，糧食不繼，在初四晚上放棄砲台，率衆衝圍而出，清軍也紛紛退去。這時革命軍中有一個小孩，看見砲台上青天白日旗還沒有撤去，他怕給清軍拿去，就冒險獨自再上山去，把這旗拿了回來。這是革命史中一件有趣的小故事，這小孩的見識和勇敢，是很難得的。革命軍佔領了九天的鎮南關，到這時完全失敗了。孫先生在失敗後的第二天初五日寫得了這消息，非常痛心。當時安南的法國銀行家已經和孫先生接洽關於籌款的事情，他們允許向他們本團徵募革命軍費二千萬元，但第一批款子必須佔領了龍州才拿來，這是他們的條件。孫先生正在懷着像羅馬神話中「Jupiter的願望，現在事情已經失敗了，這願望也就無法實現。這是孫先生革命運動第六次的失敗！

孫先生在這戎馬倥傯，革命工作萬分緊張的時候，依然沒有忘掉他的讀書生活，和革命主義的研究。現在留存的給張永福信中，可以知道孫先生這時研究工作緊張的一般情形，這信上說：「近因查考列國政事，需用本年英文政治年鑑一部，此地無買，香港書店，亦剛沽盡，今特託足下在坡（按即新加坡）代購一本，其姓名列下：（The Statesmen's Year Book 1907）該價多少，請先代支，並祈示悉，自當奉上。」

### 第三十五章 被迫離安南後的革命運動

鎮南關的事情完了，孫先生又重陷於苦悶的境地，但匆匆的上山和匆匆的下關，這一箇像夢一般的故事，回想起來是很有趣味的。孫先生在機關部裏曾經和漢長等談論到這一回事情：

「我當時自己親自走上鎮南關，實在是別有懷抱，不料大家都跟我上關，毫無疑義，現在想起來，假使我們在爬上山或下山的時候，只要清軍派少數的部隊截擊，可以把我們統統打完。事後仔細想一下，我覺得我們那一回事情確是很危險的！」

「先生所說的話是很對的，不過我們當時有兩種想法：第一點，革命者對於自己的性命看得無所謂的，普通所謂不怕犧牲者，有時還爲熱情所激，就是走入極危險的地方尚且處之泰然，若無所事，何況我們爲着革命主義而做事呢！所以我們不管什麼，統統跟着先生上崗了！第二點呢，我們去的時候很快，回來的時候也是很快，好像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樣子，所以也覺得不會碰到什麼危險的。」漢民思索了一回，這樣回答。

「不錯，你說的兩點都是很對的。」孫先生說。

這樣危險事情，本來在孫先生以及跟從孫先生的革命黨人是已看慣了的，但這一次，如果他們在山上多逗留二三天，恐怕就陷入清軍的重圍中，再不能安然衝出了，所以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不幸中的幸事了！然而革命者的生活畢竟太曲折了，平靜中又起了波浪，使孫先生又不能安居河內而度着流浪的生活了！

這波浪的掀起，就是由於那天從諒山跟來的那個警察所造成的，原來他對孫先生偵察明白了，就報告了安南政府。本來安南總督和孫先生是有相當感情的，他對於孫先生的活動，是取不干涉的默認態度，但不能給警察看見，因爲警察看見了就要執行他的職權，要依照公事的辦法去做，政府也只好依警察的話來辦理了。這一回這警察見了孫先生的行跡，他就公事公辦，曾經和楊壽彭交涉了幾回，因爲壽彭是當地的幫長，關於這類事情，政府常常先和他談話的。警察就對他說：「我們現在已經聽得孫某在何處了，你帶我們去找他出來。」壽彭聽了嚇得一跳，簡直不能說回話，祇是抵賴，但警察更進一步的說：「你一定要帶我去找楊壽某，我們是中立團，不能做你們革命的策源地。」這樣一來，壽彭更想不出應付的話來，就把警察帶到孫先生住所了。當時機關部許多人都責問壽彭爲什麼直說出孫先生的寓所，因爲他儘可以一口咬定說我是做生意的人，什麼事也不曉得，警察也沒奈何他，這件事情不是不發生了嗎？總之，楊壽彭太不老練了。

第二天，安南政府請孫先生去。對他說：

「現在別的辦法沒有，我們只有請你離開這裏了！」

「我也曉得你們認爲不方便，離開我離開好了。」孫先生答。

「那麼可以坐我們的法國船，先到西貢；到了西貢，你要到什麼地方都方便的。」

「稍等幾天，就離開這裏好了。」

在這裏蟄居二百多天，指揮兩廣革命運動河內的機關部，從這時起，孫先生又被迫離去了！但革命運動是不因連續的遭逢打擊而停頓，每個細胞中都充滿着革命情緒，孫先生決不會因此而表示退却的，他在每一分，每一刻的時間內，永遠的緊張着革命的意識和精神，因此請求安南政府寬限了幾天，爲的還是在安排着此後革命的運動。那時西南邊陲可以繼鎮南關而起的，還是在欽廉一帶，因爲王和順在十萬大山，本來預定和鎮南關革命軍會攻龍州的，但因爲路遠，沒有趕上發動，現在很可以振作士氣再來一下。孫先生和大家經過了幾次磋商，於是決定派克強再到欽廉去收拾餘衆，一面還是聯絡郭人漳。此外，雲南的張頭目上一回來接洽了以後，還沒有什麼動作，應該再去更進一步的活動，便可成事，因此派黃明堂到河口去佈置一切。這樣規劃妥當了，孫先生就留漢民在機關部辦理未了事情，自己又到新加坡，因爲那邊有同盟會分會，華僑同志也很多，很可以做發號施令的中心地點。

這是在紀元前五年的冬天，孫先生從安南到了新加坡；這一年內，孫先生從日本到安南，現在更從安南到新加坡，已經三易其地了！在新加坡，仍是住在晚晴園裏。不久，河內同志黃隆生和東京同志張繼、林時敏等也都先後來此，把狹小的屋子，都佔滿了，晚上常常二三人共床而睡，但他們並不覺得有人滿之患，祇是感覺興奮和熱鬧。後來孫先生搬到 Orchard Road 111 號去住。孫先生的行裝中，帶着曾經歷立在鎮南關的青天白日旗，和符號清軍所穿的前後補心等軍衣三四件，這時就拿出來給許多同志觀看，這是很像一個小規模的革命軍戰利品展覽會，許多同志對着這曾經戰地的黨旗，都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對它們作最熱烈的行禮。

孫先生現在的處境，已十分侷促無聊了，但更有比中國革命黨可憐的安南人，也跟在孫先生後面起事，同時更牽連到許多中國革命同志，這時也到新加坡來了。安南本來是我國的藩屬，一八八五年中法戰爭的結果

，就淪爲法國的屬地，這時正當孫先生二十歲，決志革命之年，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們這二十幾年來，也是天天悲憤失國的慘痛，圖謀革命光復。因爲受到孫先生革命運動的影響，更使他們的熱情衝動起來，於是祕密地想趁中國革命緊張的時候起事。可是法國人監視得非常嚴厲，使安南人無法動彈。剛逢着我們前黨人從越南關撤退下來，安南人心，經此渲染，更躍躍欲動。他們有和我們黨人接近的，就請求要幫助他們，這在黨人當然是很同情的。但安南人竟急切的要援義，同時因爲手無寸鐵，就想出了一個妙計；先用砒霜去毒死法國軍人，然後奪取他們的軍械來起事。放砒霜的是在法國軍營服務的安南人，乘法兵不留心時，把許多砒霜放在餐室中的飲水桶裏。晚餐時，法兵都據案大飲，不一回，砒毒性發，就一個個倒下來，慘哭哀號，先後死去六七十人。後來經醫生檢驗食品，才知道是因爲士兵所飲的水料含有重毒砒質，於是立刻搜查在營中服務的安南人，但他們早已逃去。安南政府就一面下令戒嚴，一面大事搜捕。在河南機關部下面的我們許多軍人同志，固然沒有身稅執照，也都給法國警察拘去；先後拘去將近二千多人，並且有送回中國官廳處分的消息。這事情簡直不小了！孫先生得到這個消息，非常震驚，即去電安南政府交涉，證明這許多被羈囚的人，都是他統率的中国革命軍人，依照國際公法，避敵的人應受第三國的優待。電商數次，法督才同意允許照辦，但必須送出法境。孫先生無可如何，於是叫這許多同志到新加坡來居住，第一批先送四百人。可是新加坡總督知道了這件事情，表示反對。所以輪船一到了，這四百多同志，依然不能上岸。孫先生迫得無辦法，親自去見新加坡總督，據理力爭。同時安南總督也來電證明，說這是中國革命軍，在越南關戰爭時，法國曾宣布守中立，已經爲交戰團體，應該可以上岸。新加坡總督左右爲難，終於准許他們上岸，但必須用交保手續，由新加坡地方法庭去辦理。孫先生見交涉已經成功，非常快樂，就託張永福以商人名義，每人以二百元保出。事前並且替他們每人做了兩套白帆布學生裝，他們出來的這一天，就在市上整隊遊行了一回。這時在新加坡的保皇黨很多；看見這種情形，都咋舌不已。這許多同志出來後，孫先生設法安插在陳楚楠家裏，一切佈置招待，都非周周到，此外如林義順、沈聯芳、林鏡秋等，對於這件事，也都非常出力。這許多同志中如周華和馬侶二人，後



來都在三月二十九廣州起義中殉難。孫先生這一回竭力爲同志策劃安全，充分的表現了黨人的俠義仁慈的精神。這機很忙碌的過了幾個月。第二年就是紀元前四年，公歷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公歷三月二十七日）克強在欽州起義的報告就列了。

這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克強、漢民自奉了孫先生臨行時的命令，就積極進行，一面函約欽州統領郭人澧接濟彈藥，一面向河內法商購買匣子砲百數十桿，那時匣子砲只值五十元一桿，由馮自由在香港配置子彈，祕密運送。那時原定計劃是想以聯絡人澧爲主力軍，但漢民和克強再三商量，覺得有些不妥，他說：『王和順這個人不中用，郭人澧這個人更靠不住，我們要小心留意才好啊！』克強起先似乎不信，他說要親自去看郭人澧，於是就到郭營去。那裏曉得郭人澧真的不懷好意，克強幾乎吃虧。好在克強早已看出他的神氣，就不動聲色到他底下某個營中要一張護照，營中的人，以爲郭人澧與克強本有交情，常常進出的，就毫不遲疑的把護照發了，克強領到了護照，就馬上回到河內來。郭人澧發覺了就立刻有電報來要克強再去，發護照的也追來找着克強，苦苦的訴說：『我是發不得這護照的，担不了這種責任，請黃先生再到營中去吧！』克強當然再不能理會這些了。這是孫先生離開安南以後不久的事實，後來克強知道假借旁人的勢力是靠不住的，於是決心自己編練隊伍，計有二百多人，分爲二隊，一隊是原有長鎗的，一隊就用新購的匣子砲，就在二十五日繞道安南向欽州進發了。

這一回，因爲機關部曾經請了一位社會主義的律師，向安南政府的警察廳辦過交涉，說他們不應阻礙革命黨，所以對於我們黨人的活動，似乎不像從前的嚴格了，當克強率隊過東興附近的大路村時，法國守兵，都鼓掌歡送，於是革命軍公然高吹着軍號，張起了青天白日的黨旗，浩浩蕩蕩，大踏步的走過去。鄉民一聽到革命軍來了，都紛紛燃放爆竹，前來迎接，這種景象，真是痛快極了。但這樣聲勢浩大，却引起了清軍的誤會，他們以爲郭統領來了，因此有一小隊清軍在半途上發現了這是革命軍，便都嚇得四面竄逃，一哄而散。克強等趁這機會，就在廿七日下午進佔了小峯。當時有三十多個清兵，也聽到軍號，誤爲郭人澧到了，都列隊出迎，

變命軍就對着他們毫不留情，開起鎗來，立時擊斃五人，其餘的也就毫不抵抗的投降了。郭人漳知道這是克強的軍隊，非常氣憤，就會合全軍出戰，依山爲陣。革命軍假裝敗退，引誘清軍離山，然後分爲三路，一從對山攻擊，一伏田隴間，一從清軍後山暗襲。這樣一來，清軍只顧到前路二軍，却不料還有後面的一軍，等到這後路軍突然到了，清軍就大駭崩潰，死的死，傷的傷，亂得不成樣子了。有一個哨官，竟被革命軍俘虜而去，清軍的損失很大。這樣，革命軍聲勢大壯，看見敵人的部隊就要進撲，並且揚言說：『我們是先鋒隊，後面還有大隊來呢！』清軍當者披靡，一路所向無敵。二十九日到大橋，又與清軍援兵兩營迎戰，也不堪一擊，把他們打退了。三月初二日到馬篤山，清軍調了三營來圍攻，革命軍居高臨下，原是處於優勢的地位，克強又出奇制勝，命一小部隊，出繞左道，攻打後方，一部從右方攻打側面，自己率領大隊從正面猛進，擊斃敵兵八十餘人，於是這三營清軍又完全潰散了。管帶龍某，身受重傷，郭人漳的軍旗和坐馬，也都給革命軍奪到了；克強就把這馬留下來，却派人把軍旗送還給他，並且對他說：『軍旗是有關你的責任，所以送還給你，表示我們的友誼，這馬暫時留下借用了。』這一次，革命軍在大勝之餘，得了敵軍快鎗四百餘桿，彈藥無數，擄哨官二名，都把它們殺死了，降兵三十多人，却要他們完全剪髮，編入隊伍。這時革命軍已由二百人擴充而爲六百多人了，於是計劃從那樓、大泉等處，向廣西邊境進攻。但郭人漳倒底不能心死，又和參將王有宏合三千之衆，取包圍形式，跟着革命軍趕來。克強知道這是很不利的，於是選募勇士，乘着夜色，到清軍駐紮的地方，拋擲炸彈，清軍出其不意，就自相驚擾起來，都紛紛不戰而逃。革命軍又立刻乘勝追擊，這清軍的營長姓楊，是一個胖子，號稱楊胖子，急得躲入叢林中，幸沒有給革命軍看見，保全了他的性命。經過這一次勝利，克強的威名大振，從此縱橫出沒於隆雁、陳塘、那悞、馬路圩、柳綠、鳳岡一帶，所向披靡，清軍疲於奔命，欽廉道龔心湛和郭人漳接連着的向總督告急，粵督也電請廣西巡撫協助，其狼狽情形，可想而知了。

孫先生對於克強這次艱苦的奮鬥，曾經一再稱道；他說：『黃克強的威名，是由欽廉革命起的。他在欽廉革命，是用什麼武器呢？那個時候我們在安南，到處和他買槍，今日買三五枝沙維治，明日買幾枝曼里霞，東

漢西漢，然後才得了雜槍二百多枝，每枝所配的子彈，最多也不過二百發。他帶了這點武器到欽廉，便和龍濟光、陸榮廷，打了幾個月。後來雖然失敗，但是他奮鬥的精神很大，實在令人佩服，所以他的威名便大震。」（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宴各將領演說）孫先生在另一次演講中，又把這次克強奮鬥的精神，鼓勵湖南的同志，他說：「湖南老革命黨最著名的有黃克強。他有一次自安南入欽廉起義，當時到欽廉來抵抗革命黨的清兵，有兩萬多人。黃克強帶的革命軍不過兩百人，所有的武器不過兩百枝槍。以那麼少的人和那樣多的清兵，打兩個多月仗。到後來彈盡而援不至，還可安全退出。照這一次戰事說，革命軍就是用一個人去打一百個人。像這樣的戰鬥，是非常的戰鬥，不可以常理論；像這件不可以常理論的事，還是你們湖南人做出來的。」（民國十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對湘軍演說）克強這次在欽廉奮鬥的價值，於此可見。林白克贊美克強這時期對於孫先生的幫助革命，也說得很透切，他說：

「克強是天生的——個領袖，孫先生也是。但是兩人的心理是不同的：所以天使他們聯合在一起，成一種替人類建功立業的力量。……克強是一個射擊手，單身陷陣，賴他瞄準之能，在奮呼中殲敵的；孫先生是一個指導者，立在高岡上，注意全軍的行動，不是管一槍一砲的動作的。克強看到近；孫先生看到遠。克強的手常放在刀上，迅疾地預備同敵人決死。孫先生倘使還有磋商的機會，決不輕用武力。克強只有在戰陣上面見他表現勇氣；打仗對於他像用酒席一樣，殺人的血像紅的醇酒，越吃越足以鼓勵他的勇氣。」

這幾句話，的確很能認識孫先生和克強二人的個性，克強的英勇氣概，在革命史上是永遠光耀着的。但這時因為他轉戰數鄉鎮，已經歷時四十多天，河內和香港的接濟，非常不便，等到兩廣清軍一齊調到了，到底是不敵衆，加以彈盡援絕，他知道勢難決勝，於是只得又解散軍隊，退回安南來了，這是很可惜的一回事，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到這時已是第七次失敗了！

克強在欽州廉州一帶轉輾苦鬥時，孫先生更接到黃明堂等三月二十九日在河口起義的報告。河口是處於

雲南和安南的國境線上，對岸就是安南的老街(Loukay)，是紅河最扼要之地，並且也是扼滇越鐵路交通的孔道，上通蒙自、阿迷，直達雲南省城昆明；左通蠻耗、普洱；右通劍隘、廣南，以達廣西邊境，四通八達，爲鐵路工人和游勇會黨出沒之區。這裏既有這樣重要的形勢，發動革命是最適宜的。所以孫先生上次在河內時聽取了張頭目的報告以後，早已決定一切，經過長期的活動，到現在才開始發動。清軍在河口屯駐重兵，及警察汛兵外，更有防務處督辦王鎮邦親帶二營，岑德桂管帶一營，黃元貞管帶一營。元貞早已和革命黨通聲氣，鎮邦却是一個頑固老物，德桂更懵無知識。鎮邦部下有守備熊通，勇而有謀，他想排除鎮邦而自爲督辦，並且願意率領部隊，全部歸順革命軍，他這個計劃，與革命黨已約定二十天左右的，風聲傳到鎮邦那邊，他就密加戒備，熊通和元貞二人，於是決意立刻發難。這是很難得的機會，漢民知道了，就催促黃明堂、王和順、關仁前馬上發動，因此在三月二十九日這天晚上二時，明堂等率領一百多人，從雲南渡河到河口，開始起事。河口城裏的警察一聞響聲，就起來響應，把管帶李某殺死。明堂等怕他們騷擾到老街，因此約束他們仍舊在河口照常巡邏。一面又轉攻汛營，汛官某就逃到督辦處告急。這時元貞部下的二營，已經投降了，其餘駐在河上的二營，却還是向革命軍攻擊。不一回，三營、那扒各處分駐的清軍，都紛紛叛變，革命軍戰至第二天早上還沒有攻下，鎮邦也親自督戰，但沒有方法把革命軍打退，而元貞部下這時已完全歸降，反戈助戰，使鎮邦陷入窘境。他急中生智，就秘密的派人到老街來向法國守兵營中求救兵，法軍的守兵很妙，說這是革命黨起事，我們不能幫助你去打革命軍。他沒有辦法，真真想天開，這天下午四時，又派人到革命軍來勸說投降，革命軍知道他是一個頭目的老物，突然來投降，不免令人懷疑，因此派王槐廷帶了兩個兵，還有一個法國商人，先到他那邊去偵察，並且還想勸他誠心投降。槐廷和他談了一下，才知道他真的沒有那麼一回事，就起身告辭。却不提防這老怪物突然拿起刀來向槐廷砍去，槐廷猝不及防，就倒地而死。他更拿短槍把槐廷帶來的兵打死了一個，那位法國商人很徹倖的沒有受害。這時熊通在旁，看得很清楚，知道這是機會到了，就拔槍向鎮邦轟擊，這殺人不眨眼的鎮邦也就完了。熊通殺了鎮邦，就把全部軍隊，歸順革命軍，岑德桂逃匿民舍，給革命軍找到了

，因為知道他是無用的人，仍報他走了，他兩部下，也都繳械。於是河口全境，在二十四小時內，都歸革命軍所掌握。這一戰計奪得槍千餘桿，子彈二十萬發。明堂就用南軍都督的名義，佈告安民，並派兵保護俱事和洋人，送到老衙，秋毫無犯，居民悅服，遠近歸附的，絡繹不絕，不到幾天，革命軍人數就增加了一千多，聲勢大振。

孫先生在新加坡，接連着得到克強和漢民的捷報，非常興奮。這時明堂既佔有河口，本來應當一對作氣，依照原定計劃，於最短期間，分兵四出，攻取蒙自、昆明。那時蒙自的守備非常空虛，並藏有岑春暄的三千桿槍。他們如果乘勝前進，佔領蒙自，就可增加軍械。而且滇越鐵路公司早已由河內機關部接洽妥當，鐵路線可以給革命軍應用，軍用品也可以運送便利，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可是明堂始終遲遲前進，原來他本人並沒有什麼作爲，正如漢民對孫先生報告所說：「他是好像江湖腳色中的宋江一樣，自己本來沒有什麼作爲，不過能開大鍋飯，能養許多的兄弟們。他帶人也沒有紀律，譬如他在抽大煙的時候，底下的小兄弟在旁就說道：『老大哥煙抽得夠了，讓兄弟們也來抽抽吧！』這樣的人，要統率龐大的軍隊，自然不能指揮如意了。不過他在會黨的資格復老，頗得江湖上的人心，做聯絡的工作，是最適宜的。」這一次，他佔領了河口，遲遲前進，大概是他的能力所限的緣故。直到四月五日，才派王和順率領部隊沿滇越鐵路進攻。那時黃元楨投降以後，早經勸告在鐵路上的李蘭亭和黃茂蘭兩營反正，李蘭亭並且就於二日晚上親率全營來降，繳槍二百餘桿，子彈三萬發，殺一百擔。黃茂蘭部下的二哨，也在王和順的隊伍開到半路時就來歸降了。於是革命軍很順利的直達南溪。這時雲南總督錫良已派廣鎮總兵白金柱帶領四營清兵趕到八寨來抵抗，八寨距離開化城八十里。和順特報，就分兵襲取古林箐，把白金柱的軍隊牽制住，白軍部下一百多人也都投降了。這時滇越鐵路的南部沿綫，差不多全部在革命軍的手中，很可乘勝進克蒙自。但在後方的明堂，因為沒有調度的方法，使餉彈的接濟，失了聯絡，軍事又停頓下來了。另一路關仁甫的部隊四百多人，也在三日開到蠻耗，想從蠻耗到個舊，會合臨安周文祥的部隊，進迫蒙自。第二天就遇到清軍管帶柯樹勛所部二百多人，革命軍就迎頭痛擊，到晚上，清軍竟不

戰而走，投降的也有幾十個人，駐紮酒管帶李開美聽到這個風聲，知道不是革命軍的對手，也自動的帶了部隊來投降。革命軍因此不費一兵一卒，又安然的佔領新街。

這次起義，軍事進展這樣神速，確是出於意料之外。漢民不斷地把勝利的消息，報告孫先生，同時請求籌款接濟，孫先生在海外，也很忙碌的向華僑勸募。但佔領的地域擴大了，人數也增加了，給養和軍械的費用也一天增加一天，很使孫先生焦心。同時因為主持軍事的黃明堂，能力薄弱，許多原定的計劃，都沒有按照實施，更使孫先生憂慮，恨不能立刻趕到陣前，親自指揮一切，但這是辦不到的。然而湊巧的事情，却在這時候發現了，當關仁甫佔領新街的這天，是四月四日，克強剛剛從欽州回來到安南的先安，孫先生知道了這個消息，非常高興，就立刻打電報給漢民，委克強為雲南國民軍總司令，節制各軍。這一位百戰疆場的革命戰士參加了，就好像增加了一支偉大的生力軍。他得了孫先生命令，就馬不停蹄的在六日晚上從海防趕到河口。他和明堂見面後，就發覺一切軍事佈置，都疲玩不振，而且屯兵不進，更誤戎機，因此力促明堂趕速進兵，沿着鐵路線直攻昆明。但明堂始終說是糧食不繼，沒有方法督促他們到前方去。經過這樣堅持了幾天，不能決定，克強幾次的催促，他才算決定出兵了。可是這些軍隊太妙了，第一天開前去，第二天又退回了，第三天開前去，第四天又退回了。開的時候燒了許多紙錢，不曉得又犯了什麼神，一定要開回來。克強看了，非常痛心，就和明堂商量，願意自己帶領隊伍，開上前去，明堂也很贊成，就撥了一百多兵，跟着他出發。克強騎了馬在前面走，但沒有走到一里，這些兵大家向天開了一排槍，齊聲說：『我們疲倦極了，再不能前進了！』克強向他們再三撫慰，才繼續開前去，但走了半里，一個個都散去了。克強無可如何，只得也回到河口來。他知道明堂是沒有希望了，就聯想到在前敵的王和順，也許他有辦法，於是派人約他回來商議一下。那裏知道和順與明堂原是五十步笑百步。同樣的說兵疲彈缺，不能前進了。克強看着情勢愈趨愈下，於是決心回河內招集前在欽州共難的同志二三百人，成立司令部，再用司令部的威權來使他們服從命令。他這個計劃，本來是不差的。但不幸當他到老街的時候，因為他的容貌太像日本人，就被法國警察所注意，把他截留起來，等到他說出了

真姓名。這警察才知道他是中國革命的重要人物，但照例的要送他離開法境，因此就把他逐出河內，不久，他和孫先生一樣，也由法國輪船帶到西貢，再由西貢到了新加坡。

孫先生看見克強來了，知道經過的情形，不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但事情到了這樣境地，再沒有挽救的辦法了。這時河口方面的軍事，因為克強走了，弄得更糟，因為軍事進行一再遷延的結果，便是給清軍一個調度軍隊的機會。這時滿清政府已派劉春霖督辦雲南軍務，未到任前由總兵白金柱暫代，另飭廣西左江道龍濟光率領南甯防軍七營前往協助，並着江督端方，鄂督陳夔龍接濟餉械。錫良也大賣氣力，親自督師臨安，從兩路抄襲，一由蒙自大路，一由開化西南折入黑彎後路，向鐵路沿線取包圍攻勢。在蠻耗柯樹助部下投降關仁甫的殘卒，一聽到清軍敗兵快要到了，就和柯樹助裏應外合，突然譁變；仁甫無法維持，只得放棄蠻耗，退回河口，這是第一步失敗。隔不幾天，清軍愈集愈多，計桂軍三營，川軍二營，黔軍二營，都已陸續開到，聲勢陡壯，於是更向王和順大營進攻。和順在坭巴黑附近迎戰，相持二十天，因為敵勢日張，而自己軍隊的子彈已經起了恐慌，於是也退下來了，這是第二步失敗。和順到了河口，就和明堂商量，想把全軍開到普洱去，準備襲取思茅為根據地，然後徐圖進攻昆明。明堂也贊成這個提議，約定兩部一同開到巴沙集合。不料這一次明堂忽然緊張起來了，他竟先開到巴沙，沒有等和順部隊開來，又一直前進，在下田房地方，就遇到了敵兵，給他們打得大敗，因此仍舊回到河口。和順聽到明堂部隊敗退了，知道移兵思茅的計劃，不能實行，於是也率領部隊向河口退來。這時革命軍已到孤城落日的形勢，等他們集中河口，想退入安南的時候，清軍龍濟光、王正雅等部也已經趕到馬白關守候着，兩方戰了一天，革命軍又退至馬角寨，晚上又給敵軍偷襲，更不能支持，因此都退進了安南的境界。佔領了幾月的革命軍根據地河口，從此也失去了！雲南革命的軍事計劃，到這時也宣告最後失敗！自孫先生在河內成立機關部，規劃西南起義，到這次河口失敗，已是第六次；從孫先生全部的革命歷史上計算起來，這一次已是第八次的失敗了。這中間所經歷的艱辛，和孫先生內心的苦悶，決不是筆墨所可形容的，我們這樣的敘述，不過說到關於這一切事態外形的輪廓罷了。

### 第三十六章 革命重心的新加坡

這一次河口失敗以後的情形，確是太糟了！黃明堂等本想假運安南，開往廣西邊境，但許多兵士，拿到了餉的爲賭博起來了，有些把餉賣給安南人，軍紀壞得不成樣子。法國總督知道這事，就嚴厲地警告道：『照你們這樣做法，簡直不是說你們的政府，甚且攪壞們的安南了。』一面命令他們的警兵勒令繳械，明堂等當然不能答應，於是竟和法兵開戰起來了。這很奇怪，他們沒有戰勝滿清的軍隊，却把法軍說得喪命奔命，因爲他們原來都非勇出身，書沒讀過，於是把戰線弄得很難，老弱，一直延到太原、左州，使法軍無法策應。這樣相持了很久，法國總督無法應付，就請了一個常駐土家出來調解，兩方戰事才算停止，但革命軍的論議，到底還是散下。餘下二百多人，由安南政府發給旅費，照例他又送到新加坡來。孫先生接到這個報告，知道軍情壞了，但依然極力設法安排他們，一面去電安南總督詢問真相，並且說凡是在安南有戰事的革命黨人，不應該也當作軍人，一律要他們出境，這意思是在防止他們繼續的後及在安南的黨同志。安南總督就答應這：這二百多人，是最後一批的人了，以後再不會有了。於是一面向新加坡總督交涉，要他們仍照上一回交保的手續，使這許多人安全登岸。這一切都辦理妥當，所以這二百多人一到埠頭，孫先生已派人拿價值五萬元的契約作擔保，將他們照舊租一樣的保出。保出了，他們也穿了一式的衣服，列隊遊行，舉高梁綢，儀仗激昂，幾乎忘掉這是人家的殖民地。孫先生又因爲上一回送來的四百人，已經把現有的住宅的滿了，於是又借了荷蘭街聯振東的二間房子，編爲第二宿舍。從這時起，這六百多人的每天飲食和其他費用，數目是很大的，都由各華僑同志分擔，孫先生擘劃分配，也非常辛苦。不久，漢民也從安南秘密地離開到新加坡來了，克強却早已到日本去了。漢民來後，孫先生就得了個助手。後來孫先生因爲這六百多人，坐食無事，而許多華僑同志的負擔已經很重，這不是長久之計。因此和張永福商量，集資三千元，利用他蔡厝港一千畝的山地，開辦一個中興石山公司，以便容納這許多同志。一面派漢民到各埠去勸募股本，一面派張永福和林



義順積極籌備。永福深恐錢不濟急，竟非常慷慨地願意先墊出這筆做開採費，於是這事情的進行，更見順利了。

我們如果把孫先生的歷史，劃分時代起來，從紀元前五年到四年（一九〇七年到一九〇八年）是革命運動最艱苦的時期，如黃岡起義到鎮南關佔領，孫先生沒有一天不是在艱苦的生活中，四面八方都圍困着，使他無一縫曙光可見。但從鎮南關失敗出來，一直到現在，孫先生的革命生活，更陷入苦悶的境地了，因為幾年來慘澹經營的最便利的根據地，既然完全失去，又非短期內所能恢復的，同時更因實際運動的進展而引起的黨務糾紛和反對派的進逼，也在這時期開展起來，更使孫先生苦於應付，要不是像他那樣具有沉毅而魄力，堅定的意志，準確的諒見，恐怕早就灰心了！現在我們把這時期孫先生所遭逢的事實，分幾方面來說：

我們首先要說的就是前年孫先生離開東京時所引起的糾紛，到這時章炳麟等又揚起已熄的殘灰，燃燒起來了；東京同志間的笑話也很多，盛汪公權的受端方賄賂，充作滿清政府的偵探，陷害同志張恭、陳翰怡等，因此給王金發在上海把他槍殺。劉光漢也向端方自首，並想暗殺孫先生和其他同志來立功。章炳麟竟沒有跑到滿清政府，但也托劉光漢向端方要求二萬元準備到印度去。可是他們兩人不多時又發生意見，劉光漢就把章炳麟這種秘密同克強等宣佈了，這樣見與似的鬧得很久。但章炳麟一方面還是想把民報當他的萬世一系，這時候，忽然派陶成章到新加坡來向孫先生要求撥款三千元為印刷費，並要求增加維持費。孫先生正忙着招呼鐵南關和河口失敗退來的六百多同志，天天在籌款，天天在困難中，那裏還有方法來張羅這樣一筆巨款？在這焦急中，只得把自己的手錶和其他東西，要成章去變賣，以救燃眉之急。但是孫先生這種的苦心，竟不能獲得成章的諒解。他原是光復會的重要份子，到這時就拋棄了同盟會的面目，在南洋揚起了光復會的招牌，把同盟會的同志如許雪秋、陳芸生等都拉了進去。章炳麟在東京，不待說，當然要反對孫先生了。這時民報因為發表了一篇反對滿清政府的聯美政策的文章，給清使館要求日本政府把它封閉，這鼓吹革命有力的刊物，就在二十四期以後暫告停版了！

東京民報停刊了，在孫先生革命的宣傳上，祇是失了一個機關，因為這時新加坡的中興日報，已經很有基礎，很可代替民報來鼓吹革命了。這中興日報是前年（丁未年）孫先生到新加坡時和張永福、林義順等籌議創辦的，出版時孫先生適在安南，但一切進行辦法，也有很多指導。不久，民報社的同志都因停辦而到新加坡來，於是都加入中興日報工作，革命的重心，就漸漸地有移向新加坡來的趨勢。然而，另一方面，反對派的進逼革命黨，也移轉鋒芒到這裏來了。那時新加坡和中興日報對立的還有一家南洋總匯報。這報紙最初也是由林義順等創立的，但曾一度停辦。現在許雪秋等因為陶成章的煽惑，反對同盟會，竟喪心病狂的又約了保皇黨的朱子佩來加股合辦，於是康有為的門徒歐策中、徐勤、伍憲子、袁壽民、陳介叔等都陸續來了，憑藉了這個報紙，向孫先生一派的革命黨大肆攻擊，變成了純粹的保皇黨的機關報，兩方面鬥爭的情形，和當年東京民報與橫濱新民黨報的爭戰，有同樣的熱鬧。

我們從過去事實中可以看出革命派與保皇派理論上的鬥爭，革命派因為立場的穩定，總是獲得最後勝利的。過去，新民黨報向民報挑戰的，是承認清政府就是中國政府，所以非難種族革命；承認中國人民沒有政治能力，所以反對民權的政治革命，但這些論點，都給民報駁斥得體無完膚，他們早已沒有答覆的餘地了。現在他們就掉轉方向，集中在中國革命可以召瓜分的問題，大發議論，想從國際方面來說明中國革命的危機，於是這一次新加坡空戰的陣綫，就依着這目標而開展了。關於這問題，孫先生前年（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在美國時，早有一篇中國問題之真解決，說得非常透切，精衛和漢民在民報上也根據了這個論點，做過很長的文章，向保皇黨和一般國民解釋。然而已成強弩之末的保皇黨，為要支撐門面，還是把這個問題弄弄非難革命黨。這是太巧了，在保皇黨正得勁的罵中國革命可以惹起瓜分大禍的時候，素稱近東病夫的土耳其也掀起了革命的風潮。這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以安弗爾（Enver）為領袖的少年土耳其黨（Younis Turk Party）在薩隆尼加（Salonica）起事，廢黜土皇亞伯都哈密德第二（Abdul Hamid II）而奪取政權，並且進而欲收回一八七八年柏林會議所決定的波斯尼亞（Bosnia）與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二州的主權。同時，在法德兩國角逐下的非

州摩洛哥 (Morocco) 革命軍也起來傾覆摩洛哥國王阿都亞斯的全軍，而引起各國對於摩洛哥干涉問題的討論，德國報紙並且很明白的表示應該承認新王。這兩國的事實，很可以拿來解釋中國的革命問題，因此汪精衛在中興日報寫了申論革命決不召瓜分之禍和革命可以杜絕瓜分之實據，這兩篇文章，把這個問題的內容，剖析得非常明白。孫先生也接着化名『南洋小學生』發表了一篇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借了精衛的論據，發揮他的意見，中間有這樣幾句話：

『今者近東病夫之土耳其，瓜分問題，已由革命而解決；無名摩洛哥，干涉問題，亦由革命而解決，中國豈異於是哉。』

這是很確切的見解，世界上祇有萎靡不振的國家，才引起了強鄰的覬覦，而造成在國際上許多糾紛的事實，同樣的，這種國際的糾紛，也必有待於這萎靡不振的國家的復興，才能解決。中國是否被列強瓜分，當然也決定於革命工作的能否完成。孫先生這個論斷，在後日土耳其革命成功後擺脫國際羈絆的事實中，更獲得堅確的證明。侯君派經孫先生等這樣嚴正的駁斥以後，於是又無話可說了。但他們還是想強辯，知道自己的理論不完備，竟倡言自然主義，以為中國未來的命運，只有聽諸天命。有一個筆名叫做『平實』的，在總匯報上引孔孟天命之說，大發議論，他說：孟子言時勢，以為莫之而為者天也，莫之而致者命也。又說：天與人事，不能截然區別，以至淺之理明之，夏葛冬裘，晝與夜寐，何莫非因天時以為人事。又引老莊學說，說合天地人皆以自然為歸，他以為這是很合赫胥黎 (H. Huxley) 的天演學說。這些話本來是他們的遁辭，極幼稚而不足置辯的。孫先生因為他們一再胡鬧，越說越不像樣了，於是發表一篇平實尚不肯認錯，匿名仍是用南洋小學生。劈頭就說：他們既然引孔孟天命之說，無怪以滿人侵略中國，亦為天命之自然，而甘心媚之。但他們又何必說：今為救亡圖存時代，因為天欲此時代而亡，他們已愛戴滿清政府了，便可委心任運的聽他亡了，何必說救呢？同時又根據社會進化史說明人類從穴居野處進步到夏葛冬裘，暑屬寒火，是進化的事實，進化的程度愈高，便離去天然愈遠，及至有歷史的時代，則人事漸繁而理亂興衰的事實畢現，然後乃有時勢二字的名稱

。這就說，人類到今天，決不是由於靠天活命得來的。最後 孫先生又說：

「時勢者，人事變遷之態度，兩名曰：Circumstance 日本人譯之爲遭遭之情形，而自然則曰 Nature，二者固絕然不同也。平實又引赫胥黎之天演論以自飾，……而不知天演二字之原文爲 Evolution，此字有數意，兵式操演之演，亦名曰 Evolution。譯者乃海軍學生出身，（按指嚴復）慣於操演之事，先入爲主，故譯 Evolution 爲天演。而不實今欲文其錯，並加以天演自然四字爲一名辭，以辯其人事即天然爲不錯，其實 Evolution 在赫胥黎之書，應譯爲進化乃合，譯爲天演則不合；以進化一學，有天然進化，人事進化之別也，若曰天然天演，人事天演，則不合也；因人事進化與天然進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

這樣論辯，好像和革命理論的本身，沒有什麼關係，其實也可看出兩派立腳點不同的所在；孫先生一種勇往直進的精神，不安於命定而富於創造性的氣魄，很明顯的活躍於字裏行間。然而，保皇派竟誤解了天演學說，希冀由其渺的主宰去支配他們的命運，這是多麼懦弱而缺乏革命性，當然要處處和革命黨衝突了。因此，孫先生這樣的教訓了他們一頓，竟引起了他們老羞成怒，拋棄了紳士的面目，在總匯報上破口罵孫先生是海盜。這真是太侮辱了！同時也顯出他們的窮兇極惡，因爲理論上的失敗，而出之於無理的咒罵，真是無聊極了。孫先生爲要保全自己的尊嚴，非常氣憤，親到亞命及恩烈稀律師事務所，延請鵝安氏律師，向法院起訴，要求賠償名譽損失。保皇報知道了很害怕，立刻派人向孫先生道歉，孫先生本來包容大度，目的是在要償還個懲罰，來減殺保皇報的氣焰，現在他們自知理屈，也就不再追究了。許多同志，看見孫先生有這樣大量的態度，都非常感動。

孫先生這時除在中興日報宣傳革命主義外，更爲華僑的青年學生專門辦了一種馬來音日報，叫做 Chaha Mata Hari 孫先生親爲定名曰陽明日報，派鄭提摩太主持報務。因爲那時的華僑學生，認識本國字的很少，這種特殊報紙的發行，是很需要的。出版後，銷路很廣，青年華僑信仰革命主義的。日見增多；此後他們

對於國內一切改革運動贊助的熱忱，都是受了這報紙的影響。這也是孫先生一種苦心孤詣的表示。

孫先生在新加坡這樣的努力宣傳，努力聯絡，本來很可以促進革命的運動。但保皇派的活動不停止，以及由同盟會退出來的光復會一派的搗亂不消滅，處處可以牽制。孫先生一切工作的進行，這是很可憂慮的。因此孫先生力排萬難，振起了革命的精神，除了文字的宣傳外，更努力於黨的組織工作，把新加坡同盟會分會，擴充而為南洋支部，使各埠分會都受支部管轄，以便指揮一切，派漢民為支部部長，積極進行。孫先生親自親身到各埠去聯絡華僑，籌款項。計自十一月二日從新加坡出發到芙蓉（Sambit Lan）、吉隆坡（Kuala Lumpur）、巴羅，更由巴羅到底能（Parang）所到的地方，華僑同志，都非常歡迎，但他們的團體組織，却都十分散漫，於是孫先生不憚煩瑣，都一一加以指導，因此華僑傾向革命黨的，如風起雲湧。各埠分會組織，也日見嚴密。

十二月，又借漢民、毅生、何克夫等數人到暹羅去，引起了幾百華僑的熱烈歡迎，在中華會所開歡迎大會，孫先生演說革命主義，非常熱鬧。但第二天安南政府就出來干涉，限孫先生一星期內出境，並在此時期，不許再談政治問題。原來安南政府還沒有忘掉去年的事情，他們依然不許孫先生在他們的境內活動。駐暹英領公使對於這件事，却很為孫先生抱不平，他仗義和當地官廳交涉，於是孫先生的居留時間延長了幾天，因此得以秘密的組織同盟會分會，然後仍安然的回到新加坡。

這次孫先生手訂南洋支部的辦法，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也可看出這時革命黨組織進步的趨勢；第一是同盟聯絡的嚴密，如通信辦法的規定：一、各團體至少每二個月互須通信一次；二、各團體如欲地並有新團體時，應即通知南洋支部，三、以後如續有新立團體，即由南洋支部發信通知，各處接信後，即向新立的團體發信，並且加以勉勵。孫先生更在這通告後面加着這樣幾句道：『以上三條，望留心照辦，以團結同志之精神，廣通各處之情誼，是所至囑。』可見這辦法的重要了。第二是用軍隊編制來組織同志：以八人為一排，自排排長一人，共八人；以三排為一列，外自舉隊長一人，共二十五人；以四列為一隊，外自舉隊長一人。共一百零一

人；以四隊爲一營，外自舉營長一人，共四百零五人。以各列長、隊長、營長等人員，爲會衆之代表人。孫先生在通告上也註明這個辦法的重要性及其效用道：『注意，組織會衆爲營爲隊爲列爲排一條，爲極緊要，有此則會員之感情，乃能密切，團結乃能堅固，不致如散沙。會中有事，由職員通傳於各營長或各隊長，各轉傳於其所屬之隊長或列長，則一人不過走報四人知，列長不過報三個排長，排長則報七人知，如此工夫易做。若收月費，收會費，會員交於排長，排長交列長，各列交與理財員，亦寧簡而效大也。若不行此法，則他日每埠人多至一千或數千，則無人能遍識會員，而分會機關之職員，亦無從遍知各人之住址行蹤也。故必當爲排列，一排長識其所交好之七人不爲難，一列長識三個排長更易，由營而隊而列，猶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節節腦筋相連靈活也。』這新穎而靈妙的辦法，恍惚和現在的區分部，區黨部，縣黨部和省黨部中間的連繫和指揮，有同樣的妙用，不過那時是一種橫的組織，還沒有用到縱的方面來罷了，然而孫先生這時對於黨的組織的注重，也可想見一斑了。

孫先生這時在新加坡活動，滿清政府非常注意，密令粵督張人駿派人到新加坡來，企圖暗殺孫先生。這刺客就住在胡節律一一一號，附近楊圻（雲史）家內，天天偵察孫先生的行動，準備下手。楊圻是滿清政府駐新的副領事，他和陳楚楠、張永福，以及中興日報編輯田桐（梓琴）等都很熟悉。他知道清廷將終，對於滿清政府這個陰謀，很不贊成，因此密告田桐，請孫先生預爲防備，並且同這個刺客說明種種利害，刺客大爲感動，竟放棄原定計劃，掉頭而去，孫先生從此安然無事。

我們對於孫先生這時期的活動，已經說得很多了，但革命的進行，是走曲線的，我們在這裏決不能把孫先生這時期的活動，描寫得纖微畢現。那時，同盟會的會務，雖是漸漸地發展，但陶成章等的光復會勢力依然存在於荷屬東印度一帶，當孫先生派汪精衛、鄧子瑜等到文島（Mun Tok）去籌款時，成章等就從中百般破壞，使精衛等無功而回。他那時是血氣方剛，思想純潔的青年，受了這嚴重的打擊，氣憤極了，就決心要去擊一滿清政府的重臣，以雪此恥。於是瞞着孫先生，秘密的回到香港。孫先生知道了，就向他苦勸，要

他爲願全團體，做一個振聳發聵的木鐸，萬不可就做一座悲壯的血鐘。克強這時剛到新加坡，知道精衛有這個計劃，也和孫先生聯名去勸阻，漢民也很不贊成他這樣辦法。後來孫先生又去電香港馮自由要他候精衛的輪船到後，就把他激留。但精衛的決心既已下了，勢難挽回，他到了香港，知道要給許多同志所阻止，於是就秘密的到日本去，準備實行暗殺滿清政府的重要人物。一年以後，他就造成了一件轟轟烈烈的謀刺戴澄的大事，這也是由於這時期環境的逼迫而發生的。

總之，從河口失敗以後，表面上革命運動已經沉寂下去了，然而孫先生在南洋所活動的，沒有一時一刻不想恢復革命軍的起義，同時，因這活動而遭遇的種種困苦，也決不是一般人所能知道的。那時可以給孫先生多少安慰的，就是這一年清帝后相繼死亡，新加坡清領事通告各商店休業一天，以誌哀感，革命黨員所開設的商店，却都一笑置之，沒有理會，保皇黨因此賄通無賴，大起搗亂，造成兩黨黨員衝突的事情。新加坡輔政司無法應付了，竟請孫先生以中國革命黨領袖名義，張貼告示，制止黨人。孫先生在旅途中，在一封給鄧澤如等的信中，說到這件事：

「（此）亦一奇事，想保黨及滿奴見之，轉爲駭然。英政府既認弟爲有在星管束團體之力，則吾人勢力多有可藉此而謀擴充者，弟行匆匆，未及發揮，要可將來利用耳。」

這確是開歷史上未有的奇例，也是孫先生在這時期中的一件趣事。

在清帝后死亡的喪亂期中，國內起了兩個革命運動，一是熊成基、范傳甲以礮隊舉義於安慶，一是譚震、嚴國燾等以巡防營起事於廣州，雖是事情都很快的失敗，但這時期內，也祇有兩個運動，打破了沉寂的致命空氣。我們相信，這兩件事情，給孫先生也有不少興奮。

## 第三十七章 內閣

紀元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年）三月十七日 孫先生寫信給澤如、心持、亦寬三同志說：

「弟定於十九號離星往歐洲一遊，此行以財政外交爲兩大注意問題，英法荷等國各種外交，俱必於彼祖國政府運動，方能得力。至於財政問題，卽前日借款要件，前途僅往共商，爲日已久，不能復緩也。弟行後，仍望公等以熱力鼓吹同志，增進團體爲一日千里之象。南洋支部弟託諸漢民君料理，各事均可如常通知商辦。……」

我們從這信裏可以知道，孫先生快要離開新加坡到歐洲去了。孫先生這次重遊歐洲的任務，在信上已經隱約的說出。我們根據當時的情況，知道這次孫先生離去新加坡有幾個重要原因；第一是受了河口敗兵的窘。河口和鎮南關退兵的軍人，份子本來是很複雜的，孫先生爲使他們安心的居留和解決生活問題起見，派永福、駿順等親辦石山公司，把他們都收容了進去，此外，又介紹到吉隆坡、怡保、吡叻、文島各埠礦山，工廠，或農場去做工，使各安生業。但有一部份人，還是常常妨害地方治安，後來竟因搶掠嫌疑，給新加坡警察拘去了二十一人，並且還牽連到和孫先生早年相共的尤烈，他這時正在做醫生，經孫先生多方設法，才得釋放。但清領事館就借題發揮，要表英國人趁此干涉革命運動，於是孫先生的活動，受了很多阻礙，後來竟因此把南洋支部，遷到底能去；第二，這時孫先生一面注重黨務，一面還是不忘情於軍事的運動，河內方面有一部份軍火，可以買到，祇須對經手的法國洋行付第一批款一千五百元，同時在法國可以借到一千萬元。但這借款問題，必須孫先生親到法國去商量，就像信上所說的。第三，南洋事實上已成爲中國革命的重心地，但許多殖民地政府，對於革命黨的活動，常常加以干涉；他們這種政策，當然一秉其祖國政府的命令，所以孫先生爲要黨人在海外活動便利起見，必須親自到各國去做一番外交的工作，這也是孫先生決心離開新加



據的重要原因。

這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一箇抱有偉大經驗的革命領袖，決不會永遠的盤居在一個地方，何況更具備這許多複雜的重要原因，所以孫先生又翻然要到歐洲去了。

在孫先生未去前，關於新加坡方面的事情，除支部已派漢民維持外，還有最使他不能放心而必須安排好的，就是中與日報。因為那時中與日報雖是在文字上和保皇黨筆戰的結果，獲得大多數華僑的同情，因此銷路日廣，但事實上，它也不啻成爲國內同志亡命的藏身地，像蘭仁甫等從河口失敗後，都來寄寓，所以開支很大，幾乎有不能維持的趨勢，張永福因此不肯負責。孫先生恐怕自己走了，這報紙也隨着闔門，所以預先規劃了一個妥善辦法，一面派林義順繼續負責，一面改組爲股份公司，向新加坡政府去註冊，使報館基礎，可以確立。同時，又把股票回華僑推銷，以募集現金，充實資本。孫先生維護革命宣傳機關的苦心，真是無微不至了。

這些事情得了相當的解決辦法。孫先生原定三月十九日走的，現在是可以動身了，然而，革命領袖本來是常在窮困中過生活的，他怎樣會有一筆閒着的款子，來等待着旅行時的使用？孫先生那時原定等待暹羅同志的匯款到後，才能動身，但承任款子的那位同志，因為經營的米穀生意，忽然失敗了，一下子不能把款子送來，這就延擱了孫先生的行期。後來孫先生又派漢民到仰光去籌劃。但這時和熊斌基在安徽起事的洪承勳等，因為失敗了，也來找孫先生，孫先生爲要招呼他們，開支更龐大起來，幾乎到絕糧的境地，這樣一來，更使孫先生不能馬上動身了。

直到五月十九日，他才動身到歐洲去。

孫先生一到歐洲，就在法國開始關於借款的活動。這次借款，本來是由前安南總督韜美的介紹，和一個資本家接洽。這資本家投資，應當先得政府的許可，他原以爲內閣克雷孟梭（Clemenceau）一定會同意的，所以早已和孫先生商議條件。可是不幸當孫先生到法國時，法國內閣突然改組，內閣總理已經換了白里安

(Briand)，他是反對資本家向中國革命投資的，因此孫先生的計劃，又遭了一個打擊。這情形，正和庚子年孫先生得到臺灣總督的幫助，想從日本方面獲得運輸軍火的便利，但中途遇到他們內閣改組，一切不能進行，是同樣的失望。不過這一次，由於稻美在政界積疏通的結果，還有一綫稀微的希望給孫先生，他說：「現在事情不宜求之太急，只可稍等一下，或者還有轉機。」同時孫先生因為美國方面，也有活動可能，於是就到比利時，訪問了八九個同志以後，於八月十日到倫敦，準備橫渡大西洋到美國去。

倫敦，在孫先生的印象中，怕是最深刻的一個地方了！他自十三年前在中國使館蒙難後，到乙巳年（一九〇五年）的春天，也曾來過一次，但匆匆地就走，這次來已是第三次了。孫先生在這革命的苦悶時代，重履舊地，不知道要有多少的傷感？大約事實上，孫先生這一回在倫敦，除了訪問幾個同志如吳稚暉、曹亞伯等，以及一個久別的英國朋友摩根（Morgan）以外，沒有別的重要事情。

不久，孫先生就從倫敦啓程到美國紐約，大概是在九月光景。孫先生原定計劃，想從紐約先到三藩市，然後再到芝加哥，繼續在歐洲未成功的工作。可是關於借款的活動，依然沒有什麼成就，因為他所欲訪問的人，一個已經在兩個月前死了，一個已經到歐洲去，祇看到他的兩個代理人，當然不能和他作深切的談話，孫先生所希望的事情，於是又不能順利的達到目的！

但美洲的華僑，自五年前（甲辰年一九〇四年）孫先生親來宣傳和指導以後，對於革命主義信仰的，已經很多，並且孫先生曾經手訂致公堂章程，洪門中人，信服孫先生的尤其不少。一部份華僑如黃魂蘇、黃伯耀、帝超五等也組織一個革命機關，叫做少年學社，李是男等更創辦美洲少年週報，鼓吹革命思想。雖是保皇黨的勢力，還是綿延不絕，但決沒有那年破壞孫先生登岸的那種力量。所以芝加哥同志一聽到孫先生已經到了紐約，就致電歡迎。因此孫先生打消了先到三藩市的計劃，十月八日就到了芝加哥，許多華僑都表示熱烈歡迎。第二天，在會英樓舉行歡宴大會，到會的大多是留美學生，康有為的一個乾兒子，居然也來參加，可見當時美洲華僑對於孫先生歡迎的狂熱。孫先生在席間演講革命的必要，有五六小時之久，全場都非常

感動。宴會後各同志又都環繞着請求解釋，孫先生都一一加以滿意的答覆。經過這樣熱烈的宣傳以後，許多華僑都先後加入同盟會。一星期後，十月三日，孫先生又到三藩市，那邊歡迎的華僑，比芝加哥更見狂熱，於是也成立了同盟會。自此以後，孫先生更在美國各地聯絡，所到的地方，都先後成立同盟會，如聖波羅(St. Paul)、波士頓(Boston)、泡蘭得(Portland)、西雅圖(Seattle)、域多利(Victoria)、加拿大(Canada)等地。其他中美、南美、古巴等地的華僑，也有傾向革命的趨勢，保皇黨的勢力，因此更不像從前的盛旺了。

孫先生在美國這樣順利的進行黨務，前年東京黨潮的餘波，卻又在這時起來了。這風潮的主要人物，當然仍舊是章炳麟、陶成章等。原因是精衛爲了成革在南洋破壞同盟會，就一氣跑到日本，他本想立刻去實行暗殺工作，因爲同志羈阻，所以暫時到日本去先行籌備。這是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的。精衛在日本，又秘密的把民報恢復起來，卻沒有和章炳麟合作，同時他爲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在封面上標稱法國巴黎漢侶街四號出版，這裏就是吳稚暉等新世紀報社的地址，其實他仍在日本印刷的。這就引起了炳麟大大的反感，因爲第一，他是民報的編輯爲他的萬世一系的帝統，民報恢復了，他卻沒有預聞，這是最不對的；第二，他和吳稚暉等的新世紀報，本來是感情很不好的，他在民報上常常有反對的文字發表。但現在復版後的民報竟借用他的地址，這尤其是不對。有了這兩個原因，他更痛恨精衛了，因此寫信到南洋和美洲各處的華僑，說第二十五期以後的民報，是僞民報。後來又把這信在東京的日華新報上發表，並且又做了一篇文章，牽涉到孫先生。成章在兩洋也起而響應，把炳麟的文章轉載在總匯報上，並且又造了孫先生十大罪狀，說孫先生借名革命，擷取名利。這種顛倒是非，破壞黨務的惡毒手段，使孫先生忍無可忍了，爲要免除同志的誤會，就寫信給稚暉，把歷年革命運動中關於經濟的情形說得很明白，要他以第三者的立場，在新世紀上作公平的評論，並且要他聯絡美、洲的大同，美洲少年、中西和溫哥華(Vancouver)的華英、檀香山的自由、民生、大聲等報，作同一的公評，使成章、炳麟的煽惑和造謠，不能獲得華僑的信服。同時東京同盟會也早已通告各地華僑說明成章、炳麟這

種造謠，目的是在誹謗孫先生，破壞中國革命的勢力，應該一致反對。因此不多時，許多同志都明白他們的毒計，甚至有人說煩躁是癩癩，是神經病。對於孫先生的人格，卻獲得更堅確的信仰，所謂磨而不磷，涅而不淄，孫先生前光明偉大，愈經挫折愈能發現，在這次事實中更證明了。

孫先生寫給吳給權的信，是非常重要的，現在我們摘錄在下面：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攬利爲言。而不知我之經營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時間無留學生爲我吹噓也。而乙未廣州之事失敗，中國舉國之人，無不以我爲大逆不道，爲亂臣賊子，爲匪徒海盜；當時，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辭也。今日風氣漸開，留學之士，以革命爲大光榮之專業，而陶輩始妬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祇在赴大義，行宗旨，而與共事之同志，亦無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談革命者，此故國風氣之開，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爲攬利，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以前，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固優勝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則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圖之快樂，我無不得之，革命攬利云胡哉？且當日聞廣州之革命，以資財贊助者，固無幾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資數千，檀香山人出資數千，合共不過萬餘耳。而數年之經營，數省之聯絡，及於羊城失事時，所發現之實跡，已非萬金所能辦者也，則人人皆知也。其餘之財，何自來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接濟，所費不下十餘萬元，所得助者，祇香港李君出二萬餘元，及一日本藥使出五千元，其餘則我一人之籌獲而來也。自此吾一人之財力已盡，而緩急皆賴家兄之接濟，而妻子爾蓄，亦家兄任之。是從事革命十餘年以來，所費資財，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國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後統共不過四五萬元耳。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間，而借革命以擷取他人四五萬之資，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每年所得亦不止萬餘元，此固港粵人人所共知其見也，而其他之事業投機取利者，猶過於此也。若爲圖利計，我亦何樂於革命而致失我謀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資財，析我兄已立之恆產耶？（兩年前家兄在檀已報窮破產，其原固皆以資助革命運動之用，浮錢已盡，則以恆產作抵押貸，到期無償，爲債主拍賣其業。今遷居香港，

密人離下，以耕種爲活。而近因租價未完，又將爲地主所逐。乃陶更誣以在九龍建洋樓，夫家兄本爲地主，實業家者，非我從事革命以耗析之。則建洋樓，亦尋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從事革命事業，關於二人得失之結果也。

「自庚子以後，中國內外人心思想日開，革命風潮日漲，忽而萍鄉之事起，人心大爲歡迎。時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不靈，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許助五萬金，始從事派人通達湖湘消息，而萍鄉軍已以無械而散矣。此不過乘一時礦工之變而起，初未謀定而動，故動，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計南行，得日人資萬四千元，及前述所許五萬元，以謀起義。……自潮州、惠州、欽廉、鎮南、河口五役及辦械運動各費，統共所用將近二十萬元。此款則半爲南洋各地同志所出，爲革命軍初次向南洋籌款者。今計開：由精衛庇荷屬所籌者約三萬餘元；由英屬所籌者萬餘元，共約四萬元，向安南東京及暹羅所籌者約五六萬元。我手得於上述之同志五萬元，得於日本人萬四千元，河內欠債萬餘元，此各項之開支，皆有數目，皆有經手，除梁秀春自行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費數萬，又一人騙去千餘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錢，皆無甚枉費。自我一人於此兩年之內，除住食旅費之外，幾無一錢之花費，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其見也。而此時期之內，我名下之錢，撥於公用者一萬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飾之撥入公用者，亦千數百元。此我攫利之實跡，固可昭示於天下也。」

我們從這封信中，可以看出孫先生偉大的光明磊落的態度，同時爲了革命而犧牲個人的利益，家屬的利益，這種犧牲的精神，也是足以照耀千古的。所以章陶的誹謗，結果並沒有損害孫先生毫末，卻反映出他們的私心，和破壞革命的惡毒陰謀。但章炳麟絕無悔禍之心，他依然在東京狂言攻擊，孫先生知道章炳麟蓄心破壞革命，已無餘地可留，不得已，把某同志所攝的炳麟與劉光漢同謀通好的實跡，在各報發表，以證明炳麟之非。那時孫先生又寫信告訴稚暉說：「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閥，誠爲至艱苦之時代，即爲我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也。倘有少數人毅力不屈，奮勇向前支撐，行過此厄運，則以後必有反動之佳境來也。靜觀美國華僑之人心，自保皇瓦解，大有趨回革命之勢；惟所阻礙者即各埠先覺之士，皆受陶謠，一時不免疑惑，故不能驟

得彼等之協助耳。俟此惡潮一過，則人心必能再合，此邦何有華僑六七萬人，可引導而從革命者，當有一半，於此亦不無可爲也。……爲今之計，欲從新以蓄養革命黨之勢力，舍此必無他法矣。」

孫先生對這次內閣惡潮的悲痛，從這幾句話中，可以想像得知。因此革命黨人一面感動着 孫先生的偉大人格，一面憂慮革命前途的危機，從此激起了更壯烈的革命運動。

### 第三十八章 革命運動的復興

從紀元前四年戊申（一九〇八年）到紀元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年）一年中，在革命黨方面，因爲幾年來的挫折，和內部的糾紛，表面上的活動是沉寂了。同時，在滿清政府方面，僞立憲的進行，並不因帝后登壇而中止，保皇黨也已經一變而爲立憲黨（如政聞社之類，結合國內氣味相投的人，要求滿清政府速開國會，組織責任內閣。滿清政府也爲了緩和革命空氣，從空洞的預備立憲，而有戊申年八月二十七日憲法大綱的頒佈。立憲派人大家都很高興高采烈的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奔走呼號，似乎都已忘却偉大的革命風潮立刻就要爆發，所以梁啓超很得意的說：「數年前革命之說徧天下，自預備立憲之詔既頒，乃如湯沃雪。夫一詔則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則民氣不期靖而自靖也。」（國風報梁啓超爲國會問題敬告政府諸公）孫先生就在這所謂如湯沃雪的時期中，奔走於南洋、歐洲、美洲，度着最艱辛的苦悶生涯。但這種平靖，僅僅是表面的。孫先生雖是遠處海外，內地的革命佈置，還是繼續的進行，孫先生的同志仍然努力的秉承了命令，毫不鬆懈的奮鬥前進。因此在孫先生到美洲後不久，廣州新軍起義的消息就傳來了，接着更有精衛、黃復生謀刺袁世凱的壯舉。革命的聲勢，從此格外的張大，造成了空前的偉蹟。我們應該把這時期稱爲 孫先生的革命運動復興的時期。現在先把廣州新軍起義的經過，說一個大概。

廣州新軍的聯絡，是遠在孫先生離去新加坡的那年。因為許多同志鑒於過去黃明堂、王和順的失敗，是在由游勇組成的革命軍，太缺乏訓練，所以佔據了地盤，經不起敵人的攻打，就不能固守而潰散。因此大家都注意於新軍的聯絡，因為新軍不僅有訓練，有學識，並且他們的救國思想，也遠非會黨游勇所可比擬，要他們變革命軍的主力，當然更堅實而有力。孫先生也非常贊成這個提議，所以漢民、克強在孫先生遠遊歐美期間，就積極進行廣州新軍的聯絡工作，不久他們就在香港設立南方統籌機關，派張谷山、胡毅生等到廣州新軍營中去活動。新軍同志姚雨平、張東村、劉吉香等，早具革命思想，曾經分途運動陸軍學兵營，和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很有成效，尤其是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最為活動，因此給學校當局犯姚、張、劉等開除了。但他們並不因此畏縮，在廣州更秘密的集合了朱執信、張伯倫、鄒魯、姚登樓、吳雨倉等聯絡進行。同時新軍方面的革命種子早已根深蒂固的確立了，各防營官長，都是由陸軍速成學堂第一二班，及虎門講武堂畢業的充任；新軍頭目，是由學兵營畢業的充任，他們都曾經過姚、張、劉等黨人的宣傳，所以都抱有革命思想。更巧的，這時粵吏又設立模範學兵營，在惠州、嘉應州和北江方面，廣徵新兵，黨人認為絕好機會，於是有很多人屈身應徵，畢業以後，都充作新軍排長。這樣，新軍上下差不多都有黨人和同情於革命黨的份子散佈了。加着趙聲這時剛調任新軍標統，更從前提倡，於是新軍的革命思想，愈見有蓬蓬勃勃的氣概了。

香港機關部看到新軍的聯絡，已經很成熟，於是決定準備起義。這一次起義中，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倪映典，他原名秉章，因為和熊成基在安慶起事失敗，才化名逃到廣州來。機關部同志因為他熱心勇敢，堅忍誠實，就委以運動新軍之責，由趙聲從中主持一切。東江、西江、潮梅等處，則有雨平、葉村及陳炯明負責進行。映典奉命後，就和朱執信、方楚喬、莫紀彭、黃俠毅等，在廣州城內天官里、寄園、清水源、和南關水慶坊、高第街寧安里、清水濠等處，設立機關，新軍加盟的很多。同時毅生、執信運動南番各屬民軍，也已經成熟。孫先生在美洲募集餉款子，也由趙公壁匯到香港。於是決定紀元前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正月上旬舉義。

這一次久挫後的革命運動，經過長時期的籌備，本來很可以大規模的起事。但不料在十二月，各目兵加盟的證書，給一標三營隊官羅嗣廣查到了，他就報告協統張哲培，哲培又報告到廣東總督袁樹勛，這就把事情弄壞了。因為他們知道新軍中有革命黨，非常驚惶，於是用火底抽薪之計，於十二月二十九日秘密地把標營子彈都送到督練公所去。映典知道事勢不佳，但無可如何，祇有等待標營開操後，再定辦法。

可是不幸的事實，並不因此而止，在子彈運去後的第二天，就是十二月三十日，這一天晚上，有二標新軍五六人，為了一件小事情和巡警衝突，結果雙方毆打起來，巡警把新軍拘去了二人，於是激起了新軍的憤怒，第二天庚戌正月初一日，各持木棒，把第一第五警局都打毀了，並且打傷巡警很多，以報復昨天的恥辱。袁樹勛恐怕事情擴大，立刻下令把大東門，小東門關起來，一面派兵彈壓，這風潮才算平靖下去。然而革命的怒潮，却就借着這原因而爆發起來了。

這次鬧事的，祇是第二標，其餘第一第三標，還沒有預聞。那時廣州新軍共分三標，第一二標駐燕塘，第三標駐北校場。第一標共有步兵三營，砲兵二營，輜重及工程各一營，每營三百餘人，步兵營共數一處，好像一個品字形，砲工輜別紮一處，但各營的距離都不十分遠。這已經過一標四年訓練，紀律極嚴，但黨人最多。協統哲培及標統劉雨沛等因為前次搜獲革命黨盟書，早有戒心，現在又看見軍警交關，深怕鬧出亂子，因此把初二初三兩日假期，改為運動會，這是他們的深謀遠慮。但到了初二這一天，兵士還是請求放假，沒有得到允許，就喧鬧起來，步兵二百餘人都擁擠出營，各官長無法制止。他們出去了不到幾分鐘，又奔回來大嚷大鬧的說：「警兵大隊來攻營了，我們應當出來抵抗！」這個非常的警報，把全營都震動了，於是大家都武裝起來，到軍械房去拿軍械，雨沛急得極力阻止，並且說這是撒謊，沒有這回事。但是沒有方法可以阻止他們。哲培乘機從後門逃走，坐了馬車進城。雨沛還想阻止，結果在騷動中，撞傷了頭部，就不敢再出來了。各兵把軍械拿出了以後，因為扳機和子彈都已經繳去，於是都到砲工輜各營去尋覓軍械；在路上，看見各營正把扳機用馬車運到城裏去，就截住奪去，分向息轍亭，小旗亭前進。隨後又分一隊到北校場，佔領鏡局後小山和橫枝崗等處。



又一家走東校場茶亭附近，並派斥候數小隊前進。這時李準已經親率部隊趕到東郊，新軍對他說：「我們是革命黨，你如果不肯投降，就請你進城準備和我們決一死戰。李準不及回答，就回到省城。新軍又前進至東郊陸軍講武堂，一擁而入，把這裏所有槍械都拿了出來，拔去了它的扳機，就退了出來，又回到各營去，準備明天決戰，同時派人飛報省港機關部請趙聲、倪映典等前來指揮。

李準進城後，就和樹勳等會商，決定出戰。一面下令緊閉四城門，派旗兵運砲，登城守禦；都統守東門，將軍守歸德門，李準守小北門，並雷調虎門各營進省拱衛。

初三日早上，映典趕到燕塘，看見了這情形，就嘆着道：「半生心血，敗於一朝，我們不能死守師期了，我們若不奮起，新軍同志無唯頹了！」於是潛入軍中，到砲兵第一營，激昂慷慨的大呼道：「事情迫切了！我們的同志應該立刻起來，戰亦死，不戰亦死，我們應該與李賊同死！新軍中預先受命的發動員一百多人，聽了映典的呼聲，就大家齊聲高呼道：「我們誓與李賊同死。」這時管帶齊汝漢正集隊演說，要新軍繳械投誠，他看見了映典這情形，就想出來干涉，但映典不待他動手，就把他一槍擊死，於是全營歡呼道：「我們一齊上去！」說着大家就全集操場，整隊出發。映典率隊又到砲兵第二營，全營也就歸附，不一回，工程營，輜重營也都整隊而出，在操場集合着。於是映典又率隊數百人到第一標，先派兵入第一營，大呼漢軍歸隊，官兵聽了都爭相附義。第三營已由排長帶隊，自動的出營集合。祇有第二營沒有到，映典就親自帶隊入營，向官長勒令站隊，同時把槍舉起開了四五響，以壯聲勢，全營官兵就欣然出營，也願死心革命。於是合步砲工輜七營，有三千之衆，公推映典爲司令，映典當天宣誓道：「願爲革命戰死。」大家也歡呼道：「願爲革命戰死。」因爲事情緊急，就不等部署一切，立刻分大隊三路向省城進發，以工砲輜四營由馬路前進；以一標大部分繞廣九鐵路前進；以工輜一部由橫村崗向小北門襲擊。

當新軍進發時，李準也已經與防營總領吳宗禹、管帶李景燾、董常標、太永寬、劉啓璋等各率所部約二千人，由大東門，大北門，小南門三路進兵。下午一時，兩軍在東門茶亭前相遇。李準還想用緩兵之計，先派李

景濂到新軍前游說，映典和他見面了說：

「你不是由某某介紹入革命黨的吗？現在跟大隊人馬來，爲什麼不乘機響應呢？」

「我立刻回去報告，請他們一齊歸附好了。」李景濂狡詐的回答。

李準見景濂回來了，就聽取他的報告，但李景濂却這樣的報告道：

「誰說這一回是新軍鬧事，其實指揮帶兵的都是革命黨人，現在聲勢浩大的來進攻省城，他們的目的是很大的，我們不能小視他們，應該立刻把他們剿滅才是。」

這個斬釘截鐵的報告，更使李準作戰的心堅決起來，於是立刻派吳宗禹率所部滿佈牛王廟、貓兒岡、三圍岡一帶，以步隊在前面遮蔽着，砲隊藏在後面，一待槍砲齊發，這無計劃的新軍，雖是奮勇前進，但到底不能抵禦清軍的大砲，映典就是做了第一砲的犧牲者。因此新軍喪失了主腦，更紛亂的不堪一戰。相持數小時，彈盡無援，傷亡枕藉，祇得退回燕塘。

清軍又乘勝追到沙河，到晚上吳宗禹就率所部駐紮在那邊。新軍同志王占魁還是想絕處逢生，化裝到吳軍營中去偵探，並且乘機運動各軍反正。但是結果給他們察破了，就被擒斬首。後來新軍一標步隊忽然起火了，新軍就用聲東擊西的方法，向吳軍進撲，然而經不起吳軍的反攻，又潰敗了。初四日，新軍已潰不成軍了，分向石牌、東圃、白雲山一帶退守，清軍又四出搜剿，這天午刻，更把一標內二營燒去，使新軍無法藏匿，這真是慘無人道了，於是籌劃很久的新軍起義，到這時又完全失敗了！

廣州新軍的失敗在孫先生革命運動中算是第九次了。發動消息傳來的時候，正當孫先生到三藩市的一星期後。孫先生很興奮的繼續募款，因爲欲各屬會黨同時響應，非有充分的款子不可，但當時波士頓方面預定的款子，遲遲不來，使孫先生非常焦急。到十三日，失敗的報告來了，孫先生覺得很痛惜，因爲這次籌款，所差的只有五千元，要是把這五千元匯去，使東江、西江、湖梅、南番、各屬的會黨起而響應，也許有甚辦法，祇少不至於這樣很快的失敗。這是當時孫先生遠在美洲的想法，還沒有知道這一回失敗的根本原因。

是在幾個新軍爲了一件小事情所激起的，以後很倉猝的無計劃的起事，當然一切沒有方法很靈敏的應付，而至子失敗了。

但是對於革命抱樂觀態度的，孫先生，始終是認爲前途有希望的，有把握的。當接到新軍失敗的報告後，知道失敗的祇是第一標，其餘二標三標還是安然無恙，將來一定能夠有捲土重來的機會，因此還是積極的宣傳和籌款。美洲僑胞也都非常興奮，在孫先生領導之下，奮鬥前進。當時由李綺庵等組織宣傳隊，李是男、李伯眉等創立革命學校，機關報的鼓吹，也更見活躍，於是革命思想，傳遍了美洲的僑胞。三藩市同志也於三月一日成立同盟會分會，並就在這天舉行廣州新軍追悼會，這也是一個很有意味的舉動，使每個同志都留下一個極深刻的印象。明年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美洲華僑助餉的特別踴躍，其實就是這時。孫先生預先活動的一個成績的表現。

孫先生在這期間，爲要繼續新軍起義，積極籌款起見，曾經想過一個很巧妙的經商計劃，就是欲把馬來半島華僑所產的錫，向美國各大市場傾銷。因爲南洋的錫向來是由倫敦商人包辦的，美國是最需要錫的市場，如果由華僑直接販運美國，在買主可以省去一筆經紀的費用，在華僑也可以得到很大的利益，這是一舉數得的辦法。孫先生把這個計劃告訴南洋同志鄧澤如，請他協助，想自己在美洲因爲經商的關係，可以多逗留一些時候，一面聯絡同志，一面憑藉這個企業來籌款。但一個不尋常的報告又傳來了！就是三月七日精衛在北京失事的消息。

精衛這個短兵突擊的計劃，早已蓄之有素，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自前年到日本，就與黃復生、喻培倫、曾醒、方君瑛、陳璧君等組織一小暗殺團，祕密的試驗炸彈。同時又把民報恢復出版，却因此引起章炳麟、陶成章的格外反對，並且誣謗及於孫先生，這更使他更痛心的一點。他爲了籌劃暗殺工作，曾經嚴密的往來於香港日本，但始終沒有與同志通信，這是他的苦心孤詣，想避免同志的勸阻，和外界的洩漏消息。但反對派却借此造謠了，說他已和孫先生分道揚鑠了。因此他更堅決的要實現他的抱負。廣州新軍起義以前，香港機

關部同志本來公推他留駐襄辦一切，但他已經和黃復生等約定要到北京實行他們的計劃，所以沒有答應，並且就悄悄地到了北京。這是去年年底的事情。孫先生爲了他這行動，已經勸過好幾回，要他爲了維持團體，暫時不要進行這件事，他也沒有回答，直到這次出發北上了，才寫了幾封信，一封給漢民，並附著致南洋同志書，要他等事情發生了，才發表在新加坡中興報；一封就是給孫先生，把他因憤於黨內糾紛，而欲以革命事實表現的心理，說得很透切，他說：

「蓋此時團體潰裂已甚，維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彌縫，非手段所以挽回，要在吾輩努力爲事實之進行，則灰心者復歸於熱，懷疑者復歸於信，此非臆測之言，前事可徵也。丁未春夏之間，太炎輩在東京所以排擊破壞無所不至矣，洎開演學軍起，東京同志躍起奔走，未嘗以太炎等之言而有所介於中，即太炎等亦自息其喙。惟太炎等最後之手段，無過於發佈詆譏之函，前時因有人彌縫其間，此等最後之手段忍而未發。今則不然，彼等最後之手段已出矣，其排擊破壞之能力，當無有更甚於此者矣。然則今後吾輩復有事實之進行著於天下，則彼等愧怍之不暇，更有何法以惑人。弟等之爲此事，目的在於破敵，而非在於靖內變也。所以靖內變之道，亦不外於此。」

孫先生接到了精衛這封信，知道他的計劃已完全決定，再不能挽回了，祇有聽他一試。他到了北京，就和復生等假裝開設守眞照相館，日夜研究方法和地點。最後決定在十剎海旁甘水橋附近放置炸藥，因爲這裏距離攝政王府最近，可以一舉而炸戴禮。但不幸當他們在夜間配置安放的時候，給警察破獲了，於是精衛的計劃，全盤失敗，結果給滿清政府捕去。這個壯烈的消息傳出以後，許多同志都非常感動。孫先生尤其是有說不出的傷感和悲痛的情緒。精衛在給漢民信中有這樣幾句話：「僞立憲之劇，日演於舞台，炫人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國人將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愈堅其信仰立憲之志。」他這一擊，雖沒有成功，但確實的是在保皇黨所謂如湯沃雪中的一個晴天霹靂，他們幾個人的行動，和廣州數千新軍的舉義，在革命史上實有同樣的重要意義，國內的革命形勢已經顯著的進展了，孫先生覺得在美洲無久居的必要，因此又決

定回東方來了。

## 第三十九章 庇能會議

孫先生這一次東歸，目的地似乎是在日本，想從日本再設法到和祖國接近的地方，可以指揮一切。這是孫先生早就懷着的一個意思，所以在到美國後不久，即在芝加哥去訪問查野長知的一個親戚，叫做大塚太郎，探聽日本政府對於中國革命黨的態度，以爲重返日本的準備。這一次決心離開美國，就想到要去日本，這當然是意料中的事了。但爲了行程上的必要，卻先到檀香山。

三月二十二日，孫先生從三藩市動身，二十八日就到檀香山。這裏是孫先生兒時舊游之地，也是與中會發軔的地方，雖是很多時候，沒有來到這裏，但許多同志依然沒有忘掉對於他們領袖的信仰和感情，所以孫先生一到了，就表示熱烈歡迎。彷彿和七年前一樣，檀香山的同志和僑胞，仍在荷梯爾街華人戲院中開盛大的歡迎會，到會的有二千多人，真是熱鬧極了。孫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自由新報館樓上，開會聯盟，每次加盟的總是在百人以上，甚至本來是保皇派人，也都歸化革命，可知當時的盛況了。後來又到茂芋、希爐各埠去，各埠僑胞也都先後加盟，於是同盟會在檀香山也規模畢具。

孫先生在檀香山本來想有三個月的逗留，但不久接到精衛和復生被滿清政府判處永遠監禁的消息，非常着急，嘆着道：我們從此喪失了一文一武二個人才了！爲要設法營救，和發動實際運動起見，就急急的到日本去。

六月十五日（陰歷五月初九日）孫先生到日本。但孫先生此行，並不像他所預料的有什麼成就，祇是秘密的上岸，連許多同盟會同志也不敢完全通知。住了兩個星期的光景，就給滿清政府代理駐日公使吳振麟所

據悉，他和日本政府幾次交涉，要他們拒絕。孫先生居留，日本政府起先沒有接受他的請求，但經不起他的催促，終於示意。孫先生，於是。孫先生又到新加坡來了。

這的確不是。孫先生所願意的，離去新加坡已有一年多了，卻又回到這裏來。那時新加坡南洋支部早已搬到庇能去。孫先生在張永福別墅住了幾天，就和眷屬一起到庇能，住在柑仔園四百零四號，但不久，孫先生的家庭，就遭逢了一件最不幸的事變，就是慈祥的楊太夫人忽然病故了！楊太夫人生於清道光八年六月十三日，病歿這天也是六月十三日（陰歷），享壽八十三歲，這也是一個異聞。孫先生因為奔走國事，和太夫人在家庭團聚的時候很少，十三歲時曾侍奉太夫人到檀香山，從此使。孫先生能夠看到世界的偉觀，確立了大志。三十歲時重到檀香山，又和太夫人暨德彰公同居數月，但不久。孫先生又到美洲去。在每次分別時，孫先生一面依戀膝下，一面想到革命的責任，這種躊躇家園之間的內心痛苦，我們不難想像而知。然而不幸，當孫先生這次回到南洋來不到幾天，這位偉大的革命領袖的慈母，竟不及看到他兒子的成功而逝世了！孫先生真是何等悲痛？

但不久，更有一個不幸的事實，德彰公在九龍，爲了欠繳地租，給地主驅逐出來了！他爲幫助自己兄弟革命而致於破產，已夠受了一切痛苦，現在更被人家壓迫而驅逐，是怎樣的難受？然而他毫無怨言，就一直到底龍來和。孫先生共謀革命大事，這種骨肉的至情，和對於國事的熱忱，兼而有之，實在是難能可貴，我們可以說有。孫先生才有德彰公，同樣的，有德彰公才有。孫先生，革命志士，萃於一家，也是一個千古佳話。

這些不幸的變故，固然使。孫先生傷心，但並不因此阻撓他對於革命事業進取的決心。不多時，趙聲、克強、漢民等都應召而至，於是產生了在革命史上很重要的一個庇能會議，決定轟轟烈烈的辛亥（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計劃，而完成了。孫先生偉大的抱負。但這時距離廣州新軍失敗，才有半年的光景，當時同志間的勇氣，並不像。孫先生一樣的奮發有爲。孫先生追述當時情形，有這樣的話：

「時各同志以新敗之餘，破壞最精銳之機關，失卻最利便之地盤，加之新軍同志亡命而來者實繁有徒，招待安插，為力已窮。而吾人住食行動之資，將虞不繼，舉目前途，乘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歸噓太息，相視無言。」

這確是最艱苦的時期了，因此孫先生向各同志再三安慰，說一敗何足餒？他從前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起現在來，困難的情形超過了百倍。現在我們雖窮，但革命的風潮已經很旺盛，華僑的思想也大為開通了，從今以後，只怕我們沒有計劃，沒有勇氣，革命運動不是不能再起的。大家聽了孫先生的話，都非常感動，認為現在時機迫切，應該立刻起來。孫先生看見各同志的意念都已動了，於是在決醒園召集會議，到會的有黃克強、趙聲、胡漢民、德彰公、和庇能代表吳世榮、黃金慶、熊玉珊、怡保代表李孝章、芙蓉代表鄧澤如等。大家開始討論關於革命的計劃，克強以為廣州黨人元氣大損，很不容易再起事，因此主張從緬甸入雲南，聯絡雲南軍隊來舉義，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意見，因為他曾經參加河口起義，對於雲南軍事的經營，還沒有忘懷，但孫先生別有見解，主張還是在廣州起事，理由是：

「現在因新軍之失敗，一般清吏，自以為吾黨必不敢輕於再試，可以高枕無憂，防禦必疏。至於新軍之失敗，雖屬不幸，然因此影響於軍界最鉅。吾黨同志，果能鼓其勇氣，乘此良機，重謀大舉，則克復廣州，易如反掌。如廣州已得，吾黨既有此絕好之根據地，以後發展更不難着手進行矣。且此次再舉，亦遠非前此歷次之失敗可比，因曩者多未有充分之籌備，每於倉卒起事所致。今既有先事之計劃，當然較有把握，可操勝算。但同志疑慮莫決者，乃在於餉械之無着，不知現在因吾黨歷次之舉義，與海外同志竭力之宣傳，革命精神，早已彌漫南洋羣島中，祇怕吾人無勇氣，無方法。如避免居留地政府之干涉，以致貽誤事機，今吾人則以教育護捐之名目出之，可保無慮也。」

這一番警闢的議論，把大家都說得心悅誠服，趙聲於是進一步提出一個具體意見說：

「如果要在廣州再起，必須立刻派人拿數千元回國，以便接濟某方面的同志，免得他們散去。然後再設法

集合，設立機關，指揮一切。我們也應當繼續回到香港，與各方接洽，積極進行，這樣，日內就需費路費五千元。如事有可爲，更非數十萬不可。」

「關於款項，我一定有方法可以籌足的。」孫先生很有把握的說。

於是決定在廣州起義，以新軍爲主幹。但鑒於從前運動軍隊或民軍，難於擇一發難，因此決定從同志中擇五百人爲先鋒，任發難之責，以領導軍隊及民軍。廣州一得，以克強統一軍出湖南趨湖北，因爲他曾在湖南辦華興會，黨羽很多。趙聲統一軍出江西趨南京，因爲他曾任南京新軍統領，和新軍感情很厚。這都是很周密的計劃，準備傾全黨的人力財力以赴之。關於款項問題，決議先定十萬元，英屬，荷屬各籌五萬元，暹羅安南三萬元，美洲未計，如果能照預定籌募，本來十萬元是不成問題的。

隔了幾天，孫先生在打銅街一百二十號庇能閱書報社，重開祕密會議，各同志都踴躍赴會。於是孫先生依照原定計劃，開始進行籌款，先向各同志作極謙遜的演說道：

「余每次會晤同志諸君，別無他故，輒以勸諸同志捐鈔爲事，諸同志雖始終熱心黨務，竭力勸助，或不以余爲多事，第余以吾黨屢起屢蹶，深自不安，故對諸同志甚覺抱歉。惟念際此列強環伺，滿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圖之，將恐國亡無日。時機之迫切，大有朝不保夕之概。且吾黨春初廣州新軍之失敗，雖屬不幸之事，然革命種子，早已藉此而佈滿於南北軍界。因新軍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皆極端贊成吾黨之主義，在今日表面上觀之，固爲滿廷之軍隊，若於實際察之，誠無異吾黨之勁旅，一待時機成熟，當然倒戈相向，而爲吾黨効力。是以諸同志咸認爲絕好良機，光復大業，在此一舉，固將盡傾吾黨人才物力以赴之也。」

「吾適問所云每晤同志諸君，輒以勸捐爲事，雖余亦極不願對同志諸君每有所求，但念此等責任，除我明達之同志外，又將向誰人求之？是以雖欲避免，實不可得。蓋海外同志捐錢，國內同志捐命，共肩救國之責是也。總而言之，捐款之義務，諸同志責無旁貸，此應請同志諸君原諒予之苦衷，仍當踴躍輸將，以助成此最後之一着者也。設天不祚漢，吾黨此舉復遭失敗，則予當無下次再擾諸同志，再向諸同志捐錢矣。倘或仍能生存



亦無面目見江東父老矣。是則此後之未竟革命事業，亦惟有賴之同志諸君一肩担起矣。總之，吾黨無論如險阻，破釜沉舟，成敗利鈍，實在此一舉，而予言亦盡於此。」（五）

孫先生說到這裏，不覺聲淚俱下，大家聽了，大為感動，於是雖處於經濟極困難的地位，也都互相勉勵，竭力捐款，當場籌得八千餘元，孫先生的精誠感人之深有如此。

其他同志也分頭積極進行，如澤如任英屬籌款之責，克強任荷屬籌款之責。漢民也在新加坡籌款，但經過半天的奔走，還沒有滿一萬元，因為許多同志雖都傾囊贊助，但以量力爲止，要他們破家爲國，到底是很困難。他因爲這數目距離孫先生的預算，相差太遠，非常焦急，就約澤如到新加坡共商進行，他二人研究結果，認爲新加坡同盟會，本不乏熱心之士，現在深閉固拒，也許有不瞭解這一次起事計劃的意義，於是在晚晴園開會，同志相繼演說，漢民也懇切的說：這次孫先生決定大舉計劃，實漢族存亡所關，現在內地同志均竭力籌備，待機而動，希望海外同志，格外竭力資助，以底成功。澤如也說，他在這十天內遍歷十餘埠，大家都非常踴躍，新加坡同志，不可讓人專美。這樣苦口婆心的說了一番，才激起了他們的熱情，由沈聯芳首先捐出一千元，其餘同志也就量力認捐，得三千餘元。不久，克強和澤如在檳羅會面，克強因爲荷屬的款項不可靠，而英屬的成績，也只有一萬元，現在事勢已十分迫切，如果英屬不能籌足預定的數目，恐將全局瓦解，他就不願回香港去，惟有決心實行個人犧牲主義，步精衛後塵了。他這樣說着，兩眶的熱淚就簌簌地落下。澤如勸他不必如此，還是到各地去極積籌劃。自十二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先後籌到四萬左右。克強以所差不遠，於是初八日由新加坡回到香港。

經過了這樣艱難困苦的勸募，才有這一批的款，孫先生本想遍遊南洋英荷各屬，從事進一步的宣傳，但因爲在清風閣演說革命，給保皇黨人譯登當地報紙，觸動英國政府的憤怒，於是又限令出境。因此孫先生早於十二月初六日離開庇能了。

這一次孫先生在開闢前最後的遠行了，但當時荷屬則拒絕不許前往，日本及安南暹羅亦先後有出境之

大陸之廣，南洋島嶼之多，竟無一立足之地，於是孫先生只好又向千里迢迢的美洲去了。

## 第四十章 三月二十九日

十二月十日，孫先生經過哥倫坡（Colombo），一直西行到美洲。這一次孫先生原定計劃是先到英國，辦理特別外交問題，但後來因為預計南洋十萬元籌款，恐怕一時不能足數，有誤大事，因此雖是變了，他過去航行的慣例，就是不橫渡太平洋而過地中海，經過歐洲；但到了哥倫坡，停泊幾小時以後，又繼續前進到美洲去了。

美洲華僑不久以前，在孫先生宣傳訓導之下，對於革命的熱誠，特別顯著。並且當孫先生未出發前，也曾幾次致函勸募款項說：『此十萬元不過一安全冒險之問題，非了不起之問題也。今內地同志已有決死之心，亦何暇計其安險，但念海外同志，必不忍內地同志獨出冒險，而不一援手，以拯之於安全之地位也。故欲各盡所能，以相有濟。』美溯同志讀了這封信，都很感動，已由陳耀垣、馮自由、黃芸蘇等負責開始募勸，各同志都很踴躍輸捐。

孫先生於紀元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一月二日到溫哥華，黨人約洪門人士及其他團體，都到碼頭上熱烈歡迎。第二日，致公堂開台演戲（洪門稱舉行加盟儀式演戲），孫先生擔任主盟，並演講洪門歷史及宗旨，華僑入圍者三百餘人。又在華人大戲院，逐日演講革命之利害得失是非等種種問題，每日前往聽講的都在千人以上。孫先生看到這情形，知道人心可用，於是提議創設革命救國籌餉局，溫哥華致公堂首捐港銀一萬元，這成績比南洋進步多了。

這時克強、趙聲、譚民等，已先後回到香港，長江各省及閩、桂、日本各同志，亦已紛紛起來，於是成立

統籌部，由克強總辦負統籌全責。他們因爲工作正在開展，需要款項，也很迫切，一再向孫先生請示。孫先生因此又到域多利籌款。這次籌款又變了一個新方式，向一般散仔（洪門稱普通會員曰散仔）宣導變產救國。因爲洪門會員，太鄙爲勞工，如果向每一個人去勸募，不但曠費時日，並且無法應付急需。域多利致公堂會所，是由各個會員捐資建築的，因此提出這個變賣助餉的辦法。孫先生在洪門款迎宴上，就提出這意見，並且大聲疾呼的告訴他們，反清復漢的機會已經到了，這正是我們捨私從公，爲國盡責的最好機會。各散仔大爲感動，於是召集全體大會，一致通過把會所樓房向銀行押抵香港銀三萬元，充作革命軍餉。這是一件驚人的事情，各埠致公堂聽到這消息，都很興奮。不久，都郎杜致公堂也跟着變賣他們的會所，得香港幣一萬元。加拿大籌款的成績，到這時可算十分圓滿。熱望着發動革命的香港同志，得着孫先生在海外不斷地鼓勵和源源地接濟鉅款，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一次革命運動，就逐漸展開了。

克強等在香港組織統籌機關以後，其他分機關和各省機關，也先後成立，即於一月初六日派譚人鳳攜款二千元到湖南湖北，聯絡居正、孫武等，籌劃湖北的軍事，這是預先播下了以後武漢起義的一顆極重要的種子。陳英士、鄭贊臣等也在上海設立辦事機關。方君瑛、曾霽等在香港、桂林一帶活動，促成在廣西的軍人如方聲濤、劉建藩、何啟甫等參加這次革命戰事。

廣州的秘密機關，也開始暗中設立，爲了租賃房屋必須有眷屬同居，許多熱情的女同志，就慨然冒充了他們的家眷和女傭僕姬，大門上因此公然標明「某公館」，他們在這樣掩護之下，積極地展開了很多工作。有時還要假名娶嫁，許多軍械就在這肩抬担挑的一件件禮物中暗藏着，裝騙了軍警，一批批送進省城來了。

關於軍事的進行，克強等遵照孫先生在庇能的指示，以軍界爲主力，由姚雨平等擔任聯絡新軍防營的工作，新軍下級軍官的聯絡，由陸軍速成學校的畢業生擔任。但防營自舉辦清鄉以後，不常駐在廣州，因此仍以新軍爲主幹。可是新軍自去年舉義失敗以後，滿清官吏對他們監視得非常嚴密，所有子彈，僅夠操演時的需用。孫先生早已料到這一點，因此在庇能會議時，主張成立五百個敢死先鋒隊，先在城內發難，佔領軍械局。

奪取槍械，免得臨時發生問題。現在克強等爲了實際的需要，敢死隊的組織，把預定的名額擴充到八百人，派鄧明德運動督署衛隊，葉挺芬運動督署號房，敢死隊的組織，非常嚴密，是這次起義的基本武力。

民軍方面，早經朱執信和胡毅生聯絡就緒；各地方也都派定負責同志，如番禺有李福林等；南海有陸領等；三水有陸蘭清等；順德有譚義等。惠州位於省城上游，形勢最爲重要，也派羅熾揚等主持一切。至於海軍、警察和其他各方面，也有嚴密的聯絡。

各方面的部署，已經相當就緒，於是三月十日統籌部在香港跑馬地三十五號機關部內，舉行發難會議，議決分爲十路進攻，由克強、趙聲、徐繼揚、陳炯明、姚雨平等分頭率領各省及華僑同志所組織的八百敢死隊，向總督署，水師行臺，督練公所，軍械局等目標進攻。並佔領南大門，小北門及龍王廟高地等重要地方。關於砲台和電信局的破壞，也派定同志負責。此外，又派放火委員，在旗界各重要地方，租了九個房子，準備臨時放火，擾亂敵心。另伏一隊於珠光里爲據守南門的應援隊。

機關部正在這極熱烈的討論發難計劃，在同一時間，溫生才在廣州，乘駐防將軍孚琦到燕塘參觀飛機的時候，突然把他鎗殺了，頓時引起了一個嚴重的局面。當時克強等籌議發難的計劃爲要消除阻力，本來也想先實行暗殺，第一個目標是水師提督李準，因爲這是滿清將領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其次便是孚琦。統籌部原派馮憶漢擔任這個工作，他因爲膽子小，不敢去，又改派盧性正擔任，盧正在廣州佈置，還沒有什麼就緒，溫生才却早已舉起手槍向這第二目標打擊了。他事前沒有和統籌部取得聯絡，在整個的發難計劃上，不免受影響，但他的革命精神，最值得敬佩的。

孫先生對於溫生才，也曾一再稱道，對他這次經過說得很詳細。孫先生說：從前溫生才在南洋做生意，有一次聽了我講話之後，便不做生意，回到廣州。當時駐防廣州的清兵，每年在瘦狗嶺會操一次。溫生才有一天在東門外，遇見滿洲將軍孚琦在瘦狗嶺看操回來（按係赴燕塘看飛機演習），他看見了孚琦的轎，便問是誰，旁人說是滿洲將軍孚琦，他便攔住孚琦的轎，用手槍把孚琦打死。溫生才因爲要排滿，殺了滿人孚琦，目的



款，不免透露了風聲，那些效忠滿清政府的漢奸——保皇黨，早已密告粵督張鳴岐，同時滿清政府亦電令粵吏嚴防，這又是使發難不能急切進行的一種困難。黨人在這緩急兩難的形勢下，策劃革命的工作，艱苦的情形，可以想見。

廣州機關部的同志，經過幾次籌劃，便決定了二十八日為發難的時期。二十五日，克強從香港趕來，準備主持大計。他因為預計日本和安南兩方面一批軍械，二十八日才能到達，到後尚須分配，於是主張展緩一日，改定二十九日為發難時期。這是不能遲延的一天了，因為各路的決死隊，已齊集廣州，若過於遲緩，非但四月初有新軍退伍，即機關亦將敗露，經費支持，也有困難，在緩急兩難之間，是最適當的一天了。

發難的時期，已經決定。其他留在香港的黨人，原定二十七二十八兩日全部趕來，克強因為風聲過緊，要他們暫時不來，已經到省的同志，也暫時解散，以避軍目，並且也有回港的。二十六日晚上，漢民在香港接到克強這樣一個電報：『省城疫發，與女勿回家』。就是要他們不要馬上進省的隱語，大家看了都相顧失色。有的同志，阻抑不住革命的情緒，還是自動的跑到廣州來。

二十七日，張鳴岐突然把巡防二營，調回了省城，以三營助守龍王廟等地。接着又一個緊要的消息，就是新軍二標士兵的槍械，已被張鳴岐沒收去了。滿清官吏這確有計劃的戒備，縱使黨人懷疑有走漏機密的可能。當時有人疑心陳鏡波已經充當了敵人的偵探，因此那晚風雲，主張改期。炯尚及電委的代表朱玉琳就這機密說的。但也有主張維持原定計劃的，不免見意紛歧。克強想到各部所為如此，非常痛心。他決定一個一個的去相率，死死拚，以謝孫先生和海外同志。一面立刻命令各部退避，免致被捕，於是請各機關部同志，先回香港，其他各部陸續退出省城，約有三百多人。克強在機關部把這許多同志遣散了以後，正在百病交集，機密將復的時候，林時爽喻培倫忽然匆匆的走進來，他們說：『因才接到警察界中的日川同志報告：滿清官吏立刻要搜查戶口了，形勢非常緊迫，萬不可改期，應該先發制人，以圖自救。』克強聽了這個緊急報告，非常興奮，立刻下了決心，準備集合三四十人攻襲督署，因此又電香港同志說：『母病稍痊，須購通草來。』這就是要港



在各路革命軍中，以克強那一路戰得最爲劇烈和勇敢。他率領了林文、何克夫等一百多人，由小東營出發，攜着槍械和炸彈，直攻總督署。所有阻擋的警兵和衛隊，殺的殺，逃的逃了。兩廣總督張鳴岐，聽見砲聲就驚掉了；克強衝到後堂，找不到一個人，在張鳴岐房間裏，祇見衣架上，還掛着他的長衫，水煙筒還是開的，他便放了一把火，把總督署燒起來。他剛走出總督署，就和李準的大軍相遇，給清兵圍住了，死傷了好些人；克強也給流彈打斷了兩隻指頭；但他還是勇敢的搏戰着，終於突出重圍，沒有受到傷害。又臨時分三路進攻，第一路令徐維揚率花縣同志數十人，出小北門，準備和新軍接應；第二路令川閣及南洋同志數十人，進攻督練公所。第三路由他自己率領方聲洞、羅仲靈、朱執信等十人出大南門，準備和防營接應。

克強和方聲洞等，戰至雙門底；就與防營相遇。防營哨官溫帶雄等，本來已經和黨人聯絡好了，準備到水師行台去攻打李準，但沒有到達水師行台以前，暫時不帶符號，以免阻礙。聲洞不曉得這個內幕，他看見防營的士兵，都沒有佩帶符號，便鎗把溫帶雄殺死，防營士兵，也還槍擊聲洞，聲洞不幸殉難！克強且戰且前，他回頭來一看，沒有見到一個人，就衝進了一家洋貨店，還是從門內出兩槍左右射擊，打中了防營士兵七八人。等到防營退散，他才知道自己是負傷了。革命軍和防營的接應，因此失敗了！

川閣同志攻督練公所的一路，在蓮塘街口奮勇接戰，起先也打了勝仗，清兵死傷的很多。至夜九時，轉戰大石街，終因勢無援，出小北門，又與旗兵警察相戰，堅持二時，以夜深彈盡，先後潰敗。

在小北門接應新軍的一路，走不到多遠，就見敵軍分批過來，因此在德宣街口就發生衝突，大戰於蓮塘街口。敵軍居高臨下，佔了有利形勢。革命軍即由蓮塘街轉入大石街的機關部，燒登屋頂，向觀音山射擊。轉戰至小北門高陽里口，又遇見了一隊的防營趕來，他們就在一家米店裏，把米袋做了堡壘，奮勇抵抗，相持一日夜。張鳴岐見黨人強頑不屈，竟下令燒街，黨人不得已，才越牆而走，這一路又完全失敗。

經營五月，集全黨力量，在廣州轟轟烈烈的起義，到這時又宣告失敗，這是孫先生革命的第十次失敗，他即是最後的一次失敗。



孫先生在失敗後的第二天三十日，剛剛到達芝加哥，當天的美國報紙已經把這個消息發表了出來；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打擊，孫先生非常着急，立刻發電香港慰問，並探聽消息。這電文說：「抵芝加哥聞敗。同志如何？何以善後？」但孫先生的內心，還是不斷地貫注在廣州、香港的各同志身上，他自發電以後，因為不能立刻得到回音，始終放心不下，雖然天天到處演講開會，在和藹的面容上，却不能遮盖了他的憂愁。

到四月四日，香港的覆電，在孫先生急切的盼望中，終於到了。孫先生急忙找梅喬林翻譯，這電文的首句是：

「克伯展歸。」孫先生看了，立刻現出愉快的笑容。並且高聲的說：

「天下事尚可爲也。」許多同志在旁邊聽了，莫明其妙，就請求講解。

「克者黃克強，伯者趙百先，展者胡展堂也。我所慮者，同人盡遠不測耳，今得安全，我心慰矣。」說着，又叫梅喬林繼續譯下去，這電報的全文是：

「克伯展歸，克夫（何克夫），克武（熊克武），執信（朱執信），力戰出險，佛山起，毅（胡毅生）或在彼。死者姓名，後報。」

孫先生所憂慮的同志安全問題，到這時才放心。這次壯烈犧牲的同志，有林文、林尹民、方聲洞等七十餘人，克強、執信等，幾經奮鬥，才能安然脫險。事後，張鳴岐下令嚴索，凡是沒有髮辮的人，概行殺戮，以洩私憤。對於死難的屍首，更十分蔑視，暴露曠野，無人收葬。後來有一個叫做潘達微的，也是革命黨的志士，他用善堂的名義，把這些爲國捐軀的烈士的屍體，收葬於城外的黃花園。因爲屍首共有七十二具，後人就叫他們叫做「黃花園七十二烈士。」

孫先生對於這次失敗，一點沒有灰心，且認爲有很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在失敗後不久，他寫信給庇能鄧澤如說：「事雖失敗，而其爲影響於全世界及海外華僑，實非常之大。由此所得之效譽，亦不可勝量。以區區十餘萬，而做出如此驚天動地之事，使吾黨之聲勢，飛騰千丈，亦甚值矣。弟敢決此次失敗之因，必定生出他

日成功之果也。這個肯定的預言，不久果然實現。在以後黃花崗烈士專略序文中，更有具體的說明：

「滿清末造，革命黨人，歷艱難險阻，以堅毅不撓之精神，與民賊相搏，殫創者屢。死事之慘，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圍攻兩廣督署之役爲最。吾黨菁華，付之一炬；其損失可謂大矣。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文藝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奔擊，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對於七十二烈士的奮鬥犧牲，更不斷地贊歎崇敬。民國十三年在嶺南大學黃花崗紀念會時說：「七十二烈士在當時立了甚麼志呢？我們雖然不能立刻知道他們的志氣。但是他們由於失敗，便頭頸流血，犧牲性命，由此便可以知道他們的志氣，最少的限度，是不惜身家性命，不管權利幸福，要做一件失敗的事。……他們在專制政體之下，昏天黑地之中，存心想爲四萬萬人服務。沒有別的方法，可以達到目的，想到無可如何之時，便以死來感動四萬萬人；爲四萬萬人來服務，做革命事業。在七十二烈士雖然是失敗，但是他們死得其所，在我們後死的人看來，還可以說是成功。」

但對於當時誤事的那些同志，始終表示痛惜。孫先生說：「當他們沒有起事之先，計劃是很周全的。如果完全實行，很可以成功。後來實行四時，因爲同志做事不好，所以失敗。同志做事不好的很多，譬如有一位同志，由黃克強派到日本去買一百枝威爾遜槍，假如廣州的同志，得到這些槍，是很可以成功的。後來他們起事，打到制台衙門之內，各處都已成功，最後失敗的原因，全是由於武備不足。」（民國十二年十二月二日歡宴各將領演說）這是革命修養和人格高下的表現，在孫先生每一次革命運動中，總是有一二個誤事的同志發現，他們實在應該愧對許多成仁取義的先烈！

孫先生在芝加哥大約逗留了一個月光景，又回到三藩市。那時主要的工作，是籌募死難同志的救卹經費和準備捲土重來的計劃。四月五日，孫先生又接到漢民的電報：「卹死救亡，善後費重，奈何？」因此，又展開了熱烈的募款運動。美洲、華僑，受了這次廣州壯烈犧牲的感召，都很踴躍捐輸。到了三藩市以後，情形更

好，當時 孫先生寫信給鄧澤如說：「金山致公總堂，雖係洪門，以反清復明爲宗旨，然向多老朽頑固，無進取之氣，故嘗與吾黨之少年勇進之輩，積不相寧。數月之前，猶反對同盟會之籌餉，美國華僑十居八九，爲洪門之徒，致公總堂一反對籌餉，則雖熱心革命者，亦不敢前。故以美國華僑之數，所集不過萬餘港銀，遠不如加拿大少數華僑之捐款。乃至羊城一役之後，見吾黨志士，捨身赴義，英勇絕倫，則頑固老朽之輩，亦因而感奮。今致公總堂，已發起籌餉，現已設立籌餉局，以專責成，想不久必能大收效果也。」那時三藩市政公堂和同盟會，由於 孫先生的號召，已經聯成一氣。籌餉局因對外關係，又名國民救濟局（Kwok Nin Chai ty Bureau）。

克強自三月二十九日失敗以後，決欲實行個人主義，和李準、張鳴岐等拚命，以振士氣。他一再來電，向 孫先生請示。孫先生恐怕他再演精衛的悲劇，極力勸阻。並且指示他可以組織暗殺機關，另派黨員担任。當籌餉局成立以後，孫先生就提議先匯款萬元給克強，充作設立暗殺機關的經費。兩個月以後，李沛基在廣州刺死將軍鳳山，就是這個暗殺機關發動的。

三月二十九日的革命，不但促進籌餉工作的順利，並且也影響到國際的觀感，使 孫先生的外交工作，更易着手。孫先生這次重遊歐美的另一任務，本來是要辦理外交，他現在就把握了這個機會，向各國當局說明中國革命的宗旨，以取得同情。這一切交涉的經過，在寫給鄧澤如的一封信中，也有提到：「又經羊城一役之後，外交亦易入手。弟曾着人直說美國政府，著大表同情。今已使人往英，以說彼中權要，想必能得當。法國政府，則向已有同情者也。如是吾黨今日，可決英、美、法三國政府，必樂觀吾黨之成事。則吾黨之計，必無藉端干涉之舉，且必能方阻他國之干涉也。」這是很重要的一着，武昌起義以後，沒有引起各國的干涉，臨時政府很順利的成立，就是 孫先生這時努力外交工作所得的結果。

孫先生半生經營的革命事業，經過長時期的艱難奮鬥，到這時已經快到收獲的階段了，但他的私生活，更陷於窮境。他的家屬，自前年遷居庇能以後，每月生活費用一百元，由庇能同志集資供給。但兩位女孩子的

書，和家人的醫藥費用，就無法籌措。並且不久，這集資的辦法也沒有實行，因為孫先生覺得長貧難顧，這不是一個根本辦法。但除此以外，也沒有更妥當的辦法，因此常常接到家中告急的書信。在三藩市寫給羅澤如的信中，也提起這件事，他要求羅澤如向庇能以外的各埠，寫給十個到二十個同志，每月每人捐任五元或十元，協助家費，以減輕底菲同志的負擔。孫先生私人生活的艱苦，於此可以想見。

# 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九	一七	塚土	塚土
一二	九	丁未	乙未
二二	三	聖經	小書
二二	八	禮教	禮教
八七	五	看到不知	看到你不知
八九	一〇	華文	革命
九九	一三	光生	先生
一〇七	四	躬望	盼望
一〇九	一三	入把	入，
一一〇	一四	就他	就娶他
一一〇	一八	坪	埠
一一一	八	期日	則日
一二三	三	紙毀	紙毀
一二四	九	讓與	讓與
一七二	一五	誤	正
一七一	一六	但奔劉黨	奔劉
一七一	一六	的起義，早	起義，實際上早
一七二	三	與奮	與奮
一七七	一二	規則	規則
一八五	一一	很好的	很巧的
一八六	三	很好的	很巧的
一八七	九	五期	五期
一八九	一二	節密	節密
一九〇	八	又功將一簣的	又是功將一簣
一九三	二	陳湧，	陳湧波
一九四	八	連連	連連
一九五	二	先後	先後
一九八	二〇	四千密達	四千密達

勘誤表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

孫中山先生傳

版權  
所有

每部 精裝 國幣 元

平裝

(外埠另加包裝郵寄費)

著者 高良佐

發行人 黃大白

發行所 近基書屋

總經售 聯友出版社

成都半邊橋街六號